



#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

Série dos Livros sobre a Rota Marítima de Seda

2025 Vol. 2 No.2



暨南大學  
澳門研究院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 | 歷史文化研究所  
INTERNATIONAL (MACAU) INSTITUTE OF ACADEMIC RESEARCH |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簡介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由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聯合主辦的學術期刊，創刊於2024年6月，是中外關係史、明清史（港澳史）、海外漢學、歷史文獻、基督教傳華史及海上絲綢之路城市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研究領域的專業刊物，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2958-9657（紙質版）、2958-9665（電子版），每半年出一期。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在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登記，是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中國核心期刊（遴選）資料庫、中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Airiti 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館、港澳期刊網、澳門中文期刊論文索引收錄期刊，也是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資料庫的來源期刊，為澳門特區第一批被收錄的灣區研究類期刊。未來，為進一步加強學術影響力，將繼續申請加入其他國際期刊資料庫。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的評審和編委專家由國際知名學者組成，本刊以“立足專業、服務國家、面向世界”為辦刊方針，旨在促進相關研究領域的繁榮和發展。日後，期望能進一步把本刊建設為國際上有知名度的學術期刊。





##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編輯委員會

### 【顧問】

金國平 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學術顧問、特聘教授（內地顧問）

馮瑞龍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香港顧問）

### 【主編】

葉農 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澳門研究院院長

高勝文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院長、暨南大學  
澳門研究院特聘教授

### 【副主編】

吳青 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

### 【編委】（排名不分先後）

金國平 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學術顧問、特聘教授

普塔克（Roderich Ptak） 德國慕尼黑大學退休教授

柳若梅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馬建春 暨南大學教授

陳章喜 暨南大學教授

夏泉 暨南大學教授

楊杰 暨南大學教授

張斌 香港亞太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靳環宇 中聯辦深圳聯絡部

陳進國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袁朝暉 中國社科院世宗所副研究員

馮瑞龍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



## 目 錄

### 專題研究

---

耶穌會作品中之亞速爾等北大西洋島嶼

(德) 普塔克 (Roderich Ptak) 著; 洪堃綠譯 / 1

澳門燃料史叙事重构: 试论柴草的生活、政治与外交功能

金国平 / 12

基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清代广州十三行品牌与设计传播研究

石蒙蒙 庄细细 / 25

洪聖信仰的歷史傳承與非遺及古蹟互動關係

——以香港鴨脷洲為例的民間宗教研究 彭淑敏 / 37

### 啼音初試

---

选择、博弈与交融: 香港观光团赴内地参访活动研究 (1949-1958)

许奇塔 吴 青 / 48

考古与文献所见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珠海

孙苏宁 / 60

西方体育传华与澳门、香港关系研究

張煜堃 冯 菲 / 72

### 史海尋珍

---

佚名編著; 黃善萍點校; 葉農 金國平校注《兩粵雜存》 / 84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

2025年12月 第2卷 第2期

---

主辦單位: 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歷史文化研究所

主 編: 葉 農 高勝文

副主編: 吳 青

編 輯: 宋玉宇

印 刷: 學研出版社

---



## 耶穌會作品中之亞速爾等北大西洋島嶼

(德) 普塔克 (Roderich Ptak) 著 洪堃綠譯

【摘要】宋元時期的中國文獻提到北非馬格里布地區及其鄰近海域，但沒有明確提及北大西洋的諸多島嶼。最早向中國讀者準確介紹這些地方的是明代耶穌會的著作與地圖。文章研究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和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及書中地圖）對亞速爾群島、馬德拉群島、加那利群島等地的描述及其特點。耶穌會士發明的幾個中文地名和對這些地方的部分描述可能具有一定的象徵功能。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亞速爾群島在利氏世界地圖中位於兩側邊緣。這種呈現方式彌合了地球球形投影與中國傳統空間論（例如鄒衍等人所表達的觀點）。上述發現證實了此前漢學研究的重要論點，即耶穌會士根據中國東道主和友人的期望調整了某些地理元素和情況。這進一步引出兩個要點：第一，利瑪竇和艾儒略的觀點在“語氣”上有細微差別；簡而言之，後者似乎降低了對葡萄牙人的評價。第二，在更一般的層面上，可以發現伊斯蘭、歐洲和中國傳統地理學之間具有模糊的相似之處；這體現在部分海洋空間和各種虛構地點，尤其是北大西洋的幾個島嶼。

【关键词】《坤輿萬國全圖》；《職方外紀》；島嶼；空間特徵和象徵意義

---

著者簡介：Roderich Ptak, studied Sin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in Germany where he earned his doctoral and habilitation degrees. He was a professor and chairman of Sinology at the Ludwig - Maximilians - Universität in Munich, now retired. His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hinese maritim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history of Macao and the history of animals in traditional China.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China, the Portuguese, and the Nanyang: Oceans and Routes, Regions and Trade* (c. 1000 - 1600); *Selected Essays on Macau History and Maritime History, Die Maritime Seidenstraße, Fujian - Penghu - Taiwan: Frühe Kontakte, nach Texten zusammengfasst* (ca. 200 - 1450 n. Chr.) etc. (普塔克，德國人，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博士後，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系教授、主任（退休）；主要從事中國海交史與海洋文化、澳門史、中國古代動物史等研究；著作有《中國、葡萄牙與南洋：海洋與商路，宗教與貿易》《普塔克澳門史與海洋史論集》《海上絲綢之路》《福建 - 澎湖 - 臺灣：總結文獻中的早期接觸》等)；Hong Kunlyu, earned a master degree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from th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nd a doctoral degree in Sinolog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onn. She teaches at th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er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ransl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history (洪堃綠：北京外國語大學翻譯碩士，德國波恩大學漢學博士。現任教於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究重點為翻譯理論與實踐及翻譯史)。

## 一、從摩洛哥到大西洋群島

正如我們所知，宋元時期的中國文獻提及有關地中海周邊地區的多個名稱，甚至提到了如今的摩洛哥。此類名稱例如見於周去非的《嶺外代答》（1178 年）、趙汝适的《諸蕃志》（1225 年）以及汪大淵的《島夷誌略》（1349–1350 年）等。<sup>①</sup> 在“混一圖”類型的地圖中也可見此類名稱，例如源自阿拉伯語地名“Jabal al-Fath”和“Jabal al-Tāriq”的這不里法和達普魯。這兩個名稱應該都指的是地中海西出口的直布羅陀（Gibraltar）。<sup>②</sup> 中國地理學家從伊斯蘭世界的資料中獲得了有關上述及其他地名的知識。此外，中國也對大西洋和伊比利亞半島有所了解，但掌握的細節很少；這些信息可能同樣源自從西亞或地中海地區而來的相關人士。

大西洋世界包含多個群島，主要有亞速爾群島（Azores）、馬德拉群島（Madeira Islands）、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佛得角群島（Cape Verde Islands）和百慕大群島（Bermuda Islands）。正如傳說和古地圖所示，即便是伊斯蘭世界和歐洲的地理學家，在進入中世紀的很長時間中對上述群島也只有模糊的了解。不僅如此，除了這些群島，當時人的想象裏還有一些現實中不存在的島嶼。情況的轉變並非在朝夕之間。14 和 15 世紀時，伊斯蘭勢力受到遏制，伊比利亞半島的權力關係發生變化。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此時越來越多地向大西洋航行，進行探索。他們對大西洋世界的感知因而變得更加真切。然而，一些虛構的地點直到近代都還激發著旅行者的想象力，這些地點仍出現在 16 世紀、甚至更晚的歐洲古代地圖中。<sup>③</sup>

在中國，此類過程可能大多被忽視，或未引起重視。同樣要考慮的是，鄭和船隊曾抵達阿拉伯半島和東非，但是地中海周邊的區域對明朝皇帝無足輕重。換而言之：北京和南京對所謂的西域和通往今日土耳其的古陸路了解甚多，但在 15 和 16 世紀的中國文獻中，無法找到任何有關南歐和西北非洲廣大地區以及大西洋世界的新消息。<sup>④</sup> 這也意味著，中國學者沒有注意到歐洲眾多的“島嶼傳說”。直到耶穌會士來到中國，情況才發生改變。利瑪竇（Matteo Ricci）的《坤輿萬國全圖》、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職方外紀》和其他著作，包括之前和之後的相關作品，都涉及大西洋地區及其群島。眾所周知，這些作品使用了歐洲文獻。但利瑪竇、艾儒略等耶穌會士根據其中國友人和共同作者的期望調整了許多地理細節。他們甚至相應地修改了一些從歐洲範本中吸收而來的虛構元素。本文選取若干要素來對此進行闡釋，總結了資料中引人注目的內容。一些想法是建議性的，並非所有問題都能得以回答。第二部分討論《坤輿萬國全圖》中的亞速爾群島，即本篇短文的出發點。第三和第四部分討論其他一些群島，但不涵蓋所有群島。

① 關於中國古代資料中的北非等地名，可見 Roderich Ptak, *The Atlantic Coast of the Maghreb and the Macaronesian Islands in Chinese Sources (Song to Ming): From Zhou Qufei to Giulio Aleni*, in *Orientierungen*, vol. 23 (2023), pp. 25–92.

② 最近 Nurlan Kenzhekhmet 專門對《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等資料進行了研究；見其 *Eurasian Historical Geography as Reflected in Geographical Literature and in Maps from the 15th to the Mid-17th Centuries*, Gossenberg: Ostasien Verlag, 2021, pp. 43–44, 213. 亦見其 *The Place Names of Euro-Africa in the Kangnido*, in *The Silk Road*, vol. 14 (2016), p. 114. 達普魯也可能指另一個地方，即葡萄牙南部的塔維拉（Tavira）。關於直布羅陀歷史的資料十分豐富。早期的一本代表性著作是 Captain Frederic Sayer, *The History of Gibraltar and Its Political Relation to Events in Europe;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Moorish Dynasty in Spain to the Last Morocco War. With Original Unpublished Letters...*, London: Saunders, Otley, and Co., 1862. 該書也描述了伊斯蘭時期的直布羅陀，並提到了該地的阿拉伯語名稱，見第 6–7 頁。

③ 關於北大西洋的歷史有許多全面的描述。代表性著作包括 Andreas Obenaus, *Islamische Perspektiven der Atlantikexpansion*. vol. 1: *Der islamische Atlantikraum des mittelalterlichen Abendlandes*. vol. 2: *Islamische und christliche Atlantikerkundung im Mittelalter*, Vienna, Berlin: Verlag Turia Kant, 2013.

④ 一般來說，在明代作品中僅出現這些地區的古名，例如木蘭皮等。

首先還應進行兩點說明。當下的一些作者認為，中國船隊遠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等之前就已經抵達大西洋的多個地區。這是現代的杜撰，並無證據支持。本篇短文不對此加以討論。<sup>①</sup> 此外，耶穌會士的作品版本眾多。其版本歷史十分複雜，在此主要使用黃時鑒、龔纓晏和謝方的現代版，以及德禮賢 (Pascale D'Elia) 和保羅 (Paolo De Troia) 的翻譯版。<sup>②</sup>

## 二、亞速爾群島：名稱、象徵及其他

16 世紀前往亞洲的意大利旅行者往往對直布羅陀海峽有親身體會。耶穌會士稱之為巴爾(尔)德峽。航海路線的重要性尤其在艾儒略筆下得以凸顯，他在《職方外紀》一個單獨的部分中簡要描述了這些路線，題為“海道”。在這一簡短的部分中，艾儒略稱巴爾德峽為通往大明國或者說廣州的西向路線的起點；該路線經亞墨利加(美國)、太平海(太平洋)、馬路古(馬魯古、摩鹿加群島)和呂宋抵達中國。使用東向路線駛向亞洲的船隻則從波爾杜瓦爾國(葡萄牙)的里西波亞(里斯本)出發。<sup>③</sup> 艾儒略也以此間接指出，當時的世界依據《托德西利亞斯條約》與《薩拉戈薩條約》被劃分為兩個利益圈，分別由西班牙和葡萄牙掌控。

讓我們聚焦於必須穿行的大西洋。在前往北美洲和中美洲的航行中，歐洲船隻常常抵達亞速爾群島，該群島當時已由葡萄牙掌控。但令人驚奇的是，耶穌會士留下的資料未提及整個群島的名稱。而與預期不同，《職方外紀》也未對該群島進行詳細描述。<sup>④</sup> 原因或許並不複雜：艾儒略偏好西班牙，認為葡萄牙勢力較弱。其文本中有多處證據。<sup>⑤</sup> 應考慮當時的時代背景：在《職方外紀》成書之前的 17 世紀早期，荷屬東印度公司進擊澳門，這是傳教士團進入中國內地的中轉中心。雖然澳門抵擋住了荷蘭人在 1622 年發起的攻擊，但荷蘭人仍構成了威脅。另外，西班牙人龐迪我 (Diego [de] Pantoja, 1571 – 1618) 的文稿可能也對《職方外紀》的文本和誕生產生了影響。<sup>⑥</sup>

①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 Sheng - wei Wang, *Chinese Global Exploration In The Pre - columbian Era: Evidence from an Ancient World Map*, Singapore etc.: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23.

② Pasquale M. D'Elia, *Il mappamondo cinese del p. Matteo Ricci S. J. (Terza edizione, Pechino 1602) conservato presso la Biblioteca Vaticana*, Città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1938. 黃時鑒、龔纓晏著《利馬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意)艾儒略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1996 年)(以下簡稱《職方外紀校釋》); Giulio Aleni, *Geografia dei paesi stranieri alla Cina. Zhifang waiji (職方外紀). Testo Mappa dei diecimila paesi Wanguo quantu (萬國全圖)*, trans., ed., notes by Paolo De Troia, Brescia: Fondazione Civiltà Bresciana, Centro Giulio Aleni, 2009 (以下簡稱 Aleni/De Troia, Geografia)。關於《職方外紀》版本流傳,亦見本文第 4 頁註 3 中王永傑的文章。

③ (意)艾儒略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 5,第 157 – 158 頁。Aleni/De Troia, Geografia, Brescia: Fondazione Civiltà Bresciana, Centro Giulio Aleni, 2009, p. 198.

④ 關於葡語名稱“Açores”的起源有不同的看法。在早期的資料中可見該名稱的若干變體。在這方面也容易讓人想到馬丁·貝海姆(Martin Behaim, 1459 – 1507)及其著名的地球儀。《職方外紀》中的地圖也體現出了亞速爾群島,但未標註名稱。僅有一個例外:在《北輿地圖》上可見大西洋這一名稱,旁邊似乎有聖彌(彌)克兒島(聖米克爾島, São Miguel),即亞速爾群島的主要島嶼。參見《職方外紀校釋》,第 21 頁; Aleni/De Troia, Geografia, p. IX.

⑤ Roderich Ptak, Gedanken zu Giulio Alenis Zhifang waiji (職方外紀, 1623), *China heute*, vol. 41, no. 2/21 (2023), pp. 119 – 121.

⑥ 關於龐迪我,見 Wenceslao Soto Artuñedo, SJ (coord.), Diego de Pantoja, SJ (1571 – 1618): un puente con la China de los Ming, Aranjuez: Xerion Comunicación y Publicaciones, 2018; 葉農整理;金國平,羅慧玲,蔣薇翻譯;金國平校《耶穌會士龐迪我著述集》(*Escritos De Diego De Pantoja, S. J.*)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9 年)。關於《職方外紀》的版本,可見《職方外紀校釋·前言》與王永傑的許多著述,如其 *Explaining European Geography: The Zhifang waiji and Its Editions*, in Mario Cams. Elke Papelitzky, eds., *Remapping the World in East Asia: Towar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Ricci Map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4, pp. 79 – 102.

《坤輿萬國全圖》則不同。它是多年準備工作的成果，遠在荷蘭人在東南亞立足之前就已誕生。因此，利瑪竇可能偏好葡萄牙。一項證據是他對今日阿拉斯加和東北亞——即如今白令海峽（Bering Strait）周圍——某些名稱的排布。對此，我已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論述，並將在下文簡短回到相關內容。<sup>①</sup>

總而言之，正如開頭所述，利瑪竇熟練地“操縱”象徵與地名，其中既有來自歐洲地理學的，也有中國的。在此過程中，他也顧及當地傳統及東道主和友人的觀念。如此一來，正如我們所知，他將太平洋挪到地圖中央。大明國由此獲得“世界中心”的地位。對於當時剛開始接觸地球是球形這一陌生觀點的學者而言，這無疑是個安慰。

圍繞太平洋排布各大洲，自然意味著大西洋有一部分出現在歐洲以西的地圖左緣，另一部分出現在美洲以東的地圖右緣。因此，大西洋似乎成為了邊緣地帶，至少那些堅守舊觀念的人認為如此，而這些舊觀念可回溯到鄒衍（公元前3世紀）等人。亞速爾群島因而在地圖上被分為兩個部分：4個小圓圈或者說島嶼位於左緣，7個島嶼位於接近右緣處。右緣7座島嶼的空間佈局將一個未標註名稱的、位於略遠處的島嶼包括在內。該無名島在地圖上位於色氏測島正北處。<sup>②</sup>但這是次要問題。更重要的是，亞速爾群島和被利瑪竇稱為河摺亞諾滄的大西洋，連接了地圖的左緣和右緣。雖然略有區別，但艾儒略也使用了河摺亞諾滄這個名稱，並將其改為何摺亞諾滄海。<sup>③</sup>在此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可通過葡萄牙語的“Oceano”（或西班牙語的“Océano”）將“河（何）摺亞諾滄”回溯到希臘語的“Ōkeanós”。甚至在阿拉伯地理學中都可以找到對應的名稱“al-Bahr Uqiyānūs”，它蘊含的設想是存在一個環繞整個世界的大洋。這讓人想起了中國古代文獻中“大瀛海”的概念。<sup>④</sup>

回到島嶼的問題。色氏測島是虛構的地名，出現在諸多歐洲地圖上，例如奧特里烏斯（Abraham Ortelius, 1527 - 1598）的地圖。該中文名稱是各歐洲語言版本音譯的變體。例如（葡）“Ilha das Sete Cidades”、（西）“Isla de las Siete Ciudades”、（法）“Sept Cites”、（英）“Isle of Seven Cities”等等。這些名稱的意思都是“七城島嶼”。有關色氏測島“歷史”的一種傳說是，7位主教為逃離伊斯蘭的統治者來到這裡。據說他們在色氏測島上建起了7座“城”。如今該名稱仍以其其他形式存在於許多地方，例如，亞速爾群島的聖米格爾島（São Miguel）上有一處廣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名為七城地區。此外，該名稱與其他名稱和虛構島嶼相關聯，尤其是“Antil (l) ia”（安蒂利亞或安提利亞）和“Isle of Demons”。後者在地圖上常被置於北方遠處靠近加拿大紐芬蘭（Newfoundland）的位置，讓人想到利瑪竇地圖上的鬼島（Island of Satanazes等）。<sup>⑤</sup>

① Roderich Ptak, *Gouguo, the “Land of Dogs,” on Ricci’s World Map*, in *Monumenta Serica*, vol. 66, no. 1 (2018), pp. 83 - 84.

② “色氏測島”第二個字有時不清晰，可能會被誤認為“氏”。

③ 《坤輿萬國全圖》上還出現了大西洋和利未亞海這兩個名稱。名稱的排布方式表明，它們被視為河摺亞諾滄的一部分。《職方外紀》附有題為《萬國全圖》的地圖，其結構與《坤輿萬國全圖》相似，標註有大西洋和大東洋兩個名稱。前者位於地圖左緣，靠近歐邏巴（歐羅巴）；後者位於地圖右緣，靠近亞墨利加。這使得大西洋在南北方向上被分割開來。這種排布方式可能讓不相信地球是球形的讀者感到愉快。此外，艾儒略在《職方外紀》的“海名”部分中將海洋分為西海和東海兩類。但他沒有提及大西洋或大東洋。利未亞海和河摺亞諾滄海這兩個名稱出現在西海的類別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河摺亞諾滄海的名稱中有額外的“海”字。該名稱在利瑪竇筆下以“滄”字結尾，地位更高。參見《職方外紀校釋》卷5，第146 - 147頁；Aleni/De Troia, *Geografia*, p. 184.

④ Roderich Ptak, *The Atlantic Coast of the Maghreb and the Macaronesian Islands*, pp. 32 - 33, 54 - 55, 71.

⑤ 有許多作品涉及北大西洋中的虛構島嶼。例如 Andreas Obenaus, *Islamische Perspektiven der Atlantikexpansion*, vol. 2, pp. 259 - 264.

現在回到《坤輿萬國全圖》上的亞速爾群島。地圖右緣的7個島嶼中，有兩個分別名為第三起島和鶴島。第三起島指的是特(爾)塞拉(Terceira)，即亞速爾群島中部島群中最大的島嶼。古名第三起島不僅體現出葡語名稱(Terceira)的發音，也與其同義，即“第三個島嶼”。關於葡語名稱有多種解釋。其中一種是，亞速爾群島是繼加那利群島和馬德拉群島之後被發現的第三個群島；因此，“Terceira”可能在一段時間中指的是整個群島。古地圖也證實，該名稱有時指群島中的所有島嶼。但發現第三起島(特塞拉)本身的具體時間仍有爭議。另一種說法是，該島在一段時間中被稱為“*Ilha de Jesus Cristo das Terceiras*”，“Terceira”的名稱單純來源於此。<sup>①</sup>然而，這些細節對耶穌會士來說大概無關緊要，只要能為這個島嶼找到合適的中文名稱就足夠了。

如上所述，第三起島(特塞拉)屬於亞速爾群島的中部島群。中部島群共包括5個島嶼。西部島群和東部島群則分別有兩個島嶼。但正如我們所見，《坤輿萬國全圖》左緣出現了4個無名島嶼，而非兩個。對此可以解釋為：4個島嶼中的兩個分別是聖米格爾島(São Miguel)和聖瑪麗亞島(Santa Maria)，另外兩個看似多餘的島嶼則是福米加什(Formigas)。最後這個葡語名稱的字面意思是“螞蟻”。這是一片由北向南延伸的帶狀群礁，位於亞速爾群島東側，由一些面積狹小的無人礁岩組成。福米加什在古時被視為航海中的危險障礙。

更為困難的是劃分地圖右緣的7個島嶼。它們不以5個加兩個島嶼的組合出現，而更像是4個加3個島嶼。<sup>②</sup>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最大的島嶼名為鶴島。龔纓晏在發表於《澳門學》的一篇短文中嘗試解釋這一名稱。根據他的看法，鶴島的名稱與百慕大群島有關。發現該群島的據說是胡安·德·百慕德斯(Juan de Bermúdez, 約1450—1520)，其帆船名為“*La Garza*”。因此百慕大在一段時間中也被稱為“*Garza*”或“*Garça*”。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 1512 - 1594)有言：“*Barmuda sive Garça*”。“*Garza*”在西語中的本義是“蒼鷺”(學名：*Ardea cinerea*)。龔纓晏因而將上述句子翻譯為：“百慕大，即‘蒼鷺’島”。按照文中的說法，奧特里烏斯等人後來對鶴島和百慕大加以區分，利瑪竇可能以此為參照，但使用了“鶴”而非“蒼鷺”作為名稱。<sup>③</sup>考慮到兩者外形相似，這種解釋可能是正確的。但鶴和蒼鷺在分類上分別屬於鷺科(學名：*Ardeidae*)和鶴科(學名：*Gruidae*)。我們不清楚利瑪竇是否了解這一區別。因此，關於鶴島的中文名稱還有另一種解釋的可能性，為此需要進一步展開。

亞速爾群島中最小的島嶼名為科爾武島(又稱科爾沃島, Corvo)。該葡語名稱意為“烏鴉”。它和弗洛雷斯島(Flores)同屬亞速爾群島的西部島群。通常認為迪奧戈·特維(Diogo de Teive)

① 加斯帕·弗魯克圖索(Gaspar Frutuoso, 約1522 - 1591年)著 *Saudades da Terra* 是最早總結亞速爾群島歷史的記載之一。本書共6冊；參見 *Gaspar Frutuoso (author), João Bernardo de Oliveira Rodrigues (ed.), Saudades da terra, new ed. Ponta Delgada: Instituto Cultural de Ponta Delgada, 1998*。第一、四、六冊的部分內容涉及亞速爾群島，其餘部分和其他幾冊則著眼於加那利群島、佛得角和馬德拉群島。各部分由不同作者撰寫，各冊也有不同版本。此外，新的印刷版按照新的葡語標準將作者的名字拼寫為 Frutuoso。關於亞速爾群島歷史，還有許多新的代表性著作，例如 Artur Teodoro de Matos, Avelino de Freitas de Menezes, José Guilherme Reis, eds., *Conceição Candeias revision, História dos Açores: Do descobrimento até ao século XX. 2 vols., Angra do Heroísmo: Instituto Açoriano de Cultura, 2008*。關於特塞拉島的早期歷史，見 Rute Dias Gregório, *Terra e fortuna, os primórdios da humanização da Ilha Terceira (1450 - 1550)*, Ponta Delgada: Centro de História de Além - Mar, 2007。

② 一些16世紀的歐洲地圖相當準確地記錄了亞速爾群島，甚至包括福米加什。例如奧特里烏斯的 *Açores Insvlae (1584)*，見 <https://orteliusmaps.com/topnames/ort24.html> (05 - 08 - 2024)。

③ 湯開建等著《天主教中國化的開拓者——紀念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440週年學術筆談》，載《澳門學》2023年第2期，第35 - 38頁(即龔纓晏所寫《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之“百慕大”部分)。

在 1452 年“發現”了科爾武島。但早在 14 世紀就已有記錄模糊地提到一個同名島嶼。當然，是否能因此認為亞速爾群島的西部島群在當時已為人所知，目前尚無定論，因為相關名稱的歷史與多個虛構島嶼的名稱相互混淆。但可以確定的是，最早的移民在 16 世紀來到科爾武島。<sup>①</sup> 這一切都導向以下推測：利瑪竇了解部分相關信息，他很可能熟知葡語名稱“Corvo”。利瑪竇從意大利前往澳門時曾在里斯本停留，在船上也與來自葡萄牙的旅行者來往；此外我們知道，澳門的一些葡萄牙人來自亞速爾群島。因此，他應該有相應的消息來源。

由此產生的問題是，利瑪竇在地圖上為何不用“烏鴉島”“烏島”“烏嶼”等類似名稱來標註科爾武島？答案很簡單：“烏”和“鴉”在中國通常代表著不祥。一個不祥的島嶼位於地圖右緣，即東方，這不符合中國的傳統觀念。東方通常象徵著正面的事物，人們常將東方與海中的蓬萊等仙境聯係在一起。因此，另一種推測呼之欲出：通過使用“鶴島”而非“烏島”這一名稱，利瑪竇將“不祥”的島嶼變為“吉利”的島嶼。<sup>②</sup> 鶴象徵長壽，如此一來，世界“東”緣便存在一個具有正面象徵意義的地點。或許這也解釋了，為何利瑪竇不顧地理事實，將該島作為亞速爾群島中最大的島嶼置於群島中央。而科爾武島事實上是群島中最小的一個。當然也有可能的是，他也想到了“Garza”這個古名及其含義。如果是這樣，也許可以認為，“鶴島”這一名稱的發明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讓我們再次回到百慕大群島。百慕大群島位於亞速爾群島以西遠處稍南的位置。但《坤輿萬國全圖》將百慕大群島置於後者的西北處，利瑪竇稱之為怕霧打島。這一名稱似乎暗示該區域常因大霧而無法航行，尤其是附近的馬尾藻海（Sargasso Sea）區域。礁石也使百慕大群島難以登陸。與此相應的是艾儒略的簡短描述，他為這些島嶼選用了一個含義模糊的名稱：“百而謨達，無人居，魔叢其上，側近海無風恒起大浪，海船至次甚險。”<sup>③</sup>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在《坤輿萬國全圖》右緣，即世界東部邊緣地帶，既有危險的地方（怕霧打），也有“正面”的島嶼（例如鶴島）。很容易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找到與此相似的內容。世界地圖的西部邊緣地帶也是如此。我將在結尾部分再次論述相關內容。

### 三、“木島”與“福島”

利瑪竇稱馬德拉群島為木島，這是對“Madeira”（意為“木頭”）的翻譯，後者同時也是該群島主島的名稱。群島的第二大島為波爾圖桑塔島（或稱聖港島，Porto Santo），位於主島東北方向。《坤輿萬國全圖》顛倒了兩個島嶼的位置，將較小島置於較大島的西南方向，且未為波爾圖桑塔島標註名稱。該群島其他面積小得多的無人島並未出現在地圖上，包括德塞塔群島（Ilhas

① 關於科爾武相關傳說和歷史的早期資料，參閱 Gaspar Frutuoso, *Livro primeiro das Saudades da Terra*, New Westminster, Canada: SeaLegacy Publishing, 2005 (<https://www.sealegacy.com/pdf%20files/05%20-%20Livro%20Primeiro.pdf>; 20-07-2023), pp. 277-279, 282-283. 專著包括 Carlos Alberto Medeiros, *A Ilha do Corvo*, Lisbon: Instituto de Alta Cultura, Centro do Estudos Geograficos da Universidade de Lisboa, 1967, pp. 81-83. 亦可見 Andreas Obenaus, *Islamische Perspektiven der Atlantikexpansion*, vol. 2, pp. 296-299.

② 關於科爾武，亦可見李兆良（Lee Siu-Leung）著《再論〈坤輿萬國全圖〉的作者與明代地理大發現》2018年（<https://wap.sciencenet.cn/blog-1674084-1137628.html?mobile=1>; 22-05-2023）。但讀者必須留意，李氏發表了多篇關於利瑪竇地圖的文章和一本著作，這些著述支持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的部分想法。李氏認為《坤輿萬國全圖》能為早期中國在大西洋的活動提供證據。見其《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臺北：聯經出版社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③ 《職方外紀校釋》卷4，第139頁；Aleni/De Troia, *Geografia*, pp. 171-172.

Desertas)。同樣未在地圖上顯示的還有位於馬德拉以南約 280 千米、同屬葡萄牙的另一個群島，即薩維奇群島 (Ilhas Selvagens)。這些島嶼多岩石、貧瘠且乾燥。植被基本上只有低矮的灌木叢，儘管如此，這些小島，尤其是島上的動物，仍對現代自然研究具有意義。當然，我們難以得知利瑪竇究竟掌握多少有關薩維奇群島的信息。<sup>①</sup>

關於馬德拉，利瑪竇顯然有所了解。《坤輿萬國全圖》上的相關描述如下：“木島去波爾杜瓦爾半月程。樹木茂翳，地肥美。波爾杜瓦爾人至此，焚之八年始盡。今種葡萄釀酒絕佳。”<sup>②</sup> 尤其最後一句話值得關注。原因很簡單：馬德拉的葡萄酒自古享有盛名。這種葡萄酒耐儲存，即便隨船穿越高溫的熱帶地區也不成問題。更重要的是，葡萄酒在當時是重要的食品，甚至比水更重要，因為定期攝入酒精不僅能帶來愉悅感，也能預防船上的流行病。因此，駛向印度和中國的葡萄牙船隻上總裝載著葡萄酒桶。葡萄酒通過這種方式抵達澳門，並豐富了當地文化——或許也很快就進入到那些與耶穌會士交好的中國學者的日常生活中。因此，有關葡萄酒貿易歷史的研究文獻相當豐富，其中尤為突出的是關於馬德拉葡萄種植史的研究。<sup>③</sup>

雖然馬德拉是從里斯本到亞洲航行路線上的重要一站，但在《職方外紀》的地圖上幾乎無法辨認出這些島嶼。圖形的呈現並不清晰，無法確認西北非海岸線前的無名圓圈是否代表馬德拉群島。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職方外紀》的文本中沒有單獨的“馬德拉”條目。相反，艾儒略強調歐羅巴 (歐羅巴) 或者說地中海地區有優質葡萄酒。<sup>④</sup> 對於一個自幼對橄欖和紅酒習以為常的意大利人而言，這不足為奇。因此要再次提出的問題是，他是否有意忽略屬於葡萄牙的馬德拉群島，以此突出對西班牙的偏好？

現在讓我們轉向加那利群島。該群島的歷史十分複雜，早在被西班牙佔領前就有人居住於此。連腓尼基人、希臘人和羅馬人都知曉該群島。但中國古代文獻並未提及這些島嶼，“混一圖”類型的地圖也未對此進行標註。最早為加那利群島賦予中文名稱的是耶穌會士，他們稱其為福島。該名稱見於《坤輿萬國全圖》，以及《職方外紀》的文本和所附地圖。<sup>⑤</sup>

① 關於馬德拉群島與薩維奇群島的早期資料之一是 Gaspar Frutuoso, *Álvaro Rodrigues de Azevedo (notes), As saudades da terra. História das ilhas Porto-Sancto, Madeira, Desertas e Selvagens. Manuscrito do século XVI*, Funchal: Typ. Funchalense, 1873 (<https://archive.org/details/assaudadesdater00azeveogoo/page/n9/mode/2up>; 20-07-2023)。許多新書對馬德拉群島早期的歷史展開研究，但很少涉及薩維奇群島的情況。關於後者可以見 Alberto Vieira, *O arquipélago das Selvagens. Um mundo de ilhas portuguesas com história, Anuario de Estudios Atlánticos*, vol. 61, no. 6 (2015), pp. 1-14. (<https://www.redalyc.org/pdf/2744/274432938006.pdf>; 05-08-2024)。

② Zhang Qiong, *Making the New World Their Own: Chinese Encounters with Jesuit Science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Leiden, Boston: Brill, 2015, pp. 306-308.

③ Alberto Vieira 就馬德拉的酒史撰寫了多部著作，例如 *A vinha e o vinho na história de Madeira*, Funchal: Centro de Estudos de História do Atlântico, 2003。早期的文獻包括 Gaspar Frutuoso, *As saudades da terra*, 1873, pp. 705-711。英文研究方面有 T. Bentley Duncan, *Atlantic Islands: Madeira, the Azores and the Cape Verd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p. 25-53。Duncan 在該著作中論述酒的貿易史等問題。

④ 見《職方外紀校釋》卷 1，第 64-65 頁 (居比路，即賽普勒)；卷 2，第 68、78、93、98、99 頁 (歐羅巴、以西把尼亞 [西班牙]、亞勒瑪尼亞 [德國]、厄勒祭亞 [希臘] 的哥而府 [科孚，即 Corfu；亦名克基拉，即 Kerkyra] 等條)；Aleni/De Troia, *Geografia*, pp. 81, 87, 101, 116, 121, 122。後來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在其《坤輿圖說》中採用了《職方外紀》的許多細節；見其《坤輿圖說》，指海，叢書集成本，卷下，第 9a、10a、14b、19b、22a 頁。關於海洋中國的酒史，最近的論述見 Roderich Ptak, *Verschwommen ins Runde geblickt: jiu 酒 auf See und längs der Küsten, chine'schen und portugie'schen Texten mit Willkür entnommen (ca. 1200-1600)*, in Ptak (ed.), *Jetzt wird gefeiert Speis und Trank im alten China: Wunder, Wirkung, Wahn. Geburtstagsgabe für Marc Nürnberger*, Gossenberg: Ostasien Verlag, 2024, pp. 121-155。

⑤ 《職方外紀校釋》卷 3，第 117 頁；Aleni/De Troia, *Geografia*, pp. 146-147。

加那利群島包括7個較大的島嶼和多個較小的島嶼。在利瑪竇的地圖上只能看到3個圓圈和一個名稱，即鐵島。鐵島指西南處的小島厄爾耶羅島（亦稱埃爾希耶羅），即西語的“El Hierro”，意為“鐵”。舊時的子午線穿過該島，因此它也以子午綫島（Isla del Meridiano Cero 等）的名稱為人所知。關於鐵島還有另一個故事。在利瑪竇的地圖上可見以下簡短描述：“此島無水泉，惟一大樹，葉恒不落。每日沒，即有雲抱之，日出即散，土人于樹根跑一池，雲降成水，人畜皆資焉。”普林尼（Plinius）在其《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中就已經以“Ombrion”的名稱提及該島，他同樣提到了這棵神奇的樹，稱之為“árbol de Garoé”。這棵樹出現在許多文獻資料中。<sup>①</sup> 如今它也被雲籠罩的樣子出現在厄爾耶羅島的徽章上。

福島這一名稱的來源並不明確。它可能與西語名稱“Fuerteventura”有關。後者意為“強風”，它是位於加那利群島東北部的一個大島，如今的中文名稱為富埃特文圖拉。<sup>②</sup> 可能性更高的是另一種解釋：福島二字的組合讓人聯想到拉丁語名稱“Fortunatae Insulae”（“Fortunatas”等），意為“幸福島”，該名稱在普林尼的作品中就已經出現。與此相關的是各種神話和傳說，例如古時人們認為，死去的英雄會在這些島嶼上獲得天堂一般的安寧。但與此同時，大西洋被認為是危險的地方。太陽在此落下，黑暗在此開啟並向西蔓延。我們可以在伊斯蘭地理學中找到類似觀念，甚至中國古代文本中也對此有所體現，例如《諸蕃志》和《島夷誌略》提到的茶弼沙國。《島夷誌略》末條“異聞類聚”具有象徵性，其中寫道：“茶弼沙國日入其地，聲震雷霆”。<sup>③</sup> 有趣的還

① 許多文獻提到了這種植物，例如 Gaspar Frutuoso, *Livro primeiro das saudades da terra*, 2005, pp. 143 – 144。最早的系統研究之一為 J. Hutchinson, *The Rain Tree of Hierro, Canary Islands (Oreodaphne foetens)*, in *Bulletin of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vol. 3 (1919), pp. 153 – 164. Hutchinson, p. 154。文章引用了普林尼著《自然史》。著者指出了“El Hierro”的另一種解釋，即該名稱可能源自“heres”。這個詞的意思是“蓄水池”或“泉水”，顯然是島上當地人使用的語言（第155頁）。古代《自然史》的有關部分（拉丁文），見於 Plinius VI, ch. 37 ([https://la.wikisource.org/wiki/Naturalis\\_Historia/Liber\\_VI#XXXVII](https://la.wikisource.org/wiki/Naturalis_Historia/Liber_VI#XXXVII))。另見 Giovanni Antonio Magini, *Geografia cioè descrizione uniuersale della terra; partita in due volumi, ... Dal Latino nell' Italiano tradotta Dal R. D. Leonardo Cernoti...*, Venice: appresso Gio. Battista & Giorgio Galignani Fratelli, 1597 – 1598。喬凡尼·安東尼奧·馬吉尼的 *Geografia* 分為多冊，第二冊題為 *Moderne tavole di geografia, Dalle quali, secondo, che hogidi si troua l'Vniuerso, vedesi la faccia del Mondo, tutte le sue Parti, Prouincie, Regioni, e ciascuno suoi Imperij, & altri Dominij... dell'eccellentiss. Sig. Gio. Ant. Magini ... Tradotte Dal R. D. Leonardo Cernoti...*, pp. 146a – b。《職方外紀》在多個方面借鑒了馬吉尼的作品。許多新的著述也討論了 El Hierro 等島嶼的自然情況與歷史。例如 Alicia García García, Antonio Tejera Gaspar, *Bereberes contra Roma. Insurrecciones indígenas en el norte de África y el poblamiento de las Islas Canarias*, Santa Cruz de Tenerife: Le Canarian ediciones, 2018. pp. 119 – 124, 207 – 211。

② 黃時鑾、龔纓晏著《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05頁（地名通鑿：Forteventura）。Roderich Ptak, *The Atlantic Coast of the Maghreb and the Macaronesian Islands*, pp. 66 – 67。

③ 關於加那利群島的早期歷史，可以見較新的著作，例如 Alicia García García, Antonio Tejera Gaspar, *Bereberes contra Roma*，特別是第三章。早前有影響的著作有 Juan Álvarez Delgado, *Las Islas Afortunadas en Plinio*, *Revista de Historia Canaria*, vol. 11, no. 69 (1945), pp. 26 – 61。Felipe Fernández – Armesto, *The Canary Islands after the Conquest. 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Society in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Marcos Martínez Hernández, *Canarias en la mitología, Historia mítica del archipiélago*, Santa Cruz de Tenerife: Centro de la Cultura Popular Canaria, 1992。同著者, *Las Islas Canarias de la Antigüedad al Renacimiento*, Nuevos aspectos, Santa Cruz de Tenerife: Cabildo de Tenerife and Centro de la Cultura Popular Canaria, 1996。Alfredo Mederos Martín, Gabriel Escribano Cobo, *Las Islas Afortunadas de Juba II. Púnico – gaditanos y romano mauretanos en Canarias*, *Gerión*, vol. 20, no. 1 (2002), pp. 315 – 358。“受祝福的島嶼”是神話、歷史、文學等領域中取之不盡的主題。阿拉伯著作也提到了這樣的島嶼。例如參見 Andreas Obenaus, *Die Geheimnisse des Atlantiks und seiner Erforschung im Spiegel mittelalterlicher arabischer Quellen*, in Stephan Conermann et al. (eds.), *Geheimnis und Verborgenes im Mittelalter. Funktion, Wirkung und Spannungsfelder von okkultem Wissen, verborgenen Räumen und magischen Gegenständen*,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2021, pp. 157 – 158。關於茶弼沙國，見 Roderich Ptak, *The Atlantic Coast of the Maghreb and the Macaronesian Islands*, pp. 36 – 39, 42, 43, 48, 50, 74。

有另一個名稱。加那利群島如今的西語名稱為“Islas Canarias”，其中可能隱藏了拉丁語的“canis”一詞，後者意為“狗”。但關於“Canarias”這一名稱的確切來源，目前沒有統一的想法。此外，若耶穌會士選擇了“狗島”這樣的名稱，那麼這與該島在西方人眼中天堂一般的形象難以相容。狗在中國也不總是受到喜愛。毫無疑問，福島聽上去更令人愉悅，能引發正面的期待。

與這個正面名稱相襯的是《職方外紀》中的描述：“其地甚饒，凡生人所需，無所不有。絕無雨，而風氣滋潤，易長草木白穀，亦不煩耕種，布種自生。葡萄酒及白糖至多。西土商舶往來，必到此島市物，以為舟中之用。”<sup>①</sup> 該描述位於《職方外紀》非洲卷中單獨的一個條目。其中也提到了這些大島的具體數目——共有7個，緊接著寫到了鐵島，內容與利瑪竇在地圖上的描述類似。<sup>②</sup> 該條目末尾有簡短的附加說明，證實是天主賜予了該海島世界如此美妙的狀態。讀者可以從中得出以下結論：福島之於西班牙，正如蓬萊之於中國。

最後一組群島是佛得角群島，它對我們的主題基本上無關緊要，在此僅稍加介紹。如今的佛得角群島是遊客的天堂。當時的佛得角群島則為前往亞洲的船隻提供食物補給。但不論利瑪竇還是艾儒略，都沒有提及細節。兩人都稱此島為綠峰島，這是對“Cabo Verde”這一名稱的直譯。必須將“Cabo Verde”與“Cap Vert”結合看待，後者古名綠峰，今名佛得角半島，是塞內加爾海岸線上的一個半島。“綠”意味著植被茂密，但從今天的情況看，無論是人口稠密的半島還是佛得角群島本身都並非如此。後者包括十個較大的島嶼和多個較小的島嶼。但《坤輿萬國全圖》只顯示出五個島嶼。在《職方外紀》所附的一幅地圖上，也只繪製了5個島嶼，另一幅地圖上則有9個或10個，均未標註單個島嶼的名稱。<sup>③</sup>

#### 四、極東和極西：正面與負面象徵

現在讓我們嘗試整理以上發現，通過一些補充來構建出整體圖景。本篇短文以《坤輿萬國全圖》獨特的地理投影為出發點。雖然地球是圓形的，但該地圖顧及到了傳統觀念：若忽略地球的球形，世界四周便被一片巨大的海洋以及或危險或美妙的地方所包圍。與此相符的是亞速爾群島和河摺亞諾滄的分佈情況，它們跨越地圖左（西）緣和右（東）緣。兩者既相連又分離。葡萄牙的木島和西班牙的福島、鐵島是位於“極西”的具有正面意義的島嶼：葡萄酒和豐美的自然環境證實了它們如天堂一般美妙。

與之略有不同的是《職方外紀》中的呈現，海洋在那裡的分佈情況稍有不同。在題為《萬國全圖》的地圖上，同樣可以在地球邊緣找到大西洋和大東洋這兩個名稱。<sup>④</sup> 此外，葡萄牙的島嶼在艾儒略看來並不重要，他凸顯的是西班牙的福島。與此相應，他將以西把尼亞列為歐羅巴卷中的首個國家。在相關描述的末尾可以讀到：“以西把尼亞屬國大者二十餘，中下共百餘。其在最西

① 《職方外紀校釋》卷3，第117頁。Aleni/De Troia, Geografia, pp. 146 – 147.

② 《職方外紀》中的一張地圖似乎也顯示了7個島嶼。見 Aleni/De Troia, Geografia, p. XL.

③ 《職方外紀校釋》，第25、26頁。Aleni/De Troia, Geografia, pp. XL, XLIX; Lu Huizhong, Gianfranco Cretti, *Una nuova accurata ricerca sul planisfero di Giulio Aleni S. J.*, Quaderni del Centro Giulio Aleni, vol. 5 (2018), p. 33. 佛得角歷史的早期描述之一出現在 Gaspar Frutuoso 的書中，見其 *Livro primeiro das saudades da terra*, 2005, pp. 163 及以下。

④ 見《職方外紀校釋》卷5，第146 – 147頁。Aleni/De Troia, Geografia, p. 184（亦見上文註13）。關於《萬國全圖》可以見龔纓晏著《艾儒略“萬國全圖”研究》，載《澳門歷史研究》2015年第14期，第54 – 72頁。Mario Cams, Elke Papelitzky, *Giulio Aleni's Map Sheet: Exploring the Contents and Materiality of the only Known Ming'era Print*,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eries 3 (2025), pp. 1 – 20.

者曰波爾杜瓦爾……”。“其”字十分關鍵：這是否意味著，葡萄牙（波爾杜瓦爾）是“中下屬國”之一？或者著者只是想表達，葡萄牙位於伊比利半島之西？回顧歷史，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580至1640年間都由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統治。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夥伴關係，但兩個殖民帝國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彼此獨立。在該體系中，艾儒略對西班牙的偏好顯而易見。此外引人注意的是，“屬國”是中國古代文獻中十分常見的說法。例如在《職方外紀》的亞細亞卷中可見：“至中華朝貢屬國，如韃靼、……之類，俱悉《一統志》中，亦不復贅。”<sup>①</sup>此處的說法含義模糊。作者只列出了八個名稱，其餘的“朝貢屬國”則見於《大明一統志》等類似資料。而如上述引文所示，以西把尼亞卻有超過一百個“屬國”。從中可以得出兩種結論：著者可能暗示西班牙的殖民地等同於中國的“屬國”，但通過使用“朝貢屬國”這一類別和提示未列出的國家，保留了餘地；另一種可能性是，他或許想暗示西班牙比中國強盛。我們無法確定當時讀者對此有何反應。令人欣慰的則是幾處關於“葡萄酒”的提示：不僅是大西洋島嶼，而是整個歐洲各處都有葡萄酒。《職方外紀》在這方面還寫道：歐洲人和中國人一樣，都重視教育、倫理和道德。不僅如此，歐洲人還注重適量飲酒：“其國俗雖多酒，但會客不以勸飲為禮。偶犯醉者，終身以為詬辱。”這讓人想到《論語》中的名句“酒無量，不及亂”。艾儒略試圖為歐洲塑造正面形象。簡而言之，整個極西可與中國媲美。<sup>②</sup>

讓我們回到利瑪竇。鶴島的名稱能引發正面的聯想。根據該島的排布方式，可將它歸入遠東或遠西，它隱約讓人想到古老傳說中的蓬萊群島。利瑪竇對聯想和虛構元素的操縱廣為人知，前文也已有所提及。相關例子還有女人國、矮人國、夜叉國、流鬼、狗國等名稱，這些名稱都出现在了《坤輿萬國全圖》上。<sup>③</sup>此處重要的有兩點：其中有些名稱出現在地圖邊緣；此外，它們常常具有負面含義，也就是說，利瑪竇筆下的名稱絕非僅具有正面含義。

其中的一個例子是“狗”字。從語音上看，“狗”可能讓人想到歐洲和伊斯蘭古代文獻中邪惡的“歌革”（Gog）和“瑪各”（Magog）。這些名稱常出現在地圖中的亞洲東北部。稍微發揮想象力，甚至可以從“狗”字聯想到西班牙。前文已提及兩者關係。對此僅提出兩三點想法：西班牙人探索了北美的西海岸，他們從馬尼拉經日本航行至墨西哥；因此利瑪竇認為他們活躍在北太平洋。此外，馬尼拉曾意圖攻擊中國。少數在澳門的知情人士必然深感擔憂，利瑪竇似乎也對西班牙人持排斥態度。<sup>④</sup>

利瑪竇帶來的驚喜不止於此。他在太平洋中標註出了無福島，包含4個島嶼。在這些島嶼以北略遠處可見大東洋的名稱（如前所述，利瑪竇和艾儒略以不同的方式使用這些名稱）。《坤輿萬國全圖》上的一處簡短描述指出，斐迪南·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 1480–1521）曾抵達無人居住的無福島。這個地名或許指的是智利海岸以西約400千米處的“Islas de los Desventurados”

① 《職方外紀校釋》卷1，第33頁；卷2，第78頁。馬吉尼（Magini；見注27）亦認為，葡萄牙（“La Lusitania”）是西班牙（“Spagna”）的一部分。見其 *Geografia*, vol. 2, pp. 41a, 42a.

② 《職方外紀校釋》卷2，第68頁。Aleni/De Troia, *Geografia*, p. 87; Roderich Ptak, *Gedanken zu Giulio Alenis Zhifang waiji* 職方外紀 (1623), pp. 120, 122–123.

③ 關於利瑪竇地圖上的虛構地點，可以參見葛兆光著《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記中的異域記憶——利瑪竇來華前後中國人關於異域的知識資源及其變化》，載葛兆光著《宅茲中國》（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第二節。鐘彩鈞，楊晉龍編《明清文學思想中之主體意識：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字研究所，2004年），第345–369頁。Zhang Qiong, *Making the New World Their Own*, pp. 69–75.

④ 見 Roderich Ptak, Gouguo, the “Land of Dogs”, on Ricci’s World Map (亦見本文第4頁註4)。

(Islas Desventuradas), 但也有可能是如今法屬波利尼西亞的一個或多個島嶼。<sup>①</sup> 無論如何, 麥哲倫是葡萄牙人, 但他穿越太平洋的航行卻為作為競爭對手的西班牙人效力。因此產生的疑問是, 麥哲倫、西班牙、大東洋、無福——這是否可以視為經過設計的一連串負面元素? 這是否警告大明國, 從東方而來的西班牙人可能與倭寇一樣帶來危險? 誠然還有別的看法方式: 或許東邊的無福島和西邊的福島只是“純”西班牙的對照組合, 而非別有用心? 此外, 艾儒略也提到了無福島。<sup>②</sup>

事實上, 闡釋的可能性無窮無盡。或許可以將怕霧打島和大西洋多霧的馬尾藻海與百慕大三角(又稱魔鬼三角, “Bermuda Triangle”)聯繫在一起, 關於後者有許多故事。這意味著, 極西——在《坤輿萬國全圖》的視角中則是世界東緣——暗藏著巨大的危險。此外, 中國還知曉一個類似的危險地帶, 名為尾閭。該名稱早在《莊子》中就已出現。在《嶺外代答》中, 尾閭甚至被置於東方遠處, 靠近女人國。<sup>③</sup> 後來的作品中也有類似記載。吞噬船隻和人類的巨大旋渦、怪物、海妖、龍和惡魔——這些元素廣泛地存在於許多文化的航海故事中。同樣有趣的是, 利瑪竇在世時, 中國誕生了長篇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該小說描繪了鄭和的航海旅行。在小說接近末尾處, 鄭和的船隊航行穿過一片幽暗的海洋, 它位於西方遠處的世界邊緣。那裡濃霧瀰漫, 幾乎沒有光線。這讓人想起太陽落下的那個遙遠地帶。最後, 船隊抵達由閻羅王統治的豐都鬼國。<sup>④</sup> 此處同樣可以與關於惡魔島和其他現象的歐洲古代傳說進行類比。

## 結 論

讓我們來進行總結: 我們的思考始於大西洋島嶼。早期的中國作品未曾提及這些島嶼, 是耶穌會士首次向中國同行介紹了相關信息。可以單獨研究耶穌會地理學的這一部分, 並簡要總結相關事實。或者, 也可以像本篇短文一樣, 發掘象徵意義和暗示, 這些是利瑪竇獨自或與中國友人共同構建的複雜全景的一部分。更早或更晚的同類作品可以為此提供幫助。艾儒略同樣受到新鮮觀點啟發, 但他在地理呈現中體現出不同的色彩。儘管如此, 兩者具有相同之處: 他們了解並顧及中國友人的想法; 至少艾儒略熟知, 一壺好酒可以增進彼此的理解。

① Luis Abraham Barandica, Jesús Octavio Padilla – Hernández, 坤輿萬國全圖 *Kunyu Wanguo Quantu* (*Mapa panorámico de los diez mil países*) c. 1604. *Traducción y estudio III*, Red de Estudios Superiores Asia – Pacífico, year (año) 2, vol. 4 (2016), p. 22 (no. 14). Pasquale D’ Elia, *Il mappamondo cinese del p. Matteo Ricci S. J.*, Tavola XIII and XIV (aF). 關於麥哲倫航海行程的早期文獻, 可以見 [Antonio] Pigafetta et al., Lord Stanley of Alderly, trans., *The First Voyage 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Burt Franklin, c. 1964 (原先發表於 Works Issued by the Hakluyt Society 系列叢書, 1st ser., no. LII, 1874), 特別是 p. 9 (Genoese pilot), p. 31 (anonymous Portuguese), p. 65 (A. Pigafetta), p. 197 (M. Transylvanus), p. 222 (logbook by F. Alv [ar] o).

② 《職方外紀校釋》卷 4, 第 139 頁; Aleni, De Troia, *Geografia*, p. 172。為了紀念麥哲倫的航行, 近年出現了許多關於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西太平洋地區競爭的文章。代表性的作品可見於 Vítor Gaspar Rodrigues, Ana Paula Avelar coord., *Magalhães e Elcano e a exploração das Pacíficas às Índicas águas*, Lisbon: Academia de Marinha, 2022; Magalhães e Elcano. *Do ocaso de uma expedição à génese de um mundo global*, Lisbon: Academia de Marinha, 2023。

③ (宋) 周去非撰; 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北京: 中華書局, 1999 年) 卷一, 第 36–37 頁; 卷二, 第 75 頁。

④ 這部小說有若干版本。該小說第 86 回及以下描繪了前往鬼國的旅程和鬼國的情況。對小說這一部分的專門研究, 可見 Christiane Dahl, *Chinesische Unterweltsvorstellungen. Die Jenseitsreise des Wang Ming im Roman Die Reise in die Westmeere unter dem Eunuchen Sanbao* (1597), Dortmund: Projekt-Verlag, 1998; Roderich Ptak, *Zheng He in Mekka: Anmerkungen zum Sanbao taijian Xiyang ji tongsu yanyi*, in Claudine Salmon, Roderich Ptak (eds.), *Zheng He: Images & Perceptions, Bilder & Wahrnehmung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pp. 91–112; Thomas Zimmer, *Geographische Raumvorstellungen in China und die Rolle des Xiyang ji*, in Shi Ping (時平), Roderich Ptak 普塔克 (eds.), *Studien zum Roman Sanbao taijian Xiyang ji tongsu yanyi* =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之研究,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上海: 鄭和研究中心, 2011, pp. 39–54。



# 澳门燃料史叙事重构： 试论柴草的生活、政治与外交功能

金国平

**【摘要】** 本文旨在填补澳门燃料史中柴草贸易的研究空白，为“澳门学”开辟新视角。首先阐述柴草在人类文明中的多维作用，并回顾澳门燃料史，揭示在华南煤炭资源稀缺背景下，柴草在澳门民众生活中的核心地位。通过解读“粤澳公牒”档案，描绘了澳门柴草贸易的图景及社会管理实践，并挖掘了与其相关的澳门地名，并阐释其历史文化内涵。此外，还分析了20世纪初中葡勘界谈判中，中国如何巧妙地利用限制柴草的供应来制衡葡萄牙人。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柴草，实则成为中国政治与外交博弈的利器。最后，概述了澳门燃料结构随工业化而演变，为理解澳门社会经济变迁提供实例。

**【关键词】** 澳门燃料史；柴草贸易；粤澳公牒；能源结构变迁

## 引言

统观当前中国的学术研究，澳门学已取得诸多成果，然而在众多厚重的澳门史著作内，鲜见对澳门燃料史这一独特而重要的领域进行系统阐述与深入剖析的论文。仅在部分澳门掌故类书籍中，偶然可见相关论文寥寥数篇，但多以轶事趣闻的形式呈现，缺乏严谨的学术论文。从整体上来看，澳门燃料史的学术研究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尚未形成一个研究体系。

鉴于此，本文的撰写旨在填补这一学术研究空白。通过对澳门燃料史的全面梳理与深入研究，挖掘其在澳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地位，为澳门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提供新的视角，以期推动澳门学的多元化发展。

## 一、火与柴草的历史演进

自人类文明诞生的那一刻起，火的使用便成了一股关键力量，它照亮了黑暗，引领着人类走向新的纪元。柴草，作为最古老的燃料，成为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重要资源。

通过使用柴草，人类逐渐发展出烹饪技术，改变了原始的饮食方式。这一转变不仅是饮食习惯的更替，更是人类进化历程中的关键转折点，深刻重塑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轨迹。

从生理机能层面来看，熟食的出现优化了人类的营养摄入结构。柴草火焰使食物中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营养成分充分热解与转化，更易于人体消化吸收。这一变革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使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为种群的壮大与扩散奠定了生理基础。

在生活领域，柴草作为主要燃料，改善了食物的口感和消化吸收率，扩大了可食用资源的范围，不同种类的柴草还会影响食物的烹饪效果和风味。在寒冷的环境中，柴草燃烧产生的热量为人类提供了温暖，延长了生存时间。夜晚，柴草燃烧的火光为人类提供了照明，拓展了活动时间和空间，增强了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

在生存智慧方面，火的使用与柴草的樵采、<sup>①</sup>保存及利用，激发了人类对自然现象的初步观察与思考，促使人类形成了初步的自然认知体系与思维模式。为了获取柴草，人类深入森林、山野，与自然环境互动，学会了辨识树木的种类与特性，掌握了砍伐、搬运柴草的技巧，以及在不同条件下保存的方法。这些技能反映了早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适应过程。

在生产领域，柴草是早期手工业生产的重要能源。在烧制陶瓷及炼铜冶铁等工艺中，柴草提供了高温条件，推动了人类从石器时代向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跃迁，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发展。在农业方面，柴草也具有独特的作用。一方面，焚烧柴草可以烧荒开垦、清理农田；另一方面，柴草燃烧后的灰烬富含钾等矿物质，可作为肥料提高土壤肥力，促进农作物的生长。

在社会文化领域，围绕柴草的采集、保存、分配和使用，形成了早期的社会分工与协作模式，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文明的发展。

总之，柴草的使用推动了人类生活方式、手工业发展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变革。这些变革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

## 二、柴与柴草的词义

在汉语语义体系中，柴与柴草虽有联系，但在内涵与外延上存在细微且关键的差异。柴作为与可燃木材紧密相连的词汇，构词方式为形声，由“木”字部首与“此”字声旁组成，其本义为捆束的细木小柴。在古代文献中，柴多指用于燃烧的细木柴，用途较为单一明确，主要用于满足人们日常烹饪与取暖需求。柴通常来源于树木的细枝末节，经人工捆束后便于携带使用，燃烧特性相对稳定，能为古人提供持续可靠的热源。

相比之下，柴草涵盖范围更广，不仅包括柴所指的细木柴，还将树枝、枯木、杂草等可燃物质纳入其中。杂草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易获取。虽燃烧时间短，也是重要燃料来源。此外，柴草还可指庄稼茎叶部分。庄稼茎部结构紧密，含丰富纤维素，经处理可作燃料。叶片质地柔软但表面积大，燃烧时能迅速与氧气接触，产生旺盛火焰，适用于需快速升温场合。

在日常生活中，柴草作为烹饪的重要能源，与人们的饮食紧密相连。一日三餐的烹制过程，

<sup>①</sup> 砍柴是一种职业，从业者称“樵夫”。通常生活在山区或林区，以砍柴为生的人。他们凭借自己的体力和工具，从树林中砍伐树木并将其劈成柴火，然后拿到集市上出售，以换取生活所需。樵夫这个职业在古代和近代的农村地区较为常见，随着社会发展和能源结构的改变，从业者逐渐减少。

往往离不开柴草的助力，其在传统烹调方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素有“热饮”之传统，无论是日常饮用的开水，还是茶叶冲泡，柴草都是不可或缺的能源。“柴、米、油、盐、酱、醋、茶”指代一日三餐的生活必需品，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鬻铺》所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sup>①</sup>从这一层面剖析，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民众在生活中对柴草的依赖程度更为显著。不可一日无柴草！

### 三、澳门燃料小史

华南地区，煤矿资源稀缺。澳门更是无煤可言，因此，柴草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忧柴忧米”这一俗语便是生动写照。回溯百年前，火水<sup>②</sup>（煤油）及石油气尚未广泛普及，柴草对居民而言，乃不可或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柴位居“七事”之首。清初张履祥即有“日用所急，薪、米二事为重。米取给于田，计口而食，相去不远。惟柴薪之费，相去甚远；炭及山柴为上费，树柴次之，桑条、豆萁又次之，稻柴、麦柴又次之。然麦柴又不如稻柴，以其无灰也。田家之灰，是一项肥壅。商鞅刑及弃灰秦之农事，所以山东不敌。芋茂亦无灰，以其取给于地，不待价也。总之，必待买薪而举火，难乎为家矣！”<sup>③</sup>之论。

从古至今，柴草作为燃料，为烹饪过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热能，使得食材得以加工、熟化，从而满足人类对于食物的基本需求。它不仅是烹饪技艺得以施展的物质前提，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支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柴草与人类的饮食文化紧密相连，其重要性贯穿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脉络之中，成为维系人类基本生活的重要保障。

从分类角度看，柴草主要分为木本与草本两大类。

#### （一）木本

即可供燃烧的小木枯枝。《说文》中记载：“柴，小木散材也。”<sup>④</sup>这表明木本柴在古代文献中已有体现。凭借其独特的物理特性，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关键作用，为人们的烹饪、取暖，生产等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

柴的另一种加工形式为炭。其比重较柴轻，体积小，易于搬运，可燃烧时所产生的热度较高，且火力均匀持久，烟还少，故特受消费者欢迎。澳门所处的珠江西侧香山地区曾大量生产木炭。（嘉靖）《香山县



图1 民国时挑柴人  
资料来源：“澳门记忆网”

①（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23年）下册，第168页。

② 亦称“火水油”。“杂货——在杂货中、几乎每一种商品在1888年的统计数字中都占有优势地位。煤油（火水）可能是轻微地减少，而大米则是较大地减少；但这些并不意味着这两种商品的交易在下降，仅仅表明，它们通过海关数量较前减少而已。由于煤油在厘金税则中是禁止进口，自然就有一种诱惑力使民众逃避合法途径将煤油运进国内。一小罐煤油很容易混藏在杂项食物中由旅客挑担进口。”参见《1888年拱北关贸易报告：光绪十四年》，载拱北海关志编辑委员会编《拱北关史料集》（珠海：拱北海关，1998年），第8页。

③（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35页。

④（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119页。

志》载曰：“虽竭泽而渔，罄林而薪，人力亦有之矣，然非王政也。洪武至天顺间，于山之要害处设为烽埃，编其乡民为望山夫，以瞭望寇盗，而山海之利采取有时。其后虚应故事，乃革罢之。盖山童泽涸，古今厉禁，固当如此。自花树坑以东，南台以南，多深山大林，或穷日行，空翠蒙蒙，杳无人迹。成化以前，寿星塘犹有赤虾子，如猴而人笑，木杪相牵鱼贯而下，至地乃灭。世谓仙灵窟宅以此。弘治以来，樵夫深入斤斧，以畀估客，编作筏，行深湾中，然犹不能多得巨材也，往往弃置，以其致之艰云。今则向无人迹处烟火相接矣。嘉靖中，异县豪右纠合乡氓，无所不到，其巨木以为材，其杂木悉以为炭，获利甚富，趋者益众。南台以南，山渐以童，而焚炭之气与日争赭，游息所及，劫夺随之，官不为厉禁，其谓斯何？夫以一县之微，而为一郡之所取给，山木有限，将何以堪？而舞弊之所至，大盗起而杀机张矣。是故吾心以望乎，行王道而绝祸萌者。”<sup>①</sup>

澳门周边的某些岛屿也曾向澳门提供过木炭，例如《新编中国江海险要图志》称：“利马(Lema islands)即担杆也。共五岛，由东北东至西北西，长十二迷当有半。利马乃担杆群岛总名，为香港南向第一重门户。南洋诸船来者必取道于此。……其地虽苦瘠，却有少许人家采山岩矮树，烧有木炭，运至澳门贩卖。”<sup>②</sup>

因知，在珠江口东侧的担杆列岛与澳门之间曾存在过木炭贸易。珠江口与澳门曾经有过专门运输木炭的炭船。当时，船只从澳门出发，经担杆列岛驶往福建、台湾及菲律宾等地。担杆列岛作为船只的重要中继站，为两地的木炭贸易创造了交通条件。

唐思著《澳门风物志》称，澳门也曾有过炭厂：“（青洲）区内初建之砖厂、火柴厂、炭厂、冰厂及自来水公司化验厂等，迄今只剩化验厂及冰厂，其余皆已关闭或搬迁。”<sup>③</sup>

## （二）草本

岭南多稻田。稻谷收割后，人们因地制宜，将稻草捆扎成束，用于烧火做饭。其优点是来源广泛，不过稻草燃烧时火力相对较弱，燃烧时间较短，需要频繁添加。

澳门这个城市，也曾使用稻草作为主要燃料之一。柴草作为首要生活必需品，其需求量极为庞大。在人口密度高、土地资源稀缺以及植被覆盖极其有限的澳门地区，自然界中的日用燃料可以说是零。因此，柴草贸易占据着基本生活物资的经济地位。围绕它的进口、加工、<sup>④</sup>运输以及销售等环节，已然构建起了一条完整且成熟的产业链条。“20世纪60年代前，火（煤油）炉与电炉尚未普及，澳门大多数人家都以柴炭为燃料，用作煮食烧水。澳门并无森林，小山上的稀疏树木也禁止砍伐，柴炭都得从外地运来。”<sup>⑤</sup>

①（明）邓迁主修；黄佐纂；黄健敏校注（嘉靖）《香山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卷之二，《民物志》第二，第49页。

② 陈寿彭绘；如甫译《新编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广雅书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刊本）卷之四，第7页。

③ 唐思编著《澳门风物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第34页。

④ “那时，居处附近有一家柴店，常见店中人‘破柴’，工夫很到家，姿态粗犷，将大木头放在巨型的木砧上，一手扶着木头，一手抡起七八斤重的大斧头，凌空对准木头，一砍而下，木头即一分为二；如此下去，一截大木头很快就被破成许多幼柴枝，适合一般家庭炉灶使用。柴草售价每担1元至2元，视质量而定。如客户光顾，无论远近，柴店都会派人挑柴送上门。”参见唐思编著《柴店已成历史名词》，载唐思著《澳门风物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第158页。

⑤ 陈思国著《超市取代米铺柴炭远离民居》，载《澳门杂志》2019年第30期，第30页。

在澳门，所使用的柴草几乎完全依赖进口。“柴木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广西的松柴、<sup>①</sup> 红柴。上世纪50年代以前，广西梧州<sup>②</sup>每星期有定期船班直达澳门，叫作柴炭，以运载柴炭为主，也兼运茶叶（六堡茶叶）与广西的土特产山货。二是经香港运来马来亚的坡柴。新加坡还未与马来亚分家之时，马来亚许多货物在其第一大港新加坡出口，马来亚盛产的柴炭来到港澳就称为坡柴与坡炭了。<sup>③</sup> 三是山打根的杂柴。当年山打根属婆罗洲（今属马来西亚），故也称婆罗洲柴，同样经香港到澳门。内港近司打口有柴船尾街，此处原是北港海滨，想必是柴炭船多在此靠岸，故有此街名。”<sup>④</sup>



图2 妇女挑柴草行街  
资料来源：“澳门记忆网”

柴草的价格，随着质量的不同而变化。“昔日柴炭价格以坡柴最贵，松柴最普遍，尤其受饭店食肆欢迎。松木含有丰富的油脂，易于燃点，火光猛，是人们喜爱的燃料。”<sup>⑤</sup>

① 引者注：松柴是指松木的柴火，是一种常见的燃料，具有独特的燃烧特性和用途。松柴富含松油脂，燃烧时火焰长、热量高、灰粉少，能够使窑内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同时还会释放出特殊的松香气味。这些特性使得松柴在多个领域有着广泛的用途。在陶瓷烧制领域，松柴是景德镇传统柴窑烧制陶瓷的主要燃料。由于其火焰长、热量高且灰粉少，松柴能够使瓷器表面形成独特的釉色和肌理。例如，景德镇的“松纳柴器”艺术柴窑，就是利用松柴烧制出具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效果的陶瓷作品，深受人们喜爱。除了陶瓷烧制，松柴还在茶叶加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化黑茶和正山小种红茶的加工过程中，松柴被用于明火干燥工艺。松柴燃烧时释放的松香气味能够渗透到茶叶中，赋予茶叶独特的风味，这也是这些茶叶区别于其他茶叶的重要特征之一。此外，在一些地区，松柴也曾是居民常用的燃料，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取暖和烹饪。尽管现代燃料逐渐普及，但松柴在传统工艺中的地位仍然不可替代，它不仅是一种燃料，更是承载着传统技艺和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澳门有“松柴（Lenha inteira）”与“柴花（Lenha portida）”之名，参见一千九百零六年十一月初三日（第四十四号）《大西洋管理澳门武备局李为出投事》，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 44, SABBADO. 3 DE NOVEMBRO DE 1906, Vol. VI, p. 459. 根据葡萄牙文的意思，“松柴”是整柴的意思，而“柴花”指劈开的柴。

② 引者注：通过西江运至澳门。“柴船由肇庆下驶，在西江水面必须经过海盗窝聚之区，盗党每船勒索重费。此项生意本不甚佳，又苦于盗贼逼索，难以供应，致多停歇，故出口之柴几少150,000担。”参见拱北海关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二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载《拱北海关史料集》（珠海：拱北海关，1998年），第133页。

③ 引者注：“坡柴”和“坡炭”是港澳及南中国地区特有的传统燃料术语，源于物资匮乏、依赖传统燃料的年代，主要描述从马来亚等地进口的木柴和木炭。“坡柴”特指来自马来亚及周边地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优质木柴。在早期贸易中，这些木柴因其产地特征和卓越质量而备受推崇。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坡柴价格较高，多被中上层家庭和商业餐饮场所青睐，其出色的燃烧性能和独特质地成为其市场价值的重要保证。“坡炭”则是由坡柴经专业烧炼工艺制成的高质量木炭。这种炭火以其稳定持久的燃烧特性而闻名，广泛应用于家庭烹饪和商业领域。“坡柴”与“坡炭”常常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当时独特的燃料生态系统。受限于地理环境，港澳地区森林资源匮乏，对外地进口燃料极度依赖。马来亚等地丰富的木材资源通过海运输送，不仅满足了当地燃料需求，也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传统市场上，柴火分类极其讲究，不同种类在燃烧效率、价格和适用范围上各具特色。这一独特的燃料命名和流通体系，不仅反映了历史时期的经济形态，也见证了区域间密切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融。“坡柴”和“坡炭”不仅是简单的燃料术语，更是一个时代生活方式和经济特征的生动缩影。关于香港的柴炭业，可见陈伟玉著《新加坡木炭业的潮起潮落》，<https://sfcca.sg/2018/10/30/%E6%96%B0%E5%8A%A0%E5%9D%A1%E6%9C%A8%E7%82%AD%E4%B8%9A%E7%9A%84%E6%BD%AE%E8%B5%B7%E6%BD%AE%E8%90%BD/>；黄建发著《火炭》，载《联合晚报》1983年4月18日。老童生著《木炭业的困境》，载《联合早报》，1983年7月20日。李国梁著《火炭——唤不回的流金岁月》，载《奔向黎明》（新加坡：水木作坊，2016年），第153-162页。

④ 参见唐思编著《柴店已成历史名词》，载唐思著《澳门风物志》，第85-86页。

⑤ 参见唐思编著《柴店已成历史名词》，第86页。

不过，据研究，澳门本地也曾有极少的砍柴活动。在氹仔，“即今市区的地堡街北帝庙附近，而现今的西沙一带仍为海浸之地；其后，泥沙淤积，形成泥滩，居民到海边捕捞或上山斩柴……”<sup>①</sup>当年氹仔尚未开发，还可采樵。可想而知，人口稠密的澳门半岛绝无可能！

澳门的经济活动频繁，导致对柴草需求量巨大，进而促使其贸易成为一项重要的商业活动。柴船按照既定周期，从香山及西江沿线口岸出发，满载柴草驶向澳门内港码头。抵达后，工人们有序地将柴草从船上搬运至岸边，再依据既定配送路线，分送至各处柴店。

柴铺<sup>②</sup>承担着为城市居民提供能源的重要职能，乃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历史上，澳城曾柴铺林立。“从前，柴铺到处皆是，遍布各区，且不少与米铺杂货铺相贴而邻。”<sup>③</sup>

直至20世纪80年代，“柴炭店”仍在开业经营，数量还多达14家。这一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柴铺在澳门商业体系中尚未完全被“液体燃料”店所取代。

403 澳門工商年鑑														
達誠 拱形馬路(木屋) 電話：七二六〇六	廣興 鏡湖馬路一二三號	聯興 鏡湖馬路一一六號	益隆 通商新街七號 電話：七二二五九	榮利 鏡湖馬路一百號	榮記 沙梨頭海邊街一五號	遠和 庇山耶街卅八號 電話：七三六八八	李祥 下環貨倉街 電話：七三二一九	永同 亞美打利卑盧圍二號	永利 提督馬路四號 電話：七五六一二	◆◆◆◆◆ 柴炭店 ◆◆◆◆◆				清平直街五號 主理人：李社帖

图3 《澳门工商年鉴》载柴炭店信息表

资料来源：《澳门工商年鉴》（第十五回）<sup>④</sup>

据唐思著《澳门风物志》所透露的信息：“目前，炭店尚见一两家，柴店却已难觅，要是用柴草的话，只有去杉栏、船厂购买废木料。”<sup>⑤</sup>

#### 四、“粤澳公牒”中的柴草贸易

在里斯本国家档案馆中珍藏着一批珍贵的汉语及葡语文献——“粤澳公牒”（chapas sínicas），<sup>⑥</sup>其中包含3份档案涉及柴草事。本文将对其进行抄录，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析读，以期揭

① 唐思编著《氹仔地貌百年变迁》，载唐思著《澳门风物志》，第6页。关于香港使用“坡柴”的情况，可见饶玖才著：香港野外学会策划《柴和炭》，载《香港旧风物》（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第85-91页。

② 在1879年为申领牌照，收公钞而公布的店铺分类当中可见“柴草铺”（carvoeiro），参见一千八百八十年七月十二日（第二十八号附报），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º28, OUINTA - FEIRA, 14 DE JULHO DE 1887, Vol. XXXIII, p. 200. 根据“公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第十七号宪报颁行、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十月三十日上海准行之澳门抽收公钞章程”，“下等柴店”、“中等柴店”及“上等柴店”分别“领牌银数”为“四元八毫”“五元四毫”及“六元六毛”。参见大西洋澳门国课官柯为晓谕事，一千九百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五十二号），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SABBADO, 29 DE DEZEMBRO DE 1906, Vol. VI, p. 550.

③ 黄德鸿著《柴船尾无柴船》，载《澳门掌故》（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87页。

④ 澳门工商年鉴编辑部编《澳门工商年鉴》（澳门：大众报，1983年），第十五回，第403页。

⑤ 唐思编著《柴店已成历史名词》，载唐思著《澳门风物志》，第158页。

⑥ 近年来，“粤澳公牒”（即“清代澳门中文档案”）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卢春晖博士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2024年，他在澳门大学葡语系完成了题为“Tradutor como Mediador: Interações Sino-Portuguesas em Macau (1749-1846)”的博士论文。此外，他还发表了数篇相关论文，例如《清代粤澳公牒：一部“澳门学”百科全书》，载《澳门历史研究》2020年第19期，第305-316页。另一篇论文《从原文到译文：“东波塔”中葡档案文体研究》（印刷中）。

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为相关研究提供历史文献支撑。

### 1. 香山县丞顾嵩为飭查额船黑蕃梢私将硫磺与区伦坤等换柴事行理事官牌

(乾隆十一年二月初五日, 1746. 2. 24)

香山县左堂加一级顾, 报明拿获私磺事:

乾隆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 准本县正堂张牒: 乾隆十一年正月初十日, 据差役高超禀报, 在澳门青洲海面查追私磺犯人, 至赤洲海面, 被汛兵擒获情由。到县并准香协右营守府吴, 解犯人区伦坤、张泽有、区观章, 硫磺十六小包, 船一只过县。准此, 当经讯据区伦坤等供: 上年十一月, 合作杨洪奇往老万山砍柴去卖, 经过上下村海面, 遇寄水洋船, 有黑鬼子向小的们买柴, 没银子, 止将硫磺六百七十斤折作柴价换买。等情。业经差拘杨洪奇前来, 供认不讳在案。除录通报外, 所有运磺鬼子, 合就移解。备移过厅, 烦照事理, 希查明何号洋船将硫磺与区伦坤等, 换柴鬼子拿过县, 以便并审详究。请勿有迟。等因。准此, 合行飭查。为此, 牌行该夷目, 照依事理, 即便查明上年十一月寄水上村海面何号洋船将硫磺与区伦坤等换柴? 换黑鬼子是何姓名? 曾否开行? 克日确切查实, 禀复本厅, 以凭移复核夺。毋得诿延。速速。须牌。

右牌行夷目准此, 乾隆十一年二月初五日, 厅行: 限即日缴。<sup>①</sup>

乾隆十一年二月初五日(1746年2月24日), 香山县县丞针对香山县正堂张牒所提及之私磺案, 详尽记录并给出后续处理指示。此案涉及柴草换磺案。老万山为事件核心地理节点。华人区伦坤、张泽有、区观章3人, 前往该地砍柴, 却在上下村海面与洋船上的“黑鬼子”进行硫磺换柴交易。他们被汛兵擒获并送至县衙审讯。硫磺乃重要化工原料, 用于火药制作; 柴草则是基本燃料。中国官方严厉打击私下交换行为, 旨在防止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料流入民间。文献显示, 当时澳门周边岛屿是澳门樵集柴草之地。老万山等较远岛屿都在采集范围内, 临近的岛屿如横琴、路环及对面山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 2. 香山县丞贾奕曾为黑奴打伤杨亚熙等事下理事官谕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1795. 1. 10)

特授香山分县加三级贾, 谕夷目委离多等知悉:

现准本县正堂李移: 据澳门四乡地保吴厚禀称: 十二月十三日有北山村民人杨亚熙因装柴草来澳发卖, 偶将夷人小三板撞着, 被夷人黑奴拖至门口, 用棍打伤, 现在夷目委离多请医调治。等情。到县。<sup>②</sup>

本件透露出前山与澳门之间的柴草贸易以及香山县丞贾奕处理相关冲突事件的始末。前山扮演着柴草供应者的角色, 而澳门则是消费市场。

华民杨亚熙在运输柴草至澳门销售的过程中, 与夷人黑奴发生冲突并遭到打伤, 这一事件凸显了当时因小纠纷极易引发严重冲突的紧张局势。香山县迅速介入此事并进行妥善处理。他向夷目发出谕令, 不仅反映出当时地方政府与夷人之间存在较为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 更彰显了中国

<sup>①</sup> 刘芳辑; 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澳门: 澳门基金会, 1999年)上册, 第207页。

<sup>②</sup> 刘芳辑; 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 第321页。

官方在地方事务管理中的权威性和主权行使。

### 3. 东布政使曾燠等会议详驳判事官眉额带禀请十七条议

(嘉庆十五年, 1810)

……又、据禀：澳居民稠密，旷野无多，凡有燬船咯水，飭令前往口外山陬，不许就澳海傍。而卖草之人，只许挑担，不宜坐市屯卖，庶口岸不致淤塞，而火患亦可省忧。求飭定章程永办。等语。据该府厅查复：澳门居民船向在澳门对海或驾往别处洗刷，自应不准在澳附近海傍，应请严飭地方官，嗣后不时出示晓谕。至草柴最易招火，如有囤积居奇，堆放成垛，火患堪虞，亦应飭令地方官随时严行查禁。<sup>①</sup>

广东布政使曾燠等人对澳门王室大法官眉额带历所提出的十七条请求进行了答复。其中一条回答明确指出，仅允许卖草者沿街挑担售卖，不提倡“坐市屯卖”，此举旨在预防火灾。同时，严格禁止“囤积居奇，堆放成垛”，以彻底消除火患。这份档案凸显了柴草在澳门的贸易中受到严格的管控。

葡萄牙当局因柴草囤积管理失当，导致1835年圣保禄总院火灾。自1820年起，葡萄牙国内政治格局处于剧烈动荡之中，正统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如暴风骤雨般席卷全国，其影响亦波及澳门，对当地天主教的发展历程产生了第二次重大冲击。1833年，葡萄牙宪制派在政治竞争中崭露头角，取得决定性胜利。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强烈推动下，葡萄牙毅然决然地与罗马教廷断绝了外交关系，并迅速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反教运动。

同年10月12日，时任澳门兵头的晏德那（Bernardo José Sousa Soares Andrea）签署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命令，强制所有传教士离开澳门，并对教会的财产进行了全面没收。受此影响，圣保禄（大三巴）教堂亦未能幸免，被政府征用并改造为军营，其原本的宗教功能被军事用途所取代。

然而，命运似乎对这座教堂开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玩笑。由于军队在院内厨房里囤积了大量薪柴，1835年1月26日下午6时整，一场意外的大火在教堂内肆意蔓延。这座曾经辉煌壮丽的宗教建筑在熊熊烈火中几乎被完全焚毁。唯有教堂的前壁在灾难中奇迹般地幸存下来。<sup>②</sup>如今，这座正面墙已成为澳门的地标性建筑——“大三巴牌坊”。<sup>③</sup>

## 五、煤升柴降

至20世纪40年代，煤在澳门从内地进口的各类货物中占据了最大份额，而其柴炭在排名中处于末位。“澳门进出口货物，以安南、暹罗之米，香港之糖、油、棉花、布匹、木料、五金、煤油及食品，中国之煤、盐、桔水、鲜果、瓜菜、生仁、豆类、烟叶、竹器、砖瓦，扇、席、木柴，及炭木柴和木炭，……”<sup>④</sup>该排位顺序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澳门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发生

① 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421页。

② 李鹏翥著《牌坊耗银三万两》，载李鹏翥著《澳门古今》（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第7页。

③ Gonalo Couceiro, Lucindo Ant3nio, Luis Sales Marques, Maria Jose Sena, 金国平, *Igreja de S. Paulo – Fortaleza do Monte = St. Paul’s Church – Fortress of the Monte* = 大三巴寺遗址、大炮台, Maca: Gabinete de Comunica3o Social do Governo de Macau, 1990.

④ 俞永济编《澳门指南》（澳门：商务印书馆支馆，1941年），第7页。

了显著变化。煤炭凭借其能量密度高、燃烧效率相对稳定等优势，逐渐取代柴炭，成为澳门最主要的燃料来源。与此同时，柴炭的用量呈现出急剧减少的趋势。这一现象体现了能源利用方式的进步。

## 六、废物利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一般平民百姓，劳苦大众，街坊邻里的生火炉具为木柴，坚炭，甚至山边树枝杂草，谈不上用火水（煤油）炉，鲜有今天的石油气罐式炉，遑论天然气管道炉灶。家中并非富裕，曾用柴薪木炭，但印象最深刻还是用‘木糠炉’。木糠炉，一种圆柱型桔红色，高度至脚胫半膝，半密封的炉子，靠近底部边有一个活动小灶口（供使用后扒出糠灰之用）。”<sup>①</sup>所谓“木糠”即木材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细小木屑，常用于填充材料、燃料或园艺等用途。

## 七、动物性“柴草”

“除了木材，古人常用的另一种燃料是动物的粪便。如今，在农村及资源匮乏的地方，这种习惯仍然保留着，安第斯山脉的居民和蒙古牧民更是普遍保留着这种习惯。通常，那里的孩子们负责收集动物的粪便，然后妇女们将其揉成一定的形状，并把它们放在专用的模具上晒干，这样就得到了瓦，无疑它使用起来更为方便。”<sup>②</sup>

在对能源利用方式的地域性考察中，我们看到，西藏和内蒙等地长期以来也有将牛粪作为主要燃料来源的习俗，澳门地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亦曾有以此类物质作为能源来利用的实践。这一现象反映出在不同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下，人类对于能源获取与利用途径的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西藏与内蒙古地区，由于其广袤的草原与发达的畜牧业，牛粪资源丰富。当地气候寒冷，冬季漫长，对燃料的需求量大，因此将牛粪作为燃料，既充分利用了当地丰富的废弃物资源，又满足了居民的取暖与烹饪等基本生活需求，具有较强的地域适宜性与经济合理性。而澳门地区，虽地处沿海，经济结构与西藏和内蒙古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大量养殖牛类，可作为能源的木本和草本柴草资源十分局限，也曾尝试利用牛粪作为燃料，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澳门人在能源利用方面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因为放牛的牛只要局便局。可是这些牛屎也是一宝。养牛人家将它压平放在房舍瓦背上晒干，以充柴草。虽然这些牛屎干烧起不如柴火那么旺盛，但在穷苦人家总算聊胜于无。”<sup>③</sup>

## 八、“轮柴”与“轮米”

在“柴、米、油、盐、酱、醋、茶”这7种生活必需品中，“柴”与“米”位居前两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贸易在澳门地区受到政府的特殊对待。由于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澳门政府并未对其交易施加任何限制，而是采取了完全开放的政策，允许自由买卖：

① 流星著《忆“木糠炉”》，载《华侨报》（多元档案室），2020年。这一信息承蒙蔡珮玲女士惠告，特此致谢。

② （意）安德烈·维科著；黄湘婷译《火、风和车轮》，载（意）安德烈·维科著；黄湘婷译《能源：从火到氩》（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

③ 黄德鸿著《昔日牛房今何在》，载黄德鸿著《澳门掌故》（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216页。

大西洋理事官唛嚟哆吗嚟吐为晓谕事。

照得现在本公会未准卖柴经纪，各色人等，该柴船可任便在澳卖柴，不须给嚟啡啲劳及别人费用，各宜知之。特谕。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谕。<sup>①</sup>

但在面临困境之时，对“柴”与“米”的售卖往往会被施加特定的限制措施。以20世纪40年代的澳门为例，曾出现过“轮柴”与“轮米”的独特现象。“轮柴”即民众需按照一定的顺序排队，购买限定数量的柴草；“轮米”则是依据家庭人口数量，排队按口定量购买米粮。这一举措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反映出物资短缺的严峻现实以及政府或相关机构为保障民生所采取的应急措施，旨在通过合理分配有限资源，确保民众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sup>②</sup>

## 九、与柴草运输和贸易有关的澳门地名

柴草的进口、运输以及贸易等系列活动，在澳门地名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记。这些活动所涉及的地点，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赋予了与之相关的名称，从而使澳门的地名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柴草贸易历史信息。例如，某些地名可能直接来源于柴草的停靠地或集散地而得。这些地名不仅记录了柴草产业曾经的繁荣景象，也成为了澳门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见证，让后人能够从中窥探到澳门的在柴草使用及相关经济活动方面的过往轨迹。

### （一）“柴船头”与“柴船尾街”

唐思言：“四五十年前，柴店多设在海边新街近水鸡巷一带，因对面的内港码头是柴船停泊处，入货方便。这一区，往昔俗称‘柴船头’，向西稍远掌故作家处则称‘柴船尾’。柴船由中山及西江各口岸运柴草来澳，不是天天到埗，而是三几天一‘水’，一来常有几艘，泊码头后，工人将柴草从船上搬运至岸边，堆砌如墙，以便分送各柴店。柴草品种很多，都是一截截粗大的木头，除供应本澳外，还转运香港。”<sup>③</sup>

另一掌故家黄德鸿著《澳门掌故》描述：“在百几十年前，柴船麇集停泊的水口成陆后，如今还有船尾街之名堂。”<sup>④</sup>

《澳门风物志》内有一篇专文——《柴船尾街街名追溯》。文曰：“偶翻《香山诗略》，有一首清代布衣诗人写的《柴船尾》：‘镜湖春水艇如梭，樵子渔夫逐队过。此后不忧薪似桂，载花船少载柴多。’就是当年‘柴船尾街’的写照。当时，草堆街的横巷船澳口和它一样，常泊柴船、草艇，载来的柴草，囤集于卖草地与草堆街前的斜地、沙滩待售。”<sup>⑤</sup>

### （二）“草堆街”与“卖草地街”

“草堆街”与“卖草地街”均与昔日柴草贸易密切相关。所谓“草堆”，是柴草卸船后堆放的场所。“卖草”则专指用于柴草交易的场地，是柴草贸易的核心场所。

黄德鸿描写说：“当大街已成外商集市贸易的场所时，草堆街大概还是浅滩低地。在早时，笔

① 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一月十一日（第八号），*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NOVA SERIE*. vol. 6. Macao, Sabbado, 11 de Janeiro de 1851. No. 8., p. 5.

② 黄德鸿著《昔日牛房今何在》，载黄德鸿著《澳门掌故》，第221页。

③ 唐思言著《柴店已成历史名词》，载唐思言著《澳门风物志》，第158页。

④ 黄德鸿著《柴船尾无柴船》，载黄德鸿著《澳门掌故》，第87页。

⑤ 唐思言著《柴船尾街街名追溯》，载唐思言著《澳门风物志》，第72页。

者曾说清兵曾屯驻营地大街附近，而1808年英国为争夺澳门，亦曾派兵入侵，其驻地亦在该处。据说就在那时，草堆街是从内地开来搬运柴草船只的卸货场。由于囤积大量柴草，故而以后称为草堆街。与草堆街接连不远处的卖草地，也是因买卖柴草而得名。据说当年运来柴草的乡民就是在该处交易的。”<sup>①</sup>

“柴船头街”与“柴船尾街”和“草堆街”与“卖草地街”这两对地名，堪称澳门柴草贸易历史的绝佳缩影。从其命名的由来与演变轨迹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窥见过往柴草交易的繁荣盛景。在往昔岁月里，柴草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燃料与生产物资，其贸易频繁且规模庞大，而这四地名恰似历史的坐标点，精准地标注出柴草贸易的地理与商业脉络，为后人研究与追溯那段独特的经济活动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线索与实证。

## 十、柴草的政治与外交功用

作为“七事”首位的柴，不仅是民生之本，更在20世纪初旷日持久的中葡勘界谈判<sup>②</sup>中，演变为中国制衡葡萄牙的关键战略工具。彼时，勘界谈判陷入僵局，葡萄牙寸土不让，中方遂巧妙运用限制柴草供应，“不许柴船驶入澳门”，<sup>③</sup>精准地拿捏住了葡萄牙在澳门的生存命脉。

当时的中文报刊报道说：“综此二事观之，皆曲在彼而不在我。曲既在彼，我有词专，若米也、柴也、油也、糖也、鱼也、菜也，皆彼日用所需，在在有赖于我，我无赖于彼者也。彼果出其强硬手段，我即实行种的方策以对待之，自足致其死命而有余。民受其辱久矣，苟有人心，又何乐而不为？此抑吾尤有疑勘界之事，开议者已数次，而高使概从秘密，致某不使诏，日怀疑无所为计，岂吾国民皆不足与语耶？抑必以吾民之土地断送于人，而后快其为虎作伥之计耶？”<sup>④</sup>

这并非单纯必需品的封锁，而是釜底抽薪，断绝其生存根基——纵有米粮，无柴也难以以为炊，澳门的日常生活难以以为继。这看似微不足道的柴草，实则撬动了勘界谈判的格局，成为中国在政治与外交博弈中不可忽视的砝码，迫使葡萄牙在勘界问题上束手无策，甚至动摇了其在澳门管治的根基。

在此情况下，澳门的民生受到了影响。这在1911年镜湖医院值理的禀呈中有所反映：

① 黄德鸿著《关前街有前又有后》，载唐思著《澳门掌故》，第221页。

② 中葡勘界谈判是清末时期中国与葡萄牙就澳门界址问题进行的一次重要谈判。其背景可以追溯到1557年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半岛南部约一平方千米的地方居住。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条约规定澳门界址尚未划定，需双方派员会订后再立专约，但未明确澳门的具体界址。1908年，“二辰丸”事件引发了澳门界址问题，清政府借此契机，希望通过谈判明确澳门界址。1909年7月15日，中葡双方在香港开始了勘界谈判。中方代表为高而谦，葡方代表为马沙度。葡方在谈判中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希望将北山岭、内港、对面山、氹仔、路环及大小横琴岛等，总计326平方千米的区域划归澳门，这一要求的面积是原居留地的30余倍。面对葡方的无理要求，中方代表坚持澳门半岛及其领水的主权，明确指出葡人在澳门的居住范围仅限于澳门半岛南部一小块地方。中方还曾提出将龙田、旺厦抵换氹仔、路环上占地的建议，但被葡方拒绝。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历经9次会议，因立场分歧较大，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葡方曾提议将争端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裁决，但被清政府拒绝。最终，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谈判被迫中断。此次谈判虽未成功，但清末政府在谈判中坚持主权的立场以及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应，为后续澳门问题的解决争取了有利时机。澳门界址问题继续成为悬案，直到后来通过和平谈判等方式逐步得到解决。

③ 林广志，张中鹏，陈文源主编《澳门档案馆藏晚清民国中文档案文献汇编》（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上册，第26页。

④ 《论葡人蔑视我国》（己酉七月，宣统元年，1909年8-9月），载黄鸿钊编《中葡澳门交涉史料》（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第二辑第二卷，第153页。

具禀人镜湖医院值理萧登、曹子祥等禀，为请派兵轮护送柴船到澳，以维大局而济民用事。

窃近来日用品物无以不昂，柴价之贵尤为向来所未有，现下每银壹元只买得五六十觔之□，人民嗟叹，万口同声。查其原因，盖本澳向无柴枝出产，专靠外来，今日之奇昂即由于柴船只少到，而柴船只少到则由于海面强盗繁多，动辄劫掠，其甚者或并入船被摠，所以柴船相戒不来。况今华历已届年晚之时，正为贼匪更加猖獗之际，若一旦柴贩裹足，来源顿绝，其患将有不忍言者。值理今为华人困苦计，为国澳公安计，拟自雇船前往中国西江各埠，如三水、梧州等产柴之区，多购柴觔回澳，照原价平沽，不图赢利，以消民用。惟是值理虽能不贪同人之利益，而不能防贼匪半途之劫掠未有。恳求宪台俯念民艰，派拨兵轮一艘护送商船往来，俾得购运柴枝到澳。窃计似此办法，柴价可平，每元当可得百觔上下，则阖澳民生受益甚大。伏愿迅赐批准，派兵轮随船护送澳民。幸甚！切赴大西洋澳门督宪台前。

镜湖医院赵立夫、萧登、曹子祥、余享、马瑞南、李霖初、何宝严、贺穗垣谨禀。  
辛亥年十二月十七日。①

具禀人陈卿、钟英。缘禀者等向由广西梧州府等处贩运柴炭来澳，以为居民日用伙食之需，乃近日柴炭到澳日渐稀少，几不用，且又值腾涨无已。其故皆因柴炭船路经厘厂，多方阻滞，往往船到请，延至数日始得查验放行。忖思柴炭船上伴多食繁，留难一日，即多一日使用，用愈大，则柴价必增，势所必至。各柴商因厂阻亦多裹足不前，是以柴炭之来日渐其少。为此具禀台阶，叩乞大人俯念柴炭乃澳民日所必需之物，想求恩发凭照二纸，照会两广总督部堂查照加印发还，分给者等收领，以便运来澳门。□□□□□□□□□□□□照放行，不至留难阻滞，实乃便，□□□□□□□□□□□□□□。

签名：陈卿 钟英②

中国在处理与澳门勘界事务时采取了双重攻势。一方面，中国官方明确禁止柴草进入澳门。这一措施表面上看似经济手段，但其实际影响远超经济层面，直接冲击了澳门的民生保障。柴草的禁运导致澳门居民在燃料供应上面临严重短缺，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干扰。

另一方面，澳门华人社区因燃料短缺而陷入困境，这一问题逐渐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压力。燃料短缺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民生和稳定的社会问题。中国通过这种策略，巧妙地将柴草供应问题从单纯的经济领域延伸至政治和外交层面，使其成为重要的战略工具。

## 余 言

过去，至20世纪初，澳门市民最常使用的燃料是柴草、炭和煤。这些传统固体燃料在当时是澳门家庭和商业活动的主要能源。柴草最为常见，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及生产的各个方面。这些传统燃料的供应主要依赖进口。

在20世纪初的中葡勘界谈判中，中国巧妙地将柴草供应作为制衡葡萄牙的筹码，迫使其在勘

① 林广志，张中鹏，陈文源主编《澳门档案馆藏晚清民国中文档案文献汇编》下册，第758-759页。

② 林广志，张中鹏，陈文源主编《澳门档案馆藏晚清民国中文档案文献汇编》下册，第759页。

界问题上束手无策。看似寻常的柴草，却在两国博弈中化身为一种出人意料，却极具威慑力的政治和外交武器。

事实证明，明朝将葡萄牙人从浪白滘迁至澳门，<sup>①</sup> 是一项极具远见的举措。澳门半岛的地理位置独特，其与内地紧密相连，使得葡萄牙人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内地的物资供应。这种依赖关系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还使得输澳的每一项物资都具有潜在的军事价值，可谓“万物皆可化为兵器”。

自19世纪末起，煤油开始取代传统固体燃料。1879年，澳葡政府便着手规范相关行业。1906年，澳门电力供应开启。20世纪60年代，石油气在澳门出现并逐渐全面普及。90年代末，电磁炉以其清洁保养方便、无明火特性，开始崭露锋芒，分占市场份额。澳门于2008年1月开始使用天然气。当时，来自中国海油惠州21-1气田的天然气首次经“横琴—澳门”输气管道输送至澳门，这标志着澳门电厂使用重油发电的历史结束，清洁能源利用的帷幕正式拉开。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柴草物质和化石燃料的使用期最长，煤油和电力的应用历史仅约百年，而液体和气体燃料的运用时间则更短，仅几十年。这些能源结构的更迭，生动反映了澳门社会的飞速进步与变迁。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澳门蔡珮玲女士和张中鹏博士的无私帮助，特此致谢！

---

<sup>①</sup>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研究，可见金国平著《浪白滘的史地概念变化及其在明代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新论》，载金国平著《从浪白滘到十字门——澳门水域及岛屿史地研究》（澳门：文化公所；广州：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2024年），第45-53页。



# 基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清代广州十三行 品牌与设计传播研究

石蒙蒙 庄细细

**【摘要】**随着粤海关和十三行的设立，广州成为清朝中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十三行时期的外销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发展、中华文化的世界级传播、中西艺术风格的交融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十三行外销品丰富的品类和设计特色，是艺术史中的一个断面，见证了中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生动再现了航海贸易时期中西方的社会发展状况。十三行外销品扮演了将消费文化的概念可视化到全球贸易产品的角色，是民族文化出海的代表，十三行成为一种品牌，在海外商贸领域成为代表“中国品牌”的典型。

**【关键词】**十三行；外销品；跨文化；设计传播

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广州更是成为官方指定的唯一正式对外通商口岸，也是唯一允许外国商贩停留的区域。随着粤海关和十三行的设立，广州古代的对外贸易逐步达到顶峰。“Canton”广州在全球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正是基于十三行外销品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其产品技艺水平之高和艺术风格之独特都是扬名海内外的主要原因。十三行外销品扮演了将消费文化的概念可视化到全球贸易产品的角色，见证了古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粤海关管理下的十三行外销品兼具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因此“货殖四海”，成为民族文化品牌出海的代表。

## 一、广州十三行的兴起与发展

十三行是对广东洋行的统称，关于其起源时间，有几种不同学术观点，但综合相关历史资料，十三行建立的确切年代“应该是在康熙二五年即一六八六年，那是粤海关开关第二年间的<sup>①</sup>”，随后清乾隆帝于1757年只开放了广州做对外贸易的港口城市。广州十三行吸引了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瑞典、奥地利、意大利、美国、比利时、墨西哥、秘鲁、汉堡、暹罗、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吕松等地的人来华贸易，可以发现在广州的商品贸易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著者简介：**石蒙蒙，女，博士，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副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评审专家。庄细细，女，博士，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sup>①</sup> 彭泽益著《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第20页。

对于远途贸易而言，中国对其他地区最有吸引力的大宗商品自然是茶叶和生丝，这类产品对于交通状况的要求相对较低，随着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度增强，外商的采购逐步扩展到手工产品丝绸、瓷器、漆器、壁纸、家具等多种工艺门类。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通过广州十三行得以深化和扩展。

十三行时期，清政府与外国之间的接触在这个时期基本是在商业层面。随着与国外贸易量的大增，清政府为避免与外商直接发生关系，1720年成立了一种由行商组成的公共组织——公行，随着商贸活动的频繁，在1782年最终确立了这一制度。清政府认为公行制度有其独特作用，“一方面，清政府给予参加公行的行商以承销外洋进口货物和代办内地出口货物的独占权；另一方面，公行对清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其中特别重要的几项是：它担保外商交纳税饷，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居住和行动，以及充当清政府与外商之间一切交涉的中间人”。<sup>①</sup>在这个“广州体系”中，公行的行商是负责与外国人交往的唯一代理人，行商成为一种媒介，清政府通过行商去管理外国人。与行商对应的是外国对华贸易的正规公司在广州的雇员，比如英国称之为“大班”，双方的直接对话基本上都是基于商业层面的。“公行的行商便成为广州当局唯一正式承认及合法与外国人交往的人员，而公司的特选委员会或大班则被广州当局视为外国商人在广州的代言人，并对其行为负责”。<sup>②</sup>以行商与大班为主从而形成一种平衡的局面，这是“广州体系”的基本准则。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海上丝绸之路走向全球，在遥远的欧洲，巴黎由于聚集了大量中国货物，成为了欧洲时髦的中心。中国货物大量流入欧洲，利益是商人在大航海时期运行货物的驱动力，随着在欧洲地区输入品价格的下沉，欧洲的需用市场发生激增，市场销售所能得到的利润又刺激贸易使之愈加扩大。在这个一口通商时期，各国商人、货物云集，双方物品的大量交换势必造成了商人之间的激烈竞争，除了官方认定的行商与国外公司的大班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英印港脚商和内地的的小商贩加入进来，“广州市场中外商人之间的竞争，大致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外国商人之间，即享有贸易垄断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港脚贸易的英印和英美等国自由商人之间；第二是中国商人之间，即行商与非行商之间的竞争；第三是外国商人和中国商人之间，即外商和行商与非行商之间的竞争”。<sup>③</sup>市场的繁荣和激烈的竞争致使十三行时期中国制造产品大量出口，手工艺品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迅速传播至欧洲、美洲甚至澳洲等地，比如18世纪末法国在丝绸、美术及工艺反面的欣欣向荣，实出于中国材料不断输入的刺激。对中国物产的强烈需求促使了西方出现了“中国热”，中国产品的海外输出逐步引发了欧洲等地的东方艺术潮流，深刻影响了当时的艺术风格变迁，这种新型的东方时尚体现出了东西方文化从临时接触逐步成为深层次的文化相互影响。

## 二、十三行外销品的设计特色及品牌化发展

### （一）广州十三行外销品的艺术特色

对历史唯物论和考古学的客观应用是研究传统工艺美术史的最低条件。清代的工艺美术至乾隆时期华缛至极，精巧之至，几乎是鬼斧神工般，造物造型、装饰材质之繁复，色彩之齐全，都是空前的，各种手工艺技术发展至极点。地理大发现以及西方传教者对中华文化的宣扬和美化在

① 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卷，第15页。

② 吴致谋著《“广州体系”与鸦片战争》，载《民国档案》1997年第2期，第96页。

③ 彭泽益著《清代“广州体系时期”中外商人之间的竞争》，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131页。

客观上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技艺和器物的追捧。十三行外销品的设计首先是在宫廷审美的框架之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传递出东方大国的造物理念，同时作为贸易产品也携带着大量的民间审美色彩。在外销盛况之下，广州不仅将国内其他地区的工艺品输送至海外，同时也发展了广州本地的工艺精品走向世界。

### 1、彰显中华传统经典文化的延续性

广州当地的制造业主要是象牙器业、漆器业、木器业、织布业、丝织业、制茶业、制瓷、铜铁器业等，由于商贸的繁荣，当地的制造业不断增加新品种并提高产品质量。商人们掌握着商品和市场信息，他们根据外销的变化，为适应外贸需求及时地在广州办起了出口产品的加工厂，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广州及周边区域的重要手工业部门的发展，从而正向促进广州传统手工艺产品继续广开销路。比如广东和佛山的漆器制作量大，精致秀雅，制作技艺上乘，质量和销路好。在美国东海岸重要港口城市马萨诸塞州的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藏有一幅中国漆屏风（如图1），由英国人约翰·埃克勒斯顿爵士（Sir John Eccleston）在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总裁期间于中国订制，“屏风被认定为1725年在中国广州所做。木板为芯，外饰采用黑漆描金漆工艺……风格正面表现的主题应该为郭子仪祝寿图”，<sup>①</sup>这件作品与藏于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雕漆屏风《郭子仪祝寿图漆屏风》（成于乾隆年间，1776年）场景相似（如图2）。二者在工艺技巧方面有着较强烈的地域差异。广东潮州地区的描金漆画以细腻庄重闻名，带有独特的地域特色，这种金漆画是广东传统漆艺文化的重要代表。该屏风12扇，整体高297.18厘米，宽553.72厘米，厚度为48.895厘米。屏风正面图案展示了典型的中国庭院场景，有显示“帅”字的大旗，大门前有狮子雕塑，人物动作各异，表现了有人来拜见的场景。从建筑样式来看，表现了这是高等级的官宦之家，屏风作为中国传统家具形式，大型的结构表现出主人的身份尊贵。作为订制产品，这个描金漆屏风上端绘制了订制者约翰·埃克勒斯顿家族的徽章，反映了十三行时期的典型外销产品特征。漆器屏风作为家具中的典型代表，一般正面以祝寿图为题材，反面多以耕织图为主，表现出宁静的中国田园生活，构建了美好的中国日常生活场景，让大洋彼岸的人对中国产生了无限向往。可以看出在十三行早期，外销品都是从中国人的审美出发的产品。



图1 中国漆屏风

资料来源：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PEM）藏



图2 中国雕漆屏风《郭子仪祝寿图漆屏风》

资料来源：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不仅在大型家具产品中可以发现广作工艺的细致雕刻，同时在微小工艺产品中依然有着典型的工匠精神。广州制作的阳伞风格独特多变，材质多样，有以水粉彩绘的，也有以刺绣、羽毛等

① 蔡青著《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藏中国漆屏风研究》，载《美术观察》2021年第9期，第48页。

等材料裝飾的，藏于香港藝術館的十三行廣州外銷傘（如圖3），以刺繡制成，色彩艷麗，在色彩的表達上吸收了西方油畫的藝術風格，着重變現了光影的變化，充滿了浪漫閑適的風味，花卉瑞鳥生機勃勃，體現了較強的传统中華風味。藏于廣東省博物館的清代銀錘胎徽章留白人物故事圖執壺（如圖4），做工精細，也是十三行時期的典型產品，壺的通體刻中國传统戲曲人物故事，場景豐富，壺柄是一曲身龍紋，龍口與壺口巧妙相接，底部刻有“WH”“90”款識，可見也是十三行外銷產品的典型。外銷銀器的生產在清代廣州極盛，銀器制作工艺精湛，對於喜歡使用并收藏銀器的西方人士而言，常常通過行商或者自行向當地銀器鋪訂購。



圖3 清代廣州十三行刺繡陽傘

資料來源：香港藝術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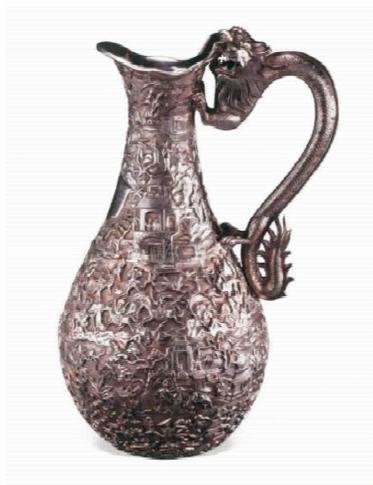


圖4 清代銀錘胎徽章留白人物故事圖執壺

資料來源：廣東省博物館

## 2、突出設計裝飾的“繁”與“滿”

極盡裝飾技巧之能事在清朝的器物設計中表現突出，清朝凝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各種精湛手工藝，加上帝王對藝術的關注和喜好，整個社會也對這種繁縟的滿飾習以為常，這種特點也體現在十三行外銷品中。十三行外銷品踐行了華美的裝飾和艷麗的設色，從器物的尺度、色彩、形態、紋樣等體現了清朝的優越感和奢侈感。在材料設計上，注重不同材料之間的設計組合，不惜採用昂貴稀缺的材料制作器物，力求在一件器物上能夠展示出不同材質之美，體現出器物的奢華，這種設計思想依然是在清朝繁縟奢華設計格局之下形成的。比如牙雕產品的雕刻細緻入微，在方寸之間也佈滿裝飾紋樣，產品表現出極致的華麗。藏于廣東省博物館的象牙雕人物信插（如圖5），作為典型的清代產品，其上部鏤空雕牡丹花紋，花心處留孔便于懸掛。四個分层也都通體雕刻錦地紋再淺浮雕人物、庭院等，邊框紋飾採用多種雕刻技法如鏤刻、淺浮雕、高浮雕、圓雕、深雕等，紋樣有人物、花卉、瓜果、瑞獸等。而這麼多繁縟的裝飾主體尺寸僅高32厘米，寬18.7厘米。又比如廣東省博物館藏銀鑲金累絲書形龍紋名片盒（如圖6），清代產品，銀鑲金的材質，西式的書籍狀，一側上方有按鈕，盒身佈滿細鑲金銀絲的網狀紋，其上雕刻粗鑲金銀絲纏枝花紋，裝飾繁縟，立體感極強。



图5 清代广东象牙雕人物信插  
资料来源：广东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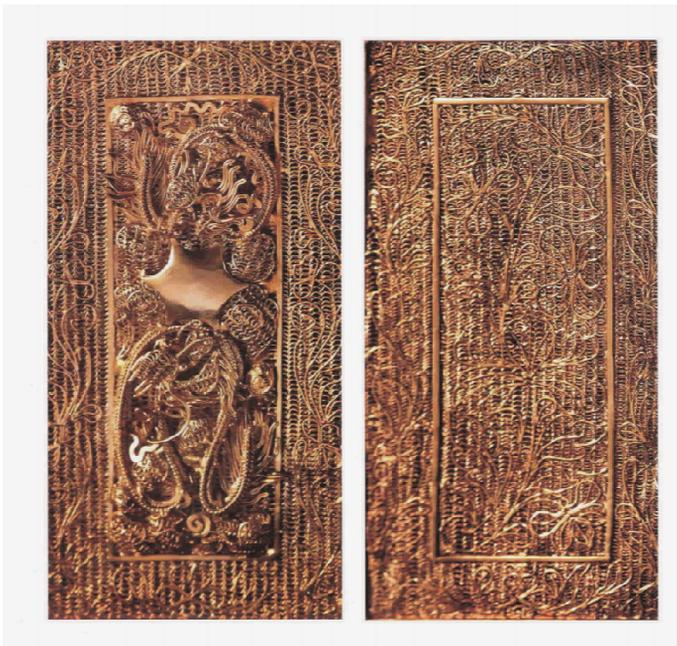


图6 清广东银鍍金累丝书形龙纹名片盒  
资料来源：广东省博物馆藏

广州十三行外销艺术品作为清代工艺美术的组成部分，显然其器物在造型装饰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十三行外销手工艺品极度追求装饰上的精巧，喜堆砌，精于雕琢，装饰反秩序、富于变化，在细节与局部的刻画上极为细致，将几千年积累的装饰技巧发挥到极致，综合了历代工艺的优秀成果。清代的纹样继续沿用古代传统吉祥纹样，但是更加强调纹样的复杂性和华丽性，体现着封建统治之下典型的东方统治者心理，即皇权和优越性。这个时期的工艺和装饰，从技巧的角度而言，精彩绝伦以致成为封建时期的工艺高峰，从风格的角度来说，它的繁缛堆砌却造成了格调平庸，流于匠气。

### 3、强化东西方视觉语言交融

伴随全球贸易航线的拓展，广东十三行作为清朝外销艺术品的生产与销售基地，品类繁多，从设计风格而言，十三行产品充满了明显的阶段特色，前期的产品洋溢着中华民族的传统风韵以及广东本地的审美趣味，后期的产品又融入了浓厚的西洋异国情调。随着商业交往的开展，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逐步体现到器物上。一方面，十三行行商由于开阔的眼界，他们在从事商务活动的同时，重视吸纳西方文化，由于行商负责商品的选定，因此他们有能力将西方文化嫁接到外销品中，比如把外国传来的素描、水彩、肖像画、铜版画等运用到外销瓷器上，创办瓷器彩绘作坊，教授画工学习西方绘画技能，从景德镇批发素胎瓷器，将欧洲绘画、纹章、风光甚至珠江风光、羊城八景、广州景观等装饰到瓷器上，制作成彩瓷。如广东省博物馆藏乾隆年间的广彩《帕里斯之审判图盘》（如图7），盘子的中心画面就是希腊神话故事的内容，盘子边沿用金彩饰瓔珞纹一周，画面绘制风格是西方油画，可以看出在十三行时期中西方之间的交流情况。广彩瓷中的另一特色就是徽章瓷的大量出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乾隆年间青花广彩徽章纹花口盘（如图8），中心图案是英国爱尔兰茶普梅因（Chapmain）家族的徽章，表示这是此家族专属定制的器具，口沿青花锦地装饰，图案则充满异域风情，表达出了十三行时期的典型中西文化交融的局面。



图7 乾隆广彩帕里斯之审判图盘

资料来源：广东省博物馆



图8 乾隆年间青花广彩徽章纹花口盘

资料来源：广东省博物馆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有几十万把扇子被销往欧洲和美国，当时西方的贵妇在参加舞会时都会以持有一把来自中国的扇子为荣”，<sup>①</sup> 高品质的外销扇以檀香木、象牙、玳瑁或者珍珠母贝做扇骨，扇骨工艺越来越繁复复杂，浮雕、镂雕工艺大量应用，在纸质或者丝质扇面上绘制图案，图案既有广州地貌、黄埔港风貌、十三行景象、中西贸易，也有西方神话故事等，在图案周围环绕花枝或者动物边饰，因此总体而言，外销扇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装饰效果，体现着清朝工艺品的发展高度。广扇体现着十三行工艺的奢华，比如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玳瑁骨纸本彩绘人物折扇（如图9），水粉色做底的扇子也是当时的一种特色，用色艳丽，突出女性化。画面呈现出典型的十三行油画风格图案，或描绘官邸家居生活，或描绘西洋人物在岭南，以及缠绕各种花卉鸟兽和吉祥纹饰。另一件广东省博物馆藏清代的红漆骨纸本彩绘人物故事瑞兽风景折扇（如图10），在绘画风格上也有鲜明的西方视觉特征，一面是各种清代人物的生活场景，且人物面部是以象牙贴制而成，画面转换有明暗区分，设色艳丽，体现着典型的十三行特色。另一面是油画风格的瑞兽场景。所以在绘制的扇面上，可以发现画面的图案显示出浓厚的西方绘画风格，这种特点在当时的蓬草画中极为流行。以羽毛作为装饰的扇子也是十三行重要的品类，如广东省博物馆藏的清代象牙骨羽描蓝填银仕女图折扇（如图11），用鹅毛与象牙骨组合成扇，图案描绘了东方女性的闲适柔美，描蓝绘制使之呈现出青花瓷的美感，而以羽毛装饰则又体现出适应西方市场的装饰之风。



图9 玳瑁骨纸本彩绘人物折扇

资料来源：广东省博物馆



图10 清代红漆骨纸本彩绘人物故事瑞兽风景折扇

资料来源：广东省博物馆



图11 清象牙骨羽描蓝填银仕女图折扇

资料来源：广东省博物馆

① (美) 卡尔·克劳斯曼著；孙越译《中国贸易的装饰艺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22页。

另一方面，来自国外消费者的订制需求，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或者“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推动力量，同时更多的是基于这两者之间的文化代理人，即参与海贸的商人、工作人员以及传教者。这些群体将中国物品携带并传播扩散至西方国家。工匠根据买方的要求更换原始图案的主体人物，比如销往欧洲的瓷器往往装饰圣经故事图，销往伊斯兰的工艺品中装饰古兰经。有时消费者会将模型式样直接拿到中国的手工艺场进行相关工艺品的定制，用中国的材料和工艺来制作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又如广州外销画是非常典型的产品，十三行的画作由中国画师绘制或应顾客的要求临摹仿制，并输出国外市场。

## （二）广州十三行外销品的品类扩张及品牌化发展

广州十三行外销品见证了古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粤海关管理下的十三行外销品兼具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因此“货殖四海”，成为民族文化品牌出海的代表。广州在十三行时期是作为中国内陆各地的物质集结地，各地大量的土特产品和手工制品汇集至广州转而进入全球市场。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大国，欧美等国的人们依靠旅居中国的人撰写的文本来认识中国，商业和文学就这样结合起来，造成一种追梦的心理状态，在十三行时期，使中国在欧洲风尚中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促进了人们对中国和中国物产的向往。随着贸易而来的国物品源源不断的涌入欧洲等国，他们通过十三行产品更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的具体感知。十三行海贸中具体的产品，成为西方各国逐步构建中国形象最重要的原材料，这些产品满足了西方社会对古老东方的“期待视域”，一定程度上，十三行大量输出向全球的中国产品减小了国外对中国认知的信息差。

中国的商业扩张为亚洲及欧洲强国建立的海上贸易网络提供了极大利益。中国瓷器的大量流通为世界范围内持续的文化接触提供了广泛的实物证据，瓷器虽然易碎，但与其作为卓越贸易对象的角色是相匹配的。它质轻、坚硬、防水，适合海上贸易，在海上贸易中，它有时也充当物理屏障，以保护更珍贵和有价值的丝绸和香料。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大量生产标准化形式和装饰的瓷器，这产生了使交易成为可能的规模经济。虽然瓷器是一种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的材料，但它只是构成早期的近现代中国商品跨国贸易的视觉和物质文化的众多类型之一。丝绸、象牙、茶叶、香料、植物和其他原材料和手工材料，如螺钿工艺、贝雕等在这一贸易中更有利可图，更显珍贵。国画、壁画、漆器、外销画、扇子、印刷产品等等也大量传播至欧洲等地。十三行将中国生活的视觉化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向国外，这些物质产品本身体现着中华的工匠文明。十三行时期的手工艺生产已经走向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比如在外销扇这个行业中，漆器、银器、瓷器、纺织、绘画、雕刻的工匠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正是多种工艺部门的合作，才造就了外销扇多种精细工艺于一身的特点。中国品牌在十三行时期扬名海外。十三行外销品的艺术和文化为欧洲人提供了一个完整体系去想象其政治、文化和宗教、风貌的机会，这些与欧洲的风貌和权力结构相比是显著优越的。十三行产品展示出来的关键特质是繁缛华丽和物质的丰饶。在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过程中，陌生的舶来品在全新的文化语境中被重新定义、诠释并进入日常生活。

鉴于中国在17世纪和18世纪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其他各国借用中国的形象来赋予自己某种帝国和文化至上的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中国漆器的特点是耐用性和持久性、防水性、防霉菌和耐热耐寒，它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褪色或变色，也不容易碎裂或折断。坚固、耐外力、经久耐用的漆器是王朝王室权威的理想材料隐喻，漆器受到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宫殿的热捧。极具东方色彩的工艺产品成为外国人竞相购买的产品，使用大型中国物品来表示与中国

的商业联系。到了18世纪中叶，将中国产品融入到更传统的装饰方案中，从贵族阶层逐步往其他阶层扩散，呈现出浓郁的“中国味道”。这种对繁缛的视觉和物质的关注构成了与18世纪全球商业的社会和经济经验的关键接触。十三行外销品是民族文化出海的代表，十三行成为一种品牌，在海外商贸领域成为代表“中国品牌”的典型。

### 三、广州十三行外销品的设计体系

清朝是中国古代装饰工艺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既能吸收前朝历代的工艺精华，又有成熟严密的宫廷管理，十三行外销品代表了中国传统工艺技术的较高水平。作为外销出口产品，它们的工艺水平是区别于普通的民间工艺产品，可以说十三行时期中国的外销品可归类为奢侈品，在装饰和技法层面呈现出较高水平。

#### （一）设计师的角色与作用

十三行外销品中的奢侈品设计与普通装饰品艺术在精神层面都集中体现了清朝的帝国风范与东方古国的传统，其质量精美和丰富的品类体现了清朝工艺制作的潮流，奢侈品的产地如宫廷造办处是工艺生产和制作的场所，集中了大量掌握高超技术的匠役为上层社会生产。造办处建成了覆盖全国的工艺制作网络，当时各地的精英匠人频繁参与到宫廷工艺的生产制作当中，这些匠人相当于现在的设计师，在清朝造办处官员统筹管理下，这些精英匠人的专业技艺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对当时清代工艺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宫廷造办处生产的各类器物工艺上乘，材料珍贵，更是充满着帝王的审美，不仅用于宫廷陈设，同时也作为赏赐朝臣和馈赠外国使者等。匠人们在造办处的工艺交流对于清朝的工艺制造和宫廷技艺自上而下的传导流通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十三行外销品的制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清朝宫廷内专门负责制造或者修缮御用物品的机构是内务府造办处，具有严格的管理和精确的分工，工匠们在各自的作坊内履行职责，负责御用品的设计制作。造办处的匠人在身份上也有较大差异，第一种是家内匠，是旗匠的一部分，从满族的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中挑选闲散人员并加以训练，以让他们成为宫廷内的正式工匠，此类人数最多，因此他们的工作属于简单的服务性质。总体技术水平较低，不能独自承担工艺复杂的创作，所获待遇也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造办处的家内匠即是职位而非职业”，<sup>①</sup> 旗匠中的家内匠是造办处的主体而非核心主力。第二种是雇佣工匠，他们是造办处的临时工匠，用以弥补造办处工匠的不足，在造办处制造器物的过程中，临时雇佣工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相对具有娴熟的技艺，聘用他们做一些具有技术性的工作。由于帝王对于西洋器物的热衷，地方官员也会举荐外国人至北京为宫廷效力，如乾隆帝酷爱奇器和西洋艺术，因此，很多洋人借此机会进入宫廷担任建筑、绘画、雕刻、瓷艺、钟表机械、外交翻译等工作，属于西洋“技艺之人”。这部分群体数量较少，从顺治康熙年间开始，西洋技艺人才的推荐“以广东督、抚奏报为主”；<sup>②</sup> 第三种是南匠，南匠来源范围较广，由广东、南京、苏州、杭州筛选出的工匠都可称为南匠，这些匠人技术精湛，多由地方推荐至内务府服务，因此南

<sup>①</sup> 滕德永著《清宫造办处的家内匠》，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26-33页。

<sup>②</sup> 伍玉西著《清前中期进京效力西洋“技艺之人”荐举方式之嬗变》，载《学术研究》2022年第3期，第129-137页。

匠人才难得，流动性强，后继无人的时候只能采取招募的方式。南匠属于造办处工匠的精英，技艺高超，他们承做的器物也是皇帝最为重视的产品，待遇相对较好。

从这三类设计创作人员的不同身份可以看出，旗匠中的家内匠因其服务属性，工作压力相对较小，家内匠本质上是一种职位，上升空间有限，这导致他们失去了进取心，不再关注自己的业务技艺水平。而另外两类工匠则必须不断提高设计制作水平，南匠和雇佣工匠都是基于其技术优势而临时取得进入宫廷服务的机会，凭借自身的高超设计制作水平赢得了消费群体即宫廷贵族的认可才获得了更多收益，因此对于这部分工匠尤其是南匠而言，他们追求技术进步，设计制作艺术精品是他们的追求。可见，南匠在清朝是非常重要的设计制作群体，对外商贸期间，广东更是云集了各个行业的南匠，这为十三行外销品的品质提升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雇佣工匠中的西洋技艺之人也都是先在广东工作得到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的认可之后才能有会被举荐至宫廷效力。由此可见南匠和雇佣工匠的技艺水平之高，所以当宫廷内遇到技术或经济困难，帝王会批复将一些重要器物交给南方工匠来制作，比如雍正帝派广东工匠雕刻宋龙珊瑚桃式盒样式戏朝带板，乾隆帝派南边工匠制作象牙缨络，这里的“广东”和“南边”明显体现了南匠的优势。

## （二）南匠对“恭造式样”与“外造之气”的平衡与调和

清朝的设计制作体系是宏大的，帝王往往担任着设计师和甲方的身份参与到器物的创作中；官员尤其是掌管内务府的怡亲王允祥、造办处海望、唐英等为代表的“技艺”官员，也都以其职位和技艺能力投入到造办处造物的各个环节的设计管理中；具体执行层面需要工匠们的配合，工匠作为技艺主体直接与器物产生关联。可以说，帝王是当时设计的向导，工匠在帝王审美的格局下展开具体的设计创作。宫廷的管理在代际传承中打下了坚实牢靠的基础并创造了重要条件，帝王对美术、工艺的追求和培养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促进作用。清代的工艺造物帝王参与度较高，尤其是雍正、乾隆两帝参与程度较深。

帝王发布制器需求经由造办处传达到地方，作为帝王审美旨意和工匠之间的联系人地方督造官和造办处管理人员，他们的作用十分关键，需要准确领会帝王旨意并尽可能生产“样”，即帝王满意的器物作样板，用何材料、怎样做等都有明确细致的指示要求。在他们往来京内外的过程中，宫廷中的各种“样”（设计稿）也由他们传导到地方，经由南匠进行制造，这些设计稿充分体现了宫廷风格，确保了地方承办能够符合皇帝的意趣，是宫廷意志在地方的反映，反映着文化上的一致。南匠将设计稿物化的过程，是设计的实现层，器物制作完毕由造办处管理人员带回宫廷上交皇帝，此后可能会再继续修改调整，也有可能得到皇帝的赞许评级，一般被帝王称赞的器物还会被要求再做一遍，这就成了“恭造式样”。可见，从“样”到“恭造式样”的实际执行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必须由工匠主要是南匠充分发挥对帝王意趣的揣摩和精湛的工艺技术才能让这一过程变得顺利。帝王作为设计管理的第一把手，他们为了改进和提高造办处造物的质量费尽心机，一直关注着艺术方向，对于宫廷内的“恭造式样”提出设想，精心选择造物模式，目的是让造物的精华部分体现出的材料、工艺、款式、色彩、风格等设计要素符合皇家标准和趣味。内廷恭造式样是造办处生产产品的最高指南，而帝王对器物制作的关注也带动了整个造办处甚至手工艺界制作精细的作风。从雍正到乾隆，宫廷造物的设计风格从秀气文雅逐步走向了繁缛之风，乾隆时期呈现出极致技艺堆叠的特点。与之相对的，宫廷造办处的外延——各地的织造、税关、海关、官窑等作坊的产品，以及各地官员进贡的地方名匠所作的产品，帝王认为这些充满区别于“恭造式样”的“外造之气”，其实就是充满了民间趣味和地方特色。

宫廷造办处作为特殊的组织属于政府掌握分配资源，掌握物质调动的权力，工匠在政府管理中进行生产制作，全身心投入到工艺设计制作中，追求高超的艺术性，力求使自己的器物成为绝世精品。他们这种稳定的组织化也会在社会中传导，层层拓展，对地方手工业技术的提升发展有积极作用。各个制作地虽有自身行政归属，但是对于承办御活儿业务时是受造办处管理的，因此这些地方制作地是宫廷造办处的补充，帝王将帝国的威严传递到全国各地，督造官员积极效力帝王，向政治中心提供各地的精湛产品举荐能工巧匠，造办处将自身的运行网络扩展至全国。通过这种组织方式，形成了官方的技艺交流，地方制作机构与宫廷造办处形成密切互动。帝王会命令造办处工匠向优秀的南匠等地方工匠学习，地方工匠也会将制作技艺传授给宫廷，因此在造物技艺与风格上，民间也会影响到宫廷，从工匠、物料、器物支持补充着宫廷技艺，在交流的短期内培养出部分学徒。这就使得各地的技术与宫廷有了交流，地方工匠同时也会将宫廷的相关工艺技巧了解学习，宫廷技艺和审美也就流通到了地方。二者之间主导方是宫廷造办处，体现着皇权主导的技艺交流。皇权之下的“恭造”心理成为工匠造物的前设，群体无意识一般办函了标准化的预设，在纹样、颜色、数量上虽有不同，但母题却是标准的几种类型，这就是技术民间化的传导。可见同一的文化心理从宫廷到民间的判断力和执行力。通过器物的尺度、色彩、形态、纹样、价值体现出造物立项和社会制度与习俗，成为中华民族的设计谱系。康雍乾时期，广东官员不仅多次遣送优秀的广东匠人入宫服役，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也向粤海关发样，要求按样制作器物等呈进，所作制品供皇室享用。清宫造办处档案、活计记录记载了广东工匠在宫中服役及创作概况。康熙至乾隆年间至少70余名广东工匠在造办处专事皇室各类用品，以珐琅、牙雕、木作技艺最为突出。

#### 四、广州十三行外销品的世界影响

十三行外销品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引起了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观照与改造，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社会的生活习惯及审美理念。在十三行外销品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在中国时尚催发下诞生出新的风格，借由中华艺术样式的清新放松来触动本土艺术，如法国洛可可风格的产生、欧洲社会“中国风”的盛行等等。

洛可可风格兴起于18世纪的法国，洛可可装饰是从巴洛克时代生长出来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只是把巴洛克原有的东西再加发展而已，但是它又受到中国的影响，自成一派。洛可可艺术的色彩趋于淡雅甜美，刻画人物纤细精致，贝壳形图案广泛应用，波浪式曲线大量出现，更多的集中在室内装饰领域及部分画作中。洛可可艺术盛行的路易十五、十六时期正是中国清朝雍正、乾隆时期，也是十三行处于发展高潮之际，十三行产品带来的文化气息极大的影响和激发了法国的洛可可艺术风格的生成。中国制造的大量精美手工产品比如瓷器、刺绣、扇子、牙雕、服装、银器、名片盒、家具、漆器、壁纸、莲草纸画等等大量涌入欧洲上层社会，新鲜的器皿和装饰艺术刺激了欧洲本土艺术风格的变化，成为洛可可产生并流动的重要推动力量。“法国专治末期与大革命之间的脱节，提供了接受外来文化的机会……欧洲的贵族们带着对中国的幻想，为自己制造一个想象中的空想、精致、娴雅和欢乐与自由的世界”，<sup>①</sup> 中国对于那个时代的魅惑，不在于大型

<sup>①</sup> 简思敏著《从洛可可艺术看中国艺术对欧洲的影响》，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专辑，第103页。

“艺术品”，而是在于小型的生活日常用物，法国人在中国货物中发现了瓷的雅调，在丝绢中发现了绚丽多彩的秀美，在中国画里接触到了幻想中的风致……这对于当时正处于艺术风格新转向的法国而言，提供了灵感源泉，十三行外销品所携带的中国艺术元素对洛可可艺术风格而言形成一种推力。“洛可可”的艺术理念和当时欧洲人所见到的中国艺术有不少相通之处，都是很精致纤巧，注重细节……欧洲的艺术家和工匠们从来自中国的艺术品和工艺装饰品中找到了美感……特别适合洛可可艺术的欣赏品味”。<sup>①</sup>

“‘Faconde la China’（中国式）字样最早出现在路易十四的财产目录中，此后法语称‘中国风’为‘Chinois’与‘Chinoiserie’”。<sup>②</sup> 路易十四在位时间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时期，这与十三行运行时期是一致的。从国外的相关研究而言，“中国风”要早于“洛可可”风格，且“洛可可”是它的表现之一。“中国风”不仅在欧洲风行，而且在西亚和阿拉伯半岛、殖民地美洲、东南亚、日本，甚至回流向中国。作为一种风格，中国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对图像、材料和形式的折衷使用，是一种真正的混合风格，因为它是在多种审美和文化传统中创造并引用的。“中国风作为一种装饰风格出现在早期现代全球贸易的背景下，甚至在21世纪初还在继续生产，中国风就是一种全球风格”，<sup>③</sup> 所以不能狭隘地认为“中国风”是欧洲洛可可的一种表现，应该说“中国风”的影响范围更大，二者有共性也有区别，“中国风”因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设计师、工匠和商人通过跨国贸易网络相互作用而产生。有学者认为“中国风”有着更漫长的发展时间，“中国风是模糊性的，时间跨度为16-19世纪，涵盖了多样的艺术风格如巴洛克、洛可可，影响了中国、日本、印度和波斯，游学学者定义成‘从中国进口的小奢侈品或者在欧洲的中国式样’”。<sup>④</sup> 中国十三行外销品的大宗传播强化了“中国风”和“洛可可”的流行程度，二者追求享受的、柔美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大为盛行，模仿中国器物成为当时的风尚，在装饰技艺层面欧人展开了不懈探索。“中国风”是在当时贸易产生的物品流通、装饰图像和艺术传统交流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既是全球贸易的文化、物质、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实的产物，也是对这些事实的回应。

在每一个中国风产生的地方，基本上都涉及到模仿或适应。十三行产品展示出的中国标志、形象和材料迫使无知的外国设计师和消费者制造出“假”的中国艺术版本。中国生产商受到外国品味和风格的影响，就像外国生产商受到他们收到的中国商品的影响一样，“当欧洲不再满足于仅靠公司货船定期定量搬运时，对中国物品尤其是瓷器的仿制潮掀起”，<sup>⑤</sup> 中国货物的大量出口给欧洲的“中国风”盛行奠定了物质基础，刺激当地生产者有了更多的设计灵感，出现了大量的仿制品。“先是华瓷在荷兰代尔夫特、德国麦森、法国鲁昂等地的大规模仿制……他们的‘中国风’仿制品与华美中国器物一起在诸如维也纳美泉宫、英国布莱顿宫、斯德哥尔摩卓宁霍姆宫中得到炫耀性呈现”。<sup>⑥</sup> 瓷器工厂根据中国材料和当代欧洲时尚来定位自己，暗示其材料的真实性。与亚

① 刘海翔著《欧洲大地的中国风》（深圳：海天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② 张婧楠，崔荣荣著《丝绸之路视阈下西方“异托邦”营造的“中国风”》，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83-89页。

③ Sloboda, Stacey, *Chinoiserie: A Global Style*, 11. 17, 2004, pp. 143-154.

④ 瑞·达维拉·洛里多著《思想、商品与船只：从16-18世纪葡萄牙及欧洲的海外贸易看中国奢侈品对欧洲社会的影响》，载《海洋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277-299页。

⑤ 施晔著《海上丝路的经典案例：东印度公司与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162-174页。

⑥ 施晔著《由技艺而道艺：17至20世纪西方视觉艺术的中国影响研究》，载《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65-74页。

洲材料、风格和技术接触并使其适应新市场的过程中，刺激了创新。从本质上来说，欧洲市场对中国产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广，因此欧洲国家会想方设法来应对这种需求，工厂进行产品革新，以满足顾客偏好东方式样的要求。替代进口产品是一种经济政策，即国内生产取代外国进口，以减少对外国进口的依赖。可以说，中国风这一风格的生成是基于现实经济和艺术变迁的双重作用而出现的。

## 结 语

十三行外销品深度拓展了设计材料的边界，延展传统材料表现的能力，技术带来的是助力，背后更重要的是自身文化传统和新的审美语境的再思考再理解，才能转化成新产品，推动十三行外销品的发展。十三行外销品彰显出中华民族固守本土文化特色，同时从设计层面具有服务意识的融合外来文化进行创造，为“西方艺术市场”量身定做、迎合西方审美口味的中国艺术品，成为中欧贸易的重要和最好的素材和资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个阶层的欧洲人对来自中国的物品趋之若鹜，尤其是中国的商品多是兼具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工艺品。来到欧洲的中国商品即便原来不是奢侈品，但是由于艰难的长途海运，随之提高了成本，身价百倍，这些中国商品成了上流社会追逐中国情趣的对象，这体现了中国品牌的影响力，是我国民族品牌出海的成功范例。



# 洪聖信仰的歷史傳承與非遺及古蹟互動關係

## ——以香港鴨脷洲為例的民間宗教研究

彭淑敏

**【摘要】**以香港南區鴨脷洲洪聖信仰及其節慶文化為個案，探討中國南方民間宗教歷史傳承，如何由國家祀典轉化為地方化信仰，並在現代城市空間中實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洪聖信仰源於南海神崇拜，歷經歷代朝廷封號，轉化為華南沿海漁民族群之生活與信仰文化。透過歷史文獻、廟宇古蹟碑記與田野調查，分析洪聖信仰的歷史源流、節慶儀式及社區參與，揭示洪聖誕作為節慶文化的轉型與延續，以及信仰在地化所建構的社區空間記憶。鴨脷洲洪聖古廟在被列為法定古蹟後，亦呈現宗教場所與社區記憶之間的互動。洪聖信仰展現民間宗教歷史的傳承、非遺實踐與都市社區轉型之間的動態關係，凸顯其作為民間信仰、社區認同與文化遺產活態傳承之意義。

**【关键词】**洪聖信仰；民間宗教；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地化；社區記憶

### 一、引言

香港民間宗教信仰歷史源遠流長，眾多宗教信俗與祭祀儀式活動至今仍活躍於社區生活之中，廟宇香火鼎盛，尤以神誕慶典最為熱鬧，常成為重要的社區節慶盛事。本地民間信仰傳統深受早期沿海漁耕社會及海上貿易活動影響，因而孕育出多元的水上神明崇拜，當中以天后、觀音、北帝最為人所熟知。其中，南海神被視為最早納入國家祀典的海神，學術界普遍認為南海神正是後來流傳於廣州、珠江三角洲及香港沿海地區廣為信奉的洪聖大王之前身。<sup>①</sup>

洪聖信仰由南海神轉化而來，在華南沿海地區廣泛流傳，隨著漁民社群遷徙與港口聚落發展，紮根於香港多個沿岸社區。香港洪聖古廟的神誕慶典多由民間社群主導，其儀式及節慶活動的實踐由早期漁民信仰傳承與轉化而成，展現從國家祭祀體系走向地方民間信仰之在地化歷程。香港宗教信俗的延續除反映宗教傳統之歷史傳承外，亦成為地方社群之集體記憶、文化傳承及社區認同的核心價值。

**著者簡介：**彭淑敏，女，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系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諮詢委員會委員。

① 謹此致謝“陸國權中華文化傳承研究基金”對本研究計劃的資助，使筆者得以於2024年開展為期一年的“香港法定古蹟展示的中國民間宗教信仰”研究項目，期間完成歷史文獻與廟宇碑記資料之蒐集，並進行鴨脷洲洪聖古廟及洪聖誕節慶的田野觀察。特別鳴謝華人廟宇委員會允許及安排筆者於2024年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期間進行實地考察，並感謝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值理的熱心協助，提供珍貴資料與接受口述歷史訪談，使本研究得以順利完成。

本文以香港南區鴨脷洲為個案，聚焦於洪聖信仰與節慶文化的發展歷程，透過廟宇空間、賀誕儀式與社區參與等層面，探討中國民間宗教在現代城市空間中延續、轉化的方式，成為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實踐。洪聖信仰歷經歷代封號與民間流傳，逐步融入在地民間信仰網絡，從本地漁民社群的日常生活中形成宗教傳統，並透過鴨脷洲洪聖古廟及洪聖誕承載社區認同及集體記憶，成為獨具本土特色的地方文化標誌，凸顯香港民間信仰獨特的在地化持續發展。

隨著香港的城市發展、海岸線變遷及社區結構轉型，洪聖古廟及洪聖誕成為法定古蹟與本地非遺的雙重文化象徵，兩者之宗教意義及社會功能亦逐步延伸至歷史教育、文化旅遊與集體認同等領域。本文結合歷史文獻、廟宇古蹟碑記與田野觀察，進一步回應以下三項核心問題：（一）洪聖信仰如何從南海神的國家祀典體系轉化為華南沿海地區的傳統民間信仰？（二）作為一項非遺節慶實踐，洪聖誕如何在鴨脷洲重構當地之民間宗教空間、文化記憶與社區認同？（三）在香港的城市化與社會結構轉型下，鴨脷洲洪聖信仰如何體現民間宗教的延續與轉化？

本文認為，鴨脷洲洪聖信仰體現了中國民間宗教歷史傳承的文化特徵，而官方祭祀轉為地方實踐的過程至具意義，作為揭示信仰、古蹟與非遺三者在現代城市脈絡中互動發展與轉化的見證，有助加深理解宗教文化與非遺活態傳承之融合意義。

## 二、洪聖信仰的歷史研究脈絡

關於洪聖信仰的學術研究，長期以來多散見於香港本地民俗或宗教的通論著作中，較少針對其信仰本體進行深入與系統的歷史探討。如謝永昌與蕭國健合著《香港民間神靈與廟宇探究》、周樹佳著《香港諸神：起源、廟宇與崇拜》，雖對洪聖信仰有所提及，然內容多側重於廟宇碑文與地方傳說，對信仰演變脈絡與社會功能的分析則較為有限。<sup>①</sup> 相比之下，科大衛（David Faure）著《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提出地方社會對國家神祇之挪用觀點，凸顯洪聖信仰作為地方化之動態發展的案例，具有理論啟發性。<sup>②</sup>

早於1950年代，英國人類學家華德英（Barbara E. Ward, 1919 – 1983）在新界西貢滘西村就漁民社群展開田野研究，觀察到當地漁民普遍自認有返村向洪聖公謝恩與祈福的義務，展現出此信仰實踐的強烈社會凝聚與責任感，<sup>③</sup> 惟該漁民社群其後已漸解散，廟宇亦日趨荒廢；反觀鴨脷洲，即便經歷城市化轉型，至今仍保留洪聖信仰與節慶傳統，展現其傳承延續及民間宗教的社區功能及其價值。

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內地學界亦逐步展開對南海神與洪聖信仰的系統性研究。葉春生在《廣東水神溯源》一文中梳理洪聖大王神格的歷史演變，指出原為火神祝融的南海神經朝廷冊封轉化後，成為廣東水神體系的重要神祠；<sup>④</sup> 而冼劍民與陳胥豪則於《南海神廟與海神信仰》一文中，探

① 謝永昌，蕭國健著《香港民間神靈與廟宇探究》（香港：香港道教聯合會，2010年），第52–61頁；周樹佳著《香港諸神：起源、廟宇與崇拜》（香港：中華書局，2021年），第52–53頁。

② 科大衛著；卜永堅譯《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0–77頁。

③ 華德英對漁民社群的研究，提及漁民被稱為“蛋家”的稱呼使他們感到被輕蔑，令他們反感，參閱氏著；朱立德譯《香港的一個漁村（一九五四）》，第1–3頁及陳孝良譯《浮鄉：香港的漁民（一九五九）》，第20頁，載（英）華德英著，馮承聰等編譯《從人類學看香港社會——華德英教授論文集》（香港：大學出版印務公司，1985年），第12頁。

④ 葉春生著《廣東水神溯源》，載《民俗研究》1992年第1期，第62–71頁。

討廣州南海神廟史及其與航海貿易的關聯，指出此信仰具融合嶺南文化與海上實踐之特徵。<sup>①</sup>

隨後，王元林在多篇論文中從國家政策及廣州海上絲路歷史背景出發，分析南海神由官方“岳鎮海瀆”體系轉化為民間信仰的過程。他指出歷代王朝多將南海神視為庇護社稷之護國神，而在嶺南地區的南海航行的商人、漁民與航海者親歷神靈顯現，則強調其兼具風調雨順、航行平安與心靈撫慰等實用功能，信仰的再詮釋使南海神最終轉化為親近百姓的地方保護神。<sup>②</sup>傅軼和黃少輝更進一步比較南海神與媽祖信仰，指出洪聖信仰之空間分布與海上貿易網絡密切相關，體現地緣與經濟活動對信仰擴散的影響。<sup>③</sup>

學界大多於地方實踐層面關注洪聖信仰，尤以討論民間祭祀儀式與傳說敘事上的在地轉化。宋旭民認為，珠三角地區的洪聖誕慶典呈現世俗生活文化的高度在地化，體現民眾對美好生活的祝願，顯示官方與民間對同一神祇的詮釋差異。<sup>④</sup>柳超球以清代筆記《廣東新語》為文本材料，探討南海神的地方化敘事，指出神明形象逐漸人格化與世俗化，為漁民與商旅之心理依靠。<sup>⑤</sup>

就宗教與經濟社會關係而言，孫利龍認為洪聖信仰反映出漁耕社會中對神恩庇佑與生存保障的心理需求，並指出民間信仰建構將“神力”轉化為較實際的“人間力量”，構建宗教的社會效用。<sup>⑥</sup>朱天舒進一步對比港澳地區的譚公與洪聖信仰的區域差異，指出漁民社群將原屬國家體系的正統神明轉化為具地方色彩的社區保護神。<sup>⑦</sup>

此外，有學者論述於南海神廟的建築與宗教空間的多元文化價值。邢照華以廣州南海神廟兼容儒釋道三教的特色為例，體現清代嶺南地區宗教文化多元的融合現象。<sup>⑧</sup>就現代城市宗教轉型而言，李朗寧則研究廣州波羅誕廟如何自官方禮儀演變為以社區為主體的“遺產性記憶”民間廟會，提出廟會作為城市民族文化與社區經濟高速發展下結合的新機遇，顯示民間宗教的可持續發展與功能再造。<sup>⑨</sup>

① 洗劍民，陳胥豪著《南海神廟與海神信仰》，載趙春晨主編《嶺南宗教歷史文化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32頁。

② 王元林著《天妃、南海神崇拜與鄭和下西洋》，載《暨南學報》2005年第27卷第6期，第128-136頁；《宋南海神東、西廟與廣州海上絲路》，載《海交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24-41頁。

③ 傅軼，黃少輝著《南海神信仰文化研究——以南海神和媽祖為例》，載《海洋開發與管理》2009年第26卷第11期，第84-87頁。

④ 宋旭民著《明清時期珠三角民間信仰在禮儀改革中的調適考察》，載《雲南社會科學》2017年第4期，第134-140頁。

⑤ 柳超球著《海神信仰與海洋開發——從〈廣東新語說起〉》，載《青島海洋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第頁46-50頁。

⑥ 孫利龍著《洪聖文化與媽祖文化的現代詮釋》，載《廣州航海學院學報》2013年第21卷第4期，第36-39頁。

⑦ 朱天舒著《從港澳的譚公和洪聖大王談起——漁民信仰中的兩種模式》，載李向玉，鄭焯明，胡柱鵬主編《〈中國漁民信俗研究與保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3年），第181-194頁。

⑧ 邢照華著《清代嶺南地區宗教文化融合現象探析——以廣州南海神廟為例》，載《中國宗教》2024年第6期，第68-69頁。

⑨ 李朗寧著《走向善治：城市廟會的現代轉型——基於廣州南海神廟波羅誕的觀察》，載《城市觀察》2021年第6期，第120-134頁。波羅誕是嶺南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傳統民間信俗之一，由廣州市黃埔區南海神廟定期舉行，以祭祀南海神為核心。該習俗被列入廣東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並於2011年納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而江門潮連洪聖廟會於2018年被列入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參閱《民間信俗（波羅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位博物館》，[https://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5158.html](https://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5158.html)，2025年7月1日瀏覽；《廣東省第二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國民族文化資料庫》，<http://m.minwang.com.cn/eportal/ui?pageId=663068&articleKey=766208&columnId=765294>，2025年7月1日瀏覽；《廟會（洪聖廟會）》，《廣東省文化館》，<http://www.gdsqyg.com/agdfyzg/mingluinfo?mlproud=2023062769742530>，2025年7月1日瀏覽。

整體而言，學界對洪聖信仰的研究從早期對神祇起源與制度祭祀的關注，逐步擴展至地方信仰實踐、文化記憶建構與現代社會轉化等面向。這些研究成果提供了理解鴨脷洲洪聖信仰的歷史根源與如何於現代城市空間中轉化之理論基礎，亦揭示民間宗教於文化傳承、社區認同與制度轉化中扮演之多重角色。

### 三、鴨脷洲洪聖信仰的歷史源流與地區信仰傳播

雖然位於香港島南端的鴨脷洲地處一隅，自清代起就因地形優勢而成為廣東沿海重要的避風塘與通商良港。清乾隆年間，當地漁民為求出海平安、風調雨順，集資興建位於鴨脷洲洪聖街九號的洪聖古廟，成為港島地區首座主祀洪聖大王的廟宇。自此，洪聖信仰成為鴨脷洲及南區沿岸漁民崇拜的主流海神，香火綿延、代代相傳。<sup>①</sup>

據 1973 年《洪聖古廟二百週年紀念碑記》所載，洪聖大王乃南海之神、四海神之首，其誕辰為農曆二月十三日。<sup>②</sup> 番禺南海神廟建於隋代，據韓愈撰《南海神廟碑》所載：“海於天地間為物最巨。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指出南海神地位極尊，神格原為火神祝融。<sup>③</sup> 葉春生進一步考證，洪聖神格經歷由祝融至南海神的演變，並於唐玄宗天寶年間獲封“廣利王”，宋仁宗時加封為“洪聖”。儘管歷朝多有封號更替，民間仍普遍沿用“廣利洪聖大王”之稱，<sup>④</sup> 而神格與歷代朝廷封號的歷史演變，正顯示洪聖原為國家祀典中的海神，在嶺南地區因應地緣及社會結構發展逐步在地化，轉為深受民間認同的地方保護神。

洪聖信仰在香港沿海地區尤為盛行，與本地漁民與海上商旅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連。根據《香港廟宇》及《香港廟宇碑刻志：歷史與圖錄》所載，香港現存主祀洪聖之廟宇共 13 座（見表一），反映香港洪聖信仰流傳甚廣，遍及香港島、九龍、新界及離島等地，構成獨有的社區信仰網絡，顯示洪聖信仰的普及及其凝聚社區之功能。地方傳說亦強化神格的在地詮釋，如鴨脷洲洪聖被視為清廉愛民、精通天文地理與數術的唐代廣利刺史洪熙，他曾設立氣象台為漁民預測天氣，深受百姓敬仰。<sup>⑤</sup> 地方信眾藉由傳說敘事將洪聖加以人格化，使其神格融入民間情感之中，構成連結國族認同的信仰文化。學界亦指出，澳門等地並無明確詮釋洪聖神格的來源，<sup>⑥</sup> 反映香港地區洪聖信仰的獨特性，及其透過歷史敘事建構崇拜之合理性與作為地化文化核心價值的傾向。

鴨脷洲洪聖古廟自建成以來，即為區內宗教祭祀與信仰實踐的核心場地，亦為洪聖誕節慶的舉辦地點，促進洪聖賀誕民間慶典的延續。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為期超過 10 天，是社區年度的民俗、宗教與文娛盛事，街道四周飄揚著顏色鮮明的賀誕旗幟，吸引大量區民及遊客參與。以 2024 年為例，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以 3 月 10 日接神儀式為始（見表二），依序舉行祭祀、正誕

① 《鴨脷洲洪聖古廟》，《華人廟宇委員會》，[https://www.ctc.org.hk/temple/鴨脷洲洪聖古廟/#tab\\_id=undefined](https://www.ctc.org.hk/temple/鴨脷洲洪聖古廟/#tab_id=undefined)，2025 年 7 月 1 日瀏覽。

② 黎志添編著《香港廟宇碑刻志：歷史與圖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23 年），第 1443 頁。

③ （唐）韓愈著；閻琦校註《韓昌黎文集注釋》卷七《南海神廟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年），第 203 頁。

④ 葉春生著《嶺南民間文化》（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第 242 - 243 頁；葉春生著《廣東水神溯源》，載《民俗研究》1992 年第 1 期，第 62 - 64 頁。

⑤ 黎志添編著《香港廟宇碑刻志：歷史與圖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23 年），第 1434 - 1451 頁。

⑥ 朱天舒著《從港澳的譚公和洪聖大王談起——漁民信仰中的兩種模式》，載李向玉，鄭焯明，胡柱鵬主編《〈中國漁民信俗研究與保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3 年），第 181 - 194 頁。

表 1 香港現存主祀洪聖廟宇

地區	廟宇名稱	成立年份	歷史建築評級
香港島南區	鴨脷洲洪聖古廟	1773	法定古蹟
新界西貢區	滘西洲洪聖古廟	1889 年前	法定古蹟
香港島灣仔區	灣仔洪聖古廟	1847	一級歷史建築
新界元朗區	屏山坑尾村洪聖宮	1764	二級歷史建築
新界離島區	長洲洪聖廟	1813	二級歷史建築
新界西貢區	布袋澳村洪聖宮	1817 年前	三級歷史建築
新界元朗區	錦田水頭村洪聖宮	1465 – 1487 年間	三級歷史建築
新界北區	上水河上鄉洪聖古廟	乾隆年間 (1748 – 1780)	三級歷史建築
新界北區	粉嶺孔嶺洪聖宮	1763	三級歷史建築
九龍油尖旺區	大角咀洪聖古廟	1881	三級歷史建築
新界西貢區	東龍洲洪聖宮	道光年間 (1782 – 1850) 或以前	-
新界離島區	大嶼山大澳洪聖古廟	1746	-
新界離島區	大嶼山塘福村洪聖宮	1802	-

資料來源：香港現存 13 座主祀洪聖的廟宇，其正門匾額分別刻有“洪聖古廟”“洪聖宮”或“洪聖廟”附表一列所相關資料，乃綜合自黎志添編著《香港廟宇碑刻志：歷史與圖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23）、廖迪生編著；華人廟宇委員會策劃《香港廟宇》（香港：萬里書店，2022 年）；《古物古蹟辦事處》《華人廟宇委員會》《東華三院廟宇及文化推廣服務網站》及《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等網絡資料。

祈福、巡遊、神功戲、水燈晚會及送神等活動。整體安排不僅延續傳統，而且融合現代社會的節慶參與需求。其宗教儀式莊嚴神聖，具濃厚的宗教色彩，展現傳統信仰的延續性與社會凝聚力；而如神功戲、水燈祈願、洪聖傳統文化導賞團等文娛項目則提升節慶的世俗觀賞與公共參與度，使洪聖誕兼具“娛神”與“娛人”的功能，在城市化的社區空間持續重構集體記憶，促進信仰再詮釋，並使洪聖誕得以傳承下去，逐漸轉型為結合民間信仰與非遺文化的社區大型節慶活動，展現其社區價值。

洪聖誕代表了多神信仰的社區宗教文化網絡特徵，廟內供奉主神南海廣利洪聖大王，並配祀觀音、關帝、太歲和文昌等神明。<sup>①</sup> 在 2024 年賀誕期間，洪聖古廟後殿特設主神壇，除洪聖大王行身外，亦以接神儀式迎請來自本區水月宮、土地社壇、香港仔天后廟、海怡半島大王宮等宮廟之神祇，包括洪聖大王行身兩側置有象徵大慈大悲、普渡眾生的觀音、被視為掌管世間財富的土地公、治病救人、呼風喚雨的天后、能鎮伏水患、保佑舟楫平安的北帝，以及令社區風調雨順、漁獲豐富的大王爺等，<sup>②</sup> 形成“諸神共賀”的宗教網絡。此舉不僅凸顯洪聖信仰與區內民間信仰的互動聯繫，鞏固鴨脷洲在社區信仰網絡中的核心地位，亦反映民間多神信仰的特色與宗教包容性，寓意共同庇佑社區居民的願景。

此外，洪聖誕自 1880 年代開始由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主辦，社區居民自發成立的公社歷年擔任籌辦、募捐與執行賀誕儀式的核心角色。<sup>③</sup> 公社長期承擔信仰儀式的傳承與空間維護，不僅彰

① 彭淑敏著《遊鴨脷洲漁港 訪古蹟採民俗》，載《文匯報》2024 年 2 月 5 日。

② 《神祇介紹》，《華人廟宇委員會》，<https://www.ctc.org.hk/deities/>，2025 年 7 月 1 日瀏覽。

③ 《鴨脷洲洪聖誕》，《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ce74e9f1-0e8a-49ee-87cf-f9cbf365775c>，2025 年 7 月 1 日瀏覽。

顯傳統宗教在社區的在地化實踐，亦維繫地方社群與信仰之間的歷史與情感。

表 2 2024 年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主要活動日程

日期	活動	地點
3 月 10 日 農曆二月初一	接神儀式	洪聖古廟 諸廟
3 月 16 日 農曆二月初七	水燈晚會	鴨脷洲公園
3 月 17 日 農曆二月初八	祭祀儀式 祈福放水燈 龍舟朝拜 醒獅採青 賀誕巡遊 水燈晚會	洪聖古廟 避風塘
3 月 22 日 農曆二月十三日	正誕日祈福儀式	洪聖古廟
3 月 20 - 24 日 農曆二月十一至十五日	賀誕神功戲小戲棚“神祈人生” 拍照區水燈晚會	鴨脷洲公園
3 月 23 - 24 日 農曆二月十四日至十五日	洪聖傳統文化導賞團	洪聖古廟
3 月 25 日 農曆二月十六日	送神儀式	洪聖古廟 諸廟

資料來源：參閱 2024 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籌備委員會編《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 2024 週年慶典》（香港：該會，2024 年）。

自清代以降，鴨脷洲洪聖信仰的歷史源流與在地化實踐，延續了嶺南民間宗教的傳統、體現官方祭祀轉化為地方信仰的歷史過程，並隨著現代城市轉型經歷再活化、再詮釋，構成兼具歷史傳承和社區參與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實踐個案，展現香港民間宗教信仰的獨特文化特徵。

#### 四、鴨脷洲洪聖信仰的地方節慶與社區記憶

洪聖誕從傳統宗教節慶演變為現今具觀賞性與公共參與度之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活動核心圍繞洪聖古廟，而正誕當日的祭祀及祈福儀式主要於廟前舉行，相關文娛項目則集中於毗鄰的鴨脷洲公園，活動入口設置傳統大型花牌，彰顯文化節之傳統氛圍與隆重氣氛，並籌辦特色市集。洪聖古廟建於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由當地漁民集資興建，至今已有超過 250 年歷史，是香港現存傳統廟宇中少數仍保留原有“臨海而建”格局的洪聖廟，體現早期海神信仰與地理環境布局之間密切的歷史關聯。

根據廟內銅鐘銘文及《洪聖古廟二百週年紀念碑記》所載，該廟自 1930 年起由華人廟宇委員會接管，至今仍為委員會的直轄廟宇；並於 1988 年大規模重修，重鋪綠色琉璃瓦，整體仍保留傳統廟宇的建築形制與內部格局，不但是區內重要的宗教建築地標，亦是全港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洪聖古廟之一。<sup>①</sup> 由此可見，洪聖古廟不僅是宗教信仰實踐的空間核心，歷次重修亦重申

<sup>①</sup> 洪聖古廟曾於 1888、1848、1973、1988、2005、2015 年進行維修工程，最近的維修工程於 2024 年 4 月至 10 月期間進行，參閱《鴨脷洲洪聖古廟文物價值評估報告》，《古物古蹟辦事處》，[https://www.amo.gov.hk/filemanager/amo/common/form/dminfo/DM107\\_Related\\_Information\\_Chi.pdf](https://www.amo.gov.hk/filemanager/amo/common/form/dminfo/DM107_Related_Information_Chi.pdf)，2025 年 7 月 1 日瀏覽；黎志添編著《香港廟宇碑刻志：歷史與圖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23 年），第 1436 - 1437，1443 頁。

信仰起源與社區記憶的歷史聯繫，象徵信眾對洪聖信仰的持續認同與傳承。更重要的是，洪聖古廟在現代城市空間中同時承載著宗教、歷史與社會文化的多重意義。

雖然洪聖誕慶典現已向社會各界開放參與，儀式實踐仍保留嚴謹的宗教傳統，使延續逾百年的民間信仰得以歷久不衰、代代傳承。近年由受延聘的金滿僊樓道壇經生主理洪聖誕的祭祀儀式，正誕當日的祝壽儀式由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值理依循傳統科儀設壇、擺設三牲及水果祭品、焚香誦經、祝禱祈福，配以傳統樂奏，恭請洪聖大王與諸天神駕臨會場，共賀寶誕，以神恩庇佑信眾。整場儀式歷時約一小時，最終由值理分發白米、花生與蓮子給予在場信眾與觀禮者，象徵神恩共享與庇佑延續。儀式莊嚴肅穆，觀禮信眾須保持肅靜，不得干擾儀式進行，體現神聖空間與民間宗教儀式之秩序和規範要求。

根據筆者於2024年3月22日進行的實地考察（見表二），<sup>①</sup>作為洪聖賀誕科儀的核心活動，鴨脷洲洪聖古廟每逢正誕日（農曆二月十三日）皆舉行隆重的祈福儀式，象徵地區信仰社群對神明祝壽，以及祈求神恩庇佑之願。當日儀式於上午11時正式開始，儀式前依例在古廟正門外設置桂葉水盆，象徵淨身潔淨宗教空間，並於門前擺放兩張供桌，供奉肉牲、蔬果及衣紙等供品，以表敬獻神恩之意。

現場共設五張神桌，分別用於擺放讚文、法器及三牲四果等供品。金滿僊樓道壇經生依據《洪聖誕讚本》誦念讚文，進行三跪九叩等傳統禮儀，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儀式期間，來自區內各宮廟迎請而來的諸神行身面朝祭壇列位觀禮，形成“諸神共聚，共賀寶誕”的儀式場景，象徵神人共樂、普天同慶的宗教特質。

經生分列於壇前兩側誦念讚文，左側敲擊鐘鼓與銅砵，右側敲擊木魚，並由一位樂師同時吹奏噴吶，配合鼓、銅鑼與銅鈸，營造出莊嚴肅穆、節奏分明的宗教氛圍。神桌中央特別鋪設白米、蓮子和花生三種象徵豐收與平安的貢品，儀式以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的值理分發予在場信眾作結，寓意神恩共享、福澤流傳。觀禮神祇的行身約在中午12時50分被恭迎入廟後，祈福科儀至此圓滿結束，為當年洪聖誕賀誕記下神聖而莊重的宗教意義。

洪聖信仰植根本地漁耕社群，長期承載水上漁民對出海平安與生計穩定的信仰寄託。無論是祈求風平浪靜、漁獲豐收或祛災解厄，信仰皆顯示與社區日常生活及經濟活動的緊密關聯。日本學者渡邊欣雄指出，中國民間信仰往往源於生活情境中的宗教經驗，具有自發與“現世利益”的實用性質，<sup>②</sup>洪聖崇拜正是漁民與海上商旅出於感恩與祈願逐步構建的“神人互動”關係。即使鴨脷洲已由昔日漁村蛻變為現代城市社區，洪聖古廟依然香火鼎盛、信眾絡繹不絕，反映出洪聖信仰早已超越原有職業群體的限制，轉化為紮根於地方社群的在地宗教傳統。上述印證鄭振滿與陳春聲的論點，指出作為一種社會表達形式，民間信仰儀式一般能穩定承載其歷史演變中所積累之社會與文化內涵。當中任何意義或內容的轉變，均根植於具體的社會變遷脈絡之中，而宗教語言則往往體現地方權力與社群的真實需求。<sup>③</sup>

值得一提的是，鴨脷洲洪聖信仰延續至今，仍保留以船隻舉行迎神與送神儀式，展現出信仰與水上文化的深厚歷史根源。鴨脷洲四面環海，昔日未有陸路橋樑連接，居民就仰賴街渡與漁船

① 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正誕日祈福儀式實地考察，2024年3月22日。

② 李俊領著《近代中國民間信仰研究的理論反思》，載《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第153頁；范正義著《民間信仰研究的理論反思》，載《東南學術》2007年第2期，第164頁。

③ 鄭振滿，陳春聲著《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頁。

往來各大社區及廟宇，船隻既為交通工具，亦為宗教活動的重要媒介。20 世紀 70 至 80 年代初出版的鴨脷洲洪聖寶誕特刊亦印有“完場時備有電船過海”或“每晚散場後有電船過海”的字樣，說明在神功戲結束後，主辦單位會安排電船接送街坊橫渡海面返家，反映賀誕活動與水上交通關係密切，見證昔日鴨脷洲這一漁民社區的生活面貌。<sup>①</sup> 即使 1980 年鴨脷洲大橋落成後大幅改變了當地交通形態，洪聖賀誕的水路儀式仍持續舉行，不僅見證傳統宗教文化的延續，也活化昔日漁民社群的生活文化與集體記憶，成為香港信仰傳承的重要象徵。

除正誕日祈福儀式外，洪聖賀誕以“送神”作為壓軸儀式，具有深遠的宗教與社區參與意義。筆者的研究團隊於 2024 年 3 月 25 日實地觀察該年度送神儀式（見表二），<sup>②</sup> 記錄其作為整個賀誕活動的結尾環節，展現地方信仰實踐與宗教空間的動員。送神儀式在農曆二月十六日於鴨脷洲洪聖古廟起行，整體路線縱貫鴨脷洲、香港仔至海怡半島，體現鴨脷洲洪聖信仰與周邊地區神明信仰網絡的空間與共融。

送神儀式由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成員負責抬送洪聖古廟內迎請的諸神行身花轎，先沿鴨脷洲大街起步，途經多座社區廟宇，再經鴨脷洲碼頭乘船至香港仔，最後將諸神逐一送返其原祀廟宇。儀式過程穿越海陸交界，展現本地民間信仰“多神共處”的宗教文化特徵，以及對神明間和諧關係的聯繫，亦體現鴨脷洲作為信仰實踐的空間動員狀況。

送神儀式歷時逾 3 小時，依次將觀音送返鴨脷洲水月宮、土地公送至普通科門診診所旁土地社壇、天后迎回香港仔天后古廟、北帝送至香港仔廟仔群，而大王爺則經水路返回海怡半島大王宮廟。每至一站皆備焚香、拜祭、奏樂等儀式，沿途由樂師奏樂、節奏分明，神轎由值理與送神隊伍肩抬護送，整體場面莊嚴有序，是傳統儀式規範與其濃厚宗教氛圍的體現。在儀式結尾時，為表賀誕儀式圓滿結束，送神隊伍圍繞海上巡遊並返抵鴨脷洲碼頭，回歸洪聖古廟。

洪聖賀誕以接神及送神儀式呈現空間轉移，不僅展現神祇網絡間之互動與協作，也重申鴨脷洲在本地節慶宗教活動中的核心地位。儀式作為神人關係的延續，促進社區居民對信仰傳統的認同與參與，透過以信仰為核心的節慶實踐，社區不僅保存民間宗教的歷史記憶，同時活化與凝聚地方文化，顯示其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傳承。

洪聖誕自 19 世紀末由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主辦至今。該組織原為籌備洪聖賀誕而成立，其後拓展至慈善、教育及社區服務等範疇，逐步發展為具代表性的綜合社區團體。<sup>③</sup> 多年來，同慶公社在節慶籌辦、儀式安排及社區動員中發揮關鍵作用，成為鴨脷洲洪聖信仰重要的傳承團體。隨著城市變遷、社會結構轉化，洪聖神格亦由昔日的漁民保護神，逐漸擴展為庇佑整個社區的地方神明，反映民間宗教信仰在現代社會中的重構與轉化。

踏入 21 世紀，面對社會經濟轉型與人口流動的挑戰，洪聖誕在回應時代變化，亦隨之調整其節慶形式。自 2013 年起，傳統賀誕會景巡遊改於正誕日前的星期日舉行，依傳統恭請洪聖大王與其他神明出巡，祈求神明護蔭居民平安、風調雨順、生意興隆、國泰民安等，以吸引區內外居民

① 參閱《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恭祝洪聖寶誕，辛亥年二月十三日》（1971 年）、《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恭祝洪聖寶誕，癸丑年二月十三日》（1973 年）、《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恭祝洪聖寶誕，己未年二月十一日》（1979 年）、《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恭祝洪聖寶誕，庚申年二月十一日》（1980 年）、《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恭祝洪聖寶誕，壬戌年二月十一日》（1982 年）、《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恭祝洪聖寶誕，癸亥年二月十一日》（1983 年）、《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恭祝洪聖寶誕，甲子年二月十一日》（1984 年）。

② 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送神儀式實地考察，2024 年 3 月 25 日。

③ 2024 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籌備委員會編《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 2024 週年慶典》，第 60 頁。

與遊客參與，提升節慶的觀賞性與公共參與度。<sup>①</sup>除了由同慶公社擔任主辦機構外，活動亦獲華人廟宇委員會基金、香港旅遊發展局、民政事務總署資助，以及香旅遊事務署的支持，並由南區旅遊文化節籌備委員會合辦、南區民政事務處、南區區議會協辦，<sup>②</sup>不僅延續實踐宗教信仰，亦反映民間信仰在當代社會中的適應能力，藉重塑節慶時序和活動空間以鞏固宗教傳統及集體記憶，使洪聖誕成為鴨脷洲社區中具代表性的非遺文化節慶。

綜上所述，洪聖信仰不僅作為宗教儀式文化實踐，更將地方節慶與社區記憶融合。透過延續神聖空間、民間組織的協作與世俗生活共融，洪聖誕成為具香港地方特色非物質文化遺產之活態傳承；其廣泛社區參與、持續更新則彰顯民間宗教信仰在現代城市空間中再詮釋的獨特活化過程。

## 五、法定古蹟與民間宗教的互動關係

鴨脷洲洪聖古廟的籌建資訊僅見於廟內銅鐘銘文，根據記載共有 16 位順德陳村洪聖信眾名列其上，惟除姓名外，關於其身分、背景及實際參與情形之資料實屬有限。<sup>③</sup>據咸豐年間《順德縣志》所載，陳村於乾隆時期已為商業活動繁盛之地：“陳村舊墟煙戶稠密，鋪舍連絡，百貨輻輳，乾隆十三年續開新墟，尤旺，遠近皆就市易，蓋一縣適中地也。”<sup>④</sup>文中先勾勒出陳村據地理優勢為具商業活力的地方市鎮，其後又提及：“蛋戶以巨艘駛出海洋，載貨還售。”<sup>⑤</sup>闡述陳村不僅是水陸交匯的市鎮中心，還聚居大量以船為家、從事漁業、航運及轉口貿易之水上居民，並與如香港仔、鴨脷洲等香港沿岸港灣往來頻繁。

水上族群流動性極高，活動範圍涵蓋廣東沿海及珠江口，除以捕魚維生外，亦從事航運與貨物買賣，構成獨特的水陸經濟體系。就信仰而言，此族群普遍崇奉洪聖大王，後者因而成為庇佑海上出入與生活平安之保護神。由此可見，活躍於此地的水上族群與地方信眾發起建造鴨脷洲洪聖古廟是出於對神明庇佑的共同信念，而且建廟經費很可能是來自陳村一帶的水上經濟活動。

陳村作為商貿與宗教資源集中地，為洪聖信仰的跨地域流傳提供現實和地理條件。信仰透過人口遷徙與商業網絡傳承，自珠三角核心地區延展至香港南部，終在鴨脷洲落地生根，信仰空間的歷史淵源深遠，既反映了地區社群與信仰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揭示民間宗教在地化過程中與經濟及社會結構的深層聯繫。

鴨脷洲洪聖古廟在 1981 年被列為香港法定古蹟，成為具高度保育價值的歷史建築。作為民間信仰空間由地方社群自主管理轉向納入政府文化資產制度的標誌，象徵鴨脷洲洪聖古廟逐漸承擔被官方賦予歷史價值的文化角色之責任；而隨之而來的新挑戰，是地方宗教場所如何在法定制度與古蹟政策框架下持續其宗教功能、實踐傳統儀式，以及在協調社區角色下之進行轉化。

① 2024 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籌備委員會編《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 2024 週年慶典》，第 80 頁。

② 2024 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籌備委員會編《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 2024 週年慶典》，第 6, 10, 13, 14, 15 頁。

③ 銅鐘上刻有銘文：“順德陳村涪洪眾信弟子張文裕、張文盛、溫鳳賢、黃興大、黎善才、張文耀、羅舉高、張益君、張文祿、張金玉、羅舉滿、黎瑞富、張文貴、張金末、溫鳳達、張金朝敬奉。峇乾隆癸巳年秋月吉旦。萬聲爐造。”參閱黎志添編著《香港廟宇碑刻志：歷史與圖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23 年），第 1436 - 1437 頁。

④（清）黃維瓚修；馮奉初纂《順德縣志》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20 年；清咸豐（1861 年）刊本影印），第 58 頁。

⑤（清）黃維瓚修；馮奉初纂《順德縣志》卷二，第 58 頁。

因此，作為洪聖誕的核心信仰場所，鴨脷洲洪聖古廟同時具宗教信仰及文化遺產之雙重身份。其籌建歷史、社區功能及信仰延續不僅體現地方宗教空間與國家制度、城市轉型及文化政策之互動，亦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案例，說明傳統宗教場所透過再詮釋與持續活化延續民間信仰在地實踐的方式，以維繫社區文化特徵及其認同。

## 六、城市化與民間信仰的轉型

據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值理鄭穩洲口述，該社籌辦洪聖寶誕已逾百年歷史，早期由陸上商戶擔任值理主導，其後始有受過教育的水上人後代逐漸加入，反映社會流動與信仰參與的結構轉變。隨著鴨脷洲在戰後的產業包括船廠、機械製造與船排業等的發展，漁民經濟條件得到改善。據政府在1961年的人口統計，當時正值本地漁業鼎盛時期，從業漁農的人數超過8萬。位於南區的香港仔與鴨脷洲作為艇戶密集的港灣，居民普遍奉祀洪聖大王，社群捐獻踴躍，使洪聖誕籌備經費充裕。洪聖誕發展到現時作為年度盛事，更展現民間信仰凝聚社區的社會功能。<sup>①</sup>

在戰後早期，鴨脷洲社區仍以族群名義籌辦社區信俗活動，反映當時移民社會的組織形態。據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鴨脷洲洪聖寶誕特刊所載，福建、潮州、惠州籍等族群皆曾借用洪聖誕戲棚及牌名上演賀誕戲，展現不同移民族群在以本地信仰空間延續文化活動的同時，強化了族群的多元認同。<sup>②</sup>這反映洪聖信仰自古以來作為一種民間信仰，地方特性鮮明，方得以延續與保存。從地緣（如鴨脷洲社區）、社會集團（如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到職業群體（由傳統漁民社群至涵蓋廣泛地方居民），皆透過實踐本地信仰傳承，以強化內部認同及鞏固社群結構，進而展現洪聖文化的延續性與在地化之宗教特質。<sup>③</sup>然而，隨著香港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末積極推動南區發展，陸續興建鴨脷洲大橋與大型住宅項目，社區迅速城市化，水上人原居的避風塘被公共屋邨與私人樓宇所取代，傳統以籍貫與行業區分的社會組織則漸被邊緣化。漁業與其相關產業式微，亦隨著艇戶群體逐步上岸定居，昔日艇戶相連的海上景象已不復見。儘管區內人口數量飆升，新社區居民卻少有漁民出身，對洪聖信仰缺乏認識與歸屬感，以及對賀誕的參與度顯著下降，反映傳統民間信仰在新型城市社區中遭遇邊緣化的危機。<sup>④</sup>當城市以規劃政策與經濟發展為主導重塑社區空間，傳統以行業與籍貫為基礎的社會網絡難以維繫，民間宗教倚賴的社群認同與文化資源亦面對危機。洪聖信仰的延續與轉化面臨資源流失、儀式傳承斷層與參與萎縮等多重挑戰，具體展現城市化對地方宗教文化的轉型壓力。

① Barnett, K. M. A, *Hong Kong Report on the 1961 Census Volume – III: The Economic Tables Notes and Comments*, Hong Kong: S. Young, Government Printer at the Government Press, 1962, p. 18.

② 參閱《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恭祝洪聖寶誕，辛亥年二月十三日》（1971年）、《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恭祝洪聖寶誕，癸丑年二月十三日》（1973年）。鴨脷洲社區早期主要由6大方言族群構成，包括寶安人、福佬人、潮州人、東莞人、惠州人與客家人。他們多從事捕魚、造船與修船等行業，並經營日用品及海味買賣，構成地方社區的主要經濟活動，參閱《鴨脷洲洪聖古廟文物價值評估報告》，載《古物古蹟辦事處》，[https://www.amo.gov.hk/filemanager/amo/common/form/dminfo/DM107\\_Related\\_Information\\_Chi.pdf](https://www.amo.gov.hk/filemanager/amo/common/form/dminfo/DM107_Related_Information_Chi.pdf)，2025年7月1日瀏覽。

③ 趙世瑜著《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第31頁。

④ 《南區民政主任岑敏玲指出鴨脷洲邨九月入伙大橋六月落成通車》，載《華僑日報》1979年2月7日；《海怡半島樓價看升》，載《大公報》1990年11月28日。

## 結語

時至今日，洪聖信仰已不限於作為漁民或海上行業群體崇拜的保護神，儀式與節慶活動逐步拓展至更廣泛的社會領域，鴨脷洲洪聖寶誕在2017年被列入香港回歸二十週年官方慶祝活動及南區旅遊文化節重點項目；及至2024年，洪聖誕更獲香港旅遊發展局、民政事務總署資助及香旅遊事務署支持，並由南區旅遊文化節籌備委員會合辦、南區民政事務處、南區區議會協辦，標誌這一歷史悠久的民間節慶正式納入公共文化體系，成為區內外市民與旅客同賀之城市節慶。<sup>①</sup>

為提升公眾參與及文化認同，賀誕活動在保留迎神、祈福、祭祀、神功戲、醒獅採青與巡遊等傳統儀式的基礎上，亦加入多項創新元素，如將水燈儀式移至陸上會場、增設小型戲棚娛樂區、舉辦文化導賞活動。這些轉化不僅鞏固洪聖誕作為地方文化遺產的吸引力，也代表了當代城市的活化內涵。

鴨脷洲洪聖信仰的宗教發展歷程是嶺南民間信仰在城市化進程中文化延續與轉化的縮影。信仰實踐既是回應清乾隆年間漁民社群對生計及平安的樸素訴求，亦是透過節慶儀式、神明網絡與信仰空間等實踐形式，轉化為涵蓋更廣泛社群的地方文化資源。洪聖信仰不僅體現民間宗教在地化的發展歷程，更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的典例。

隨著信仰群體結構與社區空間的變遷，洪聖信仰亦從過往祈求風調雨順、水陸平安的漁業祈願，逐步演變為城市社區對百業興旺、社會安泰的集體祝禱，同時彰顯民間信仰的歷史、文化包容，以及對延續非遺宗教文化的提示，除受到制度保育與資源投入外，洪聖信仰的傳承實有賴於在地社區的參與、信仰實踐與文化再建構。

地處港島南端的鴨脷洲得天獨厚，自清以來已成為廣東沿海漁民與海上商旅的重要信仰據點，亦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漁船碇泊良港。就鴨脷洲洪聖信仰的歷史傳承，本文指出南海神信仰與國家祭祀體系的淵源，歷經轉向民間及在地化的演變，從漁民社群酬神建廟，到以節慶凝聚社區集體記憶與地方認同，展現其宗教空間的持續活化，並鞏固信仰文化中的集體記憶，最終建構出與國族認同相連的民間宗教傳統。從清代洪聖古廟的興建、地區傳說流佈、百年賀誕的延續及演變，到城市化衝擊下的信仰調適與節慶文化創新，反映出香港民間信仰在歷史傳承、非遺實踐與社區記憶中的互動與文化網的核心價值。

<sup>①</sup> 2024 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籌備委員會編《鴨脷洲洪聖傳統文化節 2024 週年慶典》（香港：該會，2024 年），第 62 頁。



## 选择、博弈与交融： 香港观光团赴内地参访活动研究（1949 - 1958）

许奇塔 吴青

**【摘要】**香港观光团是由香港同胞所组成的团体，主要开展观光、观礼、致敬以及考察调研等活动。新中国成立后，香港观光团的发展受到了国共博弈的深刻影响，从而衍生出了两条不同的线路选择：赴内地或赴台，一定程度上对新中国初期的统战政策的效果产生了复杂影响。在国共博弈的背景下，双方都相当重视香港同胞，将其视为推动自身政权建设的桥梁，因此积极争取开展香港观光团工作。香港观光团赴内地或赴台参访活动为两地获取了政治的支持、港资的青睐、人才的流动，因此造成了两地敌对态势更加严峻。这一时期的国共对立也促使香港对祖国的归属感、香港同胞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都得到增强，逐渐孕育出了一种向着祖国统一方向发展的潜在动力。

**【关键词】**香港观光团；国共博弈；统一战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后，香港成为了国共两党之争的焦点，国共双方都通过组织香港观光团赴内地或赴台参访，积极争取香港同胞在政治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投资以及文化上的认同。香港观光团赴内地或赴台参访活动，主要是观礼、致敬、观光及考察等多样化内容。目前学术界在华侨观光团问题的研究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主要将香港观光团纳入华侨观光团的范畴，以此来探讨新中国侨务政策与统战政策的实施情况，<sup>①</sup>同时有学者关注香港观光团赴内地参访活动所带来的诸多积极影响。<sup>②</sup>香港紧邻祖国，这使得香港同胞对祖国的感受更为直接和深刻，地理上的亲近性使得香港观光团在参访活动中更容易产生复杂的心态。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共两党在香港的

---

**作者简介：**许奇塔，男，暨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中国史硕士研究生；吴青，女，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粤港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粤港澳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2VMZ007）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王素君著《1950 - 1965年间的华侨回国观光旅行》，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施雪琴，王刘波著《华侨回国观光团与新中国的侨务外交探析》，载《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叶炜著《中国对海外华侨观光统战研究（1949 - 1966）》（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② 聂励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组织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的历史考察》，载《党的文献》2023年第2期，第114 - 122页。

争斗并未停息，反而愈发激烈。这一特殊的政治背景导致香港观光团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参访线路，观光团问题因此与国共博弈交织在一起。本文将综合运用海峡两岸暨香港的报刊资料和相关档案，对1949年至1958年间，处于国共争斗背景下的香港观光团赴内地参访活动所产生的张力与影响进行深入梳理与探究，旨在揭示香港观光团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角色及其对新中国对港政策和统战工作的影响。

## 一、香港观光团赴内地考察之沿革与重要性

近代华侨和港澳同胞，不仅同中国保持着血肉联系，而且个人在外际遇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孙中山曾对华侨和港澳同胞发挥的作用予以很高评价，称“华侨为革命之母”，<sup>①</sup> 华侨和港澳同胞在中国革命时期重要性不言而喻。近代华侨和港澳同胞与祖国发生联结的其中一种方式便是观光团。早在1935年，国民党侨务委员会便鼓励华侨组成观光团回国考察，吸引侨资回国投资。抗战期间，最为知名的回国考察团是由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这一团体不仅活动范围广泛，而且与中共方面取得了良好联系，为新中国时期的华侨活动奠定了基础。<sup>②</sup>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组织香港观光团作为一项重要的统一战线工作，以加强与香港同胞的联系。在1949年至1958年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带领全国人民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并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在此期间，新中国一方面需要争取香港同胞对新生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通过香港这一窗口，增进港胞对新中国的了解。因此，新中国积极开展香港观光团的争取工作，使观光团赴内地考察，以期回到香港后广泛宣传内地建设的成就。

同时，在港英政府管治下，香港地区的经济、文化等领域有所发展，具有一定优势，并且其政治倾向会影响到其他侨居地同胞的选择，因此香港地区成为了国共两党的争取对象与竞争场域。对于国共两党而言，观光团是两党争取香港同胞和资金的重要方式，而对于香港同胞而言，观光团则能够为其洞悉内地与台湾具体情况，进而确定政治站位、投资路径以及未来前景提供有效途径。所以这一时期的香港观光团将置于内地与香港的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进行历史考察外，并需要将其置于国共两党之争中考量，从而能够全面地探析香港观光团赴内地考察的历史影响。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国民党就与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在处理侨务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完善的机构体系。因此，中共在争取港胞支持方面面临着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此外，香港在国共两党之争中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形成了亲北京和亲台北的不同阵营，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时期的国共斗争。因此，香港观光团成为了新中国和台湾当局争夺的焦点。据统计，从1950至1956年底止，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组团前往台湾观光的团体达412个单位，总共9166人次，除了以观光为名外，还有以致敬、祝寿、劳军、军中服务、考察等名义赴台观光。<sup>③</sup>

观光团问题上，新中国政权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些亲台北的观光团，除了在海外为台湾当局

① 在民国时期，港澳同胞也属华侨，其事务也归属侨务委员会负责。即便在国民党治台时期也将香港作为侨区进行管理。“侨务委员会”编印《侨务二十五年》（台北：海外出版社，1957年），第13页。

② 叶炜著《中国对海外华侨观光统战研究（1949—1966）》（厦门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5—16页。

③ “侨务委员会”编印《侨务二十五年》（台北：海外出版社，1957年），第71页。

的统治摇旗呐喊外，还会向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诋毁中共“不民主不自由”和宣传“反共抗俄”的口号。批驳亲台北的观光团和台湾方面对新中国和中共的抹黑，增进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对新中国的了解，引导其心向内地，是巩固新生政权、扩大统一战线的必要举措。而争取香港观光团赴内地参访并借此对外宣传内地建设成就，也能够使香港同胞认识到祖国的崭新面貌。所以，1954年华侨事务委员会总结组织观光团的目的在于观光团能够积极广泛宣传：一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二为解放台湾的决心，三为我国在国际斗争的胜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四为我国五年来建设的成就。观光团返回侨居地后，能将在内地的亲身体验同祖国真实情况介绍给国外侨胞，使得国外侨胞能够进一步认识和热爱新中国，扩大华侨爱国统一战线，孤立台湾方面别有用心的人士。<sup>①</sup>

这一时期的国共博弈是世界处于冷战格局下的缩影。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国共博弈不再是简单的内政问题，更是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和台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都被按照不同的意识形态划分入两大阵营中。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同台湾方面共同包围新中国政权，再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中美之间的矛盾趋于白热化，美国于1950年宣布冻结中国在美资金，并且企图断绝华侨对华汇款。<sup>②</sup> 侨汇不仅是新中国经济恢复与发展的资金来源之一，也对国内的侨眷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何吸引侨汇和侨商在内地投资建设，成为新中国需要面对的难题。而港商具有独特优势，首先香港地区居民组成90%以上为我国同胞，且多为经营商业者、熟悉市场与经营能力强，同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侨商与外商也有着血缘关系和各种往来；其次香港作为自由港口，消费性与转口性强且具备一定储存仓位，能够成为新中国外贸的销售耳目与蓄水池；最后新中国面临敌对国家的封锁，亟需香港作为转口站对外来往。<sup>③</sup>

这一时期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重要时期，亟需人才回国效力于社会主义建设。而华侨和港澳同胞当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他们拥有专业的知识与技术，正是新中国所需要的人才资源，新中国期望能够争取他们回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此外香港学生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他们作为新生代力量，对中国的印象更多停留在血统与国籍上，在具体问题上对于中国的形象是模糊的，因此具有相当的可塑性。而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何如，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港胞群体对祖国向心性。因此，无论是新中国还是台湾方面，皆十分重视对香港青年的争取，尤其是通过招生升学的方式将他们纳入自己的阵营中，待其学成后能够回到侨居地和港澳为各自所代表的阵营发声。故此，如何吸纳香港人才回国效力，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也是未来港胞人心归属的重要议题。

## 二、香港观光团中的国共博弈

### （一）政权认同：观光团之不同政治倾向

香港观光团在国共博弈中的表现，首先是对于不同政权的认同问题。这一时期，两岸存在着

① 《招待华侨回国观光工作计划》（1954年9月3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35-1-115-077~082。

②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号召全省侨眷生产节约自力更生，粉碎美帝企图断绝侨汇阴谋的指示》，1951年《广东政报》第2卷第3期，第94页。

③ 《关于团结利用港澳华商进一步扩展对港澳及东南亚的贸易问题（附件之二）》1958年，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4-1-20-30~34。

两个敌对的政权，香港背靠内地，从地理上而言，其对于新中国的成立较之其他侨居地负面感受更加明显。尤为突出的一点是香港方面对内地的各种运动充满疑惧，这种恐惧是来自于对新中国政权的未知和台湾方面的诋毁。台湾方面将新中国塑造成一个反自由和投靠苏联的“匪伪”政权，歪曲解放台湾事业的合法性，将“解放台湾”曲解为：勾结“俄帝”、镇压大陆“抗暴运动”、恐吓侨胞、削弱侨胞对台湾方面向心。台湾方面借此拉拢不知情的海外侨胞在政治上为其站位，仇视中共领导的新中国。除此之外，台湾方面还诋毁新中国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将1954年新中国所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为“丑剧”、1954年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称为“伪宪法”、30名华侨代表为大陆圈定指派，并将解放战争斥为“转嫁于人民身上”的“推翻民国的罪行”。<sup>①</sup>同时部分亲台北的香港同胞组成了观光团赴台湾考察，其中不乏在香港有影响力的精英带头组织，进一步加剧了港胞对新中国的误解。1953年8月9日，港商“回国”致敬团抵达台北，团长为香港精英周寿臣之子周日光，率领香港部分工商专家，向蒋介石表示拥戴和致敬，向台湾“反共抗俄”事业表达敬意。<sup>②</sup>副团长乐济世在观光感想中，将台湾称为“可爱的祖国”。<sup>③</sup>1957年，港九自由人士“回国”观光致敬团、香港工商界自由人士“回国”观光团等十余单位团体赴台湾观光，在此期间受到蒋介石、陈诚、军方人士以及“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郑彦棻等台湾政界高层接见，可见台湾地区对香港观光团的重视与对香港同胞的争夺。所以，即便赴台的香港同胞所处的土地未必为其家乡，但是港胞们因得到台湾重视而形成“新祖国”的想象建构，进而“增加‘反攻复国’一定成功信念”。<sup>④</sup>可见，香港观光团赴台考察活动形塑了一个象征性的“祖国”，进而稳固台湾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祖国”正统，有利于鼓舞岛内士气。<sup>⑤</sup>

在国共博弈影响下，香港同胞组团赴内地考察，首先要过的便是心中对新中国的恐惧关，在政治上认同新中国这个新生政权，并且向祖国内地迈出关键一步。1956年，第四（港澳）办公室收到众多港澳同胞来信来访，其中有许多港胞对相关政策提出疑问，包括婚姻法、政府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以及对“三反”“五反”和解放前后逃港的资本家和国民党旧军政人员的政策，更有一些身负罪债之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人员对要求回来坦白感到疑惧，反复要求内地解释政策问题。<sup>⑥</sup>因此，澳门爱国人士何贤建议：“至于如何进一步争取海外同胞认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我以为除了通过报刊报道以外，还应该多组织各种艺术团及旅行团，到海外去介绍祖国六年来建设情况，来影响一般受谣言蒙蔽的同胞，使他们真正认识祖国的新面貌，热爱祖国。”<sup>⑦</sup>

① 郑彦棻著《坚定信心，加紧努力，四十三年度“国庆”纪念与海外侨胞共勉》，载《香港工商日报》1954年10月10日，第2页。

② 剪报《港胞商致敬团，周日光等抵台，向蒋“总统”表拥戴，并准备投资生产》，载《星岛日报》1953年8月10日，版面不详（本文使用的剪报资料均来自于香港浸会大学所开发的《华人剪报资料库》，为注释简洁，下文出现剪报不再标注数据库名称）。

③ 乐济世著，剪报《游台观感》，载《星岛日报》1953年9月28日，版面不详。

④ 《各观光团谈游台观感，国军配备精良，反攻极具信心，又一批剧艺员昨乘轮“回国”劳军，前线劳军，远眺大陆》，载《香港工商日报》1957年12月29日，第7页。

⑤ 李道辑著《建构“新祖国”——郑彦棻时期（1950—1958年）的侨务工作》，载《“中央”大学人文学报》2007年第31期，第181—208页。

⑥ 《第四（港澳）办公室一年工作总结》1957年，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43-1-48-91-93。

⑦ 何贤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何贤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56年2月7日，第5版。

1949年11月6日，港九各界人民回粵觀光團抵達廣州，團長為香港勞工界領袖張振南、副團長為香島中學校長盧劭，該團由勞工界、教育界、工商界等人士組成，其代表性極強。該團發言人曾同記者說該團赴內地有多重意義，第一，是港九同胞與祖國人民的勝利大會師。他們要在這一行程里，將港九同胞熱愛祖國的情感帶回廣州，並將廣州人民對港九同胞的熱愛帶回香港，藉以加強港九同胞與內地人民的團結。第二，要將廣州解放後的具体事實——自由民主的實質帶回香港，告訴港九同胞，以粉碎反動派無恥捏造的宣传，及其離間港九同胞的陰謀。第三，要通過這一愛國運動，去鞏固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擴大港九同胞和外國僑胞的大團結。<sup>①</sup> 該團正副團長都是親共人士，團長張振南曾在香港積極推動勞工子弟學校和工聯會的創辦，<sup>②</sup> 副團長盧劭則是著名愛國中學香島中學的校長，二人的身份、與內地密切聯繫引發了港英當局的猜忌與迫害。1950年，港英當局乘張振南回內地期間，拒絕其入境。同年，港英當局將盧劭遞解出境。<sup>③</sup> 可見這一時期，港英當局面對香港同胞在國共博奕中往往會平衡國共雙方在港勢力的擴展，以避免某一方勢力在港坐大從而威脅其在港管治。

新中國成立後，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港英對親北京的港胞採取打壓的態度，對台灣方面則是姑息與縱容，執行著敵視新中國和製造“兩個中國”的政策。<sup>④</sup> 而港英當局對國共博奕的態度，將影響香港同胞政治傾向的選擇。香港同胞對新中國的形象認知往往受到台灣、港英當局和新中國三方面的共同塑造，因此香港同胞的態度呈現出模稜兩可的狀態。香港觀光團赴內地考察則為港胞了解新中國的實況提供窗口，眼見方為實。1950年8月9日，港澳工商界東北觀光團抵達廣州，他們觀訪了廣州、漢口、天津、沈陽、哈爾濱、撫順、大連、北京、上海等城市，並發表書面談話，談及其游歷印象，並贊揚祖國正在進步，工商業發展前途光明遠大。

觀光地的選擇並非隨意為之，而是新中國有所甄選的、正面呈現新中國成就的代表，展現了新中國華僑投資事業、公私合營事業、工業建設、中蘇友好關係等事業的進步。<sup>⑤</sup> 1956年，香港工商界婦女觀光團團長、香港名醫馬祿臣夫人、香港松渥公司經理李惠英總結觀光收穫說道：“由怕共產黨變為愛共產黨了。”<sup>⑥</sup> 同年，香港回民觀光團赴內地同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舉行座談會。會上，香港中華回教博愛社阿訇和理事劉有信說：“這次在北京我們親眼見到了政府資助舉辦的專門培養阿訇的伊斯蘭教經學院，有力地說明了新中國宗教信仰的自由。”<sup>⑦</sup> 香港觀光團赴內地考察破除了國民黨的中傷、港英當局的阻撓，不僅將新中國的真实情況反映給香港同胞，同時在觀光的过程中形成了對新中國的認同，有力地同親台北的港胞鬥爭、有利於爭取部分處於猶豫的港胞靠向新中國，“使得國外僑胞能進一步的認識和熱愛祖國，從而擴大了華僑愛國統一戰線，孤立了蔣匪幫。”<sup>⑧</sup>

但這一時期，香港觀光團赴內地考察存在局限。在對待港胞工作中，一些地區的幹部和部門

① 《港九人民熱愛自由祖國，回粵觀光團抵穗，一行二百餘人代表各界近百單位，廣州各界代表到車站歡迎》，載《人民日報》1949年11月10日，第4版。

② 《張振南茁壯成長奠基者》，載（香港）《大公報》2009年7月31日，A13版。

③ 《香港英國當局強迫培僑中學校長杜伯奎出境詳情》，載（香港）《大公報》1958年8月10日，第4版。

④ 《我外交部向英代辦處發出兩個照會：嚴重抗議香港當局蓄意尋衅、嚴重抗議英機侵犯我國領空》，載《人民日報》1958年8月28日，第1版。

⑤ 《招待華僑回國觀光工作計劃》1954年9月30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35-1-115-077~082。

⑥ 《香港工商界婦女，贊美祖國內地的建設》，載《人民日報》1956年5月16日，第1版。

⑦ 《香港回民觀光團，稱贊祖國宗教信仰自由》，載《人民日報》1956年8月26日，第4版。

⑧ 《招待華僑回國觀光工作計劃》1954年9月30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35-1-115-077~082。

不了解情况，没有很好地照顾到港胞、归侨、侨眷和华侨的特点，所以导致工作上发生一些偏差。<sup>①</sup>例如1957年两位亲共工人黎某、曾某返乡探亲，因疏忽而将香港旧报纸带入内地，而在深圳被扣。同年两香港商人回内地探亲，其中一位因携带行李过多，而被指为“走私犯”，要求将其所携数千港币作为罚款，否则将送去劳改。另一位则是指其在上海解放前所办企业有税务和债务未清，要求其购买“1957年经建公债”20万元（相当于港币40余万元），待其缴款后才可自由返港。<sup>②</sup>此外，在接待香港观光团时，对于展示正面形象的意愿有时过于迫切，有时会过分扬长避短，有时接待工作安排节目过紧，导致参观时间急迫。<sup>③</sup>对于迫切想要接近、了解祖国的港胞来说，这种态度一来容易使得港胞感到接待工作不真诚，二来港胞无法针对内地的不足提出建议和推动内地建设。对此，广州市在1956年国际活动工作计划中，要求“安排外宾活动日程应根据‘主随客便’和‘客随主便’相结合的原则，不要过紧过死”，并且扩大被参观单位和巩固原有的被参观单位，还有扩大供外宾访问的各阶层人选，以达到交朋友和消除外宾疑惧，逐渐增进对内地了解的目的。<sup>④</sup>

## （二）港资考量：内地市场与台湾市场

国共博弈之下，新中国和台湾方面对于港胞的拉拢，其目的还在于吸引港资投资各自政权经济建设。1949年11月10日，叶剑英接见港九各界回穗观光团，号召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们，继续努力，协助人民政府建设新广州、新广东和新中国。<sup>⑤</sup>而台湾方面也在鼓励港胞赴台投资，为其开辟经济建设资金，并增强港胞对台湾的政治认同。<sup>⑥</sup>对于港胞来说，投资内地还是台湾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政治认同，还需要将国共两党对港资的政策、优惠纳入考量，从而促进其事业扩张。这一时期，国共两党都不断提出便利港资的政策来吸引港资投资，使得港资流向并不固定。1952-1954年，台湾“行政院”颁布了《鼓励华侨及旅居港澳人士举办生产事业办法》、《自备外汇输入物资来台举办生产事业办法》、《华侨回国投资办法》。后复于1955年颁布《华侨回国投资条例》，首条揭橥“华侨‘回国’投资之鼓励保障及处理，依本条例之规定”，内容规定“外国人投资出资种类、投资方式，申请审核程序，本息结汇、保障、辅导等等……为此后的鼓励措施，奠定良好基础”，<sup>⑦</sup>还在1956年筹设辅导委员会指导侨商投资。<sup>⑧</sup>台湾方面除了鼓励港资赴台投资外，还多方拉拢华侨经济制裁新中国，杜绝港资流向新中国，以此达到“收打击‘共匪’、加强‘匪区’经济崩溃的实效”。<sup>⑨</sup>此外，这一时期香港媒体信息真假参半，阻碍了港侨了解内地的

① 《归国华侨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 将通过全国侨联章程，选举领导机构，确定今后任务》，载《人民日报》1956年10月6日，第4版。

② 《香港报贩何某赴穗探亲，返港在深圳被捕，中共指其为“帝国主义特务分子”，另两亲共工人返乡亦在深圳被扣，两香港商人返沪省亲，分在广州上海被扣留，迫令缴罚款购“公债”始允释放，所谓爆炸铁路事件证明系冤狱》，载《香港工商日报》1957年2月27日，第3页。

③ 《招待华侨回国观光工作计划》1954年9月3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35-1-115-077~082。

④ 《广州市1956年下半年国际活动工作计划》1956年9月，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55-2-135-015~020。

⑤ 《广州党政军和各界人民，欢迎港九回穗观光团》，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1日，第1版。

⑥ “侨务委员会”编印《侨务五十年》（台北：侨务委员会，1982年），第206-207页。

⑦ “侨务委员会”编《侨务五十年》（台北：侨务委员会，1982年），第206-207页。

⑧ 《台筹设“辅导委员会”，协助侨胞投资生产，已核准华侨“回国”投资五五家，香港占首位四二家日本次之》，载《星岛日报》1956年3月5日，版面不详。

⑨ 《加强侨胞对“匪”经济制裁，“侨委会”定办法，通令海外各侨团，制裁办法共分三项》，载（台湾）《“中央”日报》1953年4月6日，第4版。

工商政策。如台湾方面时常中伤新中国搜刮侨资，1956年国民党媒体《香港时报》指责上海所设华侨投资公司榨取港澳同胞所携港资。<sup>①</sup>这种中伤实际上是对新中国鼓励侨商投资、公私合营政策的诋毁，从而打击港商投资内地的信心，动摇其对内地政策的信任。

作为应对，新中国则是首先制订和贯彻了“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政策，中国银行先后举办了“原币汇款”、“原币存款”及“人民币汇款”、“侨眷低利小额贷款”，减少了转汇手续；同时对有意回内地的港商予以辅导，允许港资投资开发山林、荒地、农园等事业。<sup>②</sup>除了政策之外，鼓励香港观光团赴内地考察不但有利于破除侨商对内地投资的心中阴霾，还能够对台湾方面的中伤予以回击。1956年，广州举办“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香港工商界除了香港中华总商会组织的港九工商界三批观光团外，还有京果、山货等14各行业组织团队回内地交流，其中不少是解放后第一次同内地建立贸易关系。在此次交流会上，我国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同港澳和华侨商人共签订了总值1900多万元的合同。本次交流会特点在于公私合营企业积极参与，公私合营企业所达成的交易额约占58%，并且还能拓展客源、货源和帮助国营企业开展业务。<sup>③</sup>通过观光团活动，港商不仅在同公私合营企业交流中获得了物质利益，同时增进了对内地市场的信心，台湾对新中国的谣言不攻自破，何贤认为：“全国各大都市的工商业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进入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亲眼见到每一个工商界同胞，都是喜形于色，额手相庆。”<sup>④</sup>

除了国共两党对港商政策外，港商投资还需要考虑市场前景与广度。香港观光团赴内地和台湾考察能够看到两地市场差异与评估未来投资收益何如。1953年，以周日光为首的港胞商致敬团赴台，其目的除了致敬台湾军政要员外，还有了解台湾经济建设需要，准备选择可以举办的工商事业投资生产。<sup>⑤</sup>同时，该团向台当局请求放宽港商投资办法，明确规定港商投资对象，对港资进口予以便利。<sup>⑥</sup>不过，港商投资台湾时常出现亏损，例如1957年港商杨定齐在台北所投资的鹤鸣鞋帽店负债倒闭，同年倒闭的还有天光雨衣厂、怡美行、复华豆腐店、新南染织厂等，台湾倒闭风“几乎每天都有”。<sup>⑦</sup>1958年，继港商胡洽棻在台投资破产自杀后，港商徐鸿恒夫妇同年服毒自杀。徐氏夫妇曾携10万美元赴台投资纺织业，创立台北纺织公司，但最终股本全部亏光，沦为小职员，且几次申请离台不获允许，最终自尽。中共方面指出台湾官僚资本侵吞侨资，虚假宣传诱骗侨资入台。<sup>⑧</sup>但实际上，港商投资失利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台湾当局的侵吞，而是台湾市场狭小导致了投资易于竞争而淘汰。台湾本土工商界对于侨商、港商投资曾提出建议：其一为选定

① 剪报《诱骗侨胞投资，上海设华侨投资公司，搜刮对象为港澳侨胞》，载《香港时报》1956年10月6日，版面不详。

② 华侨事务委员会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侨务工作的回顾》，载《人民日报》1954年10月6日，第3版。

③ 《在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中，外贸部门同港澳工商界等签订近二千万出口合同》，载《人民日报》1956年4月14日，第1版。

④ 何贤：《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何贤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56年2月7日，第5版。

⑤ 剪报《港胞商致敬团，周日光等抵台，向蒋“总统”表拥戴，并准备投资生产》，载《星岛日报》1953年8月10日，版面不详。

⑥ 《香港胞商致敬团，昨参加侨务座谈，提供侨胞返“国”投资意见，今将出席工商界座谈会，领队周日光昨先行返港》，载《台湾》《“中央”日报》1953年8月26日，第4版。

⑦ 《港商投资台湾悲惨下场，鹤鸣鞋帽店遭拍卖，在台北开设数年终于血本无归，生财廿八拍卖据说负债数十万》，载《香港》《大公报》1957年12月26日，第4版。

⑧ 剪报《港商胡洽棻事件后轰动台湾惨剧，在台投资惨败，蒋帮吞没老本，徐鸿恒夫妇服毒死，事前申请离台不准，遗书嘱把骨灰运故乡》，载《香港》《文汇报》1958年4月25日，版面不详。

投资目标勿与已有工业互相冲突，因为台湾市场狭小，一旦生产过剩，投资有亏损倒闭的风险；其二为进口物资对本省工业勿产生影响，侨资一旦进口本省已能自制的物资，而台湾市场消化量有限，又易导致本土企业停工减产。<sup>①</sup> 所以台湾当局在1952年另订侨商投资特别办法前，港商乐于投资香港地区而将台湾视作次要地区，正是因台湾当局对侨资投资的管制，<sup>②</sup> 而放松管制后又因台湾市场狭小而导致侨资投资出现竞争淘汰现象。

相比于台湾市场，内地市场展现出更显著的规模优势与开发潜力，为港商投资更加有利可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和更可观的增值空间。内地通过贯彻执行“使商人有利可图和提高其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使其有合理利润可得，又以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其经营积极性，同时内地商品在香港销售和转口上占有重要地位，故“越来越多的商人，逐渐靠拢祖国”。<sup>③</sup> 1956年，“香港中华总商会贸易团”和“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贸易团”赴穗参加广东省物资展览交流大会，两团不但做成了数百万港元的生意，同时在途中参观许多工厂，考察到内地很多产品可以远销非洲、中东等地市场，预见到了内地产品的价值与潜力。他们认为：“目前广州可出口之货甚多，如果港商能扩充营业范围，把关系联络好，生意一定会更有前途的。”除了产品外，港商还观察到内地需要建设的物资仍有很多，如机器、仪器、五金、制药原料等在内地都可以有广泛的销路。<sup>④</sup>

### （三）引凤筑巢：人才的争取与流动

国共两党对香港同胞的争取，不仅体现在政治认同和经济利益上，而且注重吸引香港人才。如果说政治认同和经济利益是短期见效的争取，那么人才流动则是争取人心归附的长期焦点。这一时期，国共两党主要针对香港学生和技术人才作为争取对象，以培养建设人才资源。

1950年起，台湾方面通过辅导侨校、供应侨校教科书、培养侨校师资、争取侨生赴台升学、召开华侨文教会议、举办华侨教育展览、恢复侨民教育函授学校等方式，<sup>⑤</sup> 加强对侨区侨生的文教控制。台湾方面还借观光团赴台考察，拉拢侨生和香港学生投靠国民党阵营，“借以加深他们在反共抗俄这一空前伟业中实践和力行的认识和勇气”，<sup>⑥</sup> 吸引大批侨生和香港学生赴台升学和就业。据统计，在1951-1956年间，侨生和香港学生赴台升学人数共达4139人，赴台升学人数逐年增加。<sup>⑦</sup>

面对日趋激烈的香港学生争夺战，中共出台一系列政策争取香港学生回内地升学，以扩大其在香港社会的统战基础。1953年，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了华侨事务委员会，积极开展协助华侨和港胞回内地升学工作，归国的香港学生被安排入国内各级学校及北京、广州、厦门三地的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学习。<sup>⑧</sup> 1950年，广州市政府公布《优待侨生回国升学暂行办法》，对香港学

① 剪报《对于华侨投资生产工业界五点建议》，载《台湾新生报》1957年7月8日，版面不详。

② 《政府放宽侨资工商业管制，华侨返“国”投资者增加，去年投资额比过去四年多两倍，政府积极扩展，对东南亚贸易，为台湾工业品打开销路，同时订定侨胞投资对象》，载《香港工商日报》1957年1月8日，第3页。

③ 《关于团结利用港澳华商进一步扩展对港澳及东南亚的贸易问题（附件之二）》，广东省档案馆藏，1958年，档案号304-1-20-30~34。

④ 施进：《港商在穗做生意》，载（香港）《大公报》1956年5月28日，第6版。

⑤ “侨务委员会”编印《侨务二十五年》（台北：海外出版社，1957年），第79-84页。

⑥ 《国庆期近“归国”观光华侨，整日活跃于台湾，政府人员有应接不暇之势》，载《香港工商日报》1953年10月9日，第3页。

⑦ “侨务委员会”编印《侨务二十五年》（台北：海外出版社，1957年），第82页。

⑧ 华侨事务委员会宣传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侨务工作的回顾》，载《人民日报》，1954年10月6日，第3版。

生升学予以优先录取、随班附读等优待，以吸引香港学生回内地升学。<sup>①</sup>

不过在国共博弈下，各种对新中国的中伤从未停止，指责新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为“毒化教育”或“头脑洗礼”。<sup>②</sup> 新中国亟需通过香港观光团赴内地考察来破除台湾和港英方面的造谣，进而化解香港学生对新中国的疑惧，才能争取香港学生向新中国靠拢。1956年，香港教育界组织赴穗观光团，参观在广州举办的捷克展览会，参与学校主要是中华、香岛、汉华等左派爱国中学，参观内地学校的科目教学，并同广东省教育厅和教育界举办会谈。<sup>③</sup> 该团目的有四，一是透过观展，粉碎香港对内地的谣言；二是加深对祖国建设需要的认识；三是加深对国际友谊帮助的认识；四是回港以后准备开展工作以配合祖国的需要。<sup>④</sup> 在香港观光团充当香港学生和内地的润滑剂与中介后，香港学生升学能更好地适应内地的爱国主义教育，从而“使考生在思想认识上提高一步，改变他们对祖国的模糊的认识”，这些香港学生认为“他们回到祖国，好像投入温暖的大家庭，感到非常亲切，这是港澳殖民地社会所没有的。他们认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正欣欣向荣，一切都显得新社会的新鲜气象。因此，他们的理想是愿意投身到祖国怀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sup>⑤</sup>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 - 1957年），我国亟需人才推动工业化建设，尤其是吸引技术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回内地参与建设，主要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留学生等。何香凝于1955年曾发表广播，呼吁“我们国外侨胞，也应该和祖国人民一道，积极参加与支持这个伟大的五年计划而共同努力。”<sup>⑥</sup> 在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下，这一时期新中国对于港胞回内地参与建设是持欢迎态度的。早在1949年，港九各界人民回粤观光团中就不乏工人领袖、校长、教授、工程师、律师和学生等代表，<sup>⑦</sup> 他们作为香港先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回内地观光亲身感受了祖国的温暖和进步，成为了新中国同香港知识分子沟通的桥梁，向香港社会宣传新中国的政策。但是即便港胞归国服务得到新中国支持与欢迎，但回内地为国效力仍有种种障碍，例如对新中国的怀疑、台湾和英、美两国对港胞的拉拢。第四（港澳）办公室在其成立以来8个月接待来访者达6424人次，其中要求介绍就业的达4441人次；收到港澳同胞来信3019件次，其中要求介绍就业的达2386件次。而该室登记了要求介绍就业者2938人，介绍了445人，到职的255人，被录用者仅占全部登记额的15%左右。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生产任务和用人计划变动之外，还源于部分用人单位在港澳同胞的聘用上存在多重顾虑，“如怕政治上无保证，思想意识复杂不易对待”，或者认为港澳回来的港胞期望薪金偏高。这些用人单位对党的政策领会贯彻还不够，在介绍就业工作中本末倒置，没有将争取高级知识分子作为工作重点。据参加过“号召港澳高级知识分子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座谈会”的各方面人士反映港澳高级知识分子对回内地工作在思想上有十怕，如怕查历史、怕学习、怕待遇低等。此外，台湾方面和英、美国积极拉拢港胞，避免其回到内地效力，如通过签订定期合同、提高薪水、增加失业补助、造谣和威胁利诱等方式。<sup>⑧</sup>

① 《争取海外侨生回国升学，穗文教局公布优待办法》，载（香港）《大公报》1950年12月13日，第2版。

② 《港澳侨生三百余人，参加穗共统一考试》，载《香港工商日报》1952年8月25日，第3页。

③ 陈君葆著，谢荣滚编《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三：1950 - 1956）（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75页。

④ 陈君葆著，谢荣滚编《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三：1950 - 1956），第478页。

⑤ 《港澳生回穗升学指导委员会工作总结》1957年8月12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4 - 1 - 162 - 140 ~ 143。

⑥ 《庆祝祖国第六周年国庆，何香凝向侨胞播讲》，载（香港）《大公报》1955年10月1日，第1版。

⑦ 《港九人民热爱自由祖国，回粤观光团抵穗，一行二百余人代表各界近百单位，广州各界代表到车站欢迎》，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0日，第4版。

⑧ 《第四（港澳）办公室一年工作总结》1957年，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43 - 1 - 48 - 91 ~ 93。

对此，新中国采取一系列政策支持香港同胞回内地服务。首先是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按国家需要和个人特长，尽量照顾港胞志愿去安排工作。其次是规定港胞回内地后的工资待遇等一般不低于原有工资或按照国家机关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评定。最后在港胞归国手续和眷属生活方面予以照顾。<sup>①</sup> 1956年，广东省侨委召开“归侨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邀请高级知识分子和归国留学生分享争取华侨和高级知识分子回内地参加经济建设的意见与建议，进而消除他们在内地工作的顾虑。<sup>②</sup> 因此，香港观光团赴内地考察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香港知识分子前往内地服务的疑虑，但是爱国港胞最终投身内地建设事业仍建立在相关政务部门的政策解读和阐释工作。通过消除误解和政策认知差异，港胞逐渐建立起回内地工作、服务于祖国建设的信心，最终促成诸如耀鏗、徐锦庠、贺迺斌等知识分子做出回到内地参加祖国建设的决定。<sup>③</sup>

### 三、国共博弈对香港观光团产生的影响

#### （一）国家认同张力下的统一

象征符号一般需通过仪式等形式呈现，仪式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作为文化现象而蕴含着政治和权力因素，在仪式呈现象征符号过程中逐渐向民众灌输社会记忆。国共博弈影响下，国共双方都在努力建构“祖国”概念，建立港胞同“祖国”的联系与记忆，香港观光团的行程也因此分化为赴内地与赴台两条路线。在这一时期的考察活动中，香港观光团参加各种仪式性活动，逐渐对新中国和所谓的“中华民国”形成了不同的认同建构，并参与到了社会记忆的塑造活动中。香港观光团参访活动加剧了新中国与台湾当局之间的敌对关系，使得其考察活动从纯粹的旅游观光转变为具有政治色彩的立场表态。在观光考察的过程中，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感呈现出复杂的张力。对于他们而言，“祖国”不再仅仅是基于血缘纽带的故乡概念，而是可以扩展为对于不同符号化的政权的认可。这种认同的张力对香港同胞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造成了港胞分化成亲北京和亲台北两个阵营；另一方面，这种认同能够进一步强化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在国家认同的张力之下，香港同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统一认知，即香港始终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人也是中国人身份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以政治为导向的身份意识与国家认同塑造过程中，新中国和台湾当局都需要建立起彼此同港胞的关联架构（港胞——解放台湾——新中国、港胞——“反攻大陆”——台湾）。不过台湾方面所建立的关联架构是脆弱的，港胞同台湾借助“国民革命”“中华民国”或者“反攻大陆”等共同记忆维系这一架构时，同样面临着其中一方放弃这段共同记忆的危险，<sup>④</sup> 于是这种基于政治而非血缘、地缘文化所建立的虚拟架构极易瓦解，仪式下的符号未必能够维持共同记忆，反而容易产生对共同记忆的质疑。香港观光团赴台所参观的景点，如日月潭、高雄港等，都无法直观地将港胞与祖国建立起有效联系，反而在观光中发现“故乡不可见兮”。与台湾相比，新中国在建立政治关联架构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新中国不仅是“政治中国”的象征符号，更是一个承载着

① 《撤消接待港澳同胞办公室的通知及有关港澳高知和工程技术人员回内地服务的若干规定》1957年3月11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43-1-48-98~99。

② 剪报《归侨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载《广东侨报》1956年10月1日，版面不详。

③ 《第四（港澳）办公室一年工作总结》1957年，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43-1-48-91~93。

④ 李道辑著《建构“新祖国”——郑彦棻时期（1950—1958年）的侨务工作》，载《“中央”大学人文学报》2007年第31期，第181—208页。

港胞祖辈共同记忆的故乡，是港胞与亲人之间血缘联系的坚实纽带。在赴内地的考察活动中，参观侨乡是香港观光团行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进而通过这一仪式性活动与原有的社会记忆进一步建构“祖国”符号，并为新的社会记忆生成提供新素材。港胞们在侨乡的停留时间往往较长，这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既能深入探亲访友，又能全面了解侨乡的生产建设事业，从而加深对故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sup>①</sup> 香港观光团参访完侨乡后，将侨眷在内地生活情况和侨乡的新气象转告其他侨胞，加深了侨胞对家乡解放后治安、卫生、教育、交通和生产等各方面得到长足发展的认识。许多侨胞对此表示非常欢欣，说：“侨眷现在生活能过得好，都是毛主席领导得好。”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对我们祖国的造谣诬蔑；同时有助于当地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sup>②</sup>

## （二）港资投入于国家建设

在国共博弈下，新中国和台湾当局都会积极争取港资投资其所辖市场，以期为自己的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本，客观上都推动了海峡两岸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港商会在国共博弈中对两地的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进行细致的评估，以便为自己寻觅到更优的投资政策、更好的投资环境以及更高的投资效益。

香港观光团赴台考察，加深了对台湾市场的深入了解，促进了部分港资向台湾地区的流动，从而推动了台湾地区的经济建设。台湾方面曾于1957年统计，自1951—1957年6年时间内，共核准华侨和港商投资家数136家，投资总金额折合美金已逾2000万元，已开工的港资工厂达56家，多投资于台湾地区民生日用品的制造业。投资额虽不算特别多，但对于彼时资金缺乏的台湾而言，在其经济建设方面做出了贡献。<sup>③</sup> 而就侨居地分析发现，港澳资本投资台湾所占比例最大，截至1957年在台投资的华侨事业124家中，港澳地区占74家，几占一半。<sup>④</sup> 显然，在这一时期，港资在台湾的经济建设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不仅凸显了港资的重要性，也促使港资得以突破香港的地域限制，成功拓展了新的市场领域，并且建立了紧密而稳固的经济联系。然而，港资投资台湾地区这一现象对于新中国来说，却意味着部分港资未能为自身所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敌对势力的经济实力，这无疑使得“解放台湾”的事业面临着更加复杂和棘手的局面。

因此，在国共两党纷争的背景下，选择赴内地考察的香港观光团，实际上是对内地市场抱有乐观预期的理性决策。在那个时期，新中国正面临着战争留下的经济创伤，急需恢复和发展经济，因此充分利用各种资金来源成为当务之急。在香港观光团的积极宣传下，部分港商开始迈出了解内地市场的第一步，这为内地日后利用港资进行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港资流入内地，新中国经济建设获得了相当资金的支持。从1951年开始，由国家、港胞和华侨共同投资，组成了华南企业公司、华侨工业建设公司和广州投资公司等3个规模比较大的公私合营企业。到1954年底，这3家公司先后共建成了华建麻纺厂、徐闻华建糖厂等5个工厂；同时还配合国营商业部门开展了对外贸易业务。随着港商要求回内地投资者日多，以上3家公司于1955年经过改组合并成立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sup>⑤</sup> 该公司于1956年第一至第三季度获得利润327万多元，第四季度预计可得利润160余万元，旗下开设有华建麻纺织厂、东莞总厂、华南松香厂等11个工厂，并且开展

① 《招待华侨回国观光工作计划》1954年9月3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35-1-115-077~082。

② 华侨事务委员会宣传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侨务工作的回顾》，载《人民日报》1954年10月6日，第3版。

③ 剪报《六年来华侨投资额折合美金已逾二千万》，载《台湾新生报》1957年7月8日，版面不详。

④ 《就侨居地区分析，港澳侨胞投资所占比例最大》，载《台湾新生报》1957年7月8日，版面不详。

⑤ 吴尔祥《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资建设祖国》，载《人民日报》1956年5月22日，第2版。

劳动竞赛。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的对外贸易公司——华南企业公司，该年截至10月底的营业额比1955年同期增加近一倍，而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在1956年11个月内吸收的华侨及港澳同胞股金比1955年全年增加4成多，新增加的华侨股东比去年增加人数多了8成。<sup>①</sup>

### （三）港胞流动塑造共同体

在香港观光团的积极促进下，香港同胞在选择升学和就业方面有了更多机会。透过香港观光团对香港之外地区的了解，越来越多的香港同胞通过升学、就业等途径流向内地。这一过程实际上加深了香港同胞对中国的认同感，并进一步坚定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尽管国共博弈加剧了香港同胞在政权认同上的分歧，但无论他们做出何种选择，“解放台湾”和“反攻大陆”两套政治话语反而起到了将内地（大陆）、香港和台湾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用。

前文皆已提及新中国与台湾方面在争取港胞回流的措施，此处不再赘述。1953年浙江大学香港学生梁民生于1952年给港九高中毕业生同学写了一封信，信中梁民生回顾了内地政府、学校、师生给予帮助和关怀，并且道出“青年人在新社会里，前途是无限的；毕业后政府马上给你工作，毕业就是失业这是永远也不会有了的现象了，青年人的聪敏才智在新社会中可以得到无限的发挥。”<sup>②</sup> 圣保罗中学一回穗升学学生温玉珍于1953年回忆在内地学习的体验，她认为“祖国给我们的印象是很好的，我们从实际体验中，从电影中，看到了祖国三年来的飞跃进步。我们已体会到祖国的确是伟大的，我们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光荣的。”<sup>③</sup> 内地把香港学生集中起来，通过生活照顾、学业辅导、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式，提高港澳学生的思想水平，改变他们以往对祖国的模糊认识，同时因为香港学生在香港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所以争取香港学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团结和教育广大的港澳同胞。这些香港学生回到内地后，亲身感受到来自于内地人民的善意与温暖，纷纷表示“好像投入温暖的大家庭，感到非常亲切，这是港澳殖民地社会所没有的。他们认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正欣欣向荣，一切都显得新社会的新鲜气象。因此，他们的理想是愿意投身到祖国怀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提出“这次回到港澳将把亲身感受、耳闻目见的一切向亲友们宣传。”<sup>④</sup> 可见，在香港同胞的流动中，这些在香港有广泛社会关系的港胞回到香港后，将自己在内地的亲身感受和所见所闻向亲友们宣传，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和改变港胞对内地的看法和认识。他们的宣传有助于消除港澳同胞对内地的误解和偏见，增进香港同胞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同，促进香港同胞与内地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团结，为香港同胞融入祖国的发展大局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而内地对香港同胞的争取与照顾，不仅能够获得到更多的香港同胞的支持和参与到祖国建设大业中，还能够为香港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更广泛的力量。

① 《侨胞投资祖国建设逐年增加，广东华侨投资公司业务发达》，载（北京）《大公报》1956年12月9日，版面不详。

② 梁民生著《一个由香港回内地升学的同学，给港九高中毕业同学的一封信》，载（香港）《文汇报》1952年5月11日，版面不详。

③ 温玉珍著《港澳回穗升学同学生活在愉快的环境中》，载（香港）《文汇报》1953年8月26日，版面不详。

④ 《港澳生回穗升学指导委员会工作总结》1957年8月12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4-1-162-140~143。



## 考古与文献所见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珠海

孙苏宇

**【摘要】**伴随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蓬勃发展，广东沿海涌现出众多著名的港口城市。珠海市因地处珠江入海口西侧，境内岛屿星罗棋布，自汉唐以来就参与到了中外海上丝绸之路交流之中，宋元之际其逐步发展为船只前往南海前的贸易中转站，澳门开埠后更是成为了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然而过往学者的关注点多放在广州、澳门、汕头等港口之上，忽视了珠海在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段中所发挥的作用。各时期文献的记载和现珠海市境内出土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关遗物都证明了珠海面海而生、因海而兴，是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段中的重要通道。

**【关键词】**珠海；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献；重要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是近代西方蒸汽轮船出现以前，东西方进行政治往来、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有关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课题。<sup>①</sup>自古以来中国就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沿海地区的古代先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起者、推动者、参与者，来自中国的优质瓷器、丝绸和茶叶长期以来都是这条贸易通道上的主要产品。除各时期官修史书中所记的中外海上交流以外，诸多私家笔记、旅行游记和航海图略也为现阶段海上丝绸之路和沿途地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sup>②</sup>

珠海市地处珠江入海口西侧、向南遥望南海，境内岛屿众多、水网密集，有崖门、虎跳门、鸡啼门、坭湾门、磨刀门五处内河水网入海口，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所以自古以来珠海的发展就与海洋产生了紧密联系。不过传统中方史料涉及中外海上交流时多注重对于广州等港口的记录，论述自广州放洋后的海上航线时仅对于珠海地区一笔带过。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相继

**著者简介：**孙苏宇，男，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

① 参见孟原君著《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载《考古学研究》第十一期（2019年），第370页。“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由法国汉学家沙畹于1913年首次提出，此概念是对于李希特霍芬“丝绸之路”概念在海道方面的延伸。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伯希和、费琅，日本的藤田丰八、桑原鹭藏，中国的冯承钧、向达继续对此问题进行延伸探讨。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新安号”“黑石号”沉船等水下考古文物的出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外学者所关注的概念。

② 参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85，91，121页。东南亚诸国早期的历史即可用《扶南传》《岭外代答》《诸蕃志》等中方文献比对当地碑文进行研究。

在现珠海市所辖地区发掘了与历代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物,<sup>①</sup>使人们愈发认识到珠海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段内的重要通道,本文欲梳理珠海市境内出土的历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文物,并于古籍中整理与珠海市中外海上交流相关史料以勾勒珠海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

## 一、先秦至唐代海上丝绸之路遗物与遗迹

正如严文明先生在《珠海考古散记》一文中所说:“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珠江三角洲尤其引人入胜,因为那里背靠五岭,面朝浩瀚的南海,地理上自成单元,文化上也诸多特色。”珠海市气候温暖、依山傍海,为早期先民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早在4500年前就有先民在珠海地区活动,他们沿海而居,利用海洋的同时也敬畏海洋,早期珠海先民对于海洋的探索为此后珠海参与海上贸易和远洋活动提供了经验。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在现珠海市境内的淇澳后沙湾遗址、香洲蛇洲岛遗址、高栏岛宝镜湾遗址等处发掘所得的先秦时期遗物,充分证明了珠海先民在与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已经懂得利用舟楫之利进行生存,他们依山面海、避风僻浪,在有淡水的海湾进行渔猎活动。1989年唐家镇淇澳岛后沙湾遗址出土的彩陶和白陶反应了当时的渔猎经济;香洲蛇洲岛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了3件石网坠以及刻划双线波浪纹的夹砂陶器,<sup>②</sup>这生动的反应了珠海先民依赖当地的自然环境进行渔猎生产的场景,同时波浪纹的呈现说明早期的珠海先民已经开始与海洋结缘。

现珠海市境内最具代表性的先秦海洋文明遗迹是高栏岛宝镜湾岩画遗迹。1989年10月,珠海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南水镇高栏村与铁炉村之间的宝镜湾山坡上发现了6幅岩画(分别为藏宝洞东壁岩画、藏宝洞西壁岩画、藏宝洞洞口岩画、大坪石岩画、天才石岩画、宝镜石岩画),上述岩画分布在宝镜湾的山坡和海边,以阴纹线条凿的方式凿刻出各种图案。其中藏宝洞东壁岩画是中国南方地区面积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表意象形岩画,画面有船型、人物、云纹、波浪纹等10多组图案(见图1);大坪石岩画以直观写真的手法刻画了20多个人物、动物围绕一条大船奔走、跳跃和跪拜的场景,仿佛在描绘起航前祭拜的场景(见图2);宝镜石岩画上则刻有似海浪和浮云般的线条。<sup>③</sup>尽管这些岩画是由不同时代、不同部族之人刻画而成,但是由于处于同一地区、历史相袭,所以反映的海岛生活与图腾信仰都是相似的,都可以说明先秦时期百越民族“居于海上”“便于舟”的生活方式。<sup>④</sup>此外根据玉玦传播路径的相关研究来看,珠海的先民们较早的参与到了海上航线的开发之中,肖一亭在《南海丝路上的珠海》一文中指出:“同一类型、颜色、质地的玉玦在长江流域出现在6000至7000年前,而在珠江流域出现在4500年前左右,在越南北部出现在4000多年前,在越南南部出现在3000多年前。”<sup>⑤</sup>这些考古遗迹和有关研究展现了珠海先民们向海洋进军、通过海洋进行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的不朽功绩,这也为日后珠海参与海上丝绸

① 参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市博物馆编《珠海平沙出土宋元文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珠海境内的考古工作始于50年代时的零星调查,自80年代珠海成为经济特区之后,考古工作有了迅速进展。

② 参见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21页。

③ 参见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第125页。

④ 参见珠海市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3页。

⑤ 肖一亭著《南海丝路上的珠海》,载《珠江论丛》2021年第1期,第82页。

之路这一东西方贸易文化通道奠定了基础。



图1 高栏岛宝镜湾藏宝洞东壁岩画  
(笔者拍摄于珠海市博物馆)



图2 高栏岛宝镜湾大坪石岩画  
(来源于珠海市博物馆官网)

珠海在秦汉时隶属南海郡番禺县,<sup>①</sup> 当时的岭南海上生民与商人就从合浦(原属广东, 今广西北海)、徐闻(今广东徐闻)两港出发与南海诸国贸易交往; 同时, 南海地区的人们亦将当地及印度洋地区的产品输入到徐闻、合浦。无论是输往这两个港口的中国产品还是舶来品, 均沿广东海岸线进行运输, 作为岭南政治中心番禺辖属的珠海地区, 自然也在南海贸易中发挥着重要通道的作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 “武帝时, 尽灭(此处指灭南越国)以为郡云。处近海, 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 中国往商贾多取富焉。”<sup>②</sup> 此处的犀、毒冒等物品在中国并不多产, 结合“处近海”和此句后面提及的“自日南障塞, 徐闻、合浦, 船行五日有都元国; 又船行可四月, 有邑卢没国……”<sup>③</sup> 的记载来看, 这些商品的出现应当是路博德和杨仆灭南越国后, 西汉王朝拓展南海地区海上航线从而促进了岭南地区参与海外贸易的结果。考古实物证明了上述文献的记载: 1985年珠海市进行文物普查时, 考古工作者曾在外伶仃岛石涌湾遗址中采集到一件带釉弦纹罐残器, 其肩部刻有隶书“朱师所治”4个字, 这是环珠江口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汉字之一, 经过对比后发现该陶器所刻字体应属于西汉时期。这说明在张骞陆上西通绝域的同时, 汉王朝的势力已经影响到了珠海所处的岭南地区, 并且东南沿海先民扬帆起航, 正在进行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 中外海上贸易促进了局部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

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探索也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海路的扩展奠定了基础。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时期, 或许正是散布在珠海境内的各个岛屿成为中国船只进入南海前的停靠点、补给点, 这些岛屿自然也是外来船只进入番禺地区的指向标。三国孙吴黄龙五年(233年), 孙权将交州县治迁至现广州番禺, 即拉开了珠三角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序幕, 珠海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遂成为番禺与东南亚、南亚、中东国家进行海上贸易的必经之路。

李唐一代历史, 上汲汉魏六朝之余波、下启两宋文明之新运, 其对外政策包容开放、积极进取, 诸岛夷番国慕名而来, 中国与海外诸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增多。唐政府对于广东地区的海外贸易也颇为重视, 高宗朝时便在广州设立市舶使, 玄宗朝时设立押蕃使管理中外邦交, 安史之乱后伴随着西北政治局势的变化、经济重心的南移、航海技术的进步, 中外海上贸易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海上贸易的大宗产品除却丝绸以外最为著名的则是中国烧制的瓷器, 来自中国的长

① 珠海在秦代隶属南海郡, 汉初珠海属于南越国, 汉武帝灭南越国后珠海隶属南海郡番禺县。

② (汉)班固著《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0页。

③ (汉)班固著《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第1671页。

沙窑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定窑白瓷和广东各窑口瓷器在海外地区均有大量发现，因此唐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瓷器外销的第一次高峰。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洲石，又南行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笏国。又半日行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碇，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sup>①</sup>可见珠海市所辖海域在当时正处于广州—阿拉伯的海上航线上，那么必定会有大量的外销瓷器通过珠海海域销往海外，现阶段中国海域内的隋唐五代时期的沉船考古资料仅有珠海市外伶仃岛海域、荷包岛海域水下出土的陶瓷遗物和南海西沙群岛各处遗物点，而海外地区有关隋唐五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材料则较为丰富，这也印证了《新唐书》中关于“广州通海夷道”的记载，证明了珠海地区是广州商船放洋的必经之路。

1977年，珠海渔民在外伶仃岛海域作业打捞14件古陶瓷，其中大小四耳罐各1件，敞口，鼓腹，平底，其身高从20厘米到40厘米不等，口径从14厘米到23厘米不等；另有碗12件，敞口，斜壁，饼形实足，每件高5.5厘米、口径16.6厘米，胎质厚重，施青绿釉，釉均不到底。1985年5月2日，香洲乡渔民在珠海荷包岛和乌猪岛海域进行作业时，打捞到古陶瓷21件，其中四耳大罐3件、四耳小罐2件、碗16件，罐施青釉，敞口，鼓腹，平底，罐身从18厘米到40厘米不等，碗则为饼形实足，施青釉，碗高5厘米，口径为16.6厘米，经鉴定为唐代新会窑产品（见图3）。此外在珠海市南屏镇小钓村的沙滩里出土了六耳大罐1件、四耳大罐1件、四耳小罐2件、壶和碗各1件，施青釉，除六耳大罐外，其余产品均出自唐代广东新会窑。<sup>②</sup>

烧制上述瓷器的新会窑是广东著名唐窑，位于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官冲村，新会窑始烧于中唐、兴盛于晚唐，宋初受战乱影响停止烧窑，新会窑的产品以日用青瓷为主，釉色有青色、酱褐色、酱黄色三种，并且其足底多为实足。<sup>③</sup>除此之外广东地区经营外销瓷器的窑口还有梅县水车窑、佛山奇石窑等，广东窑口和其他内地窑口的产品往往集散于珠江入海口地区再经“广州通海夷道”出口到国外市场，法国学者伯希和于《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已详细考证出这条航线所涉及的海外地区，如“占不劳山”为今越南中部的Culao Cham、“陵山”即在今越南Phanrang、“门毒”在今越南归仁、“罗越国”“佛逝国”地处今马六甲海峡南北两岸，<sup>④</sup>目前在这些地区均有中国陶瓷出土，这些海外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关遗址以“黑石号”沉船最为著名，“黑石号”沉船遗迹已经打捞出包括新会窑产品在内的广东窑厂瓷器700多件，其中的新会窑陶瓷与上述珠海外伶仃岛海域和荷包岛海域打捞的陶瓷遗物极为相似。学界对于“黑石号”的始发港有三种猜测（扬州说、广州说、三佛齐说），若前



图3 荷包岛水域打捞的唐代新会窑瓷碗  
（笔者拍摄于珠海市博物馆）

①（宋）欧阳修等著《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3页。

② 参见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第65页。

③ 参见陈显求、陈士萍著《唐新会窑的特征与各著名青瓷化学组成的比较》，载《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94年第15卷第2期，第30-31页。

④ 参见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下卷《海道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78-79页。

两种猜测成立，该船在航行的过程之中则定会经过外伶仃洋海域，若三佛齐说成立，则“黑石号”沉船中所打捞的广东窑口瓷器只能解释为其他船只从广州出发将其转运至此。<sup>①</sup> 所以经过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双重互证，也更加确定了广州是该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而珠海则是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内的重要通道，那么散步在珠海外伶仃洋海域的岛屿就成为了船只航海的导向标，船只也可在此处做驶入南海前的最后准备，如采购粮食、淡水、船只的维修、等待信风的到来。

## 二、宋元时期外销瓷输出的重要通道

宋朝于太祖开宝四年（971年）灭南汉，辖有岭南，遂即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经营海外贸易。经过长期探索，两宋的市舶制度逐渐成熟。因为市舶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两宋政府注重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和经营，北宋政府取消了市舶司的专卖制度，宋神宗时政府又降低了商人的纳税负担，后又在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取消了铜钱出口禁令，刺激了海外各国的贸易需求，于是两宋时海上丝绸之路中外经贸往来空前繁荣。

环珠江入海口地区是该时期中外贸易的重心之一，珠江口的中外商船往来不绝。广东是最早设立市舶司的地区，北宋真宗朝政府两次废除了明州和杭州的市舶司，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又修订了“广州市舶条”，宋人陈瓘《先君行述》记载：“泉人贾海外，春去夏返，皆乘风便。熙宁中，始变市舶法，往复必使东诣广，不者没其货。”<sup>②</sup> 此政策一直延续到哲宗朝，所以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广州市舶司管辖着当时前往南海海域的船舶贸易。在“往复必使东诣广”的政策之下大量的中外商船往来于今珠海海域前往广州进行抽解。

伴随着陶瓷烧制技术的发展，两宋时期中国的陶瓷器烧造达到顶峰，可谓名窑辈出，来自中国的陶瓷器依旧是中外海上贸易的大宗产品。江西的景德镇窑、吉州窑（见图4），广东的惠州窑、广州西村窑，浙江的龙泉窑，福建的德化窑均经营外销瓷器，沿海诸窑产品因为其地利之便可直接从就近市舶司向外流通，而来自内地诸窑的产品则需要转运至沿海各市舶司再运销海内外各地。宋人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中详细记载了从广州出发通向海外各国的航线，如阇婆国“广州自十一月十二月发舶，顺风达昏旦，一月可到。”<sup>③</sup> 故临国“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sup>④</sup> 此时珠海再次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扮演着广州外港和陶瓷外销重要通道的角色，现珠海市境内发掘的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遗迹数量较前代有明显的增加，这是由于宋代相关市舶政策重视广州市舶，从而促进了该地区海上贸易的繁荣与发展。通过这些考古实物我们可以想象两宋时期珠海水域中外商船、货物来往不绝的场景。现珠海市境内的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遗址主要有香山场濠潭遗址、金鼎官涌遗址、金鼎大闸桥遗址、唐家横沟埔遗址、外伶仃岛大东湾宋代陶瓷遗物点、三灶圣堂遗址、三灶中学山岗遗址，以及香洲、界涌、三灶等

① 参见陈克伦著《印尼“黑石号”沉船及其出水文物》，载《美成在久》2023年第3期，第35-36页。

② 参见陈高华著《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兼论泉州市舶司的设置》，载陈高华著《陈高华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5年），第357页。陈高华先生于文中提及熙宁九年（1076年）修订的“广州市舶条”与泉州的关系甚大，过去学者只看到乾隆《泉州府志》的记载，陈高华先生在《永乐大典》卷三三四一“陈”字门中找到这条史料。

③（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二《阇婆国》（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8页。

④（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二《故临国》，第90页。

处宋代铜钱窖藏遗址。

香山场濠潭遗址、唐家横沟埔遗址、金鼎官涌遗址、金鼎大桥遗址、三灶圣堂、三灶中学山岗遗址均为陆上遗址，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宋代陶瓷器，如香山场濠潭遗址中的宋代广东、福建窑口刻花青瓷碗和龙泉窑青瓷碗；唐家横沟埔遗址出土的宋代划花青瓷碗、青白瓷碗和芒口碗等瓷器残片；金鼎官涌遗址采集的刻花青瓷碗、印花青瓷碗和青白釉芒口双鱼碟，这些出土陶瓷多是浙江、福建和广东当地窑口烧制产品且以日用品为主。<sup>①</sup>与此同时，在珠海外伶仃岛大东湾的海边出土了一批南宋青瓷，其中1件浙江龙泉窑莲花瓣青瓷碗较为珍贵。碗高7厘米、口径17.6厘米，敞口，弧壁，圈足，外壁刻重瓣莲花纹。与上述金鼎地区出土的陶瓷不同，这件青瓷碗为一孤品且十分精美。将上述遗址出土的龙泉窑青瓷碗与广东阳江“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中打捞上来的浙江龙泉窑外销青瓷碗对比来看，其在珠海地区出现应该视为始发于北部港口的船只装载外销瓷器前往海外之前，会沿着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岸线航行并将一部分商品在国内沿途地区销售，而珠海地区的岛屿和港湾很有可能就是这些船只的停靠点和贸易点。即使上述珠海出土的瓷器不是外销瓷器，它们也极有可能是通过海路流通至此的，因为东南沿海地区多山地丘陵，导致陆路运输速度慢、货运量少且容易破碎，所以浙江和福建窑口的产品经海路流入珠江口地区的运输成本是最小的。



图4 珠海市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碗  
(来源于珠海市博物馆官网)

除此之外在香洲、界涌、三灶等处发现了宋代铜钱窖藏（见图5），这应与北宋政府放松铜钱出口的禁令和本地的经济发展有关。1954年，在修建香洲至前山的公路时施工人员发掘出200多公斤铜钱，后经考古人员统计有13000多枚，其中多数是北宋太祖到南宋度宗时期的铜钱；1984年珠海市文物普查队在前山镇外界涌村收集到大量北宋“宋元通宝”和南宋“绍兴元宝”；1989年，在三灶镇出土了一批用酱色瓷罐储存的古铜钱，其中大多数为两宋时期钱币，历数12朝皇帝，铸用32个年号，<sup>②</sup>这些钱币数量之多、跨度时间之长，向我们展示了珠海市在两宋时期的经济发展已经呈现出一定的进步。

这种进步一方面是由于两宋时期珠海制盐业的繁荣和农田开垦的规模扩大：从唐至德二年（757年）在珠海设置香山镇开始，珠海金斗湾地区各大小盐场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在制盐业最为发达的两宋时期，制盐业从业人员多达1300余名，且两宋政府一度降低海盐价格并专门设置香山场盐课司进行日常管理和税收。经济发展使得迁居珠海地区的人口增多，如现珠海地区的南屏张氏始祖、山场吴氏始祖、唐家唐氏始祖均可与南雄珠玑巷传说联系起来，人口的膨胀促使珠海的沿海居民对于当地的荒丘和沙地进行开垦，并采取修建堤坝阻挡咸潮灌田的方式扩大了耕地面积。<sup>③</sup>另一方面，结合上述珠海市所辖海域的海上丝绸之路遗存来看，有理由相信两宋时期珠海地区经济的进步是和海上贸易相关，杨少祥在《珠海历史有关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中认为上述出土的部分南宋晚期铜钱是与蒙元平宋的战争有关而非是与海外贸易有关，<sup>④</sup>笔者认为此认识较

① 参见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第44-45页。

② 参见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第66页。

③ 参见肖一亭著《浪白澳——南海丝路上的重要节点》，载《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75页。

④ 参见珠海市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第298页。

为正确，但是珠海出土的铜钱窖藏中仍有大量隶属于北宋时期至南宋中期，且成批量出现，结合宋人包恢《敝帚稿略》中关于铜钱从广东市舶司流向海外的记载：“凡系抽解之司，无一处不漏泄，庆元之外若福建泉州与广东广州之市舶两处，无异于庆元……广东之钱聚而泄于广之番舶，两路（泉州与广州）之钱非如海水之无穷，其将尽入于尾闾，岂不至枯竭者。”<sup>①</sup>来看，这些铜钱定与中外海上贸易脱不开关系。尽管这一时期文献多记载广州的海外贸易情况，但是因为珠海地处南海来往广州的通道之间，所以我們也需要认识到两宋时期相关政策的变化和中外海上贸易的发展将珠海进一步纳入了国内外贸易体系之中。

以蒙古成吉思汗为首的黄金家族于数十年间扫灭中国境内一切割据政权，又通过3次西征建立起了横贯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政令的统一、驿站的建立使得蒙元时期东西方商业贸易往来频繁。元廷一反传统中原王朝重农抑商国策，采取重商政策鼓励商业贸易。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开始，元廷陆续在泉州、庆元（今宁波）、杭州、广州等处设立市舶司经营中外海上贸易。元代前期的海上贸易采用官本官船政策，以官方资本支持海上盈利活动，到元仁宗延祐年间，中外海上贸易始以民间商贸势力为主导，开始呈现出自由化、宽松化的趋势，元廷也多次颁布市舶条例来规范海上贸易，如《通制条格》卷十八“市舶”条中记载：“舶商去来不定，多在海南海北道沿州县镇市地面军民官司用心关防。”其中“海南海北道”管辖今海南岛、广西南部沿海地区；“广东道”管辖今除了茂名市和信宜市以西的其他广东地区，故珠海在当时隶属于广东路管辖。元政府令这一地区军民用心检查偷渡漏税的海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元代珠海地区海上贸易的情况，否则元政府不会单独强调此地区“军民用心关防”。

元代的市舶条例中并未将陶瓷列为禁止出口产品，<sup>②</sup>加之中国制瓷技术在元代达到新的高峰，所以陶瓷依旧是这一时期中外贸易的大宗产品。元中后期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提及“瓷仅产于刺桐（泉州）与隋尼克兰城（广州），……这种瓷器运销印度等地区，直至我国马格里布。”<sup>③</sup>此处关于瓷的产地应是作者误解，笔者认为应当是内地或广东福建诸窑口的产品转运到泉州与广州两处市舶司后再出口，这些出口陶瓷中较为著名的是景德镇的白瓷、青白瓷、青花瓷和龙泉窑青瓷，元人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了中国瓷器销往海外44个地区，<sup>④</sup>现在国内外地区发现了不少元代沉船，珠海市境内亦发现了元代沉船和不少排列整齐的外销陶瓷，这些考古遗存证明了珠海在元代也积极参与到中外贸易之中。现珠海市境内与元代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考古遗存为南水镇蚊洲岛元代陶瓷遗物点、三灶草堂湾古沉船遗存、平沙前锋古沉船遗存。

1969年4月，珠海南水公社渔业大队民兵在蚊洲岛北面沙滩发现212件元代青花瓷和碟，遗



图5 珠海市出土的两宋时期铜钱  
（笔者拍摄于珠海市博物馆）

①（宋）包恢著《敝帚稿略》卷一（民国九年南城李氏宜秋馆刻宋人集本），第16页b。

② 元代法律文献《通制条格》中所列禁止出口产品为“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丝绵、段疋、销金、綾罗、米粮、军器。”

③（摩洛哥）伊本·白图泰著；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0页。

④ 参见（元）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6，86，89，248-249页。汪书提及元代的瓷器在占城、日丽、麻里鲁、勾欄山等海外地区均有出售。

物出土时排列整齐，碗碟均为分类层叠倒放，排列6行，这批碟碗主要有印花青瓷和划花青瓷；在珠海三灶草堂湾水下2米左右有一艘古沉船，经过对该沉船的探索发现该船长20多米、柚木质，全船采用棕绳拼连，船舱里装载货物为香果和槟榔，香果药味较浓，这艘沉船可能来自阿拉伯地区，1976年，平沙区前锋8队群众挖鱼塘时发现3艘古沉船埋在2米多深的泥滩之中，这3艘船只并排排列，船肚仰天，考古人员对于其中一艘进行测量，长20多米，柚木质，船身外裹铜皮，后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用碳十四对船板进行测量，发现其年代距今660年左右，相当于元代末年，余下两艘沉船仍埋在原处。<sup>①</sup> 上述遗址中打捞的瓷器大都采用相似的打包方式，它们大小相套、整齐叠放，部分带有草绳捆扎的痕迹，显然属于外销瓷器。且蚊洲岛长期无人居住，在该岛屿上考古工作者并未发掘出其他人类生活遗物，<sup>②</sup> 所以这更加印证了上述出土陶瓷是外销产品。

### 三、明清时期中西交流之枢纽

明朝初建，洪武年间政府即实行“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中外交流仅限于官方朝贡体系之下，成祖即位后“五出漠北、三犁虏庭”，经营北方的同时注重恢复与南海各国的关系，欲通过“协和万邦、恩泽广惠”的手段以实现“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局面。<sup>③</sup> 故在永乐元年（1403年）就恢复了广东、福建、浙江三处市舶司，南海周边国家除安南由陆路经广西入贡外，大多数国家均由海路经广州入贡，那么珠海所辖水域在明初一度成为了朝贡贸易的必经之路。

郑和下西洋时也涉及到了珠海海域，郭棐所修万历《广东通志》中记载：“永乐五年（1407年）……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sup>④</sup> 嘉靖十四年（1535年）广东巡抚戴璟所编的《广东通志初稿》卷十一《循吏传》记载：“时内臣赍金币劳赐海诸蕃国，护行军官颇横，径捕韶民三人偕之往，家人号呼；以金赎之不许，询至其舟中，夺之以归。”韶关是进出岭南地区的重要通道，那么由朝廷护送金币礼品经过韶关可知郑和第六次出洋应是从广东出发，这段记载应是出洋前准备阶段发生之事。另外《郑和航海图》中也标注了多个珠海海域的岛屿（见图6），经考证图中的东姜岛为今担杆岛、翁鞋岛为今二洲岛。<sup>⑤</sup>

此外明代文献中详细记载了海禁背景下存在于珠海地区的海上走私活动。先是三灶岛居民吴进添私通番舶作乱，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都指挥使）花茂奏讨平之，悉迁其党，诏虚其地……岁令官军千人防守”。<sup>⑥</sup> 又有《广东通志》：“正德中，奸民与畚蛮……与里胥为奸，里胥亦凭依之，近海则通番。”<sup>⑦</sup> 这说明该地区的海上贸易和渔业可能早已是沿海人民生计所在，故在海禁政策之下其无以为生，不惜铤而走险与官府抗衡以维持生活。

15世纪末，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来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纷纷通过远航在远东建立

① 参见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第67-68页。

② 参见珠海市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第300页。

③ 参见李治安著《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第98页。

④（明）郭棐等修万历《广东通志》卷四《藩省志六》（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496页下栏。

⑤ 参见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编《新编郑和航海图》（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43页。

⑥（清）田明曜等修光绪《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449页上栏。

⑦（清）阮元等修道光《广东通志》卷三三〇《列传六十三》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715页上栏。



图6 《郑和航海图》中标注的珠江入海口地区岛屿  
(来源于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编《新编郑和航海图》)

贸易据点，他们不断谋求和中国进行贸易以获取更多的东方物产，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租住澳门就是这一历史的缩影。明清两朝海禁政策始终占据主导，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设立广州十三行，确立了广州一口通商的贸易格局，珠海成为了当时省澳贸易间的重要枢纽。过往我们偏重对于广州十三行贸易和澳门的研究，但是忽略了澳门本身是香山的一部分，即今天珠海的一部分，在澳门作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桥头堡之前，珠海就已经与欧洲商人进行接触，之后的一口通商时期，珠海更是成为了中外贸易的中转站和水上走廊。

### （一）浪白澳：澳门开埠前官方对外贸易港口

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于广州设置市舶司进行贡舶贸易，《明史·外国传》记载：“暹罗、占城、爪哇、琉球、勃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后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不服抽分而搅扰广州，为确保省城安全，明政府遂划定香山南部的浪白澳作为外国商船临时停靠和贸易的港口，经调查与考证发现浪白澳即今珠海南水岛以及南水和北水之间的水道。<sup>①</sup> 1533年葡萄牙人的航海图在浪白澳的位置上标注了“Labuoa”，<sup>②</sup> 此外笔者在珠海市博物馆所展出的1735年唐维尔所绘《广东全图》（局部）中发现一处标注为“Lang petao”的地点（见图7），此“Lang petao”与今日南水的地点相近，疑此“Lang petao”为“浪白澳”的对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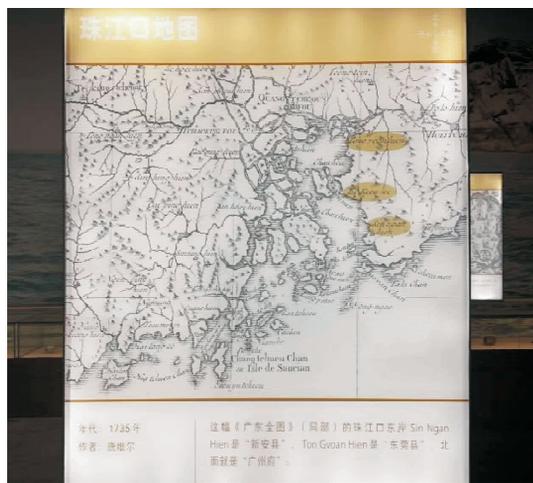


图7 唐维尔所绘《广东全图》（局部）  
(笔者拍摄于珠海市博物馆)

广东地方文献也详细记载了浪白澳在不同时期的情况，黄佐的《广东通志》卷三十一“海道

① 参见珠海市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第303页。

② 参见肖一亭著《浪白澳——南海丝路上的重要节点》，载《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77页。

江道哨兵条”<sup>①</sup>中记述了在香山浪白澳设置哨兵的情况：“募东莞县兵夫后生五百名……”明政府在浪白澳设置哨兵应与前叙划定此地为外国商船临时停靠点和贸易场所、打击沿海走私贸易有关。此外，明正统年间还有外国商人在南水村一带居住并试图建立澳埠，清朝道光《香山县志》卷一《輿地上·文湾山条》记载：“中界浪白滄海自成一港，湾拱如门，有鸡心州收束其势，山横如城垣，广三十余里，内有村落，明正统间，佛郎机夷泊居浪白之南水村，欲成澳埠，后为有司所逐。”直到嘉靖年间明政府允许葡萄牙作为非朝贡国家在浪白澳、澳门以及广州进行贸易，嘉靖八年（1529年），中央依从广东方面“互市有四利”的奏请，允许开设香山浪白澳进行市舶贸易，隶属于广州市舶司管辖（嘉靖时重开浪白澳应是明中期海禁政策摇摆不定，将浪白澳等港口暂时关闭，此时重开），清人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中记载：“凡番舶停泊，必以海湾之湾环者为澳。澳者，舟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余里，诸番互市。”浪白澳不仅是中外贸易的临时交易点，也是葡萄牙人经营的日本—东南亚贸易航线上的一处停靠补给点，1552年至1554年葡萄牙人的商船往返日本途中两次在浪白澳停靠以获取补给，1555年也有多艘葡萄牙船只从东南亚驶向浪白澳。<sup>②</sup>

不过因浪白澳距离陆地较远，地理条件略差于濠镜澳（今澳门）。嘉靖十四年（1535年）广东都指挥黄庆收受外商贿赂，奏请转移贸易地点，此事在《广东新语》中也有明确记载：“嘉靖间，诸番以浪白辽远。重贿当事求濠镜为澳。濠镜在虎跳门外，去香山东南百二十里……番人于二湾中聚众筑城……自是香山之浪白、十字门悉废。”<sup>③</sup>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广东海道附使汪柏同意葡萄牙商人在澳门临时贸易，万历十年（1582年）两广总督陈瑞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中外贸易的交易场所这才从珠海转移到了澳门。由上述澳门开埠的历史可见，澳门开埠是外商、广东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多方势力拉扯和妥协的结果。在清代广州十三行贸易成为定制以前，广东的对外贸易经历了从珠海到澳门再到十三行的转变。

珠海市境内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上述史实。珠海市与明清时期海上贸易相关的考古遗迹主要有金鼎上栅旧村遗址、唐家茭塘夏遗址、平沙白水寨遗址、大万山推船湾遗址。金鼎上栅村遗址是明朝中期设置在海边的拒敌哨所，现出土了明代仿龙泉釉瓷碗，青花碗、黑釉罐残器，产品均来自广东惠阳、佛山和景德镇的民窑；唐家茭塘夏遗址和平沙白水寨遗址中均出土了明代龙泉窑碟、惠阳窑菊瓣纹碗和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这应当是当时的外销瓷器。在珠海市万山镇大万山岛推船湾，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缠枝花卉玉壶春瓶、青花草书“福”字款大碗、青花花结带宝杵纹大碗、影青暗花盘、白釉杯，还有龙泉窑生产的青釉刻花大盘和广东惠阳窑生产的青釉印花碗和酱釉壶，这些都是明代早中期与市舶贸易相关的遗物。<sup>④</sup>上述文献和考古材料证明了在澳门开埠之前，珠海地区因是官方指定中外贸易地点和拒敌哨所点而变得繁荣。

## （二）澳门开埠后中外贸易的中转站和水上走廊

澳门开埠后珠海并没有没落，在清代一口通商时期，广州成为了西方国家通过海路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和贸易场所。“外商欲购入茶丝及其他商品，亦不能不委托行商代办。外商不须自行收

①（明）黄佐等修嘉靖《广东通志》，第767页下栏。

② 参见肖一亭著《浪白澳——南海丝路上的重要节点》，载《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78页。

③（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页。

④ 参见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第53页

买货物，应俱由公行代办理”。<sup>①</sup> 中国国内各地的出口货物也都要运输到广州，经由十三行商人运销国外。因此珠海海域往返广州的水道成为了中外商船的必经之路，今珠海市境内散布在珠江出海口和伶仃洋的大小岛屿和优良港湾成为了外国船只进入广州口岸前的临时驿站，当时珠海十字门至广州的航道是名副其实的海上贸易走廊，“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清人屈大均的这首《广州竹枝词》生动的反应了珠海航道繁荣的景象。

与此同时，因为清政府一口通商政策的限制，以及外国商人仅可在每年10月至次年4月来穗贸易的规定，使得当时的省澳贸易形成来如下格局：粤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并管理十三行、十三行负责经营对外贸易、澳门是来华贸易商人的居留地。珠海市因地处广州和澳门之间，且明清时期广州城南的珠江南航道可以通过珠海境内的内河航道直达澳门，遂成为了当时省澳贸易的枢纽和商品运输通道。往来的中外客商、信使、传教士通过珠海境内水陆网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便利，把瓷器、茶叶、丝绸等中华物产和儒家文化传播海外，也将钟表、火器、宗教、艺术、科学等西方文明产物传入中国内地。自万历二年（1574年）在今珠海与澳门交界的莲花经设立关闸开始，这里逐渐变成了中外商人的一处贸易据点，葡萄牙史料记载在康熙六年（1667年）澳门与北方大规模通商，来自东非海岸的珊瑚、琥珀、鱼翅等奢侈品由此运往内陆，原来不定期开放的关闸也在本年8月开始每月开放，当地人们争相庆祝这一决定。<sup>②</sup> 清代两广总督吴兴祚的《抵香山，舍舟从陆，经翠微村、前山寨、官闸口到濠镜澳，遍观炮台及诸形胜，薄暮留宿》一诗中写到“岭外云深抹翠微，翠微村外落花飞。负贩纷纷多估客，辛苦言从澳里归”。这些记载都是当时珠海境内陆路贸易繁荣的真实写照。

现今珠海市境内的古驿道和古水道依旧保存完整。珠海境内连接省澳的内河航道有虎头门航线、磨刀门水道；陆路则有岐澳古道（见图8）、长南迳古道，根据考古人员调查显示，岐澳古道从香山城南门起，经过双合山（今五桂山双合山）、石鼓（今五桂山石鼓）、前山寨（今珠海前山）、莲花径到达澳门；长南迳古道所在的凤凰山脉大致为东西走向，长南迳古道为南北走向，穿越凤凰山，以山巅为界，大致分为山下段和山上段两部分。山下段原古道除两座石板桥外基本为砂土路面，山上段古道保存较为完整，为石步级和三合土路面等。这些古道路逐渐从民间商道发展为连接香山和澳门的官道，它们为清政府治理香山、管理海防、管辖澳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香山及其周边的新会、开平、台山等地人民前往澳门、走向海洋的重要道路。



图8 现珠海市境内的岐澳古道遗存  
(来源于珠海市博物馆官网)

### （三）、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珠海因有着长期参与中外海上贸易的历史，较早的接触到先进的西方文明，人们思想开放、眼界开拓的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也有了一些改观，在中外交流中成长起来的开明乡绅、华商将西方文明引入香山社会，促进了香山传统社会的转型，香山也因此成为了这一时期中西方文

① 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第144页。

② 参见（葡）施白蒂著；小雨译《澳门编年史》（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56页。

明交融荟萃之地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鸦片战争之前，因广州和澳门是重要的通商口岸，有不少外国人聚集于此，其因贸易、政治外交和个人需求产生了巨大的邮政通讯需求。他们先是雇佣当地华人“千里马”为其进行邮递（“千里马”本是政府临时雇佣的民间邮递人员），但是随着乾隆朝政府对于外国人的限制加强，合法的信息传递只能通过十三行进行传播，而官方程序的繁琐以及速度之慢，使得早期的民间邮政系统依然存在，这些受外国人雇佣的脚夫频繁往来于省港之间，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上述珠海境内连接广州和澳门的古驿道、古水道和船只也就成为了重要的信息传递通道和载体。此后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先后在广州和澳门非法设立邮局，也使得这条经过珠海的信息交流路线更加繁忙。现在珠海市境内也有遗存的侨墟（如上泽侨墟、斗门侨墟），这些侨墟是前往南洋拓殖的中国商人在香山沿海建立的贸易基地，侨墟内中西合璧的骑楼、巴洛特式风格的洋房无不体现了珠海是中西文明荟萃之地。近代以来，以容闳、梁如浩、宋文翊为代表的香山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化探索的道路上都留下了脚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珠海长期以来面向大海、开放包容的历史文化底蕴塑造了他们积极探索、敢于革新的品质。此外香山华人入赘澳门为外人婿、信奉天主教之事更是屡见不鲜。<sup>①</sup>

综上所述，海上丝绸之路是承载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历时千年不衰。珠海面海而生，向海而兴，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段内的重要通道，正如珠海高栏岛岩画所绘，珠海先民敬畏大海的同时又渴望利用大海，早在先秦时期就展现了极其鲜明的海洋文明特色。伴随着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汉书·地理志》已经开始记录岭南沿海地区的中外海上交流，珠海市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遗物证明了汉王朝势力对于岭南地区的渗透和南海地区局部贸易的兴起；《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唐代“广州通海夷道”表明珠海地区的水道是广州放洋船只的必经之路，荷包岛和蚊洲岛海域的外销瓷器遗物也证明了珠海在这一时期是外销瓷器出口的重要通道；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私家游记和著作的增多也帮助后人进一步了解到当时中外海上交流和南海诸国的情况，此时期珠海的海上丝绸之路遗迹数量也有明显增多，这也证明了珠海面海而兴的事实；即使明清时期中外贸易有所衰退，但是珠海浪白澳成为官方指定的外国船只贸易点，从而延续了前代的繁荣。澳门开埠后，珠海成为了澳门的经济依托，不同时期的香山地方志都向我们展现了珠海是省澳贸易中的重要枢纽和内地通往海洋的重要通道。

前辈学者的研究表明，虽然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了东西方广袤地区，覆盖范围极大，但是这条海上路线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并非一次打通，而是先在局部区域内形成短途贸易航线，后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和航海经验的积累逐渐连为一片的。因此在广州、泉州、忽鲁谟斯这些著名港口的光芒掩盖之下，还有无数个像珠海这样的港口存在，它们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之间由点到线的串联最终汇聚成了一条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所以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时我们不应只将关注点放在著名港口上，也应重视散落在其间的重要节点，这对于我们日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珠海应当依托“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充分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遗物，结合历代文献记载，讲好属于珠海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继续谱写新时代珠海的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① 参见黄晓东著《珠海简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



## 西方体育传华与澳门、香港关系研究

張煜堃 冯 菲

**【摘要】**16世纪中叶以来，澳门就成为西洋体育传入中国的首个桥头堡与窗口，以射击、骑马、游泳等为代表的葡萄牙人骑士运动与以赛马、划船、球类等为代表的英国人贵族运动传入澳门。19世纪中叶以后，香港成为欧洲体育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基地，体育会（俱乐部）成为香港体育活动主要组织者。澳门圣保禄学院、圣若瑟修院以及19世纪初澳门新教学学校开展学校体育活动。至20世纪初，港澳地区已经在学校里普遍开展体育活动。

**【关键词】**港澳；西方体育；学校体育；明清时期；近代

西方（西洋）体育，即欧洲体育，传入中国，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与中国体育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份。关于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外关系史与体育史等学者们，主要探讨了下列这些问题：首先，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是鸦片战争之后以来才传入中国。<sup>①</sup>其次，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学者认为西方体育主要通过了以下四种途径传入中国：一是外国人来中国传授，如洋务运动中新式军队和学堂所采取的办法；二是派人出国学习；三是从国外书刊中学习；四是外国人自觉与不自觉的传播。所谓“自觉”，即出于一定的目的，有计划地来中国传授近代体育运动。所谓“不自觉”，即外国传教士、商人、军人在留驻中国期间，开展了一些体育运动，这在客观上自然起到了传播近代体育的作用。<sup>②</sup>第三，传播的项目。近代西方体育传入的顺序，首先是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继而是田径、球类、游泳等各种近代运动项目及其竞赛。<sup>③</sup>第四，西方体育传入地研究。汤开建教授认为，澳门是西洋体育传入中国的桥头堡。<sup>④</sup>

**著者简介：**张煜堃，女，广东财经大学体育学院助教；冯菲，女，暨南大学体育学院讲师。

① 如崔乐泉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接触到西方近代体育，从而开始了缓慢的体育近代化的过程，而近代西方体育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崔乐泉著《中国近代体育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18页）。张晓军指出“鸦片战争后，西方体育活动开始进入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被看成做一种‘游戏’性身体活动而被视为低下的事物”，见张晓军著《近代国人对西方体育认识的嬗变（1840-1937）》（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之“中文摘要”。

② 周西宽著《近代体育运动在中国的兴起》，载《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第18-19页。

③ 崔乐泉著《中国近代体育史话》，第18页。

④ 参见汤开建教授所著系列论文：1、《明清时期西洋体育在澳门的传播》，载《世界汉学》第3期；2、与颜小华合著《清中后期西洋体育在澳门的传播》，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3、《民国时期澳门近代体育的形成与发展》，载《暨南史学》第3期。

西方体育，作为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入中国的历史，仅仅是从鸦片战争时间之后才开始的吗？居留中华大地的欧洲人士如何“自觉”与“不自觉”地向中国人传播西洋体育，包括其体育精神与体育项目？自明朝以来，历经明清两朝，成为了来华外国人合法居留地的澳门，如何成为了西洋体育传入中国的窗口？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割让给英国，又有大批欧洲人，包括澳门葡萄牙人移居香港，此地如何与澳门一道，成为了西洋体育传入中国的另一个窗口？鉴于学术界目前对这些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研究与重视，<sup>①</sup> 本文将通过分析澳门、香港与西洋体育传入中国之间的关系，探讨港澳地区在西洋体育传华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以此弥补学术界研究的不足。限于学术水平，本文仅系抛砖引玉，就正于大方之家。

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份，西方体育的一些特征，如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社会角色、竞技性体育活动发达、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观念、体育价值观中的强烈的超越色彩，充分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特征。自从澳门、香港欧洲人小区的形成，这些特征就体现了出来，并随着港澳地区外国人小区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从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为澳门小区主体时，澳门地区展现出了葡萄牙人骑士体育；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展，英国人来到澳门，到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将绅士体育带到了澳门；鸦片战争之后至二十世纪之初，欧洲近现代体育又在港澳地区流行。

## 一、澳门与骑士体育

澳门，原为广东省珠江口外的海岛，明代以来，因珠江的泥沙淤积，逐渐成陆而与香山县所在的岛屿相连接。十六世纪中叶，来自欧洲大陆最西端、通过其武装商业船队建立了印度洋——太平洋之间的海上霸权的葡萄牙人，几经努力，在明朝政府对葡萄牙贸易的经济需求及海上防卫海盗军事需要的条件下，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获得了广东政府许可，人居澳门，在中国南海边形成了一个以葡萄牙人为中心的欧洲侨民城市。<sup>②</sup> 从此，以葡萄牙人骑士体育为代表的西洋体育活动，开始进入澳门欧洲人的社会生活，澳门因此成为西洋体育最早传入中国的桥头堡。

葡萄牙人在欧洲中世纪骑士制度形成后，受到其影响，人数众多的下层贵族成为了骑士，亦成为葡萄牙社会的军事团体。骑士从7岁时起，就要学习骑马、游泳、射箭、投掷、狩猎、下棋和吟诗等“七艺”，随后要进一步学习骑马、击剑、轻装跑步、跨越壕沟，翻越障碍和徒手攀登城墙等。在获授骑士称号后，骑士则要经常开展各种游戏和竞技比赛活动，如骑马、射箭、打猎、投掷、游泳以及各种球戏。虽然在14世纪之后中，骑士制度开始衰落，但对于远征东方的葡萄牙下层贵族来说，这种骑士精神却一直在他们身上保存。澳门早期的体育活动，就是这些葡萄牙贵族开始的。<sup>③</sup> 主要项目有：

1、火枪射击与打猎。澳门开埠后，一批葡萄牙贵族定居澳门，火枪成为这类澳门居民最常用的自卫武器，欧洲火器进入澳门。（葡）博卡罗（António Bocarro）指出：“葡人和这些人（指中国基督徒——通事）都有很精良的武器，如火枪、矛和其它类似武器，没有六或十二条火枪及同样数量的矛和标枪的葡人很少。”<sup>④</sup>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奏折中记录了澳门葡

① 如马宣建主编《中国体育通史》第八卷（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年8月）只用极少的篇幅，论述香港与澳门的西洋体育发展史。

② 有关葡萄牙人人居澳门的时间，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但不属本文讨论的范畴，故在此不再赘述。

③ 参见汤开建著《明清时期西洋体育在澳门的传播》，第148-149页。

④ （葡）博卡罗著；范维信译《要塞图册》（*O 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 cidades e povoações do estado da Índia Oriental*），载《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19页。

萄牙人使用火枪进行射击训练之事：“（澳门）番哨分守炮台，或鸣鼓换班，或开放鸟枪，并非终年训练。”<sup>①</sup>

由于澳门地域狭窄，葡萄牙人在租居的澳门城内，并没有多大空间供其进行射击运动，故使用火枪进行“打猎”，成为居澳葡萄牙人射击活动的重要部份。因陆上无法进行此项活动，葡萄牙人常租船出海打雀消遣。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澳门同知记录：“访有各国夷人，雇请疍民充当水手，驾坐大三板船，私出海面游荡，并用鸟枪弹雀等事，逗留在外，数日不回。”这种活动，违反清朝规定。乾隆十四年（1749年）香山县令暴煜制定的《详筹善后事宜十四款》曾严格规定：“禁夷人出澳。夷人向例不许出澳，奉行已久。今多有匪夷藉打雀为名，或惊扰乡民，或调戏妇女，每滋事端，殊属违例。该夷目严行禁止，如敢抗违，许该保甲拿送。”<sup>②</sup>

2、骑马。作为骑士精神的传承者，葡萄牙人不会放弃此项运动，但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后，马匹来源遇到困难。万历初年霍与暇曾提到葡萄牙人“买马”之事：“以尔（葡人）土著于此，招集无赖，买马造銃，恐我中国嗜利之徒，煽诱不轨，将为地方患。”<sup>③</sup>

葡萄牙人购马，显然是为了骑乘训练之需。英国旅行家彼得·芒迪（Peter Mundy）曾记载：“他在澳门见到一种游戏，是主要流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民族中的一种运动，而他本人则未曾见过。在澳门板樟堂前地广场，有一个圆形跑道，有15或16个骑士骑马在跑道上跑，跑了5个圈。骑士分为两队，一队为‘野蛮的摩尔人’，一队为基督徒。每人手持皮或纸质的盾牌，戴着大马士革钢做的面具，穿着皮制的盔甲，每个骑士表现都很勇敢。骑士拿着装有白灰和鲜花的泥球向对方投射，而每个骑士都有卡菲尔黑奴为自己传递泥球。马很小（广东马），但快速而勇敢，与英国马Cornish Naggers相似。”<sup>④</sup>可以看出，这应是流行于时葡、西民族中一种骑术表演和投球的游戏，葡人亦将这一些游戏带到澳门。

这种游戏亦可反映澳门葡萄牙人的骑马活动在澳门的展开。葡萄牙人的骑马活动，由于受到空间的限制，不可能获得很大的发展，但葡萄牙人喜爱骑马却在有限的资料里依然获得表现。清道光时期，广州将军哈丰阿奏折载：“该夷人遇天气晴明，三五人驰马海旁，谓之运气纳凉。”<sup>⑤</sup>

3、游泳。骑士制度对骑士们培训的重要项目。澳门三面环海，周围多岛屿海滩，故极适宜游泳活动的开展。澳门葡人的奴仆黑人中的一种即极善于游泳。王临亨《粤剑篇》称：“番人有一种，名曰黑鬼，……能经旬宿水中。”<sup>⑥</sup>蔡汝贤《东夷图说》则称：“黑鬼……入水可经一二日。”<sup>⑦</sup>能在水中呆一两天之人，游泳技术很高。

我们在澳门葡萄牙人的休闲生活中也能找到一些游泳的数据来。吴历《粤中杂咏》第十二首称澳门青洲：“青洲多翠木，为纳凉休沐之所。”<sup>⑧</sup>这里的“休沐”，即是休憩沐浴之意。明清时期的青洲为一小岛，岛边有浅海滩，可供人们游泳。龙斯泰（Anders Ljungstedt）则称青洲岛为澳门

①（清）卢坤撰《广东海防汇览》（清道光刊本）卷三十二《方略》二十一《炮台》二引道光十四年卢坤巡抚祁祯奏折。

②（清）暴煜纂（乾隆）《香山县志》（清乾隆十五年刊本）卷八《濠镜澳》。

③（明）霍与暇撰《勉斋集》（清光绪丙戌重刊本）卷十七《处濠镜澳议》。

④ Mundy, Peter,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 ~ 1667*, Nendeln, Liechtenstein: Nabu Reprint Ltd., 1967, Part I, pp. 264 - 268.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暨南大学古籍所等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二册第658号档《广州将军哈丰阿等奏报查明澳门炮台各情形》，第264页。

⑥（明）王临亨撰《粤剑篇》卷三，载《志外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69页）。

⑦（明）蔡汝贤撰《东夷图说》不分卷之《黑鬼》，四库存目丛书本。

⑧（清）吴历撰《三巴集》第十二首，小石山房丛书本。

人“提供了进行体面娱乐活动的场所”。<sup>①</sup>很显然，到青洲海滩游泳是当时澳门人的一种时尚。美国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记录十九世纪初期澳门时称：“他在西望山上的明纳托水池（Tanque de Minato）有一座有游廊的平房，……平房的后边，山势急陡向主教湾下降，那是一个良好的浴场。”<sup>②</sup>亨特所言“浴场”应在澳门西湾。昔日缪君侣有《夏初早游西湾》诗：“流水随湾转，飞花着地残。服绵方觉热，衣葛又生寒，林鸟啼初日，潮儿戏浅滩。微风吹过处，犹足起波澜。”<sup>③</sup>“潮儿戏浅滩”，反映当时的西湾亦是澳门人游泳之处。

澳门葡萄牙人除了在澳门半岛有游泳活动外，现珠海市对面山的银坑也是当时葡人游泳之处。龙斯泰称：“银坑仍然是一个最受喜爱的海滩，由于有从上面流过的清新溪流，有可供锻炼身体的山坡，……葡萄牙人经常来到这里。五十年前，外国人就已到这里和拱北的其它地方进行娱乐活动，他们常常在这些地方度过一天，漫步，谈天，餐饮，并从事健康的娱乐。”<sup>④</sup>海滩上的“健康娱乐”当是指游泳。据1845年《中国丛报》载：“麦拉主教（Bishop of Myra）萨梅奥西（Alexis Sameaux）于7月14日，在靠近澳门的沙栏仔游泳时淹死。”<sup>⑤</sup>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葡人妇女也参入游泳活动。道光初，方恒泰言：“先一三日，（澳门）夷妇相率浴于河，意在洁而事近褻，往来行路，俱以青帕一方覆身首。”<sup>⑥</sup>可以反映，在十九世纪前，游泳在澳门葡萄牙人中是一经常性的体育锻炼活动。

4、其它体育项目。如散步与郊游。澳门葡人的重要的户外活动与锻炼身体的方法。1637年孟迪的数据就有记录：“他们的聚会、节日和婚礼娱乐、基督教节日和假日，他们有时到附近岛屿的海湾或河湾去，在一些河流旁美丽的小山谷里与家人共度八或十天，住在自己带的帐篷里，这里有很多这样的山谷。这就是住在这里葡萄牙人的娱乐。”<sup>⑦</sup>亨特《旧中国杂记》则称：“现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常常到三山去郊游。”<sup>⑧</sup>三山即上川岛。潘有度《西洋杂咏》则更有意思，有诗云：“红灯白烛漫珠江，万颗摩尼护海幢。日暮层楼走千步，呢喃私语影双双”。其自注云：“夷人每日黄昏后，往来行动，以运血气，俗称行千步。”<sup>⑨</sup>19世纪20至30年代在澳门居住的美国姑娘哈丽特·洛（Hillard Harriet Low）日记称：澳门娱乐很多，（1829年11月14日）她首次参加了在青洲举行的泼水节，她又描写了1829年10月27日哈丽特的一群朋友组织的一次野游及1831年12月中的湾仔之游。<sup>⑩</sup>

又如纸牌游戏。据葡萄牙学者阿马罗（Ana Maria Amaro）教授介绍，在这一时期，葡萄牙人还将古老的伊比利亚半岛上三种纸牌游戏：马尼拉（Cartas Manila）、梭罗（Solo）、康京

①（瑞典）龙斯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163页。

②（美）亨特著；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之《澳门的老侨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3-194页。

③（民国）缪君侣撰《百尺楼诗稿》之《夏初早游西湾》，转引自《澳门掌故》十三《名胜古迹掇拾》四十六《西湾》，第304页。

④参见《早期澳门史》第三卷第三章《其它游览地》，第170页。

⑤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No. 8, Aug., 1845, p. 400.

⑥（清）方恒泰撰《橡坪诗话》卷四，载《杂记》道光十三年刻本。

⑦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Vol. 3, . Part 1, pp. 264-268.

⑧《旧中国杂记》之《1825-1826在新加坡与马六甲》，第269页。

⑨参见（清）潘仪增编《番禺潘氏诗略》（番禺潘仪增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第二册《义松堂遗稿》。

⑩ Hillard, Harriet Low; Hodges, Nan P.; Hummel, Arthur W., ed.,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the 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Woodinville, WA*: History Bank, 2002.

(Conquim) 传进了澳门, 且一直在澳门流行, 直到上一个世纪。<sup>①</sup>

## 二、绅士体育在澳门的发展

从十八世纪下半叶起, 随着澳门成为欧洲人士驻冬之处, 来澳门驻冬的英国人, 将绅士体育带来了澳门。<sup>②</sup> 因此, 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前, 澳门成为了中国绅士体育的发祥地。

最为盛行的是赛马运动。英国人非常热衷此项运动, 其在广州时就已经开展了此项运动。来澳门后, 在此继续进行赛马, 在文献中留下了许多线索。首先从地图来看, 在19世纪30年代出版的、由(瑞典) 龙斯泰着《早期澳门史》, 附录了一幅1834年绘制的《澳门市区及港口》, 在关闸之南, 标有跑马场——“Racing Ground”。此后的其它地图中亦有标注。其次, 从在澳门的中外人士的记载来看, 关于赛马运动是当时澳门社会生活的记载对象。如美国女性哈丽特·洛曾在其日记中写道: “1829年11月5日, 我们受邀前往赛马场地……赛马场位于一个叫关闸的地方, 那里是为了防止所有外国人越过的地方。马场大约有四分之三英里长的距离。这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地方, 我很快就被好奇的场面吸引住了。这里有一处用竹子搭建的临时棚子, 专供女士观看。我敢保证当您看到下面这么混杂的一群人时您一定会觉得很有趣。大多中国女子身上穿的是单裙……葡萄牙人、印度人以及中国人混杂一处, 各种语言交织在一起。……当中有些马表现得十分出色, 比赛很精彩, 还有人下很大的注赌马。……”<sup>③</sup> 又如1835年10月的《中国丛报》记载了8月15日星期六澳门的情况“骑马去关闸, 马尼拉和爪哇小马; 阿拉伯马; 华人的马术”,<sup>④</sup> 反映了当时关闸附近赛马场的活动, 而且在欧洲人中普及, 华人也参与。

而香港被英国占领之后, 英国人的赛马活动转移到了香港, 但在香港跑马场建成之前, 香港的赛马活动还是在澳门举行的。据1843年2月23日《华友西报》报道: “我们很迟才收到一条澳门赛马会的消息, 因此, 未能放入我们的出版日程计划。无论赛马是在周一或周三举行, 无论结果会如何, 我们都敢断言, 我们期待的1844年初在香港举行的第一届春季赛马会, 将会吸引更多的人来观看, 其规模将远远超过在澳门举办的任何一届赛马会。”<sup>⑤</sup> 可知, 1844年的香港赛马会即将在香港举办, 在此之前是在澳门举办的。

早在乾隆时期, 赛马就已经出现在中国人的诗文中了。叶廷勋、叶廷枢诗集中记载“关闸平明骏骑夸, 诸夷逐队走平沙。肩舆尽属红毛派, 倭帽斜簪四季花”; “关栅难关关路长, 行人来往马蹄忙。回头左右天连水, 孤鹜飞霞带夕阳”。<sup>⑥</sup> 诗中“红毛”即指英国人。

香港岛被英国占领, 原住澳门的外国人离澳赴港后, 澳门的赛马亦逐渐走向衰落, 香港与上

① (葡) 阿马罗著; 吴新娟译《伊比利亚传统的澳门纸牌游戏》, 载《文化杂志》第23期(1995年), 第39~48页。

② 所谓“绅士”就是指这一批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新贵族。英国绅士体育产生于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 而绅士体育就是新兴资产阶级所推行的绅士教育中的一部分。绅士体育为了培养处群能力、竞争精神、实战本领的需要, 强调在绅士教育中开展骑马、击剑、游泳、划船、舞蹈等活动项目, 却又特别偏重于赌博性的竞技运动, 如赛马、拳击、击剑、板球等项目。绅士体育多以俱乐部形式出现, 不对下层群众开放。

③ Hillard, Harriet Low; Hodges, Nan p.; Hummel, Arthur W., ed., *Lights and Shadows of Macao Life, the 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p. 79.

④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6, Oct., 1835, p. 292.

⑤ *The Friend of China*, Vol. 1, No. 49, Feb. 23rd, 1843; p. 194.

⑥ (清) 叶廷勋撰《梅花书屋诗钞》(清道光十一年刊本) 卷四《于役澳门纪事十五首》; (清) 叶廷枢撰《芙蓉书屋诗钞》(清道光十一年刊本) 卷四《澳门杂咏》。

海的赛马代之而起。

其次是划船运动。自清政府在乾隆三十六年（1757年）开始实施“一口通商”政策以来，外国来华商人们经常在广州举办此项运动，但受限制较多，他们便经常在澳门举办。关于划船运动在澳门举办的情况，亨特《旧中国杂记》中有详细记录：首先，比赛由在广州的外国人组织的“广州划船俱乐部”举办，赛事在1837与1838年分别在广州与澳门举行。<sup>①</sup>此传统一直保留，甚至在著名的英国人澳门劫狱案发生时，澳门总督亚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都是在美国船上指挥划船比赛：1849年12月的《中国丛报》还记录了一份数据：“总督（亚马留）在答复他并将科帕尔引见给法官卡尔尼伊罗后不久，就登上美国船‘朴利茅斯号’担任划船比赛的裁判。”<sup>②</sup>

第三，网球、板球、台球等。网球是一项优美而激烈的体育运动，孕育于法国，诞生在英国。板球（cricket），又称木球、桨球，起源于英国，是由两队各11人进行对抗比赛的一项团队运动，一向被颂为“绅士的游戏”（gentleman's game），是一项崇尚体育精神（sportsmanship）和“公平比赛”（fairplay）的运动。盛行于英联邦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亚、非洲南部、西印度群岛等地。板球的球季主要在春季与夏季，刚好跟在秋季与冬季打的足球互补。

台球，亦称桌球，是一项在国际上广泛流行的高雅室内体育运动，是一种用球杆在台上击球、依靠计算得分确定比赛胜负的室内娱乐体育项目。这些运动，经英国人传入澳门。

网球传入澳门的时间，目前尚不确定，但19世纪下半叶，澳门已经有了网球运动。1867年，比利时卢尔德维奇·德·波瓦（Luodovic de Beauvoir）公爵游澳门时，曾提到澳门的网球场。<sup>③</sup>1890年时，澳葡政府还批准了澳门外国人草地网球俱乐部章程。<sup>④</sup>

板球传入澳门始于19世纪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锺启韶游澳门，写下诗句：“筑球

① 此段记录相当重要，兹录如下：“1837年，十三行商馆里的一些年轻成员组织了一个广州划船俱乐部。我们有几十艘供比赛用的单人划艇和轻便小艇。供帆船赛的有三艘约二十六英尺长的双桅纵帆船——斯特吉斯的‘小鼠号（Mouse）’；英国领事馆秘书埃尔德姆斯利（Eduard Emslie）的‘大鼠号（Rat）’和笔者的‘白鼬号（Ferret）’。所有这些船艇都是在河南澳门水道的尽头处，由一个完全秃头的老人建造的。……他的手艺一流，特别是为保罗·福布斯建造的快艇‘亚特兰大号’，那是一艘五十吨的双桅纵帆船，按照遐迩闻名的‘美利坚号’游艇式样建造的。它在澳门海面的一项比赛中获得优胜，超过了其余的六艘好船，其中包括约翰·颠地的三十四吨单桅快艇‘吉卜赛号（Gipsy）’，当时由我驾驶，获第二名。‘亚特兰大号’的时速为九又四分之三海里；‘吉卜赛号’为八又十分之一海里。比赛线路作三角形，有三十五海里，当时吹着强劲的北风。我们在澳门海面举行的第二次比赛发生了一件不幸事故。报名参赛的有十只艇，但实际出航的只有四只（海面风浪很大，不远的地方刮着飓风）。它们是‘吉卜赛号’、查顿三十三吨的‘蓟号（Tistle）’、坎贝尔（Campbell）三十一吨的‘梦号（Dream）’和利文斯通三十吨的‘龙号（Dragon）’。十八吨的独桅快艇‘仙女号（Fairy）’曾出发，一起行驶了一会儿，便连整幅帆一起沉没了。它的主人‘金星门号’的船长罗珀（Roper）紧抱桅杆不放，才得获救，但他的伙伴‘格伦莱昂号（Glenlyon）’的船长的哈多克（Haddock）和两名印度水手则被溺毙。我再次驾驶‘吉卜赛号’，以领先九分十秒赢得优胜。它载着我们在四小时中驶过二十五又二分之一海里的三角形航线。……我们的裁判是碇泊黄埔的孟买船‘查尔斯·福布斯爵士号（Sir Charles Forbes）’的船长斯科特（Scott）。……其实，中国船只对这次运动也表露出浓厚的兴趣，它们自己也在防止有出来妨碍比赛。我们的第一次帆船比赛是于同一年在澳门航道举行，……‘大鼠号’‘小鼠号’和‘白鼬号’参赛，‘白鼬号’获胜。另外两次比赛在1837年和1838年举行，没有发生事故。1838年11月同样由前边提到的三艘双桅纵帆船进行比赛，天气寒冷阴沉，获胜者是罗伯特·福布斯（Robert B. Forbes）。”见前揭（美）亨特著；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之《广州划船俱乐部》，第302~306页。

②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No. 12, Dec. 1849, p. 669.

③ 德立·龙巴（Denys Lombara）著；李长森译《德·波瓦公爵在澳门》，载《文化杂志》第23期（1995年），第11页。

④ （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著；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第294页。

坡对座，走马路横窗”。澳门还有板球场，前引《澳门市区及港口图》在东望洋山之西，水坑尾之东，有一“板球场 (Cricket Ground)”。此球场，即今荷兰园塔石球场的位置。民国初年汪兆镛写下《抛球场》诗：“昔有戏马台，后世乃无闻。此地开广场，草色亦氤氲。蹴鞠亦古法，体育舒劳筋。”<sup>①</sup>由此可见“筑球”为英国人盛行的板球。

台球亦于19世纪上半叶传入澳门。1843年7月5日，《澳门曙光报》一则广告称，英国人彭丁 (E. Bontein) 为一家台球馆老板。<sup>②</sup>1858年岗顶剧院建成，不仅成为当时“上演话剧、音乐会、歌剧的首选场地”，<sup>③</sup>而且还是开办舞会、看书、打桌球的地方，院内设有桌球室。汪兆镛记载：“龙嵩庙侧，地名冈顶，有大厦一区，宏敞环伟，葡人谓之‘及笠’，即华人之公司，盖釀资建设公共游息地。每会：士女昌丰，击球、跳舞、饮酒、唱歌，往往达旦。”<sup>④</sup>击球，就是打桌球。故岗顶戏院又被称做“岗顶波楼”。

### 三、香港近代体育、俱乐部与居港葡萄牙人的贡献

香港近代体育的发展，与英国人割占与租借香港地区是分不开的。从1842年至1898年期间，英国用武力威逼、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分别割让香港岛、九龙半岛及租借新界地区，使香港地区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因此，香港近代体育发展深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体育活动主要由西方人士组织的体育会举办，参与者仅限于驻港英军、商人及外籍人士等，华人绝少机会或渠道参与。体育会（俱乐部）成为了在19世纪香港体育运动的组织者。研究近代香港体育发展及其对西洋体育传华的影响，需从了解这些体育会入手。

#### 1、域多利游乐会 (Victoria Recreation Club)

成立于1849年10月25日，当时名“域多利划艇俱乐部” (Victoria Regatta Club)。前身是前述1837年在广州创办的“广州划艇俱乐部 (Canton Rowing Club)”。它是香港运动俱乐部之父和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体育会，<sup>⑤</sup>用以推动如划艇、风帆和渡海泳等水上活动。首次划船赛在1849年举行，比赛包括帆船赛、渡海小艇、四桨小艇赛、家用小艇赛等。1855年关闭，五年之后又恢复，会员有78位。会舍建立香港的水傍，1872和1874年的风灾，给它造成了很大的损失。1874年风灾损坏的维修费用高达5000元。1900~1901年之间，它搬到了九龙。该俱乐部由居港葡萄牙人管理多年，尤其是当其游泳池与房舍还在商业中心区时，年轻的葡萄牙办公室职员经常很好地使用该俱乐部的设施时。<sup>⑥</sup>

#### 2、香港木球会 (The Hong Kong Cricket Club)

木球 (cricket)，又称板球。香港英占后，英国人又将此项运动带到了香港。此俱乐部于1851年6月成立，将英军操场铺上草坪改建成球场——渣打道球场 (Chater Road ground)。它是在英国之外的第一个木球俱乐部。<sup>⑦</sup>

① (民国)汪兆镛著《澳门杂诗》第二十一首《抛球场》(民国五年(1916年)刊本)。

② Forjaz, Jorge, *Fami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de Macau, 1996, Volume 1, p. 529.

③ 参见施白蒂著；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第134页。

④ (民国)汪兆镛著《澳门杂诗》之《竹枝词四十首》。

⑤ <http://www.victoriarecreationclub.com.hk/history.html>

⑥ F. A. (Jim) Silva, *Sons of Macao, Their History and Heritage*, California, UMA, 1979, p. 31.

⑦ <http://www.hkcc.org/history.aspx>



1908 年左右的域多利游乐会会所<sup>①</sup>

### 3、香港赛马会 (Hong Kong Jockey Club)

香港的赛马运动始于 1841 年英国占领香港岛之后。当年英国人刚抵达，便疏通清理在跑马地的一片疟疾为患的沼泽作开辟马场之用。从 1846 年开始，此马场便一直运作至今，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暂停了数年。由于赛马次数增多，于是正式成立“香港赛马会”。1884 年 10 月，马会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在香港大会堂举行，成员包括来自德国会所、美国会所、西洋会所 (Club Lusitano) 及各国洋行的外国人。当时的马会不准华人入会，只可以当来宾。马会也只负责主办所有赛马活动，投注业务则由私人会所经营，马会仅从中抽取佣金。因为英国人酷爱赛马，因此香港赛马会成为了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会才广泛吸收会员，富有的华人也可以成为会员和马主。

### 4、香港足球会 (Hong Kong Football Club)。

英国人亦将在其祖国流行的足球运动带到香港。该俱乐部由香港辅政司骆克爵士 (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 与一批英国商人创办于 1886 年 12 月 12 日，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一家足球会，亦为亚洲成立最久而又仍然运作的足球会。该会早期不但组织足球队参赛，在香港足球总会成立前，更负责制订比赛章程与规则，还创办香港足球高级银牌赛。此赛事成为亚洲历史最悠久的职业足球联赛及锦标赛。<sup>②</sup>

### 5、香港游艇会 (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

虽然 1849 年，香港已经以域多利划船会的名义，举办了划船比赛，但成立俱乐部则在 1890 年。在一年前，几名游艇主人在一只名为“Mersey Canoes”号的小艇上，达成了多项比赛协议，以便组织更好的比赛。本年，组织了“香港科林斯式帆船俱乐部” (Hong Kong Corinthian Sailing

<sup>①</sup> 图片来源：<http://www.victoriarecreationclub.com/hk/history.html>。

<sup>②</sup>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ng\\_Kong\\_Football\\_Club](http://en.wikipedia.org/wiki/Hong_Kong_Football_Clu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8%B6%B3%E7%90%83%E6%9C%83>

Club), M. Beart 先生被选为俱乐部主席。1893 年改现名。<sup>①</sup>

华人参加到香港体育活动中来,始于 20 世纪初,又有一些新的社团,开始向华人推广体育活动。1902 年,香港基督教青年会 (Chinese YWCA of Hong Kong) 成立,致力向华人小区推广体育活动,1918 年其属下的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必列者士街会所 (又称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央会所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Bridges Street Centre)) 启用,设有室内泳池和跑道,是香港首个市民会堂及体育场馆。1908 年,在校华人学生莫庆等 40 多人发起组织华人足球队,参与洋人举办的足球竞赛,其后逐渐演变成为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体育组织——南华体育会。香港中华业余体育协会于 1916 年成立,负责推动发展本地华人体育活动,同时选拔运动好手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sup>②</sup>

在 19 世纪香港体育发展过程中,从澳门迁居香港的葡萄牙人曾经积极参与,产生过重大影响,是香港近代体育发展的主力军,为推动西洋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居港葡萄牙人积极体育活动的原由,主要有下列方面:

1、体育活动是葡萄牙人小区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也是他们维系小区的重要手段。罢辣架说:“在运动领域,早期的葡萄牙人并没有实质性的参与。但从第二代开始,葡萄牙人在香港的运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杰出。在个人运动中,他们在射击、桌球、游泳、划船、多项竞技项目及赛马中表现出色;在集体项目,诸如足球、曲棍球、草地滚球、水球、划船、网球、板球,他们亦出色。由‘葡人俱乐部’成员提供的‘鲁索人’杯赛,是每年春季由香港赛马会举行的香港赛马赛事中的大型年度赛事。”<sup>③</sup>

2、小区消遣手段。施利华说:“特别是在运动方面,它们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消遣途径。同样,不计他们在香港人口中的比例,‘澳门之子’的运动员控制着如此之多的领域。也许其原因是中国人,直至现在为止,均没有运动意识;或许是这些‘澳门之子’的混血背景,使他们具有其它种族所缺乏的机灵与协调。他们擅长于游泳、足球、划船、骑马、垒球、曲棍球、网球、羽毛球、桌球和草地滚球,在许多领域,他们至今仍是这样。”<sup>④</sup>

定居香港的澳门葡萄牙人参与香港体育运动的重要形式是组织社团,在社团中开展体育活动。下面分别介绍这些社团:

### 1、香港岛“西洋会所”。<sup>⑤</sup>

香港葡人最早的俱乐部。1865 年 12 月 26 日,由澳门总督亚马留 (José Rodrigues Coelho do Amaral) 来香港主持了其大楼奠基仪式,<sup>⑥</sup>它是顺应居港葡萄牙人需要而组建的。

### 2、域多利游乐会 (Victoria Recreation Club) (见前述)

### 3、九龙“西洋波会 (Club de Recreio)”<sup>⑦</sup>

① <http://www.rhkyc.org.hk/History.aspx>

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9%AB%94%E8%82%B2>

③ Braga, José Pedro, *The Portuguese in Hongkong and China: Their Beginning, Settlement and Progress during One Hundred Years* (Revista “Renascimento” 1944; Macau: Fundação Macau and Mar – Oceano, 1998), p. 162.

④ *Sons of Macao, Their History and Heritage*, p. 19.

⑤ 关于此俱乐部的中文名称,据孙修福编《近代中国华洋机构译名大全》(北京:海关出版社,2003 年)第 224 页载:“Club Lusitano, 西洋公司(香港);沙面西洋公司(广州);东方总会(上海)。”又据黄光域编《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82 页载:“Club Lusitano, (1) (香港:1866 年设立,初期)新西洋公司; (嗣改称)西洋公司; (2) (广州)沙面西洋公司; (3) (上海)东方总会。”

⑥ (葡)施白蒂著;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第 161 页。

⑦ 此俱乐部的中文译名,据前揭孙修福编《近代中国华洋机构译名大全》第 22 页:“Club de Recreio, 西洋总会。”

西洋会所奠基庆祝（1920年12月17日）<sup>①</sup>

香港草地滚球组织。先由侨居香港的葡萄牙人组成，是葡萄牙人小区休闲中心，后来发展成为运动俱乐部。会所位于九龙京士柏加士居道20号，近卫理道交界，亦系年轻人在九龙的运动中心。其场地与设施有草地滚球、羽毛球、曲棍球和网球。<sup>②</sup> 奥马达·卡斯特罗说：“在运动领域就一句话：西洋波会在此领域的记录，太为人所知了，以致于不再需要提及；那个俱乐部在足球、草地滚球、板球、曲棍球方面赢得了荣誉；而整个小区在运动方面，也富有成果；其中有它一个会员，哥沙洛家庭（Gosano family），此家庭成员成长起来，不久将毫无疑问能够在他们之中召集起两支11人曲棍球队。该俱乐部最热心的支持者是葡萄牙人；许多当地的游泳记录也是葡萄牙人保持。葡萄牙人在草地上的热情，人数不少；最为成功者之一是苏亚雷斯（F. P. de Vasconcellos Soares），他在彩色、绿色、金色的草地上追逐，其中最为吸引人的是在赛马场。”<sup>③</sup>

西洋波会外观（1920年）<sup>④</sup>西洋波会会所入口<sup>⑤</sup>

#### 四、澳门、香港与近代学校体育

澳门是欧洲学校教育在中国最早展开的地区，而将体育教育引入学校教育中来的，首先是天

① *Portugu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p. 97.

② *Sons of Macao, Their History and Heritage*, pp. 30 ~ 31; <http://www.clubderecreio.org/index.do>.

③ Castro, Leo de Almada e K. C., *Some Notes on the Portuguese in Hong Kong*, in *Instituto Portugues de Hongkong Boletim*, No. 2, Setembro, 1949, pp. 273 ~ 274.

④ *Portugu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p. 98.

⑤ 图片来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B4%8B%E6%B3%A2%E6%9C%83>

主教学校。16至17世纪澳门学校体育就是通过舞蹈、戏剧、散步、游水、登山等这样的身体活动方式来展开，这与当时欧洲刚刚兴起的学校体育教育大致同步。

澳门两家主要的天主教高等学府是开展学校体育教育的代表。首推澳门圣保禄学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虽然，由于资料的不足，目前并未能全面了解该学院的体育教育的情况，但有将登山作为体育锻炼的规定。据1620年耶稣会巡视员陆若汉（Jeronimo Rodrigues）的一份报告，据学院当时13条校规之第3条规定：“由于学院没有专门地方供大家散步和锻炼身体，因此，学院规定，星期天及其它圣日为休整日，所有的人均应登山散心，呼吸新鲜空气。大家可携带水果和食物在外野餐。同时，神父每天清晨上山祈祷；教师们每天下午教完课后亦可登山活动。作出这样的具体规定是为了保证人人能够锻炼身体，有充沛精力进行学习和工作。”<sup>①</sup>学院还在澳门附近的青洲（Ilha Verde）兴建教堂及供学生休闲活动的场所。其次，是圣若瑟修院（Seminário e Igreja de São José）。1828年，该修院接管青洲后，青洲又成了该院师生休闲娱乐的场所。

其次，新教传入澳门后，即展开了他们的办学活动。马礼逊于1807年来华后，即进入澳门。1812年赴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英华书院虽然没有开设体育课，但据当时到该院学中文的美国人亨特记载：“学院规定我们要每天锻炼，我们很高兴地接受这一规定。”可知，刚刚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即很重视体育锻炼。1836年9月，为了纪念马礼逊，一些欧美传教士在澳门成立马礼逊教育会，并开办马礼逊纪念学校，聘请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布朗（Samuel R. Brown）担任校长，据1841年10月的《中国丛报》记载：“在（1839年）11月1日，我们搬到了教育会的房子，并在同月四日开办了一所学校。……（每天）有8个小时用于读书，3至4个小时用于室外进行锻炼和娱乐。”<sup>②</sup>

澳门官立学校推广体育运动，始于1911年。1910年10月5日，葡萄牙爆发了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的革命。澳葡政府亦进行了中学教育改革，意识到体育运动对国民素质提高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于次年1月6日，由代理总督马楂度（Alvaro de Mello Machado）颁布第15号谕令，正式成立澳门运动会。这是澳门历史上关于发展体育运动的第一份正式官方文件，对澳门体育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sup>③</sup>这大大推动了澳门学校体育的发展，1911年11月29日，澳门振兴学会（APIM）在塔石球场举办了“学校学生运动会”，以响应此号召。<sup>④</sup>葡国革命后，澳门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各种类型的学校基本上完成了教育近代化任务，主要学校大多配有专职体育教师，开设体育课，各种体操、田径、球类在学校展开。

进入近代以后，香港继澳门成为了学校体育传华的新基地。但从港英政府的教育年度报告来看，至19世纪末，港英政府资助学校的课程中，并有未开设体育课程的报告。20世纪初，香港的华人学生在学校开始接触体育运动。

## 结 论

自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以来，澳门就成为了西洋体育传入中国的首个桥头堡与窗口，以射击、骑马、游泳等为代表的葡萄牙人骑士运动与以赛马、划船、球类等为代表的英国人

① 何儒达王室图书馆藏圣保禄学院源文件《本院最后一项工作——附属小学》（*Do Ultimoministeriodeste Colegio que e a escolar dos meninos*），转引自李向玉著《澳门圣何禄学院研究》（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

②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No. 10, Oct. 1841, pp. 564 ~ 587.

③ 参见汤开建著《民国时期澳门近代体育的形成与发展》，载《暨南史学》第3辑，第505 ~ 535页。

④ 施白蒂著；金国平译《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1900 ~ 1949）》（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58页。

贵族运动传入了澳门。19世纪中叶以后，香港成为了欧洲体育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基地，体育会（俱乐部）成为了香港体育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居港葡萄牙人亦为香港体育运动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学校体育是西洋体育的组成部分之一，从16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澳门的圣保禄学院与圣若瑟修院以及19世纪初的澳门新教学校开展了学校体育活动。至20世纪初，由于体育教育对国民素质提高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港澳地区已经在学校里开展了体育活动。港澳地区体育运动的发展，为西洋体育在华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編者按：**史學即史料學，史海汪洋，史料為舟。為推動本領域的學術研究工作，本刊特推出新欄目，名曰“史海尋珍”。借助本刊之平臺，將重要史料，向學術界介紹，以有益於學術研究也。

## 佚名編著；黃善萍點校； 葉農 金國平校注 《兩粵雜存》

### 一、解題

《兩粵雜存》不分卷，佚名編輯，晚清抄本，書法工整而精緻，屬精抄本。其版式為，每半葉9行，行大字單行30至35字不等，小字雙行約86字。四周雙欄，外粗內細。白口，單上魚尾。魚尾之上，題“紀事備覽”，下題“養虛齋”。未注明輯錄者或抄寫人姓名。

《兩粵雜存》主要收錄晚清兩粵地區的官府公文，原藏於上海圖書館。

#### （一）《兩粵雜存》成書時間

考據原文內容，多次明確出現清“同治四年”至“同治八年”的日期，且只出現過“同治”這一年號，可以判斷此本文獻應輯於晚清同治八年至同治十三年之間（1869 - 1874年）。

#### （二）所輯文書之著者考證

《兩粵雜存》收錄兩粵地區地方行政部門處理公事的各類信劄，開篇是3封書信者作為地方長官向總督投遞的書函，從信中稱謂及落款使用的敬語可知，總督是書信者的上級；而後收錄的其他信函中，書信者多次自稱“本部堂”“本司”，亦有來信稱其為“撫部院”。有清一代，地方總督自稱本部院，地方巡撫自稱本部堂。因此可以判斷，《兩粵雜存》收錄的是清朝同治年間兩粵巡撫、總督處理公事的各類書信、公函。

據記載，同治年間兩粵地區任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者有：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蔣益澧。而此本所收錄的《候補鹽大使劉元標稟給還儘先插委二次批》一文中，7次出現“臣瑞”的自稱，撰寫這些信函之人，也許就是瑞麟和蔣益澧。

#### （三）《兩粵雜存》之文獻價值與研究意義

《兩粵雜存》共輯錄公文42篇。按公文類型來分，其中包括告示2篇、軍事及鹽餉紀實2篇、

上行文信函4篇、刑事案件商議類4篇、商議類劄文12篇、批文18篇。其內容涵蓋兩廣地區與西洋各國交涉事務、澳門問題、拐賣人口、兩粵通商事宜、徵收稅款、軍事海防等多個方面。其中有27次提到“澳門”，13次提到“香港”。

在澳門問題上，《兩粵雜存》詳細記錄了當時中國官員與英法領事就澳門歸屬問題的交涉。英國領事羅伯遜提及澳門為中國領土卻被西洋人占據，且西洋國勢衰弱，中國可考慮補償經費讓其遷移。據文中收錄的信劄所說，中國官員對此有更深刻的認識和諸多考量：一方面，英國已佔據香港，若再索回澳門，可能引發其更大的貪欲；另一方面，法國在澳門有長期居住的民眾，若澳門交還中國，法國可能趁機生事。此外，若中國以經費補償換取澳門，可能引發其他國家效仿，帶來無盡的麻煩。且西洋人在澳門已居住多年，若強行驅逐，可能引發更大的動盪和問題，甚至可能出現“驅羊而得狼”的局面。因此，中國官員主張在籠絡羈縻之中，向西洋人示以守信不移之道，以圖長久穩定之計。

文中對當時粵東地區拐賣人口出洋，即“賣豬仔”的現象進行了深入描述。由於地理環境的特殊性，粵海關難以有效稽查，使得拐賣之徒得以肆虐。拐賣者通常以招工為名，誘騙窮苦無知的鄉民前往澳門、香港，再賣給洋人，從中牟取暴利。文中詳細記載了拐賣的過程，包括如何誘騙、如何與洋人議價以及被拐者的悲慘遭遇。對於這種現象，中國官員採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如嚴懲拐賣者、禁止洋人干預招工事務、加強地方稽查等。同時，還附有禁止拐賣人口的告示稿，強調了拐賣行為的嚴重危害以及對拐賣者的嚴厲懲處，體現了當時政府對治理拐賣人口問題的決心和態度。

在通商方面，《兩粵雜存》主要圍繞潮州通商事宜展開。書中記錄了與英國駐潮州領事就通商條款的協商過程，包括洋商貨物完稅後的運輸、沿途抽厘、落地稅等問題。中國官員主張按照條約規定，洋商貨物在通商口岸完稅後，若在內地銷售，應由華商納稅，而洋商不應再被徵收內地稅。

同時，對於外國人租賃房屋、建造房屋等事宜，也提出了相應的管理措施，強調應在不違背民情和條約規定的基礎上進行。此外，還批駁了惠潮嘉道稟議的通商條款，指出了其中不符合條約規定之處，如在尚未離口之先抽收厘金、要求領事協同辦理非其分內之事等，並要求按照條約重新核改。

總之，《兩粵雜存》反映了晚清時期兩粵地區在對外交往中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及清政府處理這些問題的歷史過程，為當代學者研究19世紀中葉兩廣地區的经济發展情況、當地政府與西洋各國的交涉、軍事水準和法律體系等方面的歷史提供了基礎史料支撐。

## 凡 例

一、本次整理點校，採用現代漢語標點符號。

二、為保持原文，呈現原貌，對文中俗體字、異體字，盡量採用，不轉寫為正體字，如“糧”“湏”“既”“允”“緣”“彙”“塽”“猪”“面”“决”“净”“叅”“迫”“雇”“准”“况”“欸”“碍”“收”“寫”“凶”“暨”“譁”“讞”等。但“概”，則改為“概”。

三、原文中缺失的和不可辨認之內容，以“□”代替。

## 兩粵雜存

### 致總署

謹密啟者：澳門地方向經西洋人在彼久居，曾據英領事羅伯遜談及澳門，是中國地方，為西洋人所踞，現聞西洋國勢衰弱，何妨酌酬經費，令其遷移？又據法領事李添嘉詢問中國，有令西洋人交還澳門之說。如有其事，各國均有不服之言，俱經不露形色，相機答覆。然此事總署如何籌辦，外省未悉底蘊，第以英、法二領事之言繹之。蓋有深意存焉。以愚見度之，英國志在通商，已有香港一島，而澳門亦是通商碼頭，恐有得隴望蜀之心，此則一可慮也。而法國人向有住在澳門，故不欲澳門交還中國。前次和議，英國已得香港一口，法國尚無所得，恐交還之後，法國難保不啟覬覦之念，此則二可慮也。若中國令西洋人交還澳門，酬以經費，恐異日各國亦以此例要求，未免多費周章，此則三可慮也。現在西洋人居澳門相安已久，即如在彼抽釐等事，從無阻難。所不得者，糧賦耳。澳門彈丸之地，所徵幾何，設別國求而得之，另開生面，是無殊驅羊而得狼，必多饒舌，此則四可慮也。以為與外洋交接，惟有圖其大者、遠者，首當講求自強之道。際此彼族正強，只有於籠絡羈縻之中，示以守信不移之道。如此庶幾稍有限制，不致貪求無厭。伏諗王爺大人通籌全局，智珠在握，自能計深慮遠，必不為其所惑而承乏嶺南，六載于茲。苟有所知，不敢不盡其愚，謹將所聞所知，詳晰布陳，以備採擇。肅此具啟，虔請鈞安。八年二月初十日五百里排單釘封發。

### 復總署

謹密復者：前奉復諭，知澳門一事，仰荷採擇，且承虛懷下詢，不棄芻蕘，曷勝欽佩。查澳門本為番舶薈萃之區，自香港開設口岸以來，貿易大不如前。華洋雜處，藏垢納污，固所不免。西洋國勢衰弱，亦如赫總稅司所言，惟別國租買一節，不知其詳。第西洋在澳門，每年收租稅，數亦不貲，況以法領事李添嘉語氣察之，澳門若開租賣之端，各國必有紛爭之事也。洋藥抽釐，在澳門有同濟堂公所；距澳門二里許，有石角釐廠；距澳門迤西海面四五里，有拱北灣釐廠；距澳門迤東陸路八九里，有關閘釐廠；而前山新馬頭，亦設有釐廠。查澳門與前山水陸皆通，水程十二三里，陸路十五六里。凡經由澳門之洋藥，各處抽釐，西洋尚無阻撓。查閱志乘，雍正八年設縣丞于前山。乾隆八年移肇慶同知為前山寨海防同知，而將縣丞移于澳門。其後澳門縣丞何時復回前山，因粵東省垣，自咸豐七年洋人進城，檔案皆經毀失，無可稽考。若設官于澳門，與體制甚為相宜。但該處生聚較繁，同知職位卑小，距省寫遠，不足以資鎮撫。如果添設大員，建置經度，殊覺非易，而人才尤為難得。前晤法領事，曾云西洋欲求換約通商，今知該國業已照會貴衙門，可否于其議約之時，飭令照舊輪納租銀。如此，則澳門仍為中國之地，諒各國無可覬覦。如有逃人逸犯，可令按約交出，彼此循舊相安，似于羈縻遠人，尚無得失。譴陋之見，是否有當，伏候鈞裁。肅此具復，敬請金安。謹肅。八年五月十六日隨同三百里駟摺發遞，由兵部轉送。

### 復總署

謹密復者：接奉鈞諭，並承錄示函件，拜讀敬悉。查洋人拐騙華人之事，以粵東為最多，亦惟粵東為最易。祇緣地理情形，迥與各省不同，以故拐騙之徒，得肆其虐。謹將地理情形，詳細

陳之。查各省洋船出入通商海口，均皆直抵海關，故海關得以稽查，而粵海關則設在省垣，洋船拋泊則在香港、澳門，距省河四百餘里，鞭長莫及，海關無從稽查。而自省河至香、澳，其間海口林立，如衝要海口，尚有員弁稽察，而偏僻小口，向無汛卡，隨時可以出入。其拐騙之徒，以澳門、香港為歸蓄，澳門拐賣人口最多最久；香港次之。以身擁厚資者為豬仔頭人，託庇洋人，坐地收買。先係華人專營此業，近來洋人亦間為之。另有拐騙之徒竄入內地，見窮苦無聊庸懦可欺者，即誑以澳門、香港某某洋行託人招工，如願同往，先給定洋數元。鄉愚無知，受誑同行，初不言招往外國也，是以中途破案發覺者甚少。及誑至澳門、香港，則閉置堅房，與洋人議價售賣，每名不過五六十元，而洋人販至外國，每人可賣洋五六百元不等。惟聞澳門洋官，其先尚有規矩，議定之後，將被拐之人喚至議事亭，徧詢情願出洋否。如有不願，其人即自走散，豬仔頭人不敢過問。倘無異詞，次日交價送人上船。前數年間，聞有西洋官某者，頗存公道，詢問最詳，以故願往者十不得一，豬仔頭人大窘，於是先覓就地之人，冒名聽詢，無一人不願往者。次日得價，乃將所拐之人送上洋船。後聞洋官被控撤退，華人錄新聞紙以頌之。亦有本地刁徒，自稱願往外國，傭工向豬仔頭人索得工值者，及至議事亭查詢，則曰“我被拐騙，何願遠往外國”，則亦誑騙而去。人情狡詭，奇變莫測。而粵東拏獲拐騙之徒，審明正法者甚是不少。乃因香澳皆為洋人所據，華官不得過問，雖奉招工章程，絕無照章招工之事。而拐騙之徒，寄跡香、澳，恣其所為，法令所不得及，緝捕所不能到，以故販人漁利此風未能盡絕。今年正月間，管駕恬波輪船之陽江鎮右營都司梁禹甸，巡至開波洋面，聞海船有人喊救，拏獲豬仔頭人二十四名，解省審辦。被拐者共有二百餘人，就地遣散。其餘隨時獲辦，不一而足。並經出示嚴禁，並將示稿附呈尊覽。深受國恩，忝膺疆寄於民生休戚，何敢稍存膜視？特以地理情形與各省不同，亦惟盡其力之所能，竭誠辦理而已。肅此具復，謹請福安。謹肅。謹再密復者：承諭李泰國出身始末等因，如果其人來粵，定當密致海關，監督不准其干預各關事件，並即報聞，以副鈞囑。肅此再復。謹叩勛祉。再肅。八年七月初八日，四百里排單發。

### 錄禁賣豬仔告示稿

為出示嚴禁事。照得奸徒拐賣人口出洋，謂之“賣豬仔”，其害最烈，為禍無窮，前經奏定新章，但誘拐已成，不論曾否上船，為首者斬決，為從者絞決，均於審明後，即行正法。近年拏獲豬仔頭人，照例審辦者，已有多起，法律未嘗不嚴，而此風竟未淨絕，實屬愍不畏法。夫商賈百貨貿遷，皆可謀利；農民耕鑿傭工，亦足資生。乃豬仔頭人專以販人為事，誘拐出洋，百無一生，實以害人圖利，可謂喪心昧良！其中有被甘言哄誘者，謂外洋傭工如何大有利益，而愚昧之徒誤中其計，遂致竄身異域；亦有其人本不願意，或被誑至異地，或經誘上洋船，奸徒乘勢威逼，其人誤墮術中，進退無路，因而遠涉重洋，一去不返。生為中華之人，死為異域之鬼，良為憫惻。更有被拐之人，家有父母妻子，因此倚門望斷，魂夢常驚，甚至老幼凍餒，親屬分離。是奸徒所得者，僅賣一人之利，而其貽禍有害全家之慘。忍心害理，莫此為甚！及至事發到官，照例懲辦，奸徒平日利己害人者，斯時方知害人仍是害己，身正典刑，後悔何及？然奸徒誘拐豬仔，地保隣佑斷無不知情之理。其租賃搭渡，亦應予以明禁之條，此後豬仔頭人犯案，如地保隣佑知而不報，照例治罪。倘能送信引拏，概准免究。其租賃房主，搭渡船戶，如能覺察舉報，一體賞給花紅。倘知而隱匿，一經官兵破獲，房屋船隻，一概入官，本部堂院現飭水陸地方文武，一體查拏，比前更為嚴緊。倘奸徒罔顧法紀，仍復販賣豬仔，貪利忘生，不死不休，本部堂院為民除害，必當設法拏辦！言出法隨，不辦不止。為此，通行各屬，曉諭諸色人等，一體知悉。務宜心存凜惕，勿蹈覆轍之凶。倘敢以身試法，必干駢首之誅。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 咨商海關給還金順記船洋藥變價

為咨商事。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准貴關部咨開：前接本關吉稅務司云云，一併領回，實為不便仍祈見復等因，到本部堂准此。正在核辦間，據船戶金順記、客民陳塔合呈稱：切蟻等船貨于本年四月二十晚，被吳叅將誤拏解省云云，慘切至極，迫得匍叩恩准等情，並據惠州府海防通判申稱，查明鋪民陳塔合等，向在碣石開張貿易，常雇金順記船往香港載運貨物來碣，投納關稅，從無瞞匿等弊。七年四月十九日，在香港買有洋藥、洋布、各項貨物，彙付金順記船裝載回碣銷售。是月二十晚，駛至碣石港候潮，尚未入港，即被誤拏，委非漏稅，請即發還給領等情。並據廣州府沈守會同識局各委員，亦稟請發給領回前來。本部堂查善後條款，內載“洋藥准其進口，議定百斤納稅銀三十兩。惟該商只准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等語。查華商在香港購買洋藥，如在上年五月二十七日，開設釐廠以後，所運洋藥，不粘印花，則為私貨。此案金順記所運洋藥，在香港向洋行購買，在四月間未設釐廠以前，無從粘貼印花。至於洋藥，專裝洋船，不准華船裝載。曾經前部堂勞出示曉諭，有案此指洋船可到口岸者而言，若碣石子口非通商口岸，洋船何能得到？而曰華船不准裝運，似難執一。向來華船裝運洋藥洋貨到各子口，斷不止碣石一處為然。況據金順記等呈稱，常為鋪民陳塔合等，在香港裝運洋貨多次，均在碣石稅關納稅，從無隱瞞，恐難保無收執歷完稅單之事。況在港口，尚未入港，未經過關，謂之瞞稅，民情亦不帖服。吉稅司所言，專指洋藥經過海關而言，亦不欲據改本部堂原斷，而貴關部斷為私貨入官，似未平允，現在商民哀切呈訴，而原斷之廣州府沈守等亦稱按例應予發還。本部堂於關政民瘼，無不兼籌竝顧，竝不有所偏向，斷不迴護原斷。惟民情既有屈抑，本部堂何忍不為籌商妥辦？相應咨商，為此合咨貴關部，煩為查照。如果此項洋藥業已變價，即將原價咨送來轅，以憑飭發給領，以慰民望。施行。

### 海關咨復接入

當經照會吉稅司復稱：查前接貴關部照復，將洋藥充公，洋布船隻給領。本稅司當即照辦，將洋藥飭發變價，暫緩入充公罰款結內。今准前因，茲將原變洋藥價銀票九百七十四元零二先士壹紙，壹百陸元六十八先士壹紙，送關咨送查收等因，到本部堂准此。合就札飭，札到該府會同識局委員遵照，立將發來銀票二紙查收；即傳該船戶金順記等到案，飭令將船貨及洋藥變價銀票領回。照例輸稅。

### 酌議潮州通商事宜

一、洋商貨物在新關完稅後，領出關單，運往潮州府城貿易，沿途不准上下貨物。違者船貨照約入官。路經府城東關，呈單查驗，其單即由東關留存繳銷。如單貨不符，照約入官。若單貨相離，逢關納稅，遇卡抽釐。

一、潮州府城，係通商之口。洋商運洋貨入城，不徵落地稅釐金。若洋商自入內地販賣，應先赴新關完納半稅，領單起運，內地不復重徵。若不完稅領單，貨物一經離口，不論洋商華商，逢關納稅，遇卡抽釐。惟洋藥一項，止准華商轉運內地。一經離口，洋商不得預聞。

一、洋商運貨船隻，或用火輪船，或用內地船，應領關單執照，分別完納鈔料。違者照約議罰。

一、外國人如有租賃房地之事，應由領事照會地方官，妥議辦理。

一、租賃房屋，須洋人與內地人自相情願，公平議價。彼此不得勉強措勒，以符條約。

一、外國人如果嗣後在郡建造房屋，應由領事會同地方官查勘，擇地租與外國人興造。總於建造房屋，不至有碍民情。

### 劉英國駐潮啊領事

為劄復事。同治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接貴領事官伸陳，內稱：案照敝領事接准惠潮嘉張道照會，內開本月初七日接據潮州府稟稱，現奉院憲劄飭。洋商運貨進城，賣與華商之後，中國稅釐徵自華商之手，洋商自未便過問。因諭飭紳士傳諭鋪戶，一體知悉，設局徵收等因。據此照會到敝領事。准此查條約，內載：洋商運貨通商，只應完納進口之稅，至現洋貨賣與華商之後，若復徵收內地之稅，即與徵自洋商之手毫無有異，未免洋商貨進一口，稅完兩次。敝領事因思此事有違和約，致碍英商。是以迭經照會惠潮嘉道，請飭裁撤此重徵之稅，並先經稟明本國欽差，旋接來文，亦以按照條約，通商貨物，一口只有一稅，未經離口，自不應完納別項稅餉等因。惟是敝領事雖經照會惠潮嘉道，亦已出示暫行停辦，但此事潮州道府係奉貴部堂劄飭辦理，自必未敢擅便，相應申請飭遵。為此伸陳貴部堂查照事理，希即再行劄飭惠潮嘉道暨潮州府遵照。即將所辦補徵洋貨內地之稅，認真停止，以後毋庸再議，實為公便等情。本部堂均已閱悉。查潮城通商事宜，本年三月間，貴領事官來省，本部堂將貴領事官與惠潮嘉張道會議條款，酌量核改，與貴領事官面商，貴領事官亦以為可，並無異詞。何以其後又云不符條約？係屬有背原議，即如潮州道府，現徵華商稅餉，原與洋商無涉，貴領事官，本可不必干預，如謂此事有違和約，不知有違和約第幾款？即望貴領事官明白指出，本部堂自當照辦。前貴領事官伸陳，以汕頭比黃埔，以潮城比省垣，引類比証，何其明白！而省垣徵收華商帖餉釐金，已歷多年，各國領事官均無異議，即通商各口，亦皆如此辦理。茲貴領事官獨於潮城一口，屢止華官，不准徵收華商稅餉，此豈和約所有乎？即洋商由汕頭運洋貨至潮城，現在已經通商，應由海關發給關單，沿途照驗，並至潮城繳銷，亦不應由貴領事官發給執照，此亦為和約所無。望貴領事官諸事恪照和約改正，本部堂實為至盼。相應劄復貴領事官查照。為此劄復，順候時祉，須至劄者。

### 惠潮嘉道稟議通商條款等批

據稟及鈔摺均悉。查啊領事現議第一條，在潮州府城兩口抽釐，係於尚未離口之先抽收釐金，實與條約不符等語。查《通商章程》第五款，內載“洋藥不准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貿易。洋藥進口，止准在口銷賣，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其如何徵稅，應聽中國辦理。是汕頭府城，皆為口岸。如洋商未經銷售，不徵釐稅；若一經銷賣，即為中國貨物，徵納釐稅，自與條約不背。現在通商各口，無不皆然。該領事所言：“如果貨物流通，洋商獲益，必轉請外國欽差，飭令洋商完納稅釐。”此與條約不符，未便准行。第二條，現議《章程》內有欲須敝領事協同辦理之事。但查條約，內有“非敝領事分內應辦之事，未便照行”等語。查新開口岸一切事宜，領事照會地方官辦理，亦與條約相符，向來各口皆如此辦，若非領事應辦之事，自無勉強之理。第三條，洋藥釐金雖徵華商，實與抽收洋商無異等語。查中國軍務，尚未完竣，餉需取之於賦稅釐捐，非比外國，有債可借。此為軍餉起見，藉資商力。俟各處軍務告竣，自當次第裁撤，亦係中國自主之權。第四條，潮城設局抽釐，恐滋事端等語。此在地方官善為辦理。第五條所議洋藥稅短絀情形，均屬實情。惟偷私各口，多係海關子口，自應咨商粵海關，稅釐一體整頓。現在洋藥偷漏，所經子口，未必無費，徒為中飽耳。仰即會商設法，認真整頓。照依現議，在海門、甲子、神泉三處，揀派委員，管帶巡船，在彼常川駐紮，作為釐金分局。照議每箱抽收四十兩，先行試辦，務期週密，盡善為要。仍將辦理情形，隨時稟報。至該道稟稱，

啊領事自擬條款十四則，而查閱清摺內所列，僅止六條，何以多寡不符？並即據實稟復。仍候咨行查照，暨候撫部院批示。繳摺存。

#### 惠潮嘉道稟開辦汕頭洋藥釐金批

據稟及另單抄摺均悉。查洋商完納釐金一節，前據該道等，抄錄啊領事所議條款具稟，當已批示，為條約所不准行。今果譁張叵測，至釐金不收現銀，待英國欽差回文，實屬過慮。此時但收議單，異日恐有轆轤。釐金係徵自華商之手，各口皆然，即省城亦行之已久。各國領事，並無異議。何潮州一府，獨多周折。自委該道辦理洋務以來，凡有稟請開銷，本部堂無不俯允所請，甚為倚重。乃自去冬汕頭滋事一案，該道既接啊領事照會，並不立時前往，遷延貽誤，釀成重案。試問該道，居心何安？本部堂不將該道糾叅，欲觀後效。豈知該道不知激發自勉，仍安故習。而於潮州開辦通商以來，該道議論，無一句中肯，動輒張皇，全無主張，既未能實心辦事，並無真實學問，更准徵收洋商釐金，迨被執定難推，乃以華商代洋商出名完釐，為掩耳盜鈴之計，荒謬糊塗，實出情理之外。但不知該道故違條款，開此一端，究竟是何肺腑？此事所關頗大，仰即遵照條約，速行更正。倘再玩誤，本部堂定將該道撤任，奏請從重叅辦。該運同既同委此差，若不悉心參贊，一經貽誤，厥咎維均，毋謂言之不預也。一面仍將辦理情形，飛稟察核，並候咨行查照。此繳摺存。

#### 惠潮嘉道稟汕頭洋藥釐務商定新章給發印花運照等批

據稟及另單抄摺均悉。查徵收洋商釐金，以及洋商假華商之名，領給運照，實與條約不符，斷難准行。已於前稟詳晰批示矣，仰即遵照條約，更正妥辦。總之該道等不照條約，謬妄從事，禍福兩途，悉皆自召。本部堂何能曲為寬貸也？凜之切切。至釐局需用印花，應如何印給，即由道脩移釐務總局印發補用，仍將辦理情形飛稟察核。並候撫部院批示。繳摺存。

#### 東莞縣稟方年晚雨訊無傳派謗詞批

查此案前據布國甲領事伸陳，宏發洋烟店有謗詞傳派，不知何人印刷，交該店傳派等語。茲據訊方年晚雨，僅稱有路過不識姓名數人，在伊店前檢得字紙一張，互相傳看。適有洋人隨後走到，說此字毀謗洋人，疑伊傳派等供。查所印黃紙，其質不甚微小，何以偏落方年晚雨店前？究竟何時所落，當時初無所見，而為不識姓名數人所拾看，又值洋人撞見，焉得有如是之巧？且既經不識姓名數人同看，何以獨指宏發洋烟店為傳派？其中必有別情。中外交涉事件，中國人應歸中國官訊辦，現在所取供詞，既云有洋人目覩，務須真切確實，方可示信外邦，乃該縣並不細心研究供情，仍屬支離，斷難照轉，仰再覆加詳鞠，另錄確供，詳覆核辦，仍候撫部院批示。繳。

#### 示加邨鷓汀等鄉被洋兵焚屋傷命

為再加優邨曉諭事，照得中外通商，和好已有多年，各處士民均應知曉，何以洋兵前赴潮屬鷓汀、浮隴、東墩各鄉打鳥，該鄉無知？幼孩輒相追逐嬉笑，釀成事端，致被燒燬房屋，傷斃多命，內有婦女幼孩，亦遭傷殘。本部堂聞之，深為憫惻，即經批飭惠潮嘉道，加意撫邨，以資矜憐。茲據該道稟覆，查得因傷身死者：鷓汀鄉三十二名，浮隴鄉二十五名，東墩鄉十二名，每名酌給卹賞洋銀三十元。鷓汀鄉受傷者二十五名，浮隴鄉二十名，東墩鄉二十三名，每名酌給養傷洋銀三元。又查被燒民房，鷓汀鄉二百六十五間，浮隴鄉二十間，東墩鄉一百六十間，每間酌給

撫卹洋銀二元。具稟前來，本部堂院覆加酌核，除傷斃各命，每名給洋三十元。已比向章從優，毋庸置議外，其受傷之男丁、婦女、童稚，當此被災之後，焉能有力調養？原給養傷洋銀每名三元，尚恐無濟於事，今本部堂院再給受傷人，每名洋銀拾元，以資調養；其被燒房屋，每間原給撫卹洋銀二元，似覺過少，亦應再加撫卹。為謀棲身之計，本部堂院于被燒之家，每間再給洋銀三元，藉以體卹。除劄藩司籌撥庫款，派委妥員解赴被災各鄉，仍照原查清冊，按名散給外，合行曉諭，為此示。仰潮屬鷓汀、浮隴、東墩各鄉士民人等知悉，一俟委員解款到境，立即報名請領，以資卹養而助生計。此次本部堂院格外憐憫，重加優卹之意，深望各鄉士民驚定思痛，速自省改，力除囂凌之惡習，迅為純樸之良民。父誡其子，兄勉其弟，興仁講讓，革薄從忠；務使俗美風醇，閭閻安生樂業，毋負本部堂院諄諄告誡之至意，實有厚望焉。誠之，勉之。切切！特示。

### 整飭輪船一點鐘行路燒煤定數若干

查輪船本為外洋利器，一自官買以後，便成笨物，即如黃廷耀現駕安瀾輪船，由省赴瓊，往返計有十日。如此一日薪工，駛不到半日路程，實屬虛糜經費。應通飭管駕各輪船員弁，與經理船務之洋人，細加講求，每一點鐘應行若干路，須燒若干煤，定一限數，以憑稽核。縱不能如洋商輪船之迅疾，亦當遲速不甚相懸。本部堂深知，該員弁在輪船，不過同一贅疣，亦為安逸之優差，尤宜究心講習，顧惜經費，以期利器得用，免被洋人貽笑。

### 禁擄人勒贖告示

為剴切曉諭事。照得匪徒擄人勒贖，其害甚為狠毒，擇富厚之人，擄捉關禁，凌虐逼辱，無所不至；贖價多寡隨心，生死制之在手，如果走露風聲，或勒贖不能如意，被擄之人必死非命，並且毀屍滅跡，慘毒不可勝言。以故被擄之家，忍氣吞聲，備價取贖，不敢鳴官究辦，恐其立加殘滅。迨既贖出之後，仍復不敢聲揚，猶慮被其圖害。是以破案甚屬寥寥，匪胆用是益張。其劫擄之虐，甚于強盜，而狠毒之心，無異虎狼。此風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安。本年三月間，據署撫標中軍參將鄧安邦等，拏獲擄匪黃亞嬌等八名，並將被擄監生黃顯燦起出，一并解省聲明：陳亞社一名，雖係黃亞嬌同夥，現經通信引拏，請將功贖罪；勇目李炳坤、區文江二名，捕拏擄匪，最為出力，稟請核辦前來。即經本部堂院賞給李炳坤、區文江六品頂戴，陳亞社准其免罪。旋據廣州府將黃亞嬌等審明，分別擬以斬梟，復經批飭正法在案。此後無論何項人等，如能拏獲擄匪，連被擄之人一并起出者，即照李炳坤等之例，賞給頂戴；其擄匪同夥之人，如能通信引拏者，即照陳亞社之例，准其免罪；地保隣佑、知而不舉，本有應得之罪，如能送信引拏，亦准一體免罪。為此通行曉諭各屬諸色人等知悉。遇有擄人勒贖之事，或通信引拏，或網送到官，定予分別獎勵。本部堂院為除民害起見，故不惜諄諄曉諭，優給賞格，各宜謹遵毋違。特示。

### 香山紳士保留香山協黃國安呈批

查香山協副將黃國安，職膺專城，有查拏盜賊匪徒之責。該縣鄉民鄭姓與雜姓械鬥一案，兩造互相殘害，數月以來，地方大受荼毒。本部堂迭飭該將，嚴行彈壓，妥為解散，並勒拿滋事匪徒解省審辦，以期除暴安良，使閭閻得以綏靖。乃該將委靡不振，坐觀成敗，營伍廢弛，豈尚可問？且聞性耽逸樂，聲名平常，經水師提督翟咨參撤任，留省察看。茲該副貢等聯名違例保留，固屬冒昧妄瀆，而該將貽誤地方，該副貢等豈無所聞？乃匿情懷詐、顛倒是非，聯請保留，豈欲桑梓之邦，日遭糜爛乎？據呈該將防海整飭，不知拿獲海盜多少？若云搯演無懈，本係營將分內

之事。然以近事徵之，此言未必可靠。若云宵深巡夜，匹馬當先，不知巡夜當先，算為何等功效？亦在保留之列耶！若云內地安堵，現在械鬥之案，尚未了結。若云該將會縣親行彈壓，無如兩造未曾罷鬥，該將袖手旁觀，雖去無益。而該副貢等，又以四門設卡，城頭安堵，為該將之功，是即呈內所謂勞績堪徵者耶？該副貢等，諒係居住城內，故爾如此推許，罔顧不經之論，又何必聯名如許之多？雖其中未必人皆盡知，亦有冒砌其名者，而此風斷不可長。紳衿為庶民領袖，風俗所關，自應以公正居懷，不當以鄙劣為務。今所呈者謬論，所保者劣員，是否情囑，抑係賄串，均未可知，何足以資矜式？無怪民情刁悍，習俗不純。此舉匪特與該將無益，且恐有損，該副貢年齒最高，首先列名，親身遞呈，而不知欺飾之詞，何能朦准，無乃老而憤乎？雖砌捏多名，又何益耶？合行申飭，此呈不准。保領附。

### 增城縣詳銷劫案批

此案事主溫耀宗，被盜行劫，拒捕傷人，該前縣張令，並不勘驗通報。據詳因事主延不引勘，致未詳報。揣該縣之意，以為盜案不報，乃事主不引勘之故，諉為自悞，而“引勘”二字，遍查律例，並無此項名目。只有例載地方呈報盜案，州縣官不論遠近，無分風雨，立即會同營汛飛赴事主之家，查驗通報。如不親詣查驗、捏作親詣填報者，革職；諱盜者，革職。又事主報盜，止許到官廳審一次，認贓一次，不許往返拖累，違者將承審官嚴加議處。今溫耀宗係染坊被劫，呈有確鑿住址，並非道路失事，或須事主指認。惟聞外省陋習，事主報盜，官于未勘以前先派供應書役，又索飯錢，以致事主失物之後，又須花費，累上加累，所以視報官為畏途，往往飲恨中止，事所常有。此案事主溫耀宗被劫報縣之後，又復上控，尚非被盜不報。該縣既將此案未經通報之故詳明，則是前縣張令諱盜無疑，例應參辦。該縣接任後，自應通詳捕盜，以期除暴安良，方謂無忝厥職。乃僅迭催事主，又以清釐積案章程，奉為靈符寶錄，而視盜劫重案，轉為爛卷陳言。據詳事主久不赴案，亦未呈催，請銷控案，以為了事。似此存心，何堪謬膺民社？查“原告”二字，專指尋常詞訟而言，若被盜之家，則為事主，被殺之家，則為屍親，安得均以“原告”二字律之？該縣圖銷控案，不得不牽引章程，乃以原告不到為詞，何其不諳例案之甚耶！仰東按察司，即將該縣嚴加申飭，勒限文到一月內，務將贓盜弋獲究辦。倘再泄視，張令既以諱盜于先，該縣又復玩捕于後，定當一併嚴參。近來請銷控案，無論事主、屍親，概以原告不到，紛紛藉口，稟詳銷案，實屬批不勝批。並由司通飭各屬，一體申明禁止，以杜謬悞。仍錄批報明撫部院，並候批示。繳。

### 劄司會議審案章程

為飭議事。照得省垣設立讞局，專審疑難重案。委員結案，較多予以計功給獎。原于慎重刑獄之中，仍寓策勵人才之意，立法未嘗不善，乃日久懈生，實為廢弛，以致積案纍纍，罪犯擁擠囹圄，時有瘵斃；証佐久候質訊，拖累尤多；委員濫邀優獎，僥倖益甚；亟應設法整頓，以挽頹靡之習。查上年十月讞局冊報，舊管人犯五十三名，新收人犯十二名，開除人犯四名，實在人犯六十一名；十一月冊報，舊管人犯六十一名，新收人犯五十六名，開除人犯二十名，實在人犯九十七名；十二月冊報，舊管人犯九十七名，新收人犯三十名，開除人犯三十二名，實在人犯九十五名。案牘愈積愈多，犯証久羈監押，情殊可矜。即以十月冊報開除人犯四名論之，內竊犯二名，遞籍墩禁，良民二名，遞籍保釋；十一月開除二十名，內保釋者十八名，交保候訊者一名，病故者一名；十二月開除人犯三十二名，內盜犯正法者三名，歸案審辦者四名，遞籍鎖墩管束者四名，保釋者十六名，病故者五名，大小委員十餘員之多。每月結案如此，不知所司何事？實深憤懣。

查閱冊報，新收人犯項下，尚有數語註釋；至于舊管人犯項下，一字俱無，竟在不論不議之列矣。聞委員每日午後始行到局，薄暮即散，一日工夫本無幾何，狡黠人犯，每堂熬審，亦止片時，無怪不能審出實情，以致案懸莫結。總由委員意在苟且塞責，于新收人犯解局時，畧加試問，得結就結，冀邀獎叙。迨至人犯茹供不吐，則亦無意再訊，便存規避之心，旁觀者見其難審，亦復不敢過問。積案之多，殆由于此。若遇一案可結，則羣起附名，如盜犯陳亞池等一案，委員列銜，有八員之多。此外一犯兩委員，列銜者不一而足，問官多于罪犯，外省實為希聞。如委員胡秉鈞一員，讞局保其素嫻，例案聽斷本所擅長，結案二十四起，若不予以優獎，無以示鼓勵而昭激勸，請給超委一次。遇有缺出，儘先委署，即經批准在案。茲復細加披閱，摺內所開結案二十四起內，惟劉伯芙一起，尚覺棘手，其餘尋常案件甚多。而劉伯芙一案，前因所審供詞，于原案緊要情節，多未訊及，業已駁飭復審；且此二十四案，均非胡秉鈞一員所審，何以讞局獨歸功于胡秉鈞，為之力請優獎？不知其意何居？殊所不解。所有與胡秉鈞同審之員，將來是否一律請獎？抑或不復重請？凡此冒濫請獎，有違循名責實之道。夫考核公則賢能自勵，獎叙濫則僥倖思逞。何足以示勸懲？徒令相率因循。所有胡秉鈞原獎，由司暫緩註冊。聞該員平日審案尚為得力，應令從此奮勉，以圖後效而遂前功。讞局總辦各員，於積案如此叢脞，尚復不思振作，實心清理，專為委員開委署之捷徑，何其不顧名思義耶！此後承審委員，亦如在京部院正稿、幫稿之義，外省州縣首獲、協獲之分。遇有人犯衆多，一人思慮難周者，指派一員專審，再派一員幫審，不得任意附名；所審案件，總以頭緒紛煩，實在疑難者為斷，不必論其罪名之重輕。專審委員，結一起即紀一起之功，幫審者自作另論。他如尋常命盜案件，則委一員承審，以期責有專司，亦可覘其才識。至于每月冊報，不得仿度支之式，有管收除在之目，致使名實不符，自應分別已結、未結兩項。其已結者，固應詳加註釋；即未結之犯，不論新舊，亦于逐名之下，註明：何日解局、現在訊有何供，或須行提要証，或應飭查案據，均將行查月日，分晰註明，按旬一報，聽候逐旬考察，隨時勒限飭審，以稽委員之勤惰。惟承審委員，嗣後必須常川駐局，即遇堂期，不必赴各衙門稟謁。倘有面回事件，亦可隨時面稟，或由首府及總辦之員稟達。各委員既有承審之責，但當盡心研鞫，精勤聽斷，遇有挺刑匿供之犯，尤須晝夜熬審，以期究得實情，犯無枉縱。本部堂亦不時派員訪察，自能默識賢否，斷不使黑白混淆也。現在人犯淹滯過多，此後天氣日暖，潮濕愈盛，難免蒸染疫癘，定例獄禁罪囚，鎖鈕常須洗滌，薦薦常須鋪置，冬設煖床，夏備涼漿，何等矜恤！現如府監及南、番二縣監獄羈押之所，自應仰體皇仁，一體優加矜恤。粵東卑濕尤甚，更宜多薰藥物，無得坐視痼弊。凡此諄諄告誡，固期慎恤刑獄，以省拖累，亦欲激勵人材，使委員濯磨自新。但恐本部堂識慮不周，或有未盡詳賅之處，合行飭議。札到該司，立即會同藩司查照，札內事理，悉心商酌，參以己意，妥議章程，詳復察核。並將讞局現有委員細加甄核，其聽斷尚可者，仍行留局，以觀後效；其承讞無能者，立即撤委，毋任濫竽。一面留心考察，如有例案熟悉、聽斷才長之員，派令入局充補，以收得人之效果。能用賢黜劣，何愁不知勸知懲？但當一秉大公，勿存半毫私見，不惟刑獄日清，而吏治亦可望有起色。一面分檄廣州府南、番二縣，將監獄羈押之所，認真稽查，加意矜恤；並將如何辦理情形即日通稟、查核，均須見諸實事，勿任徒托空言。切切！此札。

### 劄司會議詞訟章程

為飭遵事。照得粵東民情好訟，控案紛繁，各屬于批發控案及自理詞訟，往往經年累月，延不訊結，以致愈積愈多。一案牽連，數家失業，書差每藉傳審為由，多方嚇詐，証佐多人守候，受累無窮。訟棍從中唆撥，枝節叢生，甚至一案未結而兩造已至破家。其有負屈不甘者，事外尋

畔報復，每至一案化成數案、小案釀成大案，沉案滯獄，百弊皆興。不肖廳州縣，方安坐衙齋，何曾以民命為？言之實堪痛恨。前經設立積案局，委員稽查催辦，近亦徒存虛名，毫無實濟。原定功過章程：“各廳州縣，上控案件如一月內結案六起至九起者，記功一次；十起至十四起者，記功二次；十五起至十八起者，記功三次；十八起以上者，記功四次。所記之功，除抵過外，積功至十次者，候補人員，給予超委一次。實缺人員，給予調署繁缺一次；積功至二十次者，候補人員，給予儘先超委一次，實缺人員，給予儘先調署繁缺一次。上控案件，在三起以上，一月一起未銷者，記大過一次；五起以上，一月銷不及三起者，記大過二次；十起以上，一月銷不及五起者，記大過三次；積過至十次者，摘去頂戴，積過至十五次者，立予撤任，嚴參在案。”茲查記過一道，尚有未盡周賅，即如現任各廳州縣記過而論，記至十過以上，摘去頂戴；其十過以下，不過上下徒行虛文，全無懲戒，殊非循名責實之道。除有功可抵外，其餘現任廳州縣，每記一過，作何酌定章程，不致如前視同無事，稍知儆惕，使功令可以嚴肅。其候補人員，記過亦准有功相抵，倘有餘過，宜如何停委、扣委，亦宜議有明文，方能有勸有懲。即各廳州縣，于每月應行造報已、未結各案，有竟隱匿不報者、有逾期始行造報者，核其情節，隱匿不報，較之按月報明；及逾期造報者，更為藐玩。前議功過章程，于隱匿不報及逾期不報，作何甄核，尚無明文。其各廳州縣，自理詞訟，何一非民命所關？亦當與控案相計並論。至論起計功計過，雖有舊章可循，然各廳州縣有繁簡之不同，詞訟亦有多寡之互異，自應按其審結一半者，功過相抵；一半以上，已結幾起，方准記功；一半以下，未結幾起，自當記過。所記功過，統由藩司註冊，以免參差，亟應由司復核，妥議章程，以昭整飭而挽頹風。合亟札飭，札到該司，即便遵照會同布政司悉心商酌，逐條妥議。如本部堂札內事理，尚有未盡者，亦望參以己見，總期力除積弊，務在訟清民安。酌議畫一周妥章程，詳請通飭，遵辦切速。

### 兩司擬章稟復接入

伏查詞訟，務求速結，而清釐須立章程。從前原定各廳州縣功過，自結案六起至十八起以上者，記功一次至四次不等；積功至十次二十次者，候補人員分別給予超委、及儘先超委，實缺人員，給予調署繁缺、及儘先調署繁缺；未結案件又以三起至十起，所銷止一起、或三起、或不及五起，分別記大過一次至三次不等；積過十次及十五次者，分別摘頂撤參；其十過以下，應如何懲戒，未經議及。誠如憲臺所云，尚有未盡周賅，惟思該員等積過已至九次，加以一過，即應摘頂；再加五過，即應撤參。若使按其過次，先予議罰懲戒，該員等轉因前過，業已議罰，明知以後不致重科，視同無事。設遇下次再應記過，未便將已經議罰之過併計，摘頂撤參，辦理不無窒礙。本司等再三商議，擬請將記過已至五次、不至摘頂參辦各員，即由本管道府委員，前赴該廳州縣坐催，如一月內銷不及半，不准委員銷差，則委員自知實力催辦。各該廳州縣，一奉委催，不必罰而罰在其中，自不敢以記過為具文矣。又現奉憲臺割開，各廳州縣有繁簡之不同，詞訟有多寡之互異，按其審結一半以上，就已結起數記功；一半以下，就未結起數記過。如割內事理尚有未盡者，亦參以己見，總期力除積弊，訟清民安等因。仰見憲臺虛懷若谷，一秉大公之至意，本司等伏查郭前臬司，詳定舊章。內如控案三起以上，每一月一起未銷者，記大過一次；細繹以上二字，專指四起而言，又五起至九起，一月銷不及三起者，記大過二次；則是五起內銷至二起，尚應記過二次；較之四起內詳銷一起，即可免議者，輕重已屬失當；又十起以上，一月銷不及五起者，記大過三次；則是十起內詳銷四起，與五起內詳銷二起，毫無區別，乃一則記過二次，一則記過三次。參觀互證，尤屬不得其平。若不論控案之新舊，及起數之多寡，審結詳銷，至一半

以上即准記功一次；不及一半者，即記大過一次。洵屬至公至允，至各廳州縣，於此次詳定章程，奉文行知之後，理應查明控案若干起，於冊內逐一造入，按月呈繳。倘敢規避記過，隱匿不報，即屬有意抗違，自未便稍事姑容，必須隨時從嚴查辦，以杜流弊。又查近來奉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催辦未結之案，事關中外交涉，較之尋常上控詞訟，尤為緊要。似應飭令趕緊審結詳復，酌予獎勵，他如各廳州縣自理詞訟，例限二十日完結。應請申明定例，由該管巡道督催，以免日久懸宕，拖累無辜。其有上控命盜各案，混請詳銷者，自應查明是否已奉批銷，分別已結、未結，核實辦理。本司等會同悉心核議，謹就管見所及，參以舊章，量為變通，酌擬條款八則，理合另列清摺，呈候憲臺察核是否可行。伏乞俯賜批示。祇遵。摺開：

一、前奉憲臺劄開：每月冊報案件，不得仿度支之式，有管收除在之目，致使名實不符等因。應請嗣後各廳州縣，上控案件以前任未結舊案為一項；以按月審結舊案詳銷者，作為已結舊案一項；以本任內未結新舊為一項；以按月審結新案詳銷者，作為已結新案一項；分作四項造報。不論新案、舊案，務令於每一案之首，將何年月日、奉文緣由，詳細敘明，以清眉目。已結者詳加註釋，未結者亦將現在作何辦理情形分晰註明，以備查核。

一、前任未結上控舊案，不論年分久暫，但係接准前任移交者，俱歸入舊案項下。其本任內未結上控新案，凡前任移交舊案，在本任內始行上控者，即作為本任新案，不得歸入前任舊案之內。應請嗣後各廳州縣，詳銷上控案件，不論新案、舊案，籠統併計，總以審結。詳奉批銷至一半為度，如詳銷數已及半，或在一半以上者，不論起數多寡，概准記功一次；不及一半者，亦不論起數多寡，概記大過一次；積功至十次者，候補人員，給予超委一次，實缺人員，給予調署繁缺一次；積功至二十次者，候補人員，給予儘先超委一次，實缺人員，給予儘先調署繁缺一次；積過至十次者，摘去頂戴；積過至十五次者，立予撤任嚴參。以上詳銷控案起數，總以銷至及半過半為度，如一二起已銷一起，或三四起已銷二起之類，方准記功一次。若銷不及半過半者，如一二起未銷一起，或三四起止銷一起之類，即計大過一次。所記功過，統由本藩司註冊，以免參差。

一、現任各廳州縣，實缺候補。各縣積至九過或十四過者，應請俟下月冊報。如能自知愧奮，銷案較多，有功准其抵銷。倘仍不知振作，銷不足數，仍應記過者，則已積至十過及十五過，立即分別摘頂撤參。其記過已至五次，不至摘頂參辦各員，即由本管道府委員前赴該廳州縣坐催。如一月內銷不及半，不准委員銷差，則自知實力催辦。各該廳州縣，一奉委催，自不敢以記過為具文，而知所做戒矣。

一、各廳州縣，無論新舊上控案件，如有上月遺漏未報，或隨時查出補報，或至下月始行造報者，應請分別辦理。假如實有控案四起，先經報作三起，詳銷一起，業已記過，隨據自行查出補報，與功過無關出入者，只就其漏報控案，記大過一次。假如實有控案五起，先經報作三四起，詳銷二起，業已記功一次，隨據自行查出補報者，將原記之功註銷，仍照銷不及半，補記大過一次，再照漏報控案，記大過一次。均由本藩司核冊，歸入詞訟功過案內，按次併計。其有心隱匿不報者，自應查明是否命盜重情，或係雜案及戶婚、田土事件，核其情節輕重，分別撤參辦理。

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催辦未結之案。檢查奉行原冊內，惟廣、惠、肇羅、南韶、高雷、潮嘉等府州所屬各縣有之，亦惟廣屬之南、番、東三縣，及潮屬之澄海，每縣有三四起至五六起不等；其餘十餘縣，每縣不過一二起而止。如能於一月內全數審結詳復者，應請准其記功一次；若一時難以審結，將現在如何辦理情形，先行稟報者，亦請免其記過。並飭各該員將已結、未結各案，按月另行摺呈核，不得彙入上控詞訟冊內，以便稽查。

一、定例州縣自理戶婚、田土等項案件，限二十日完結。仍設立號簿，開明已結、未結緣由，令該管府州，按月提取號簿，查核督催。該巡道將未結之案彙開一單，移知兩司，申詳督撫查核等語，定例本極周密，惟不實力嚴催，每致日久懸宕，拖累無辜，且自理不能速結，勢必上控求伸。如欲控案之逐漸清釐，當察自理之有無壓攔，應請申明定例，飭令設立號簿，按限申報，仍由該管巡道督催，查明未結起數，列冊通稟兩院憲察核，一面移知藩□□□□核辦理。

一、各廳州縣於上控命盜案件。業已獲犯，審明詳辨其被控之人，實係懷疑牽控，並非有心誣告，應准其將控案註銷。如未經獲犯審辦，亦未勘驗，詳報開參，率請審屬虛誣，或不將誣告之人，照例反坐；或照尋常詞訟事件，原告半年不到，舊章詳銷。業經駁飭另行審辦者，仍作未結控案論，不得列入已銷案件之內，致滋淆混。

一、命盜案件，均有例定，展參處分。近來各州縣，往往將上控之案，率請詳銷，且牽引原告兩月不到，准其註銷例文，大屬朦混。查定例原告兩月不到，應將被告釋放，即治原告以誣告之罪，所以息誣告而安良善也。若命案則謂之屍親，盜案則謂之事主，豈尋常詞訟原、被告可比？應請嗣後如再有牽混詳銷，除批駁外，即記該州縣大過一次。若訊明原控失實，聽由訟棍誣捏、添砌虛詞，除准其銷案外，仍勒令交出訟棍究辦，并治控告者以誣告之罪。不得僅以“到案首明”與“始終誣執者有間”等語為之開脫，自甘模稜，違者撤參。

#### 廣東全省水、陸各標鎮協營寨大小共一百營內

陸路各標鎮協營，共六十五營：

督標中左右前後五營

撫標左右二營

提標中左右前後五營

廣州協左右二營

三水營

永靖營

惠州協左右二營

和平營

永安營

連平營

肇慶協左右二營

四會營

那扶營

陽春營

增城營左右二營

南韶連鎮中左右三營

佛岡營

綏遙營

南雄協

三江協左右二營

連陽營

清遠營左右二營

高州鎮左右二營  
 化石營  
 羅定協左右二營  
 廉州營  
 欽州營  
 雷州營左右二營  
 徐聞營  
 瓊州鎮左右二營  
 儋州營  
 萬州營  
 崖州營  
 潮州鎮中左右三營  
 城守營  
 黃岡協左右二營  
 平鎮營  
 饒平營  
 潮陽營  
 惠來營  
 興甯營。

外海水師各標鎮協營寨，共二十七營：

提標中左右三營前後列內河  
 香山協左右二營  
 大鵬協左右二營  
 碣石鎮中左右三營  
 平海營  
 南澳鎮右營左轄閩省  
 澄海營左右二營  
 達濠營  
 海門營  
 陽江鎮左右二營  
 赤溪協  
 廣海寨  
 吳川營  
 碭州營  
 東山營  
 瓊州鎮轄屬  
 龍門協左右二營  
 海口營  
 海安營

崖州協  
儋州營

內河水師各標協營，共八營：

督標肇慶水師營

提標前後二營

順德協左右二營

新會營左右二營

前山營

### 新甯縣稟查無土匪勾結主使等批

據稟，周副將所開新甯土匪之黃榮熙，係丁憂工部主事回籍守制。李維屏、趙樹蕃二名係舉人，趙錦芳、李有章二名係生員，均在局辦事。即陳賢啟等諸人，亦係安分良民。所有周副將前稟該縣土匪勾結各情，應否免予置議之處，仰東軍需總局，會同布按二司核議詳奪。至另單請飭周副將于所招兵丁，務須選募別處人民，勿使客民應募等語。查招募土民，於客民不便，招募客民，而土民亦不相安。自應責成周副將體察情形，于土民所居汛地就近招募土民，而客民所居汛地就近招募客民，庶幾各得其宜。但國家建設營制，固當因時制宜，體察輿情，尤在地方官善為化導，教民成俗，使閭里恬熙，永無土客之分，民氣緩和，方副良有司之職。若不顧大局，議論偏徇，作局外觀，又安用此地方官為耶？該局移會周副將，並鄒令妥為遵辦。仍候撫部院批示。繳。

### 讞局稟訊黃東有係良民請釋批

查黃東有一犯，前據順德協黃副將獲解來省，發局審辦其原送供摺。黃東有在廣西疊犯劫拐各案，隔省移查，固須時日。其上年九月，夥同朱亞五，在南甯拐得女子一口，及亞灶交來女子一口，名亞好，一同帶至省城米婆處，發賣其拐來女子，已賣得銀九十七元。其亞好現在米婆處，未賣等供。自應查傳米婆並亞好質訊，以杜狡避。此等人犯，初解到局，易得實情，及羈押既久，串供隱情，俱所難免。況該犯係於上年十二月間解局，非戴守任內之事，其時讞局審案，大抵審問不得實情，即予遞籍保釋，纍纍皆是。如果誣拏良民，自應議罰原拏之員弁；倘所審未得實情，率予保釋，亦不足以服原拏員弁之心。且恐緝捕員弁，聞而生懈，殊有關繫。戴守係接審之員，無所用其迴護。仰東按察司即飭戴守會督讞局委員，查照原供，提証質訊，明確錄供，稟覆核奪。仍候撫部院批示。繳。

### 清遠縣詳林李氏上控案請銷批

查已死黃勝怡，經該前縣驗明不致命。右肋棍傷，紅腫；右肱肘一傷，骨斷，青黑色；上下牙齒、唇吻、指甲、趾甲俱青黑色；咽喉穀道，用銀釵探試，俱青黑色，洗擦不去。謂係被毆後服毒自盡。惟見証曾社樹及隣佑人等，均稱黃勝怡于爭毆後服毒自盡，並無骨折重傷。並據貢生朱永達等，聯名結保林成昌實無毆斃黃勝怡，及致傷骨折情事。如果屬實，該前縣何以原驗右肱肘一傷已經骨斷？且傷至骨斷，足以戕生，何必再行服毒？即云服毒，究竟所服何毒，如何服食，有無餘剩毒物？覆核原驗情形，其屍身臉面、唇口、周身是何顏色？口、眼、耳、鼻、小便糞門等處，有無血出？均未據聲明。而穀道亦不脹突，核與服毒情形亦不相符。究死於傷抑死於毒？

毫無切實供証。屍親于何年月日報案？黃勝怡于何日身死？全案皆未聲敘，案情疑竇甚多。該前縣相驗後，並不照例詳報，忽將林亞谷照他物傷人例折責發落，又不敘詳候批，實屬不諳政體。該署縣到任後，亦不傳集覆訊，竟以案經前縣訊明斷結。被告林亞谷，先已照例折責，兩造久未控訴，率請將案註銷。各前縣辦理此案，固屬顛預，該署縣依樣葫蘆，率請銷案，尤屬荒謬。仰東按察司，即將該署縣鄭，令先記大過一次，移會藩司註冊，以為玩率命案者戒。一面飭令廣州府委員前往，會同接署縣卓令，究明致死根由，澈底研訊，錄取切供，分別議擬詳報，毋再顛預干咎。并錄批報明撫部院查核，並候批示。此繳。

### 歸善縣稟鍾亞貴命案批

據稟已悉。查鍾亞貴與劉黃氏，既經訊無奸情，乃黃亞勝等因鍾亞貴頗有積蓄，起意闖禁嚇詐，何容鍾亞貴執刀自戕？明係嚇詐不滿所欲，用刀殺斃，事後埋屍滅跡，顯而易見。況鍾亞貴所帶牛價銀兩，曾否已被勒去，並未訊明，亦屬疎漏。而細核自戕情形，既已戕傷喊痛，何又執刀不放？情形殊欠確實，案情疑竇尚多，該縣等原審太覺含糊，應即覆加確究。仰東按察司，速飭提集屍親犯証，遵照指飭，澈底根究，務得實情。錄取切供，將訊驗情形，填具格結，通詳察核，毋得稍有不實、不盡。一面選差懸賞，關移隣封營縣，上緊嚴緝逸犯黃亞勝等，務獲併究，均毋諱飾延縱，致干嚴參，仍候撫部院批示。繳。

### 博羅縣稟曾瓊華控案批

此案前據監生曾瓊華，以“汛弁羅向華，于劉伯傳被劉徐福擄捉，不敢嚴捕，反向該生索費，勒寫限單，並誣曾成瑞等拒捕窩匪”等情，赴轅具控，如果屬實，法在必究。茲據稟查明：劉伯傳被擄，汛兵吊放不出，時有曾姓數人環觀擁擠。又因曾成瑞曾誤保劉徐福，該弁羅向華遂疑有幫同拒捕，移縣拘訊。事出有因，曾瓊華係押令完糧，續已放回。所控勒寫限單，係該監生一時未能交匪，具狀求限。其嚇詐銀兩，查無確據，請毋庸議。曾成瑞等，濫保匪類，咎無可辭。劉徐福現已遠逃，一時難獲，情願罰銀八百元為修城工費。劉伯傳經曾瓊華等贖出，給屬領回，請將控案註銷等語。控關汛弁誣良，藉端索詐，虛實均應澈究。既未提案訊明，率以查無確據請免置議，已非核實。況劉徐福現犯擄捉勒贖得贓，情罪重大；曾成瑞等雖于劉徐福初犯鼠竊之時曾經濫保，今已事隔多年，豈得復行牽扯，而為汛弁羅向華曲開狡卸之端乎？且曾瓊華業已來轅呈明，該縣自應按例訊辦，何故罰其捐修城工，而不根究汛弁以誣良藉端索詐之罪？率請註銷控案，辦理殊屬糊塗。仰東按察司速飭惠州府，立提汛弁羅向華及應訊人証到郡，研審如何誣良、藉端索詐、勒寫限單，曾否得贓，據實詳辦。此等劣弁，不必姑容，如果狡展，即行詳請革究。一面督飭縣營嚴密緝拏逸犯劉徐福，務獲究辦，毋稍輕縱。並候禮營將汛弁羅向華撤任質訊。此繳。

### 東莞縣稟韋金生命案批

命案與盜案處分不同，劫殺與鬥殺罪名亦異，該縣謂韋潤連等代為冒遞呈詞，是劫是聞，厥罪維均。是何言歟？又據稟，韋金生死後，韋學賢索銀不遂，即聽湛湘主唆，捏控盜劫。如果屬實，何以韋學賢在縣先報劫而後報聞，並不先報聞而後報劫？稟詞自相矛盾，總由諱劫情殷，不暇思慮耳！俞令現應卸事。仰東按察司速飭新任東莞縣葉令，細查韋金生被殺實情，究死於聞，抑死於劫？通稟察核，毋得代為諱飾，同干參咎。一面比差懸賞勒拘韋潤連等務獲，並催傳韋學賢等，暨移增城縣提解唆訟之生員湛湘到案，集訊明確，分別究擬詳辦。仍俟委員恩倅覆查情形與現稟有無捏飾，另行分別飭遵。暨候撫部院批示。繳。

## 南海縣稟繳駁回金潤命案詳冊批

此案旂人金潤，被南海縣差役吳陞、劉亞連等刀銃致傷，身死。于同治七年正月十三日，准署廣州將軍慶咨會，即經轉飭緝兇、驗訊、通詳。旋於二月初日，據理事同知福丞會同該署縣，將驗明生死各傷大概情形稟報前來。其後疊准將軍咨催，以吳陞、劉亞連均係在官人役，不難提案，節經嚴禮催緝十四次，並經委員守提。迄今年餘，兇未獲，並無隻字稟詳，不可謂非胆玩也！本年五月十二日，據該署縣會同理事同知福丞，將此案驗訊情由，填格通詳。查閱詳尾，係填同治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詳，係屬倒填年月，核與定例不符。僅將原詳駁回另換，並不嚴加申飭，未始非從寬貸也。茲於五月二十三日，該署縣復將原詳送呈，並據附稟聲稱：本案係會同福丞相驗，若將詳冊另換現在出文日期，則應填現任理事同知長丞銜名。長丞並未會同相驗，似難會銜填格出詳。福丞卸事已久，又難填現在出文日期，擬請准免另換，仍將前詳格結稟繳，察核批示等語。本部堂查該署縣承審命案，例有定限，何以事越年餘，甫經通詳？遲延之咎，本屬自取。乃謂福丞卸事已久，倒填上年二月間出詳日期。查此項詳文，日期雖已倒填，而出詳係自近日，究在福丞卸事之後，不知該署縣如何會行？憑何會印？令人無可思度。本部堂若准該署縣之請，倒填收文日期，則與現在收文及迭次催禮種種不符；若標現在收文日期，則此詳因何壓擱年餘？誰任其咎？且准收詳文以後，自應批辦，如批行仍按倒填年月，必與原案處處不同。若按現行日期批發，則遲延之咎，本部堂當為該署縣代任也。揆之情理，豈有如此辦法！士大夫居官，公過不能免，私罪不可有。查定例，官員承審命盜等案，務須立時緝捕，速為審理，倘有怠於聽斷，延案不結，及至限期已逾，懼干參處，因而挪改月日者，照規避例革職。又，內外衙門案件，有挪移年月等弊，該管官知情用印者革職，俱私罪。至承審遲延處分，按例均係公罪。今該署縣奈何舍承審遲延處分，而甘蹈規避溺職之條乎！是雖有心取巧，其實未諳政體。復以原詳上瀆，尤屬肆無忌憚！此等違例妄為之員，即予以特參，亦未為過！今再發回原詳格結，姑期該署縣改過自新。仰東按察司即將發去原詳格結，轉發該署縣查收，另行照例詳辦。現在各屬倒填年月、抽換原詳之案，不一而足，雖經遇案駁飭，實屬不勝其煩。該司即會同布政司、鹽運司通飭各屬，一體嚴行禁止！違者照例揭參，以肅功令。並錄批報明撫部院，暨候批示。繳。

## 劉香山縣將鄭應元等解辦

為飭遵事，據香山縣職員郭作佐遣抱赴轅，呈稱：“切職等十八鄉興建翼賢義祠，被豪惡鄭應元等欺凌捏阻云云，切赴。”等情到本部堂。據此，當批查粘呈開列被焚被殺人數姓名，閱之深為憫惻。香山縣、協職司何事？任令兩造慘殺多命，坐觀成敗，忝膺民牧，苟具天良，捫心何以目安？言之實不勝憤懣！先經飭提兩造匪首，迄今尚未據解省查。鄭應元、陳亦昌實為此案罪首禍魁，雖寸磔亦不足以蔽辜！仰東按察司飛札香山縣，將首犯鄭應元、陳亦昌即日解省審辦。倘再遲延，即將周令揭請撤革留緝。並候選札飭遵、粘抄並發等因。揭示并將呈詞印發東臬司外，合就飛札飭遵。札到該縣，先行摘去頂戴，即將首犯鄭應元拏獲，連陳亦昌同其餘犯証，限文到日，立刻解省審辦。如鄭應元不能就獲，即將其眷屬解省監追。一面嚴飭兩造解開止爭，勒令網送匪徒，呈繳炮械，使良民得安生業。此案自數月以來，殘殺不已，始由該縣因循醞釀，迨經激成械鬥。又屬怯懦無能，現在慘殺人命如許之多，該縣身膺民社，目覩情形，試問何以自安？亦何以謝百姓？亦何以對朝廷？若恬不知恥，仍復手旁觀，非特客匪日聚日多，為害胡底，該縣何能當此重咎？即如現釀重案，尚復不知愧奮，趕緊了結，使地方日益糜爛。本部堂惟有將該縣參革留緝，以為貽誤地方、慘害民命者戒。慎毋以身試法。勿謂言之不預也。凜遵，切速。

### 林岐山誣拏釀命一案

查閱全案情節，該革弁林岐山管帶師船出洋巡緝，被洋匪追逐，駛逃進口，向凌水縣朱令借銀二百兩，未允，含怒而出，逼令新義順船戶袁福利隨伊出洋打仗。其意必有所圖。何以承官未將此節究訊明確？及袁福利答以船小人寡、又無槍炮，不肯允從，該革弁因此挾恨。俟袁福利商船駛至楊梅港邊，開船追趕，槍炮齊施，袁福利驚慌帶同水手眷屬梟水上岸，村人陳德輝等疑為洋匪，銃傷水手黃亞勝、幼孩袁亞保二命。該革弁尚欲將袁福利等帶回。是該弁挾恨施放槍炮，轟擊袁福利商船，以致袁福利眷屬、水手狼躑梟水奔逃，又被陳德輝等銃斃，一家二命。似此懷嫌，逞兇殘害，釀成一家二命重案，尚得謂之疑賊誤拏乎？業經毛前部堂奏參革職拏問，自應照例治罪，以昭炯戒。現在陳德輝等俱未就獲，人命一無抵償，幼孩袁亞保是否袁福利之子，亦無一言訊及。案懸五載，袁福利屢次提質，拖累可知。乃以袁福利自認初報失實，附會其詞，曲為該革弁開脫，僅照溺職例革職完結，置誣拏釀命重情于不問，是誠何心耶？生者倖免，死者含冤。袁福利初以屈情控訴，繼又拖累數載，亦屬苦中又苦，冤上加冤。承審官不能確訊供情，明刑執法，亦不顧案情扭捏支離，率請定讞，曲縱兇徒，不知是何意見？案關奏達，如此供情，何能率轉？仰即移飭雷瓊道府遵照指駁，再提該革弁切實研鞠，另錄確供，按擬解勘，毋任縱延。此繳。

### 劄局覆審拐賣猪仔一案

為劄飭覆審事。案查前據陽江營都司梁禹甸，獲解拐犯張亞良等二十四名，係質猪仔關亞芳等三名，人數簿一本，即經飭發讞局審辦。旋據該局以提訊張亞良等，僅止供認前往覓工，或係探親，並無拐賣猪仔情事，稟請保釋等情。本部堂查梁禹甸拏獲張亞良等之時，交海陵司巡檢，訊供鑿鑿。茲據訊，或探親，或覓工，豈有三百餘人同往探親覓工之理？所稟恐有未確，飭令梁禹甸並海陵司巡檢查明稟覆去後。現據該局以張亞良等實係探親覓工，新洲地方實有華人在彼貿易。伏讀憲諭，以讞局羈犯有九十餘名，皆由委員等不能審理，以致拖累，特命卑府等認真清釐。茲伍華源等均係無辜，若待梁禹甸稟覆，有稽時日，且該都司係原拏之員，設有迴護，冤更難白。可否先行開釋等情，具稟請示前來。正在核辦間，同日又據梁禹甸稟覆，去臘二十二日，船至開坡洋面，見有海波船內滿載多人，形跡可疑；並據恬波火船各洋人，聲稱邇來常有華船載猪仔，至新洲轉過洋船，前赴美國售賣等語。都司駛赴查看，而該船喊救聲喧，是以將該船連人拘交海陵司巡檢鍾國慶訊。據關亞芳等供，被張亞良拐作猪仔售賣，並指出猪仔頭二十四名。質訊張亞良等供認，陸續誘拐猪仔三百餘人，帶往新洲售賣，姓名悉記簿內。梅耀觀等亦認包載出洋，得價均分。即將張亞良等二十四名解省，關亞芳等三名備質，其餘被拐多人就近遣散。又據聲明前解簿內，並無貨物開載，祇登拐帶猪仔姓名，且內有一款註明：如到新洲，估銀多少，三份均分；內船主屬一分，帶者屬二分，開載甚明，彰彰可考等情。本部堂細核通案情節，張亞良與關亞芳不過素識，既云關亞芳窮苦，自願前往覓工，其赴新洲船價，是否關亞芳自備？抑係張亞良代給？而吳亞裕、洪亞換均託張亞良照應，果無拐賣猪仔情事，何以梁禹甸往看，即尔喊救聲喧？若無迫切之情，斷不至此。據訊因關亞芳等後到，坐在艙底，追悔誣供，而張亞良本與關亞芳等同伴，何以張亞良獨在艙面？既經挈帶同行，那得相待若尔？當梁禹甸查詢，眾人何以僉指張亞良等二十四名為猪仔頭目？現據訊明，此二十四名皆係慣往新洲之人，並無初往者一人在內。拐賣猪仔原係積慣之人所能為，况梁禹甸當時遣散有二百餘人之多，果皆探親覓工，均有切己之事，孰肯自願遣散？且船內裝人而不裝口，又將關亞芳等姓名登記簿籍，如謂搭船攬載，何用開取姓名？

現據梁禹甸稟稱，簿內尚有一款，註明：如到新洲，估銀多少，三份均分，船主屬一分，帶者屬二分。此非拐賣豬仔之實據乎？該局兩次具稟請釋，而此款並無一字稟及，不知其意何居。但云“若待梁禹甸稟覆，有稽時日”，又云“該都司係原拏之員，設有廻護，冤更難白”。不思讞獄何厭精詳，但不當置之高閣耳。若梁禹甸原拏有誤，自不得再有異議，設使承讞不實，何能禁人不稟？以此觀之，該局何畏梁禹甸之具稟也，其中必有別故。即張亞良等供述新洲風土娓娓可聽，該局亦附會其詞，深謂可信，而恬波火船各洋人僉云“載運豬仔到新洲轉過洋船”“前往美國佳賣”之語，其言不為無因。該局僅聽一面之詞，未經究及，亦所不解。此等人犯一經到案，便加研究，自可立得真情。乃延之又久，串供尤所不免。本部堂前因讞局委員審案懈弛，即如上年十月分冊報，僅止訊結竊犯二名，遞籍保釋二名，故特下札整飭，所以重民命而恤刑獄也！不意該守等反因此藉口，謂有“清釐之文”，遂爾如此辦理。若無清釐之文，豈更玩愒從事乎？各屬疑難案件、命盜要犯，方交讞局，責任綦重，該守等均為讞局總辦，當思恪盡職守，不得因有清釐之文，即可不分皂白，或遞籍訊辦，或稟請保釋。近日似此稟牘頗多，以此謂之清釐，實未之聞也。是本部堂所以整飭讞局者，轉為讞局開一草率之端。延玩之習未除，縱漏之弊更甚，將用何法以治之耶？緝捕委員查拏匪徒，甚是不易，解局之後並不虛衷推鞠，紛紛請釋，日後緝捕如何整飭，尤為可慮。總之，此案現訊供情，種種扭捏，難容開脫。况簿籍有據，活口尚多，必應水落石出，以期無枉無縱。特委候補縣胡秉鈞、達桑阿、張璿再行切實研審，如敢再蹈覆轍，定當親提審辦。合亟飭遵云云。

### 袁泳錫互訐高景賢

查袁泳錫剿辦會匪一案。原詳張左隴設立紅、黃、白三教，自號偽東山王，以黃金元、黃榮勝為左、右元帥。經在事員弁紳勇或臨陣擒捉巨寇，或設法搜捕餘匪，故意張大其詞，以為冒獎地步。今被高景賢稟訐，查明拏獲二十六犯，格殺二犯。內正法十四犯，傷斃二犯。其餘或因病保調，或未訊有確供。不過尋常捕匪之案，其原詳誕妄，不攻自破。最可異者，不識姓名人亦格殺在內。在格閱之時，或無暇問姓名，迨各犯就獲，自有活口可訊。乃既不訊明姓名，亦不知其是否同黨，而遽加以戮屍之慘，如何可登公牘？高景賢以佐雜擅受，降一級調用；刑訊未致死，降三級調用；均私罪。若照原擬弓役得贓，是袁泳錫所訐得實，而高景賢劣跡太多，恐革職猶不足以蔽辜。況門丁是何姓名，既未到案，亦未訊及，即弓役亦未解省。似此憑空結撰，成何讞法？又如南韶連道補揭一層，袁泳錫之諱盜，由高景賢稟訐訊明而知，如何尚可補揭？豈不欲蓋彌彰？

### 麥欽等控張寶銘等一案批

查該生麥欽等前在安良局並本部堂衙門，先後指控張寶銘、陳疇、葉林保、黃觀南、黃湘、謝際熙等六名主謀。糾匪李佳兩次奪犯，謝亞水、林桂高、羅乙四、賴鴻俊等四名主謀窩匪築寨；張國勳、劉章秀等二名主謀，助資羅黃福、曾桂祥、林桂清、楊開彬等四名領資簿首，謝天仙資助糧械。如果該生等所告得實，則被控之大名，罪皆駢首。茲據鄭鎮等查明，張寶銘、李佳、謝際熙三名，俱為釀禍之人。陳疇徙居花縣，向無潛回；葉林保、黃湘、張國勳、謝亞水、賴鴻俊等五名，或以老耄居鄉，或在家教讀，均非兇惡之流；黃觀南即黃錦芳，劉章秀即劉漸鴻等，在省貿易，久歷年所，採訪輿論，黃觀南等均屬公正，邀令回高，在局辦事，擒解匪徒多名；羅黃福、謝天仙（即謝天生），亦在省貿易；林桂高、楊開彬徙居清遠，向無踪跡；羅乙四、曾桂祥、林桂清等三名由雙都流寓各堡，向無滋事。是該生等指控十八人為匪重情，現在查明，僅止三人得實，其十五人均屬誣告。按誣告人死罪未決，照律反坐。該生等罪應遠戍客匪勾結滋事，迭經

鄭鎮督兵擒斬數百名，其餘爭相逃命。孽由自作，本無足惜！即雙都客民，本部堂明知其不在滋事之列，祇以宿隙未除，慮有後患，亦准一律遣散。續據現署鶴山縣稟，有公正紳士保留應否准其免遣，本部堂慮患甚深，仍飭一體遣散。亦憐其流離失業，故不論老幼男婦，概給川費及抵安插之所，再給耕種之資。所以為地方生民計者，亦屬無微不至。揆諸“普天率土”之義，土、客均是朝廷赤子，本部堂惟有一視同仁，欲使各得其所。土民如果平心相處，無嫉害之心，無覬覦之念，何致客民不能安居，仇衅相尋？若謂客民皆非善類，而土居亦豈盡屬良民乎？該生等毫無公道之心，惟欲客民盡置死地。即如張寶銘一名，業已解省審辦，該生等乃請早日正法，下井投石，居心太薄！此等稔惡匪徒，既經獲案，自應審明懲辦，亦豈由該生等所得瀆請？實屬藐玩太甚！然則該生等誣告多人，干犯法紀，亦不當按律究辦乎？本部堂最惡凌囂之習，尤疾惡薄之風！故於法外施仁，仍寓教化之意。將該生等誣告之案特立一冊，詳註姓名、事由，存諸檔案，如果該生等從此敦品勵行，革薄從忠，改過自新，原可不咎既往；倘若怙惡不悛，干預公事，仍有妄告，一經發覺，二罪俱發，從重治罪。該生等其凜遵自惕，慎勿以身試法。自干重罪，以致噬臍莫及。並候行司分飭知照。粘單附。

### 劄發方鎮條教

為指授機宜事案，查前委：該鎮統帶弁兵馳赴潮屬，會督地方文武，清理械聞，抗糧積案，業已會札飭遵。該鎮受札以後，自必悉心籌畫，求其當理者而行之。本部院于此舉辦案，亦屬其難其慎。茲復細加參酌，擬有條教四則，發給查閱，該鎮可藏諸行篋，身體而力行之，不特與公事有裨，亦為該鎮立身之助。開列事宜於左：

一、軍行宜申明紀律也。查號令不嚴，則軍心不肅；約束不明，則聲威不振。該鎮行軍於梓鄉，士卒稍有騷擾，衆人必歸咎於該鎮。辦事之始，此著最為要緊，若即藉人以口實，則此後一事不可為，衆怨有所歸矣。

一、局紳宜聯絡和衷也。該鎮生長潮郡，紳耆孰賢孰否，自必稔知。如局中延邀皆公正之人，則是非自然清白；倘有匪紳濫列其中，意在庇其黨類，則黑白必有倒置。此事大有關繫，該鎮與公正者，固宜和衷共濟；不肖者，密囑地方官驅之。倘係犯法匪徒，即就地辦之。總宜不露痕跡，免得招怨，更宜妥籌熟商，于事有濟。紳耆為一鄉之領袖，苟得公正可靠之人，譬如提綱挈領，諸事皆有頭緒，但期公事妥速完竣，何必定煩兵力？諒該鎮斷無喜事邀功之念也。

一、勇丁不宜添募也。現在查辦匪鄉，非比徵剿逆賊。先宜申之以教令，如果不服，然後怵之以兵威。所謂不得已而用之。練兵平日粗知紀律，尚易約束；如倉卒添募勇丁，若輩獷悍性成，惟利是圖，明知事畢即撤，安能禁其擄掠？人數衆多，誅不勝誅，又恐官兵混雜，効尤，是除害安良之謂何？大與初意刺謬矣！既有各局紳耆為耳目，輔助辦理，不致棘手。即一二匪鄉公然抗拒，該鎮相機進紮，勒令交匪，如敢拒敵，乃用巨炮以轟之，毀為平地。始終不可使官兵進鄉，使人言有所指摘，該鎮亦無以自解矣。諒毀平一二鄉之後，軍威大振，餘可望風自服。前札添募勇丁一節，姑且備而不用，先壯聲勢可耳。

一、遇事宜深思熟慮也。該鎮身荷重委，統率戎師，旛旄導前，士卒擁後，體制何等尊顯！古人衣錦之榮，殆不及此！然以本地之人辦本地之事，不但衅隙易啟，且恐怨尤叢積。即秉公無私，猶慮難免，宜時時凜畏，刻刻戒慎，如臨深淵，如履薄水。馭軍宜嚴，而接紳耆、地方文武宜和。若能同心相助，他人之功即該鎮之功，何必稍分彼我？事畢功竣，論功行賞，該鎮定邀朝廷之懋獎，且留鄉黨之芳名，此為全美。倘或妄自尊大，不洽衆心，或辦理不善，別釀事端，亦恐為該鎮日後之禍。本部堂院誼切同舟，志在共濟，故不惜諄諄誠勉。務望凜體力行，以副委用

而奏全功，是所切盼。

### 稟中堂

敬稟者：頃奉面諭。粵省勇糧開報雖多，總局按成裁減亦鉅等因。伏思浮銷勇糧，各省皆然，而積猾營弁，預為地步，雖竭力核減，總恐不敵其浮。是在調度之際，不予以浮銷之端，尚可正本清源。如方耀現在剿辦匪鄉，不分匪勢強弱，一遇抗拒便准募勇，則該鎮所帶三千練兵，歸為何用？且募而撤、撤而又募，縱潮郡情形不同，亦恐該鎮恃勇不恃兵，統帥節制諸將，要當就我範圍、聽我驅策。今方鎮接奉此劄，恐啟圖利之心，轉惰鼓勇之志。且所募本係烏合之衆，情見一鄉攻畢，即要撤遣，其擄掠姦淫，亦何所忌憚！兵法有先聲而後實者，此時不得已而剿匪鄉，當紀律整肅，秋毫無犯，除暴安良，令行禁止，使別鄉聞風知畏知感，自可少煩兵力，易奏全功。明知成事不說，然仰沐師恩，公事既有不妥，不敢不盡其愚。茲飭房另謄一稿，量為更改，並又擬《致李中丞信》稿，送呈鈞核。謹稟。

### 每年額徵鹽課餉

廣東、廣西各府州縣，及江西、南贛、甯郡、湖南、郴桂、福建、汀州府所屬州縣，并貴州、黎平、古州各埠，額徵課餉銀：六十三萬九千三百四十一兩四錢六分四釐。內潮橋各埠，額徵引餉銀：十二萬六千四百十四兩八錢五分四釐。

鹽務雜款名目：

加平部飯  
 飯食充公  
 硃引奏  
 嬰鹽羨  
 罰贖  
 添平

四款頭係幫辦奏銷懸餉：

加捐懸餉  
 預提節省工伙  
 積引成本  
 籌補懸餉

西埠各款：

西稅  
 坐平  
 船頭  
 鹽規  
 秤羨  
 飯食

以上各款，係應隨同正餉完納奏銷，入撥派捐七分，彌補懸餉帑息。

籌捐潮橋運本：

耗鹽價

鹽倉公費

添補修倉

西省捕費

運樞經費

修造米艇

公費銀兩

籌補潮橋缺餉

撥補潮餉

籌撥京餉

奉行扣平

歸商程價

平頭

各行成本

配鹽飯食撥補潮餉

懸餉成本

溢鹽程價

私鹽場羨

潮引成本

籌捐軍儲

白鹽加價

寄庫銀兩

西關地租

八旂菜鹽羨

鐵稅

鐵規小禮

部稿規

攤捐銀兩

緝私經費

外銷充公

京羨

場羨

溢羨

溢鹽撥補場羨

溢鹽充公

公所還庫工貨

公所私鹽變價

寄庫舊欠

賞借息

旂人養贍息  
 旂舉水脚息  
 軍裝息  
 龍王等廟息  
 育嬰堂租息  
 故員襯屬回籍路費息  
 越華息  
 加增越華息  
 端溪息  
 運樞息  
 馬谷價息  
 龍門協息  
 公捐掩埋息  
 賠補買馬息  
 粵端息  
 粵秀息  
 添補粵秀息  
 馬匹變價息  
 普濟堂息  
 快艇息  
 西省捕費本息  
 洋船變價息  
 雲南土練本息  
 塾台水柵息  
 修置軍械息  
 鹽本本息  
 住堂乳婦經費本息  
 嬰堂閏月經費本息  
 潮局本息  
 籌裕米艇修費本息  
 乾嬰口糧息  
 潮橋塾款本息  
 緝私經費本息  
 水脚息

鹽務陋規名目：

西場程價每包銀伍分五釐，東場銀四分五釐，東西場潮塾銀五釐。以上繳庫。

運房飯每包一分二釐

庫大使每包三釐六毫

書差又七毫二絲

經歷司每包五毫  
批驗大使每包五毫  
運房茶資每包不計，按每套程三錢六分  
海運房飯每包二釐二毫  
程費每套三兩一錢五分  
繳程價每百兩補火耗一兩八錢  
又，加平六錢  
報單庫收每張五分  
電茂程到場，每包官規七分四釐二毫，防虞九毫七絲七忽  
扛籬三釐八毫五絲  
雜款三釐四毫大船加倍  
晒價一錢六分六釐二毫，駁船二分五釐二毫 此二款可領回三四成，賣與商人抵完價款。  
茶水一毫八絲  
圍巡一分四釐  
廠規一分四釐  
票差一釐二毫九絲  
飯食一釐  
房費釐九毫五絲  
查船三毫五絲  
量船三毫  
小費零星各款一釐五毫。

博茂程到場，每包  
官規七分四釐二毫，  
防虞二釐八絲  
扛籬七釐六毫  
雜款六釐八毫大船加倍  
晒價一錢五分六釐二毫，駁脚三分三釐 此二款可領回三四成，賣與商人抵完價款。  
茶水三毫四絲  
圍巡一分四釐  
廠規一分四釐  
票差一釐六毫  
茶烟七毫二絲大船加倍  
房費一釐九毫五絲  
針秤一釐五絲  
掛號三毫五絲  
平頭九毫五絲  
小費零星各款七毫二絲

礮白程到場費用：

每百石大船十九元，小船十七元。  
計每百石回關，約成一百四十包。

大洲程到場費用：

每百包六兩三錢

雜項每船十兩八錢九分

每船炮台武營費二元

此外，各場費用多少不等，隨時增減。且程船甚少，大約西場如電茂、東場如礮白大洲。

程船到虎門：

截角丈量費每船四兩五錢

封牌一兩四錢

鹽更一兩四錢

香資一兩四錢

程船到東關：

丈量船頭每船二兩一錢

丈驗蓑衣鹽八包

每日開秤更鹽，隨時增減不定。新秤由數包增至二十餘包，舊秤一包。

緝私丈量蓑衣綱鹽八包，另每日開秤一包

痲瘋每船三錢

武廟燈油每船三錢六分

程船放東關監掣：

北柜每百包船頭一錢五分，一百至二百餘包均半元，三百餘包一元，四百餘包二元。

中柜每百包一錢五分，包頭一錢三分，一百至二百餘包二錢，三百至五百包半元，五百至九百餘包一元，一千包以上二元。

西柜每百包釐頭一錢五分，包頭一錢三分，每船清艙三元各柜同。

西關程鹽批驗：

每幫醮金七錢六分不計船數，每包飯食三釐五毫。

船頭：

北江每船二錢五分。

連陽一錢。

西江六分五釐。

中柜六分均九五折。

點包：

西江每包二釐五絲。

中北江一釐均七折。

放關：

每包一毫一絲二忽五微，又一毫五絲，又三絲七忽六微，換照每包九毫三絲三忽，又三毫三絲三忽。

商人配鹽，除繳庫各款外，每包：

運房飯六釐，三首領連房飯共一分一釐，堂禮五釐。督撫署三節兩壽，送巡捕門上，並商家紅白喜事。

商人繳完餉價：

餉價雜款（每百兩）平餘。

運署：四錢

門上：五分二釐

庫官：二分四釐

庫吏：二分四釐。

撥抵價款期溢（每百兩）：

運署：二十兩

門上：三兩

運房：二元

庫大使：一元

又按每船房費一錢一分，稟東三兩一錢八分。

正價（每百兩）：

經歷：一錢八分五釐

庫大使：一錢八分五釐

此二款近聞在運房撥祇項下分出

正餉（每百兩）：

庫官：三錢

庫吏：三錢融餉八五折

商人送運署：

每月費四百七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

新任並三節兩壽

臨全：六百元

樂桂：六百元

連陽：五百元

雄贛：二百元

門包加二

包價每個九釐，久不發作送款。

每年送鹽修二百兩。

銀號送運署：每月月標一百兩。

各場送運署（新任三節兩壽）：

電茂：二百兩

博茂：二百兩

大洲：二百兩

礮白：二百兩

門包加二

運署新任商人供應三日，每日折銀五十兩。

### 運司呈繳三七搭拆各案

為呈繳事。現奉憲臺剗開。前據該司面呈清摺，內開：同治五年，委員韓守等稟覆雄贛埠原案，受融一包，准受外埠籌補引一包，外埠精引一包。請嗣後毋論籌補引、積引，一律稟受，毋得只受籌補引而不受積引。仍舊與本埠引目，正融皆七，而積引籌補皆三，以相撥拆一案。又，臨全埠於同治五年九月間加三，覓引拆配，改為三七融受外埠，已完成本積引搭拆一案。又，樂桂埠於同治六年，援照臨全等埠，覓融外埠，已完成本積引三七搭拆一案。又，連陽埠於同治六年十月，准覓外埠，已完成本積引，與連陽本埠及帶辦浚洸兩埠，正引三七搭拆，不入比較一案。又，封富埠於同治七年九月，准俟三年分引目拆清後，援案融受外埠已完成本積引，與本埠引目三七搭拆，並照本埠拆正引之例，每包仍帶完舊欠五分一案。以上五案卷宗，現在本部堂應需查核，亟應委員飭提。合就剗飭。剗司立即遵照，將前項各案卷宗檢齊封交委員賚呈來轅，以備查核。切切等因。奉此遵即照依提取各案卷宗，一併檢齊，給交委員賚赴憲轅呈繳，云云。

摺開：

呈詳易承榮等續辦雄贛埠務三年由一件。

奉准易承榮等續辦雄贛兼帶始興、翁源埠務由一件。

剗諭臨全埠應完隨價之鹽倉等款五成完繳以裕轉輸由一件。

連陽埠覓融外埠積引，與本埠正引三七搭拆分飭知照由一件。

封富埠拆銷三年分正引准其融受外埠積引三七搭拆由一件。

公所委員徐以煊稟覆梁履和等，供辦樂桂埠，每年加配懸引五萬包加三搭拆稟一件。

### 候補鹽大使劉元標稟給還儘先插委二次批

查劉元標前在香山縣獲盜原詳，請給儘先超委一次，業已批准。嗣於同治五年四月批定新章以後，劉元標忽又稟府，詳請改獎，儘先插委二、三次，貪求無厭，本為可鄙。本部堂念其効力在先，准給儘先插委一次。乃劉元標旋被張辰照、彭懋采等訐其改獎取巧，批由該司議詳。張辰照等係因爭缺妄稟，本部堂即批飭將張辰照等記過停委。所出雙恩場之缺，不准爭缺各員署理。而劉元標于批定獎案，事閱多載，擅請改獎，亦不無取巧之心。故飭註銷改獎，仍按新章記功，以昭畫一而免藉口。茲劉元標輒敢稟請給還儘先插委一次，又請再給儘先插委一次，荒謬已極！本應予以懲處，惟念劉元標前次獲盜，不無微勞可錄，姑准給還原獎，儘先超委一次，仍照原批日期註冊。經本部堂此次格外從寬之後，劉元標若復貪競居心，不知自愛，定當從嚴參辦！仰鹽運司轉飭劉元標凜遵。此繳。稟鈔發。

奏為查明前任運司，擅減鹽商課餉，數目頗鉅，並經手庫款，亦有未收未解，請旨飭調來粵清理。恭摺具奏：

仰祈聖鑒事。竊照兩廣鹽務，自軍務平定以後，自宜日有起色。查前任兩廣鹽運司方濬頤，于上年九月間卸事時，曾據具稟，任內徵解課餉實屬有盈無絀。臣瑞因查所開數目不符，飭令接任運司孫觀覆查開報，旋據孫觀開摺呈送，數目仍屬不符，復飭詳細再查。又據孫觀稟覆，以方濬頤任內款目繁多，查覆有稽時日，嗣因久未查覆，疊次劄催。茲於本年七月二十三日，據孫觀造冊稟覆前來。臣瑞細加核看，查兩廣每年額徵課餉銀六十三萬九千三百餘兩，方濬頤自三年六月初十日到任起至十二月止，是年收正餉銀二十九萬五千六百餘兩；四年收正餉銀五十九萬一千五百餘兩；五年收正餉銀四十五萬二千一百餘兩；六年收正餉銀三十九萬七千八百餘兩；七年正月起至九月初三日止，收正餉銀三十萬五千六百餘兩。是方濬頤任內徵收正餉，年少一年，深為詫異！然方濬頤在任時，從未據實開報。又閱孫觀冊造，尚有前司業已解存，及方濬頤任內未收未解各款，共銀四十九萬一千九百餘兩。此項亦未據方濬頤報過，不知因何虛懸，自應查明清理。臣瑞又飭孫觀細查，方濬頤任內經徵商課有無未妥，旋據孫觀開摺呈送查閱。摺開：方濬頤任內有批准臨全、封富、連陽、雄贛、樂桂各埠商減免課餉各款。檢查臣瑞衙門檔冊，未據方濬頤稟詳有案，復將運署底稿調來查閱，確係方濬頤自行批准，埠商減免計共一年減收正雜各款：銀八萬一千餘兩。內有樂桂一埠，曾據方濬頤于六年二、三月間，兩次具詳請准該商梁履和等，加三搭拆免完成本雜款。臣瑞俱已批駁不准。現閱運署底稿，方濬頤係於是年四月間批准照辦。查鹽政係臣瑞專管，即尋常公事亦應申報備查，况減免課餉，有關庫款出入，例應稟詳候批，方成政體。乃方濬頤於臣瑞兩次批駁之件，擅准照辦，未悉何故。即因體恤商情，亦應斟酌商辦，何得擅自准行？以致庫款有虧，鹽務積弊多端！黠商營謀最巧，亟應查明整飭。相應請旨，勅下兩江督臣轉飭現任兩淮鹽運司方濬頤，交卸來粵，趕將庫款課餉清查歸補，以重款項。臣等會商即委廣東布政司王凱泰、廣東督糧道貴珊，酌調鹽務熟悉人員，設立清查局，將兩廣鹽務澈底查明整理，以除宿弊而裕餉源。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連陽埠：每年額完正餉銀二萬六千七十一兩三錢五分八釐，除受三成外埠已完成本、積引不計外，每年短收正餉銀七千八百二十一兩四錢八釐。每年額定雜款銀三千六百七兩九錢伍分九釐零，除同前外，每年短收雜款銀壹千零八十二兩三錢八分七釐七毫零。該埠帶辦清遠、浚洗二埠，每年共認完正雜餉銀四千七百二十二兩七錢二分八釐，除同前外，每年短收正雜餉銀一千四百十六兩八錢一分八釐零。

樂桂埠：每年應完正餉銀九萬四千三百二十八兩八錢八分七釐，除三成搭拆不計外，每年短收正餉銀二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兩六錢零。每年應完雜款銀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兩二錢六分，除同前外，每年短收雜款銀三千八百二十五兩零。

臨全埠：每年應完正餉銀六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兩六錢八分八釐，除三成搭拆無餉之鹽不計外，每年短收正餉銀二萬六百九十兩九分零，每年應完雜款銀一萬四千一百七十四兩八錢二釐零，除同前外，每年短收雜款銀四千二百五十二兩四錢四分零。西稅不在此內。

雄贛埠：每年應完正餉銀三萬三千九十七兩六錢八分四釐，除三成搭拆積引籌補不計外，每年短收正餉銀九千八百二十九兩三錢零，每年應完雜款銀四千二百四十六兩七錢八釐零，除同前外，每年短收雜款銀一千二百七十四兩零一分二釐零。

封富埠：每年認完正餉銀一萬二千三百三十三兩九錢六分七釐，除三成覓受外埠已完成本、積引不計外，每年短收原認正餉銀三千七百兩一錢九分零。每年認完雜款銀一千五百四兩三錢四

分五釐六毫零，除同前外，每年短收雜款銀四百五十一兩三錢三釐六毫，西稅不在此內。

連陽埠，及帶辦清遠、浣洗兩埠，自同治六年十月起，八年七月止，短收正雜餉銀壹萬八千六百五十九兩六錢一分六釐。樂桂埠自同治六年四月起，八年七月止，短收正餉銀六萬六千九十六兩七錢二分；雜款銀八千九百二十四兩八錢零。臨全埠自同治五年九月起，八年七月止。短收正雜餉銀七萬二千七百四十九兩零。封富埠自同治七年九月起，八年七月止，短收正雜餉銀三千一兩五錢三分六釐零。雄贛埠自同治五年十一月起，八年七月止。（無下文，第79面右葉）

### 督撫雙銜劉東藩司軍需局鹽運司西鹽道

為劄飾籌議事，案據廣西鹽法慶道來稟，請催提運庫欠解西稅云云。照督署洛文寫於稅餉兩項，頗有實濟等因，分別咨行查照在案。茲會查西稅係西鹽道應收之銀，而懸欠在商在埠，非久自運司也。本年部撥廣西月餉二萬兩，聲明無論何款，設法籌解。今將課餉撥給抵欠，即係無論何款之一端，應行奏咨辦理。且現年課餉湊給西鹽道辦理積欠，西稅奏銷則東省課餉必形短絀，所有東省課餉奏銷及部撥京餉，本省兵餉如何統籌兼顧，均應預為計議。而京餉省餉兩項，應飭東藩司及東軍需局司道會同妥商，方得周匝。合就劄飭。劄到該藩司總局司道、運司監道即便會同東軍需局司道監運司西鹽道、藩司鹽運司西鹽道、藩司軍需局司道西鹽道、藩司鹽運司軍需局司道公同妥議章程，迅速詳辦，并移運司該運司并鈔錄嘉慶年間，將西稅鹽規等銀，改由東省兌收移解西省全卷。及西省各埠原定額餉額稅，每包若干，現在減至若干。開造清冊，歸案會議，仍先鈔錄呈核。再查近年鹽務疲敝，餉稅兩絀，大率由於西省抽收鹽釐過重之故。西省開辦鹽釐之初，係因梧州失守，商亡埠絕，勞前部院變通成法，抽收私鹽釐金，暫濟急需。所抽之釐倍重於餉稅，是以上年東省請將釐金撥抵西稅。西省已有遵辦之文，乃遷延至今，尚未辦理。其鹽釐一項，僅於同治二年每包酌減七錢二分，尚抽至一兩數錢。東省不得已減輕餉稅，遷就西省十有餘年，億不可支，以官商配運之引鹽。西省仍照前時私鹽抽辦，致令稅餉因之兩虧。本屬無此政體，今既另議東省餉課，撥完西稅，不由西省釐金撥抵，非將西省鹽釐大加裁減，由東省加增餉稅，何以漸復舊章？課稅整飭無期，關係實非淺鮮。此一節近年屢次咨商，西省延未咨復。茲值西鹽道來粵會議撥抵鹽稅事宜，亟應即由該運司檢齊十數年來與西省商辦減釐始末案由。與西該鹽道就近議定減釐數目，詳請奏咨定案，以免周折稽延。

西稅每引例完銀七錢八分五釐九毫八絲九忽。

### 雄贛埠逃商虧帑責令徐以煊賠繳批

查雄贛埠自同治五年十一月間，經方前司飭委候補知府韓鳳翔會同三首領公所委員，督同辦事商逐一釐別，查得該埠原辦只有八商，續後添至二十六商。於各商中選擇殷實者十二商，將蔡德和改為金祥順，皆註本姓名，並將更換商名保結總結，及各商姓名、籍貫、房產，開摺詳送本部堂衙門查核。其時韓守等酌議，該商不繳現餉現價，名為體卹起見；而於節省等銀，仍應預提分五釐工貨，以及首領房飯等款，毋庸核減。當時議論，本屬重私輕公，然商人承充引埠，使委員及辦事商為之如此調停，所需使費定必不少。本部堂只期課餉不誤，亦不復逐底追求。迨後金祥順忽又改為“邱記”“翼記”。據詳，係邱位儂、金翼堂合辦，既與原呈姓名、籍貫毫不相同，自應詳明改充，乃公所督辦委員徐以煊等，請照如此辦理。且謂有該員等在外稽查，其完庫及署中一切公事，同用“金祥順”商名，倘有貽誤，仍惟“金祥順”商名是問。是徐以煊等胆敢私准改充，並不取結詳明存案，已屬胆大妄為！而云有該員等在外稽查保承，何等著力？委員肯替商人如此吃勁，其中情弊本已顯然。乃云“倘有貽誤，仍惟‘金祥順’商名是問”，此為欺人之談！

查金祥順引埠既易邱姓、金姓合辦，所謂金祥順者，徒具虛名耳！而曰“倘有貽誤，仍惟虛名是問”，豈非奇談？查前詳將“蔡德和”改為“金祥順”，據稱皆註本姓名，何以改名私充之時，並無金祥順在場？抑或當時所改之際，亦屬有其名而無其人乎？實為難解。現在邱記、翼記逃遁，而應問之金祥順又何在耶？虧帑至二萬餘兩之多，房已搬空，人已逃遁，而力任稽查之徐以煊又何在耶？即使查抄變價，尚有幾何？當時委員，為之調停著力，不知商人費多少貲財。刻下商人逃避，徐以煊仍得置身事外，不過曰“另招殷商承充”而已。然則所虧者公項，所肥者私察，情法豈得其平？何以方前司于徐以煊等私准改充，一任朦蔽？而徐以煊等營私舞弊，罪尤難恕！仰即嚴拏逃商，監追並查抄財產變抵，勒限一月內如數繳清。倘逾限不繳，或繳不足數，責令保准私充之徐以煊等賠繳。如徐以煊等不自引咎，猶敢狡卸，本部堂定行親提該革商訊問。諒當水盡山窮之時，該革商無不盡情吐露，何難水落石出也？切切！此繳。

### 運司詳覆雄贛埠逃商欠餉請寬限籌繳批

邱記、翼記既有如許存引，何致逃遁？該司不將雄贛埠招商接辦，但令徐以煊招致水客行鹽。本部堂姑且不問。茲徐以煊僅完商欠九千餘兩，暫免參革，仍先摘去頂戴；再限一個月，勒令徐以煊將未完銀一萬三千六百七十餘兩如數全繳。倘敢飾延，屆期定行奏革，未必再待司詳也！仰即嚴飭遵照。此繳。

### 德慶埠商爭奪承辦批

據稟，該商初與楊庸軒夥辦德慶埠。於同治四年，楊庸軒退頂，寫立契約，由該商承辦。如果屬實，契約開載明晰本已斷絕葛藤，若該商果能餉款全完，楊庸軒何得再啟爭端？據稟，楊庸軒申謀公所委員徐以煊、總商馮逸林等，詭名稟承，而徐以煊等偏袒朦蔽，阻撓不許拆動額引等語。查徐以煊前以雄贛埠“金祥順”商名私准邱記、翼記改充，徐以煊担承甚力，朦成其事。迨後邱記、翼記虧帑逃遁，本部堂即察知徐以煊弄權舞弊，將來邱記、翼記虧帑無著，定惟徐以煊賠繳也。今該商託其申謀朦袒，固難保其必無。而本部堂細察該商承辦埠務，亦成強弩之末，力所恃者陳裕德為之代完餉款，暫時敷衍，此後不知能否完餉，亦屬難定。至於開辦限期，減輕成本，皆屬該商取巧，斷不能准。惟德慶埠於該商未充以前，本已虛懸二十餘載，既經該商辦有起色，自應責令酌增加成納課。查閱粘呈，運司所批“李文鈴既非德慶埠商，楊經常承辦未久，私自頂退，應行招商另充”等語。檢查原卷，頂德慶埠者易經常也，並無李文鈴、楊經常之名。而運司所謂楊經常承辦者，何時准其承辦？何年詳准有案？實所未解。商人承辦引埠，如果餉課無誤，即使另易商名，何妨詳明更換？堂皇正辦乃鹽務公事，往往藏頭露尾、移步換影，總由不肖委員從中把持、播弄，任情顛倒，得售其奸。以致鹽網廢弛，不成公事，實堪痛恨！仰鹽運司查明該商前承五年餉課無誤，不得輕聽委員、總商之言，亦不許楊經常藉口爭奪，仍准該商承辦，但令加成納課，以顧正款。倘或以直為曲，以非為是，致使鹽埠疲壞，不可救藥，亦惟有執法從事！本部堂為鹽務疲壞，日夜焦憂，不知何法可期整飭。該司責有專司，尤當秉公持正，悉心籌辦，庶期日有起色，毋為劣員奸商朦蔽，致使不可救藥也。慎之！此繳。

### 鹽廠委員稟拏獲鹽斤請派銷批

查前經通飭緝私委員，務期人鹽并獲。一以究梟販之行踪，一以查私鹽之來歷。定章本有深意，乃近來緝私委員總以鹽犯逃遁為詞，千篇一律，起獲鹽斤，意在一半邀賞。若皆似此存心，惟利是圖，其異於梟販者幾希？無怪匪踪至今不能淨絕，走私之場埠亦無從破案，鹼綱何日得有

起色？應再明立章程，嗣後獲鹽不獲犯之案，只准以二成充賞，八成歸公，以杜其弊。茲閱該委員來稟，共獲私鹽十四萬六千餘斤，並無一犯就獲，此即緝私之通弊，而稟內沾沾以派銷充賞為務。查前據東江埠商鄧時宜具稟，委員收買私鹽，抬價勒銷，以致商累益重。即經批飭，查辦在案。今該委員既請派銷，並不將鹽斤銷價聲明，藏頭露尾，其弊顯然！不過欲藉上司批示，為抬價勒銷之具耳！仰鹽運司會同東布、按兩司，通飭緝私各員弁遵照，並令該廠委員將因何派銷鹽斤不將價值聲明之故，即日明白稟覆察核。一面由司嚴查此項鹽斤究竟有無買私勒銷情弊，據實詳辦。仍候咨明撫部院查照。繳摺存。稟鈔發。

#### 劄司裁革鹽房承辦奏銷陋規

為飭遵事：照得粵網鹺務，埠懸餉匱，已有江河日下之勢。本部堂憂心如焚，無術補救。前經查知餽送各衙門食鹽一項，諭飭禁革。茲查本衙門鹽務房書吏，每辦殘引、省河、潮橋各奏銷，向請另提工食及桌椅、板橙等項，該司視為舊規，亦准折價領取。現在鹽務敝敗、課餉匱乏之時，豈容有此陋規？應即永遠裁革，以節浮費！合亟劄飭。劄到該司，立即遵照備案。



##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投稿須知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為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與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合辦的學術期刊，創刊於2024年6月，是中外關係史、明清史（港澳史）、海外漢學、基督教傳華史及海上絲綢之路城市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研究領域的專業刊物。本刊以“立足專業、服務國家、面向世界”為辦刊方針，旨在促進相關領域研究的繁榮和發展。

本刊歡迎國內外專家學者賜稿，投稿注意事項如下：

1. 來稿不限所使用的語言，中文也不限簡體與繁體，字數以2萬字為限；

2. 來稿文責自負，必須為原創且未經其他期刊以任何形式發表或出版，稿件一經採用，本刊可以任何形式發表或出版，或經本刊授權其他個人或單位以任何形式發表或出版，惟投稿3個月後仍未獲任何回覆，則可另投他處；

3. 本刊有權刪改來稿內容，如不同意，請在來稿中注明；

4. 為了統一規範論文的撰寫、編輯、印刷以及為了便於論文處理、儲存、檢索、利用、交流、傳播等，投稿之論文格式請參照本刊《體例要求》（請與編輯部聯繫）；

5. 來稿須同時以WORD檔格式電郵至[journalmsr@126.com](mailto:journalmsr@126.com)/  
[journalmsr@hotmail.com](mailto:journalmsr@hotmail.com)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編輯部



ISSN 2958-9657



9 772958 965007 >